斯德哥尔摩情人

[智利] 罗伯特·安布埃罗 / 著　赵德明 /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主人公克里斯托瓦在智利政局急变后，移民到斯德哥尔摩，从事侦探小说创作。一天他无意中发现妻子有成人性爱衣物，而妻子没有在他面前穿过。他怀疑妻子有外遇，正为此而苦恼困惑时，邻居的妻子死于安眠药服用过量，警方认定是自杀。但邻居家的女佣坚持说是他杀，并把证据透露给克里斯托瓦，可惜不久她也被谋杀。

主人公跟踪做艺术品生意的妻子与一俄国男人见面，赶上两人发生争吵并爆发打斗，他冲进屋里帮妻子的忙，在情急之中用台灯砸死了俄国人。两人仓促逃离现场。不久，一个自称在湖边看见他们杀人的嬉皮士女孩前来敲诈，这个口子还没封住，邻居又声称拿到了他们作案的证据，神通广大的探长也一步步逼向他们……

小说将情爱、仇杀、亡命、破案诸因素糅为一体，而将之巧妙地融入真实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收到有虚有实，亦奇亦幻的效果。作品发表当年即名列 2004 年度智利畅销书排行榜第一位，并引起国际文坛的注意。西班牙评论家塞拉诺称扬它“充满激情，是近年来少见的优秀作品”。


北京硕良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策划


ISBN 7-5354-3055-4
9 787535 430557 >
定价：18.00 元

斯德哥尔摩情人

[智利] 罗伯特·安布埃罗著　　赵德明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德哥尔摩情人/(智利)罗伯特·安布埃罗著;赵德明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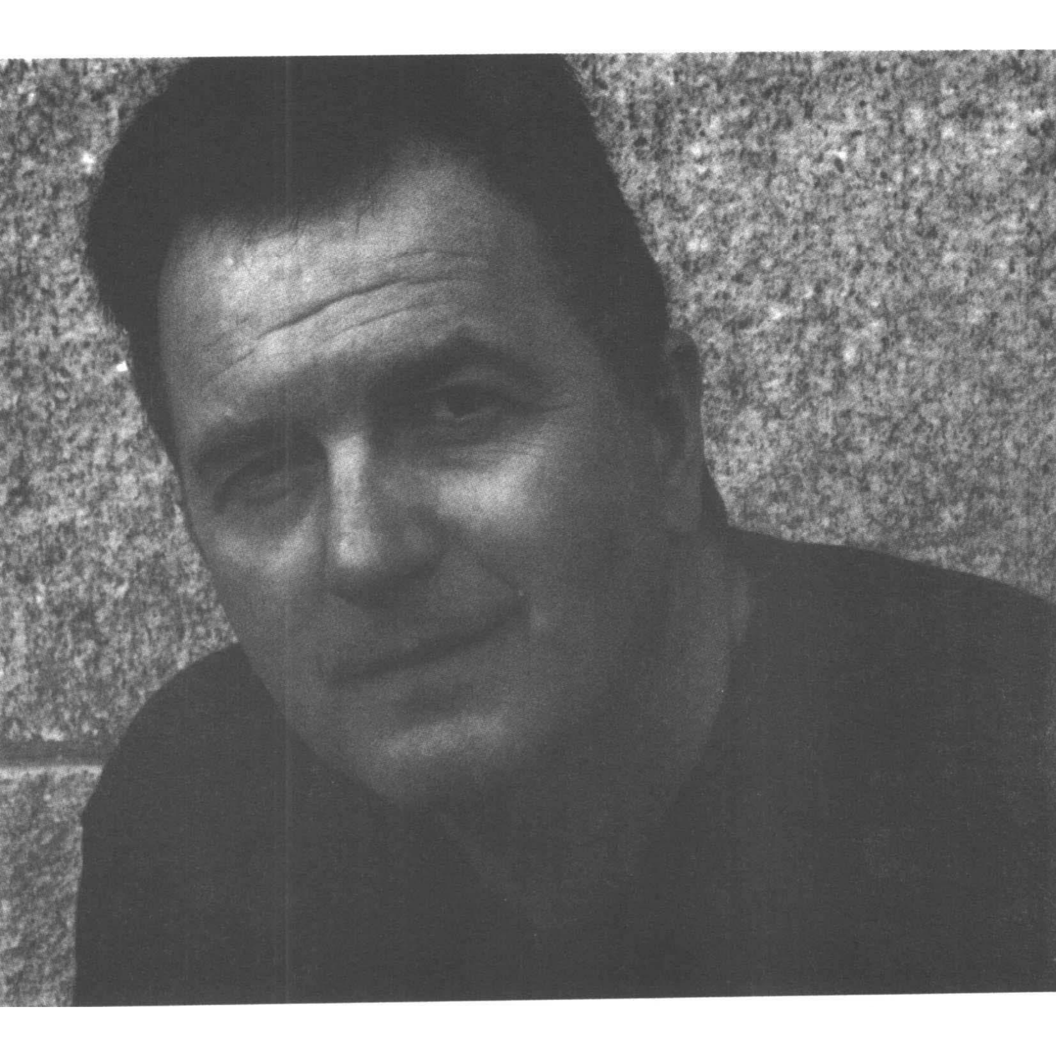
ISBN 7-5354-3055-4
Ⅰ.斯…
Ⅱ.①罗… ②赵…
Ⅲ.长篇小说-智利-现代
Ⅳ.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4936 号

策　　划:刘硕良　吴　超　　　美术编辑:吴　寒
责任编辑:赵赤勇　霍　晶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峰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20×1280 毫米　1/32　　印张:8.5　　插页:2
版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9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8.00 元



[智利] 罗伯特·安布埃罗(1953——)

·译本前言·

无望的逃离

赵德明

2004年春天，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有个研究生去智利出差。我委托她买一本当年畅销的长篇小说，就是这本排行榜第一名的作品——《斯德哥尔摩情人》，作者名叫罗伯特·安布埃罗，今年五十岁，是智利文坛上的当红作家，已经出版了好几部作品。

正当我阅读《斯德哥尔摩情人》的时候，智利驻中国大使馆一位文化官员告诉我，罗伯特·安布埃罗青年时期留学古巴和民主德国。他的许多作品是讲述近三十年来智利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的。他的5部长篇小说均获得国内外重要奖项，5年内再版42次。他的作品除热销拉丁美洲国家外，还在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广泛流行。目前作者定居美国，在佛蒙特州大学讲授拉丁美洲文学。评论界对于他的作品更是好评如潮，西班牙文学评论界代表人物马赛尔·赛拉诺说：

“《斯德哥尔摩情人》是一部充满激情的小说，是近年

来少见的优秀作品。作者讲述的故事神秘莫测，真假难辨，结局出人意料，而情爱成分又能与杀人犯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读者不得不一口气读完。作品的语言新鲜，充满活力。作者视野开阔，善于营造气氛，观察人生与社会入木三分，故事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学理论支撑。”

《斯德哥尔摩情人》的主人公克里斯托瓦是从智利流亡到瑞典的作家,擅长写侦探小说。故事的开篇写道:一星期前,我邻居的妻子死了。故事由这一偶然事件引发逐渐展开。不久，邻居家的女佣主动向他透露此事的可疑之处，正当作家好奇地关注女邻居死因的时候，无意间他从一小袋自己从未见过的情爱衣物，发现妻子可能有外遇，顿时醋意大发，疑窦丛生。他秘密跟踪妻子，越来越多的疑点显露出来，使他痛苦不堪。一天他跟踪妻子到一座豪宅，发现与她约会的是个俄国人，两人不但没有偷情反而爆发激烈的争吵和打斗，情急之下作家上前帮忙并失手将俄国人打死，随后夫妇俩破坏了现场，并将手枪等证物带回家来。不料在家门口遇上有杀妻灭佣嫌疑的男邻居。夫妻俩正惴惴不安时，探长董甘登门调查女佣被杀案，希望作家夫妇提供线索，但探长好像醉翁之意不在酒，更关心夫妇二人在智利时的情况，原来探长也是从智利流亡到瑞典的，他在前政府做安全保卫工作，与作家妻子的父亲是不同阵营的对手。夫妻二人越发心神慌乱起来。一个嬉皮女孩声称目击了作家杀人一幕，公然向他敲诈，接着邻居找上门来，声称掌握了他们杀人证物，更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为了尽快脱身，他们只得一面对女孩花钱消灾，一面同邻居达成妥协。不料作家只身逃到葡萄牙小岛时，又与探长狭路相逢，全书结尾处探长的报告在无限惆怅中抖出了谜底……

这部小说我读了两遍，让我感到惊异的是，一部貌似侦探小

说形式的作品怎么会包藏着如此沉重的情感呢？怎么会包藏着如此苦涩的人生哲理呢？怎么会对貌似“绝对真理”的主义产生如此深刻的怀疑呢？怎么会在绝望的情绪里怀抱着对人类理想的期盼呢？在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 1963—1966 年我在智利大学教育学院读书时结交的一些拉丁美洲的留学生的身影。他们的房间里张贴着马克思、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大幅肖像，经常谈论着古巴革命的重大意义，向往着拉丁美洲的光辉前景。我还回想我们同智利社会党领袖、总统候选人阿连德先生的一次畅谈。在那次谈话中，阿连德先生畅想了智利的社会主义前途。现在我还记得，那时的拉丁美洲在古巴革命胜利的巨大影响下，的确涌动着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企图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的痼疾，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1970 年阿连德在大选中获胜，当选为智利总统。他上任后立刻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把大工业收归国有，在农村建立合作社，要求企业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改善穷苦百姓的生活状况。这一系列革命措施触动了智利大资产阶级和大庄园主阶层以及美国在智利的利益。1973 年 9 月 11 日，皮诺切特将军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社会党政府。阿连德总统英勇地战死在总统府。皮诺切特军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逮捕、大搜查、大清洗。被捕、被杀和失踪的人数多达几万人。大批左翼人士流亡国外。《斯德哥尔摩情人》的作者也是其中之一。这些人在流亡期间经受了种种磨难。而最大的折磨是心灵里的困惑和强烈的思乡之情。尤其是在 1990 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以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让他们更加迷惑不解。他们不仅怀疑种种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而且怀疑具体的人际关系，甚至怀疑自己的亲人和同志。而他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是大量事实教育的结果，因为他们一再上当受骗。他们的结论是：世间除去假话和假货是真实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人人在说谎，个个在欺骗。本来

他们是用‘ 自私自利 ,尔虞我诈 ’来批判敌人的 ,现在是情人、亲人、同志在实践这个弱肉强食的法则了。《斯德哥尔摩情人》中的作家把社会主义思想看作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固然说明了他政治信仰的动摇，更说明了他在实际生活里遇到的具体困难让他感到无可奈何，所以他的死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与作家持相反态度的则是探长董甘。他长期在左翼营垒里担任情报和保卫工作 ,流亡到瑞典后 ,他虽然当上了警察“ 为反动政府服务 ”,但是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理想 ,坚信‘ 报春的鸟儿一定会来临 ”。他那坚毅的性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把胜利和失败看成是家常便饭。

《斯德哥尔摩情人》能成为畅销书有它特有的真实背景和社会氛围，还有其自身独具的风格。小说主人公是侦探小说作家，是设计、掌控自己作品人物命运的主宰，而在生活中则多少有些无奈地被命运牵着鼻子走，按照作者的话：发生的事，在他的小说中都不一定出现。一切都是扑朔迷离，前路无迹可寻，不知会发生什么。而他美丽、能干 ,开朗奔放的妻子更是不能信任的人，时刻都在跟他演戏。他的人生就是编织在一张充满谎言、怀疑、欺骗的大网里。人生的无助感和内心的孤独注定了主人公永远处于逃离状态。这种人生的疏离正是时下的一种普遍状态，是人们信仰的缺失和社会日益功利化、世俗化造成的。在这里作者也提出了问题：当生活质量提高了，精神质量就必然提高吗？在智利国内时主人公不堪军政府的独裁统治，向往北欧自由、民主的生活 ,但‘ 逃 ’到那里 ,却发现精神上根本不能与之相融。生活在天堂里，可精神却依旧在地狱里受煎熬。作家敏锐地抓住这样一个题材 ,融入侦探、情爱、仇杀等多种流行因素 ,用侦探小说的形式囊括了深远的社会问题和情感问题。

所有这些作者都没有给出答案也没有半点说教，读者掩卷之后却不能够回避这些问题。我看完这部作品的第一个印象就

是,这部作品不仅情节曲折、生动引人、故事跌宕起伏、结局出人意料，显示出当代拉美文学的圆熟和功力，而且有超乎一般通俗作品的不俗的见解，甚至不乏发人深省的道理，是值得介绍给我国读者的。正好这时著名的出版人刘硕良先生来约我策划一些当今的拉丁美洲文学作品。我就趁热打铁把《斯德哥尔摩情人》介绍给了刘先生。这位出版界前辈果然慧眼识金，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选题，催促我提供相关资料。最后长江文艺出版社取得了中译本的出版授权。接着，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斯德哥尔摩情人》的翻译工作终于结束了。内中的苦乐我正在慢慢消化。现在只希望《斯德哥尔摩情人》能够让中国读者有所收益就好。

2005 年 5 月 18 日

于山东日照教授花园

目录



一星期前，我邻居的妻子死了。可是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这个消息实在让我太感到茫然了，闹得我无法静下心来继续写这部长篇小说。这真是让人难过。是既难过又吃惊，因为我这个人很少为谁去世而难过，更不要说陌生人了。我从来没有机会认识邻居的太太玛利亚·艾里阿松。可是，今天，她无情地撒手而去，这让我感到痛苦而神秘。

我说过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玛利亚·艾里阿松。就是她的丈夫，我也只远远地见过一面。那是几天前的事，大概是下午两点，吃过午饭，喝了茶之后，我动手修改作品——这是我的习惯 我身旁是小木屋的一面窗户。小木屋是我和妻子租住的，面对着刚刚结冰的波罗的海。从一楼传来阵阵轻柔的音乐，那是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悲伤的华尔兹》。外面，阳光飘洒在白桦林上 我的邻居马尔库斯·艾里阿松和他的几个孩子在花园里给雪人做最后的加工：两个大纽扣用做眼睛，一根又粗又弯的胡萝卜

做鼻子，一条黑色的大围巾系在雪人的脖子上。后来，马尔库斯和孩子们进屋去了，雪人沉思般地注视着那个观察着住宅正面、仿佛期盼着什么的雅典娜女神的雕像。

博耶娜是个波兰女人，她每周来我家两次，打扫卫生，洗熨衣裳，是她悄悄走进我的书房，一面收拾茶具一面告诉我外面发生的事情。我经常去的地方只有一家越南人在斯德哥尔摩开的商店,去买茶叶。

“ 我不知道她有病。”我说道,目光从电脑屏幕上移开,向邻居的房屋望去，那是一座红色木结构住宅，有着斜坡屋顶和白色窗棂,显得非常凄凉。

“ 玛利亚·艾里阿松不是病死的,是自杀。”博耶娜用地道的德语解释说，她之所以会德语，是因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的时候，她借助一笔奖学金在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她是在波兰的科拉克维亚省获得奖学金的，因为她是农业合作社社员的女儿。“ 她喝下超剂量的药物，丢下了丈夫和孩子们。 ”

“ 什么药物 ?”

“ 安眠药。死前,她不想见人。”她解释的口气很有权威性,因为她曾经在那座住宅里工作过，现在那住宅让我感到孤寂和凄凉，如同西贝柳斯的音乐和瑞典剧作家、电影导演伯格曼的影片一样。

“ 既然她感到压抑、沮丧和虚弱，就不应该让她拿到安眠药啊。 ” 我提醒道，好像一个如此充足的理由可以使人起死回生似的。

“ 这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地方。 ”

我责备她没有及时把玛利亚自杀的噩耗告诉我，可是再三思量之后,我想 即使她及时告诉我,对我来说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我会不知如何是好。面对别人的死亡，有某种难以确定的东

西让我感到麻痹；这或许与死亡不能打动我有关。我恰恰认为死亡是人生中最可预知的现象。大概我会给马尔库斯送上花圈，或者唁电，或者穿过花园的雪地登门表示悼念。谁知道呢。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死了，我去表示沉痛哀悼，这合适吗？要不然我做点实际的事情，比如表示我愿意照看他的孩子们做游戏、做作业？天晓得。总而言之，现在做什么都晚了。

“是啊，您本该及时通知我……”

“及时通知……”博耶娜在揣摩我的意思，那口气显得疏远、缺乏信任和具有嘲讽意味，是那种只品尝到生活苦涩而已经失去了品尝甜蜜者的口吻，“克里斯托瓦·帕索斯先生，把个自杀事件及时通知某人，对您来说，是什么意思？”

我装出寻找答案的样子。博耶娜离开了我的书房，心里一定猜想：她把我领进了困境。她在莱比锡肯定是个出类拔萃、热情冲动的女生。她给艾里阿松夫妇工作已经五年了。可是她说，不想回那里去了。她辞工的理由肯定十分充足，因为她每月都不得不给父母寄钱，父母在波兰过着俭朴的生活，每月都得支付房屋贷款。

我放下这部长篇小说的开头部分，因为不清楚究竟如何写下去才好。穿上大衣，出门踏上于什霍姆小区茂密森林包围的宁静街道，这里居住着外交官和跨国企业的高级经理。谁也不会想到瑞典还有富翁。人们以为这里的人都是平等的，可这不是真的。在这里，乌托邦理想也没有实现。对此，我可以证明。我觉得生活在这个特别的地方是很幸运的。两个月前，我和我妻子马赛拉·蒙图法尔用便宜的价钱租下了这座房屋，与周围的豪宅相比，它好像悄悄溜进来似的，因此如果它是豪宅，凭着我俩微薄的财力根本不可能住进来。据说，这间小木屋是二十世纪初来这里兴建于什霍姆豪宅区的木匠师傅们落脚的地方，因此严格地说小屋是挤进富人区里的无产者的住宅。

我们现在居住的这条街道面对波罗的海，名字叫宝灯大道；此前，我们住在甘拉斯坦区的一个单元房里，高高的顶梁柱和琉璃水晶灯泡让人感到亲切。窗户面向一条弯弯曲曲的中世纪小街,街上挤满了商店、餐厅和咖啡馆,使得旧城颇有个性。眼下，我一面踩在覆盖着波罗的海冰层的白雪上，一面呼吸着穿过海面的刺骨的寒冷空气，一面由衷地后悔我们来到这个新地方时没有见见周围的邻居。从前，在甘拉斯坦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虽说在那里不肯与邻居见面不是由于懒惰，而在这里是因为懒惰。那里是因为我们进出大楼时没有遇到过任何人。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方才知道瑞典人是在躲避我们，他们或者从楼梯里出去，或者趁我们不在或者睡觉时坐电梯下去，要不然我俩就是这座寂静得如同陵墓一样的赭色建筑物里的唯一住户。

假如你说在斯德哥尔摩没有时间去完成那些见面的礼节，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是一座省城,生活安静、稳定,全然没有大都会的紧张和喧闹。此外，由于我和妻子马赛拉过着井井有条的生活——也许因为我俩感觉到只有井井有条才能确保我俩工作的稳定,她是古玩商和演员,我是小说家——所以仍然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俩在迁居到新家当日没去拜访邻居。拜访邻居是瑞典聪明而重要的风俗，严酷的冬天很早就迫使人们互相认识、组织起来、互相帮助。因此我俩在于什霍姆区没有拜访邻居就是罕见的事情了。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这样一个事实把我俩给出卖了：我俩离开智利恰恰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为了建立一片解放区以便摆脱父母和亲属所犯错误带来的累赘；一片仅仅建立在我俩现在从事的或者可能有所成就的解放区。

我回到家里，木地板的房间里温暖、干燥的空气包围着我；博耶娜已经走了。或许现在我可以重新开始工作了，可以克服每当写作时就占据我心头的这种感觉：表达不出心里的要说的话，一些人物从心里淡化的感觉，现在做的事情或许可以放弃的感

觉。这个钟点，马赛拉正在参加古玩拍卖会，地点在皇宫后面的一条小街上：阿尔塞纳卡坦。我俩计划在瑞典居住两年多，至少让马赛拉可以巩固她和一些古玩商的联系，这些商人可以让她从事大规模的交易。我妻子的兴趣是做拉丁美洲到瑞典的进出口生意，她认为可以赚钱。在拉丁美洲，欧洲的古代家具可以卖出天价；同样，在瑞典，新大陆殖民时期的古董也可以卖出大价钱来。

我停下笔，确切地说，是推迟重新写作的尝试。我再次透过窗户欣赏邻居的房屋，它耸立在雪地里木栅栏的另外一侧。一只不礼貌的乌鸦落在雅典娜女神的头上，猥亵地乱叫了一阵。叫声之后，小区里再次充满了宁静和孤寂。从我的书房望出去，眼前很像一张明信片。我估计邻居家中空无一人。邻居一定把孩子们安置在某个亲戚家里了，他要设法让孩子们习惯那不可能习惯的事情，习惯母亲永远离去的事实。

据说，瑞典人宁肯掩饰痛苦，也绝不流露出来。不久前，在比克里诺咖啡馆的柜台旁，一个名叫贝贝·克里斯塔的智利流亡者，如今成功地从事二手电脑的买卖工作，他告诉我：他经过一个月的时间才获悉女同事的母亲逝世的消息。这位女同事一直把这个不幸事件留在自己心中，绝对保密，不告诉任何人。瑞典人与我们智利人不同，他们讨厌倾诉感情，不愿意让别人同情。贝贝说，这里的人认为同情会削弱意志，使人跌价。但是，无论如何，我不了解贝贝这些关于瑞典人的话是不是属实。由于我来瑞典的时间不长，消息来源基本上是国外的，因此零星得令人难以相信。瑞典有成千上万的移民，大部分是十几年前逃离军事独裁统治的土耳其人，是躲避皮诺切特政府迫害的智利人，是离开铁托政权的南斯拉夫人。几乎所有的移民都居住在单调的简易楼里，真正是移民特区，与瑞典人的居住区保持相当的距离，但是享受着在他们各自国家不可能享受的舒适与方便。

我一面望着电脑屏幕，上面有等着我修改的稿件；我承认死亡来临的偶然和意外让我惊慌失措、惴惴不安。我把死神想象成一个流浪的老太婆 没有牙齿、冷笑、无情、不合时宜地决定在随便什么人家里寻找栖身之所。一星期前，死神可能没有任何充足的理由就在邻居家破烂的台阶上坐下来，盘算着如何把致命的黑影笼罩在那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身上。但是，那个没牙的老太婆完全有可能坐到稍稍北边、我家的台阶上。那样的话，死神带走的就是我，而不是玛利亚·艾里阿松了。

如果是我死了，那么让我担心的这些大事就不会发生了，或者以另外的方式发生，这实际上会对我有好处，因为我就不必经历本书我正准备讲述的难言经历了。



自从我知道玛利亚·艾里阿松的事情以后，已经过去几天了。那座住宅依然没人，依然沉浸在宁静里，依然处于一种被人弃置的状态。的确，有的人家欢乐，有的人家忧愁，也有类似邻居这样的人家似乎永远保持缄默和无望的状态，好像没有灵魂和气息。是房屋投射出这样的形象吗？还是我们给房屋贴上了自己的标签？仅仅是昨天，大约是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候，天空开始放晴，在远方，透过海岸边的浓雾，在冰封的海面上，隐约出现一对男女在滑冰，这时我看见有辆汽车行驶在街道上。汽车在邻居家的花园里、面对车库停下来。从书房里，我费了一阵功夫才认出邻居来，因为我距离他较远，而他又戴着帽子穿着潜水服。半个小时后，他就走了，大概是因为不能较长时间停留在一座充满悲伤回忆的住宅里。

博耶娜再三坚持说，玛利亚·艾里阿松是个美人，比她丈夫年轻得多。但是，很快，博耶娜好像患了早衰症似的，自相矛盾地

解释说 近几个月来玛利亚显得身体衰弱、面目苍老。可是，现在我对这个波兰女人的许多断言表示怀疑了。她说，玛利亚长着雪白皮肤、栗色长发、碧蓝的眼睛，其相貌更具地中海人的特征，因此会被误认为是法国人或者意大利人。尽管玛利亚身患重度压抑症，可她是在家中去世的，因为给她看病的心理医生认为——据博耶娜说——患者只有在家里，周围是亲人和熟悉的物件时，才有希望恢复健康和正常的生活。

“她一直在治疗吗？”我问博耶娜，因为心里明白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这部长篇小说我是写不下去了，到现在第二章还没有结束。

“我不知道。”博耶娜心不在焉地说道。

到了这个时候，我必须承认：造成我写作停止的原因，既不是玛利亚的突然去世，也不是对这一死亡事件不合理之处的探究，也不是小说家的心理干扰——大学图书馆里有大量的专著涉及这个著名的提法——而是不久前我在翻动马赛拉参观画展、前往古玩店或者艺术品拍卖会时随身携带的皮包里的重大发现！

我首先声明：我可不属于那种经常检查妻子皮包和衣服的丈夫，也不是控制妻子通信、寻找可能暴露妻子不忠痕迹的男人。有这种毛病的丈夫，是醋意造成的，对妻子完全不信任。不，我不是不信任我妻子，恰恰相反，我信任她。仅仅有一次，那是我俩开始建立关系的时候，由于眼下还不能说的原因，我提出是否有可能她在欺骗我。坦率地说，那一次我是担心她对我不忠，因为她母亲、索非亚夫人就曾经背叛过丈夫、退休上校蒙图法尔。

我不想说离题的废话。让我感到不安的重大发现发生在马赛拉洗澡时，我要找一个女记者的电话号码。这位女记者可以帮助我联系一个出版拉丁美洲小说的瑞典出版商。我的政治立场，确切地说是难以确定的，既有社会乌托邦思想，也混杂着经济实

用主义，是左派和右派都讨厌的玩艺儿；这样的立场已经变成在瑞典出版作品的障碍；瑞典的出版商社大部分掌握在对拉丁美洲抱有浪漫思想的人们手中，而坏心眼腐蚀了这些人，让他们享受富裕社会的好处。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不能失去与女记者的联系。于是，为了不打搅正在洗澡的马赛拉，我决定自己动手掏出她皮包里的电话本来。

可是我的手在她的皮包里碰上了一个引起我好奇的塑料袋。我检查了这个塑料袋，接着就在袋子里发现了两个黑色细绳编织的微型三角网兜；仅仅过去几秒钟的时间我就得出了如下结论：这是一个像安全带一样的女裤。随后，又找到一个透亮的乳罩，也是黑色的，乳罩顶端有个小小的洞眼；还找到一双有吊带的抽纱长袜；还找到一条超短裙和一个长长的金黄发套。我的心脏在狂跳，怒火烧红了我的面颊，手心开始冒汗。我不了解这些东西。眩晕和浑身的颤抖占据了我整个肉体，与此同时，金黄发套在手指里被揉搓成一团。从洗澡间里不断传来嘈杂的水声以及马赛拉无忧无虑的哼唱声。

片刻间,我想了想这个发现,非常气愤,拿不定主意。应该马上质问她,还是暂时装作不知道,等到证据多了以后再说 起初，我想，应该质问她，拿出这些不忠的内衣给她看，因为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东西是用于取悦某人而不是我的，是她给某人提供快感的。我悄悄向洗澡间走过去。她在用肥皂涂抹皮肤，大概是为又一次幽会做准备吧。我相信，只要把内裤拿给她看，我肯定能半快乐半残忍地目睹她那张堕落的面孔上出现惊愕的表情，目睹她徒劳地为说清塑料袋里的东西所做的努力。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流水声停止了。我由于恐惧,好像现场作案被抓的是我，便在小过道里停止前进，然后悄悄地转身，夹着尾巴往回溜，紧张兮兮地把塑料袋放回原处了。最后决定：我不准备公开宣战。不,鲁莽行事是不妥的,我心里说服自己,要努

力忘记自己没有利用真凭实据的武器围攻马赛拉的这次机会，因为我害怕她有可能道出我不愿意接受的内容。就在我犹豫不决的过程中，确切地说是胆怯，是嫉妒突然释放出来的胆怯，我责问自己为什么如此懦弱，为什么不把妻子背叛的证据高高举起，反而掩埋起来？大概仅仅是为了安慰自己、给自己辩解，我想：如果方式不对，那永远也不能从马赛拉口中掏出我需要得到的答案，如同所有被欺骗的丈夫那样，总是在想：她跟谁？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发觉马赛拉在开洗澡间的门把，便马上回自己的书房去了。我在电脑前坐下,装出写作的样子。但是,我俩共同度过的场景乱纷纷地涌入我的记忆里，与此同时，我试图说服自己：虽说我俩最初的激情颤抖已经消失，但是夫妻共同生活这么多年以来，两人的关系还是不坏的。当然早期的疯狂和纵情之火是熄灭了，但是不时地做爱还是让我俩感到快乐的，特别是礼拜天下午，温柔和不慌不忙地缠绵一番还是满舒服的，至少我觉得快乐，尽管我常常怀念那个主动积极、无拘无束的马赛拉，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这些优点都渐渐消失了。但是，如今我必须承认：我经常发生类似做爱过程中的某些事情。过去我爱上的女人，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根本没有性爱技巧的经验，给我在床上提供了端庄正派而不是下流的少量纪录——请读者原谅我这种说法。但是，有几个我偶然结识的女人，却以一种放纵和从不衰退的淫荡功夫、一种不可思议地运用情爱技巧和一种非凡地制造快感和享受快感的能力让我感到惊喜。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一切，或者说发生在所有男人身上的一切，难道是偶然的结果吗？换句话说，我心爱的女人们，包括马赛拉在内，是仅仅与偶然相遇的男人仅仅在偶尔偷情时才是炽热如火的吗？而随后，面对她日常生活的男人，关于爱情、家里的天使和夫妻生活的可怕传统思想，最终让她们变成了讲究廉耻的女人？

如果我平心静气地回顾一下马赛拉给我讲述过的她以前的爱情故事,可以肯定 她曾经有过丰富、强烈、快乐和大胆的性爱经验，但不是和我，而是跟一些露水情人。那些男人对我来说是遥远和陌生的，对她来说已经被岁月的脚步擦去，大概今天还蕴藏着她的一些永久回忆。同样地，我的脑海里也保存和回味着一些转瞬即逝的热情女郎与我交欢的情景。这时，就在我思索男女之间的不均衡现象的时候，马赛拉出现在书房门口，她披着浴巾，头发披散在肩头。我以为从她的眼睛里隐约看出一丝认错的闪光，仿佛意识到我已经发现了她的秘密；当我的视线游移在她丰满乳房的顶端以及浴巾下滚圆的大腿时，欲望推动我向她走去,怒火熄灭了。于是,我拉起她的手,走进卧室,心里猜测着 如果她计划去赴约会，那么一定会千方百计拒绝与我做爱。

她在床上躺下,没有拒绝做爱,而是温柔、甜蜜、眯缝着眼睛等待着我脱光她的内衣和抚摩她成熟的美妙胴体。热吻之后,我轻柔地让她翻身趴在温暖的床上，我的嘴唇在她无声动作的协助下，开始滑动在绸缎般光滑的脊背上，寻找着古代的珍宝。



博耶娜在我的书房里，给我看一张模糊发黄的照片，四边是深棕色的,是她和玛利亚的双人照。拍照的时间是四年前,地点在旁边的住宅门口，好像是在庆祝什么；由于日晒或者是潮湿,照片已经破损。两人都是全身 博耶娜系着围裙,玛利亚身穿华丽的黑色紧身、高领衬衣,面带微笑 旁边是长桌,上面堆满了瓷盘。博耶娜以为从我的眼神中看到一丝怀疑，便从她的钱包里掏出一张女人相片。她说，这也是玛利亚。

根据这张相片判断,玛利亚是个美丽的女子,眼神聪慧,面相机敏,额头饱满,头发是深绿色的 有些特征很像马赛拉。两人都是秀眉弯弯，都有芭蕾舞女演员微微隆起的颧骨，都有挺拔、周正的鼻子。可能只是在身材方面——从照片上判断,玛利亚大概比马赛拉稍高一些——我隐约看出一点区别。两人体貌如此全面地相似，让我感到难过；博耶娜可能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因为在生活距离遥远的人群中如果有长相近似的人，肯定

会引起不安。

“玛利亚长得漂亮,也吃过苦。那个时候,她还健康,跟您的妻子一样。”博耶娜伤心地说道,仿佛是在解答我的疑问。随后,她又调皮地补充说：“我想她甚至有过几个情人。”

“是你亲眼所见,还是仅仅是传闻?”我不高兴地问博耶娜,因为这个波兰女人用她的推测破坏了我心中勾画出的玛利亚的纯洁形象；或许因为博耶娜迫使我回想起发生在我岳母索非亚夫人身上一件未经证实的事件，那具体情节我不愿意多想；还因为博耶娜的话让我想起马赛拉手提包里那些可恶的情爱用品。

“有一次，我看见玛利亚在斯德哥尔摩上了一辆汽车，她跟驾驶员亲嘴。那人可不是她丈夫。”博耶娜冷漠地声称道。

我无法想象照片上的玛利亚如何编织谎言，如何消除怀疑并且欺骗丈夫，如何与情人秘密约会，如何跟情人做爱并且达到性欲高潮。我认为某种不确定的东西，不仅是恐惧或者尊敬，最终把几乎所有死人都变成了不可触及的无性别的天使般人物；这种不确定的东西让我们仅仅讲述这些人物正面的事迹。死亡漂白了生命。对于我那位不可提及的上校岳父来说，唯一的希望或许就在于此，他在皮诺切特军事独裁统治时期，在用暴力取缔反对派组织问题上，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让死亡冲淡一切应该是我岳父最大的希望，同样也是马赛拉的最大希望，她在智利因为蒙图法尔这个姓氏而背负着沉重包袱，仿佛是个麻风病患者一样。

“可怜的马尔库斯。”我沮丧地叹息说。

“希望玛利亚给马尔库斯多戴几次绿帽子，因为是他欺骗了玛利亚。他投机取巧,道德败坏,厚颜无耻。”

对于这样的断言，我不想听。我没有资格评判任何人，更不想听女佣人的恶意传言。我母亲总是提醒我不要理睬女佣人的闲话,她老人家从来不信任女佣。在她的一生里,我想,如果她有

力气，就绝对不雇佣女仆。几星期之前，在博耶娜嘴里，总是说马尔库斯夫妇的好话，真是赞不绝口；五年来，博耶娜一直在马尔库斯家中打工。而如今，我猜测马尔库斯一定有重要理由把她给辞退了，这个波兰女人于是对马尔库斯的看法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很有可能的是博耶娜的保守观念养成了对马尔库斯的鄙弃心理，因为马尔库斯可能太自由主义了，而博耶娜则是个墨守成规的天主教徒。

这里的人在各个方面都讲究自由。博耶娜是波罗的海那一边长大的，那里不像这边宽容，因此不理解这边的自由主义。此外，瑞典人面对裸体没有任何偏见的态度，可能也激怒了博耶娜。这种态度不虚伪，不假装正经，通过一种我还不熟知的体制，把裸体与性欲分开了。这从一个天主教徒的角度来看，是很难理解的。我记得锡克斯迪纳教堂的壁画中的身躯一度完全是裸体的，后来位教皇认为裸体不道德而下令用罩布盖上了。不久前，美国一位名叫阿斯克罗夫特的检察官也有过类似的表现，他下令用罩布遮盖一座新古典主义雕像的乳房，因为雕像位于这位检察官的单位门口。瑞典人充满智慧地认为：人类的身体不能压缩为单纯的性欲功能。这种把裸体与性欲分开、裸体和性欲又同罪孽分开的能力，或许可以说明裸奔体育场、男女混合洗桑拿浴以及许多人在炎热的夏季裸体躺在公园繁衍的原因。这种人人都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裸体晒太阳的习惯，在我开始来到瑞典的时候，曾经让我产生出某种不健康的心态。

今天，仅仅写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两三页之后，我就去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逛旧书店，到那里寻找关于拉丁美洲的古书；随后，我走进伯吉尔王公[1]大街上的一家小咖啡馆，这条大道上布满了豪华商店；伯吉尔王公是这座城市的创建者；大道通向斯特兰德

[1] 伯吉尔王公，十三世纪瑞典的统治者。

瓦根，这是沿着波罗的海海岸走向的林荫大街。我要了一杯经常喝的牛奶咖啡。透过窗户，我一面观赏着瑞典女人急匆匆走路的步伐，面重新审视发现马赛拉包中秘密之后自己对她应该采取的态度。

我 应该提这件事情吗？让她给我说清楚事情的原委,或者继续装糊涂，等待更加有力的证据出现？因为有可能马赛拉还没有使用这些衣物，或者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属于她。比如,昨天,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她把那些东西从手提包转移到某个抽屉里去了。的确，那些东西散发着新产品的气味。我仔细闻闻那些玩艺儿，可以 确认：还没有肉体的汗酸或者香水的气味浸染过它们。因此，设想马赛拉买来那些东西是打算哪天夜里给我一个惊喜,那并非 是不明智的。果真如此,那真是妙不可言,也证明了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我是多么下作和卑劣。

几天前，我在她的图书里发现了一本意大利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教导结婚多年的妻子如何诱惑和取悦丈夫，这样的话题自然让我充满了乐观情绪。因此，我想那些情爱用品可 能是用来满足我情欲的。但是，杂志里还有另外一篇文章认为：小心谨慎的不忠诚行为可能是维持婚姻的关键因素，这个题目让我感到浑身不舒服现在，我还不愿意讲清楚，但是我承认：过去有一段时间，我跟个跳现代芭蕾舞的女演员的偷情活动，对于我和马赛拉的共同生活变得可以忍受是有贡献的。

是啊，也有可能那些情爱用品属于马赛拉的一位女友、一个真正喜欢通奸的荡妇，那骚货希望马赛拉帮忙，免得被丈夫发现。这类勾当是司空见惯的：通奸的女人跑去找情夫玩几个小时；女友负责给她丈夫提供没有过错的证据。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帮忙总是会有这样的企图：哪一天请你用同样的方式来回报我。在斯德哥尔摩，马赛拉有两个推心置腹的女朋友。一个是卡罗拉,智利人,女建筑师,丈夫是瑞典人。另外一个是巴罗马，

古巴女画家，如果她肯甩掉那个狂妄自大的爱立信公司的执行官——她的伴侣——并且认真投入到美术中去，她不要很长时间就可以获得成功。她俩都有稳定的男女关系，年近三十岁；与我妻子一样，都没有子女，很容易玩上新的冒险游戏。其中之一就是对丈夫不忠。

我一面望着穿越伯吉尔王公大街的行人以消磨时光，一面考虑：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博耶娜比我想象的要狡猾，她跟我提到玛利亚的不忠行为，是因为发现了我的妻子在欺骗我。突然间，我脸红起来，因为我估计博耶娜含糊其辞地提到玛利亚的不忠行为，仅仅是为了侦察一下我是否知道自己是被骗的牺牲品。众所周知，全世界的女佣常常翻动主人的抽屉。博耶娜在城里看见跟某个男人亲嘴的可能是马赛拉，而不是已故的玛利亚；现在，博耶娜编造这样一个类似的故事，她是打算侦察我的反应啊。有可能博耶娜企图骚扰我妻子，或者为了挣钱给我提供关于我老婆的情报。为什么不可能呢？这个波兰女人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的，她急需用钱，今天毫不犹豫就说起过去主人的坏话来。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角度考虑此事的话，也有可能我妻子已经察觉我发现了她那些衣物、现在则假装全然不知。也许马赛拉正像秘密警察那样沉着和冷酷：一旦他们怀疑自己被人盯梢，就立刻暂时停止秘密活动，让跟踪者迷失方向。果真如此，我就得一辈子等候马赛拉使用那些衣物，以便证明她的不忠行为；与此同时，她只要采取某些预防措施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与情人幽会，而根本不使用那些衣物。

为了不被这猜测和怀疑的暴风雨淹没，一回到家中，我就检查马赛拉的抽屉。我的担心立刻烟消云散了，因为我查明那些衣物仍然呆在老地方，仍然是原来的折叠模样，仍然散发着新产品的气味，或许就等候马赛拉穿上，专门让我享受一番呢。要么就是穿在她女友身上，满足某个情人的快感。为什么不可能呢？

四

雪花整整飞舞了一宿。现在，外面是晴空万里，一片宁静，没有鸟语和花香，与前一天不同：天刚亮就要天黑。斯堪的纳维亚的冬天，白日仅仅有几个小时，因为夜幕很快会遮蔽阳光。这样的自然环境让我感到压抑，让我在家中穿着拖鞋漫步。透过客厅的窗户，我看到波罗的海白雪皑皑，浩瀚无垠，仿佛俄罗斯大草原。这样的风景，除去一棵橡树上有个松鼠在紧张地寻觅食物之外，很像一张彩色明信片。

我利用马赛拉还在睡觉的机会，去邻居的花园走一走。一脚踩下去，靴子陷进雪地里。因为清楚地知道房子里无人居住，我便围绕住宅转上一圈，想看看里面的情景。但是，一只办事严格的手已经拉上了窗帘，从而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只发现了鹿群和兔子的足迹，冬天这些动物常常来住宅区觅食。我悄悄地回家去了。就在我一面煮咖啡，一面想马尔库斯如何给他的子女们解释母亲不再回来的时候，马赛拉出现在厨房门口。她漫不经心地打

了一个哈欠。她下楼的时候，我竟然没有听见木板楼梯的咯吱声。今天，她穿的是几年前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快速购买的宽大的丝绸睡衣。

“不给我煮一杯咖啡吗？”她满面笑容，懒洋洋地伸展双臂。

那一次她是去罗马，准备跟一个意大利医生结婚的。真是怪事啊，现在我发现：她跟她母亲一样，索非亚夫人也是想跟医生结婚，而结果却跟一个其他职业的男人跑了。我在登机门附近一家咖啡厅里远远看见她的时候，我正打算要一份面包夹火腿片和奶酪以及一杯咖啡牛奶，我立刻根据直觉猜出她是拉丁美洲人。苗条动人的身影、闪闪发亮的披肩长发、见过世面的表情，都告诉我：这是一个富裕家庭的拉美人。于是，我就厚着脸皮凑了上去。再过三天，她就结婚了。在吧台上，我俩一见钟情；一面谈着不可能实现的计划，一面消磨时光，但是没敢延期航班。人生有时会预感到生活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你抓住它，来一个大转弯。戴高乐机场给我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我没敢邀请她跟我一起飞往马德里，担心她把我当成疯子。一年后，当她已经离婚并且我俩也在马德里郊野公园对面的住宅里安家的时候，她用责怪的口气对我说：“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会放我去罗马呢。”

眼下，意大利铝制咖啡壶已经放在火上煮了，马赛拉仍然靠在门框上，我要说明这一章实际上不是谈她。我只是要讲讲：她喜欢图画和古玩，她离开智利，是因为希望人们别再把她跟她父亲蒙图法尔上校联系起来。上校在皮诺切特军政权的保安部门有着重要职务。出国是她最理智的选择。一个有蒙图法尔姓氏，即和退休上校阿多尼斯·蒙图法尔同样姓氏的人，怎么能在智利过公众生活而不被联想起与上校有关呢？马赛拉自从凭直觉感到在父亲的屋檐下她绝对不可能像艺术家或者商人那样发财致富的时候，就试图营造一个人格独立的天地。但是，摆脱自己的

血统是不可能的。德国人说得好,朋友可以选择,父母则不能。因此，她最后逃离了祖国，当然并没有背叛她的父亲；可是的确要远离父亲，如同人们躲避带刺的树枝，所以她来到了斯德哥尔摩。谁都不应该为自己父母做的事情负责；但是，大海那边的人们却不这样理解，那边仍然是一种家长制的思想体系占据统治地位。

我家里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在蒙图法尔上校粉碎反对派的活动时,我父亲,费尔南多·帕索斯,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不仅在大学里可以支配人力和物力自由自在地研究，全然不睬上校干的一切；而且还不断接受表彰和祝贺，在世界讲坛上代表智利发言，对于国内发生的事情丝毫没有兴趣。由于我有这样的父亲,我的左派历史——从激进驶向平和的历史，在智利回归民主生活后，并没有捞到半点好处。我被排除在一切公务岗位之外，也就是说，体制之外，变成了一个至少是受怀疑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马赛拉吃到了父亲卑劣行径的恶果；而我则是父亲不问政治的牺牲品。如果说她父亲是行动犯罪，那么我父亲就是对国事漫不经心而犯了错误。把我和马赛拉结合在一起的不仅是在巴黎机场上开始的恋爱史，而且还有这样的愿望：回避我俩的过去以及建设一个忘记过去的现在，或者建设一个未来，但是由我俩自己讲述故事的未来。就在咖啡的香气开始在厨房里弥漫的同时，马赛拉突然宣布：昨天有件要紧事忘记告诉你了。

“今天我要去马尔默[1]拜访几位古玩商，他们为我提供斯堪的纳维亚家具的仿制品，价格合理。”

“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早晨。”

马尔默位于瑞典南部。据说，是瑞典城市中最缺乏瑞典风格

[1] 马尔默,瑞典南部港口城市,距离斯德哥尔摩 800公里。

的城市，也就是说，缺乏生气和风情的城市。我没有到过那里，但是可以想象出那里的港口气氛、那充满海员的酒吧以及每天开往德国的火车轮渡。港口性质使得马尔默变成了世界性的城市。那里一定会有雾气蒙蒙的天气、缺乏热情的气氛和潮湿的街道。比利时作家乔治·西默农[1]在他的长篇小说里多有描写。我作为侦探小说作家，喜欢这位出生在比利时列日的作家：风格平和而深刻，寻根问底。但是，我不能原谅他的多产，虽说嫉妒他的才华横溢。我建议马赛拉：出发之前，把她下榻的旅馆电话给我留下来。

我在给她的杯子里倒咖啡的时候，她说："我住在斯堪第克饭店，就在火车站附近。"

"留个电话号码吧。万一有什么事情呢。"

她一面往咖啡里加糖，一面告诉我（这大概是第三次了，不过这一次口气更热情，更有信心）：她有可能成为两位斯堪的纳维亚古玩商在拉丁美洲的独家代理人；这两位商人甚至给王室和瑞典的破落贵族供货，这对于在智利大量孳生（繁衍之快如同野草）的新贵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这些新贵大部分是钻进政府的政客，他们把国家变成了战利品，掌权不是为国效力，而是拿国家财富中饱私囊。这些刚刚上台的窃国大盗需要伪造历史和编造祖先，需要装点门面，需要拿出从著名古玩店里弄来的老式家具和名画 当作祖传宝贝。马赛拉目光炯炯地说，这种买卖在短期内可以赚大钱。

她不时地加上一句："这样，我就可以躲开这讨厌的寒冷气候了。"

从几周前开始，她一再强调：这里寒冷的冬天和漫漫长夜让她感到压抑；还说，她的体质需要比较暖和的气候才能健康。我

(1) 乔治·西默农（1903-1989），比利时小说家，用法语写作。所著作品约 425 部，被译成 50 多种文字，在全世界销售 6亿多册。

感到生气的是，她已经忘记了正是她把我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拉到瑞典来的，理由是智利的环境污染、令人压抑、咄咄逼人，虽说亲人都在那里。另外，这句‘我就可以躲开’说明这是她个人的心愿，已经把我排除在外了。

我看了她一眼，没有反驳。沉默变得令人痛苦了。实际上，这几天来，我跟她保持一种休战状态，而不是夫妻关系。这是一种既没有戏剧性，也缺乏紧张悬念的休战；是一种无言的休战，或者确切地说，是寡言少语的休战，因为有时我鼓起勇气邀请她去时髦酒家吃晚饭，比如，去刻意求新的阿莱克斯饭店，或者传统的奥尔森酒家，品尝美味佳肴，泛泛地谈点什么，对于我俩发生的事情没有半点牵连，而是和解性质的。但是，夫妻生活中也有处于海难边缘的时刻，甚至连调查一下船在哪里漏水的心情都失去了。我俩不再像从前那样推心置腹地交谈了，那时的谈话亲切而变化多端：新鲜、充满爱情的火花和启示，仿佛我俩刚刚认识不久，仿佛惊喜随时可能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俩之间的差异不再是刺激，不再是开心果，而渐渐变成了冲突和口角的起因。比如，对于马赛拉来说，不认识女邻居玛利亚，没什么要紧的。当然，她对玛利亚的逝世也感到悲伤，尤其是替孩子们着想；但是，她坚持认为，我俩去玛利亚家丝毫不能改变她家的命运；马赛拉坚信，去对马尔库斯表示哀悼是不大合适的。她又说，最好的办法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小心等待一个新机会出现，再去认识马尔库斯。我明白这是一种非常算计和功利的考虑，大概是她把生意经搬到日常生活来了；如今，在发现她那些情爱衣物之后，我心里释放出种种不安和震惊的猜测，让我担心对她的不忠行为的怀疑还是有根据的。因为我想，男人不忠时好冲动，是本能和单纯的；女人则相反，她的不忠行为讲究选择，是有理智的。我或者我朋友们的不忠行为是位于事件开端的行为，是随后能否引发事端的原因；已婚妇女——特

别是我跟她们有过鱼水之欢的已婚女子——的不忠行为则相反，她们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行动的，那是后果，是婚姻关系的尾声。为了避免误会——由于极端的女权主义之错，流行着大量误解——我要说明白：有可能男子不忠时缺乏明确的动机，仅仅一时的性欲冲动就可能让他冒险，例如，迷恋鲜艳的嘴唇、丰满的乳房或者滚圆的臀部，例如，不肯放过良机的雄心壮志，这样的冲动会在征服了新猎物时就消失了。但是，女子不忠时似乎有充分的理由、重要的理由、并非偶然的理由。因此，女人的不忠行为就特别坚决而彻底。她们不像男人那样兴之所至，不像男人那样仅凭一时冲动或者临时好色而行动，而是有更加深层次的考虑。由于所有这一切原因，她那炯炯的目光才让我格外不安，并且妨碍我弄清楚她内心深处策划的阴谋。

就是在这样共进晚餐的饭店里——冷静的观众或许会理解为浪漫的约会，我也不敢问她那些情爱衣物。某种难以确定的东西使得我宁肯装蒜，宁肯假装那些事情都是正常的；这难以确定的东西是指望她买那些衣物打算有一天给我一个情爱惊喜，或者是替某个女友为隐瞒丈夫而购买的衣物。但是，还有可能是我的装聋作哑，仅仅是担心她会生气，会破坏掉这脆弱的家庭和谐，担心我俩的船会沉没，马赛拉会不可挽回地远行，把我丢进可怕的孤独中去，而只有我作品中虚构的人物才会有那样的孤独感觉。的确，我害怕失去这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和不得不生活在孤独之中的担心，远比排斥马赛拉要强烈得多。

我老婆喝完咖啡，看看手表，跑步上楼去淋浴。十五分钟后，她再度下楼，这回她已经穿好衣裳，洒了香水，化好妆，手里拿着皮包。她披上大衣，穿上皮靴，从门口给我一个飞吻。出租汽车已经在街上等候，她急忙跑上车。她走了。我重新沉浸在寂静里，像电影里运用‘闪回’的手法那样，我回顾并且分析她早晨的表情。我估计，如果她真有情人，就不会来跟我吃早餐了，也不会向我

快乐地飞吻，昨天夜里也不会以和好的方式回应我热情的抚爱了。如果有不忠行为，那么以如此性爱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既没有在肉体上、也没有在表情上留下任何痕迹，岂非咄咄怪事。因为我俩的性交方式是极好的：在沉默中，几乎不是通常意义的拥抱，而是极力获得最大的满足；两人的结合远远超过了表面，被某种模糊的、神秘的、难以确定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仿佛这样的结合有着无限的空间，只有大雁以整齐的队列飞跃天空时才可能拥有如此辽阔的空间。不，不忠行为不会在肉体上和举止上留下痕迹的，它只会在秘密的柔风鼓舞下航行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后来我非常仔细地检查她的裸体，看看是否有欺骗的痕迹，也仍然是一无所获。

我离开厨房，说服自己应该抓紧这安静的一天继续把这部长篇小说写下去。作品正在渐渐变成一位小说家讲述的故事：他一再拖延杀害不忠妻子的时间，因为他无法辨认谁是奸夫。我承认这个故事缺乏独创性。怎样写会更糟糕呢？详细了解某人妻子的情人呢，还是像印象派绘画或者后印象派画家那样用朦胧的方式想象那个情人？那情人的肖像是由约翰·辛格·萨金特[1]来画呢，还是由德加[2]或者乔治·修拉来画[3]？我在电脑前坐好，无法平息内心的醋意和我作品中主人公的嫉妒情绪。我正要继续打字的时候，一个折磨人的疑问涌上心头：马赛拉是不是带走了那些情爱衣物？在好奇心和担心的驱使下，我马上跑到卧室，拉开抽屉，双手急不可耐地搜查起来。

几秒钟后，我无可奈何地确认 那些衣物不见了。

[1] 约翰·辛格·萨金特(1856-1925)，意大利出生的美国画家，擅长肖像画。

[2] 德加(1834-1917)，法国画家。

[3] 乔治·修拉(1859-1891)，法国新印象主义画派创始人。

五

我毕竟不是实干家。否则的话，我可以采取另外的方式面对马赛拉和博耶娜。或者说，马尔库斯应该对他妻子身亡负责。是的，我性格里缺乏一点热带人敢作敢为的精神，缺乏一点火暴脾气 应该血液沸腾,激情澎湃,快言快语,直呼其名。可我只是南美洲一介文弱书生，是个用虚构人物和舞台编造故事的作家，仅仅希望读者别把这些故事理解成谎言，而是当成像现实生活一样真实的情节。

虽然我喜欢文学，而不愿意实干——否则的话,我就去经商了，或者行医了，这些行当之所以不吸引我，是因为商人和医生太俗气——我还是当天上午便扔下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以及作品里的主人公——喜欢吃醋的作家,决定出门跟踪我妻子,调查一下促使她前往马尔默的真正动机，因为她随身携带着我在她手提包里发现的情爱衣物啊。她这次旅行，包括在南方一家旅馆神秘地过夜，既让我闻出一种假象，又看见了我在自己的小说中

描述的那些冲突。为此，我宁愿把这次刚开始描写的谨慎跟踪掺入到情节里去，当然这是因为故事之外发生的一切刺激我的结果，是在这个于什霍姆小镇田园牧歌式的现实里发生的；我还宁愿推迟作家发现自己老婆的情夫身份的时间。我把这些内容都刻在软盘上，还在笔记本电脑的硬盘上加以保存之后——自从几年前在希腊萨摩斯岛太阳烧毁了我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电子存档后,我便采取了这样的防范措施,我没淋浴,也没刮脸,穿上外衣,走¦出家门，前往中央火车站。由于下一班开往马尔默的列车是在两个小时之后，我就顶着鹅毛大雪散步，相信欣赏附近的建筑物可以消磨时光。

如果抛开现代建筑不说，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建筑风格是一种均衡、朴素与和谐之美，很像圣彼得堡的风格。一座座楼房紧紧相连，都是五层到七层高，绿色的屋顶染上了铜绿色，窗帘总是拉开的,小小的阳台围着铁栏杆。天空上,云层总是低沉,教堂的钟楼胆怯地伸向空中，金色的圆顶和排水屋顶掩饰着斜面窗口,这是城市又一道风景线。但是,在那些狭窄的小巷里,冬天很难有阳光，没有树木，没有行人，只见一片无人过问的严酷景象。

马赛拉认为，建筑师在二十世纪中叶就从这里消失了。实际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用钢铁加玻璃建造在市中心的那些功能大厦，非常令人讨厌，最后引发了众怒，人们抗议政府当局继续拆毁古旧建筑，继续建造那些时髦的滑稽玩意儿。尽管如此，在中央火车站的四周，在叫做塞海斯多尔的圆形大广场上，有个用钢筋混凝土制作的大蛋糕，中央插着一根玻璃做的高大蜡烛，象征斯堪的纳维亚永远结冰的状态。还有，在斯威阿根大街的第一段路上，后来发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民众抵抗活动。而此前，建筑公司已经拆毁古建筑，盖起了大批毫无个性和特色的钢铁加玻璃的巨型火柴盒，与城市整体风貌不和谐；或许可以满足尼古

拉·齐奥塞斯库[1]追求的辉煌梦想。

这已经是十分可怕的事情了。但是，还有更糟糕的事发生，因为有个时期斯德哥尔摩政府计划拆除整个旧城区——包括大众酒吧和饭馆、陡峭的小巷、工人住宅楼以及它那灰色的、已经剥落得令人害怕的外表——为的是建造现代化大厦和所谓的改善工人生活的质量。政府甚至委托瑞士著名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科比西埃[2]全面规划旧城区的主体，盖满摩天大楼。用建筑学家们的话说，那简直是犯罪，如同盟军飞机轰炸德国文化名城德累斯顿一样不可饶恕。幸亏科比西埃拒绝了委托，斯德哥尔摩今天还有它最美和最有旅游价值的老城区；如今那里居住着学者、艺术家和成功的企业家。

在附近闲逛一通之后，我回到了中央火车站，在咖啡厅里要了一杯牛奶咖啡。我需要一个温暖和安静的环境来制定下一步计划。我靠窗边坐下，对面是售票处和商店，心里幻想着老婆会误了火车，还正在外面闲逛。从前可没有想象过会有这样的事情：有一天我会跟踪马赛拉，如同眼下我正在做的事情一样，目的是捉奸！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愤怒加难过的混合物，拖着我走向开往马尔默的快车。

在车站的拱廊下面，不断传来旅客们的脚步声和高音喇叭的广播声，我焦虑地扪心自问：为什么妻子的不忠行为不会立刻在受害人的心里产生反感，而是急切地想要挽留欺骗和伤害他的妻子，希望这一切可能是一场噩梦，是一个没有根据的猜疑，是一个不必理会的故事，是一本结尾开放的书，总之是个情节，

[1]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1918-1989)，罗马尼亚领导人，由于推行个人崇拜，好大喜功，脱离群众，在 1989年一次公众对抗活动中下令向群众开枪，被军队逮捕，经特别军事法庭审判，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2] 科比西埃(1887-1965)，别名让纳雷，瑞士建筑师，讲究现代功能主义与表现主义相结合的风格。国际风格建筑学派的第一代创始人。

是个如同扭断拉美现代主义诗歌中的天鹅脖子那样可以扭断的情节呢？假如马赛拉欺骗了我，她对我会有什么感觉呢？是同情，是遗憾，是冷淡，还是厌恶，首先会是什么？是排斥我，还是先爱上了别人？我和马赛拉已经共同生活好几年了，而我最近才发现，虽然在骨子里马赛拉仍然是我在巴黎机场看见的那个美丽姑娘，但是已经疏远了，对我来说，已经有些陌生了。我努力回想自己搞上女舞蹈演员卡尔拉时期对马赛拉的感情；但是，我做不到，因为那时的话语、记忆和想象已经乱成一团了。最后是根据我眼下的需要，今天我对马赛拉如何想念我的愿望，而不是根据实际发生的事情，来整理过去的印象。我已经知道了：没有办法一五一十地重建过去，因为任何回忆都是在背叛过去。而令人感到压抑的是，大人强迫我们从小就相信：记忆可以准确地重建过去，如同准确地组装七巧板一样，实际上，记忆绝对恢复不了七巧板的原始设计，而是造出一个有区别的七巧板来。

我一面搅拌着牛奶咖啡，一面极力自我安慰，心想：我搞上了女演员，那是对马赛拉的不忠，而她没有察觉女演员的存在；女演员即使是我偶然间暂时征服的结果，可是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俩在餐馆、夜总会和海岸饭店疯狂幽会，她最后成为我迷恋的对象，成为我准备为之而抛弃马赛拉、去过动荡生活的人。这段浪漫史传到了文坛，成为许多人议论的话题；可是，幸亏我精明、能干，有本事（嘿，什么话呀！）让马赛拉完全蒙在鼓里，她对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至少我想象是这样的。或者，莫非马赛拉早就知道我欺骗她，而她选择了沉默，厚着脸皮假装正常，就像我现在这样？为什么不可能呢？如果那时马赛拉的被动态度现在向我充分证明：她一无所知，那么我今天的沉默和伪装说明我的结论可能完全是错误的。欺骗一旦被揭穿，就会惩罚假装不了解真相的受害者。

假如我与马赛拉的情人相遇，那我应该做出何种反应呢？有

时，我想，最好永远不要遇见他。我猜想，带走别人妻子的第三者自己的妻子往往也会被别人带走。就在我小口呷着咖啡的同时，脑海里却浮现出我妻子挎着另外一个男人步入一家饭店的景象。那男人会是谁呢？是我的熟人？是她在出差时勾搭上的什么人？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我现在调查的这段历史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情人具有特别的魅力？是因为马赛拉已经厌倦了我，还是因为我身上的什么缺点？是我的过错伤害了她的感情？我估计，具体到我这里，过错在女演员卡尔拉身上：她为人处世没有顾忌，她喜欢策划既不着边际又颇有说服力的蓝图，她善于创造无数个可能的世界和乌托邦世界——片刻间，我迈进那个世界，随后又满腹疑团、想法和备受鼓舞地出来，她疯狂地快乐地渴望生活，渴望每天在餐桌和床上是个新人，渴望每天焕然一新，仿佛是个永远处于变形或者假装改造自我的女人。但是，现在折磨我的是并非深思熟虑的事情，只要一想象妻子不忠行为之前的一系列细节，就让我感到痛苦：那对情侣到达饭店服务台前，他和她假装是夫妻，他和她在服务员严格审视的目光下神情紧张地填写住房登记表，他和她担心撞上熟人，两人登上电梯，结果上升速度太慢，有幽闭恐怖的感觉，急急忙忙走在似乎没有尽头的长廊地毯上，房门在他和她身后关上了，狂热地拥抱，双双寻找大床。

可是，我应该保持镇定。中烧的妒火会让我采取冒失的行动，造成终生悔恨。喜欢危言耸听的报纸上充斥着大量来自第三世界移民犯下的情杀案。如果我也来一次暴力行动，那只能增加一份丑闻报道而已，只能加强那个受骗和急于报复的“拉丁情人”的典型性而已。不，不要暴力。我宁可与瑞典小说家瑟德尔贝里①作品中的冷静风格一比高下，学习他在长篇小说《格拉斯医

① 瑟德尔贝里(1869－1941)，代表作：《马丁·伯克的青年时代》和《格拉斯医生》。

生》里迷人的叙事节奏，学习格拉斯医生不慌不忙的风度：他走在十九世纪斯德哥尔摩的街道上，闲荡在咖啡馆和家中，无论发现陡坡还是人们的伪装和激情，永远保持沉着和冷静。

我乘坐的列车是下午到达马尔默的，夜幕里散发出的煤炭气味，无情地笼罩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初看上去，马尔默不是我想象的世界性城市，好像比其他同等规模的瑞典城市更加具有活力和讨人喜欢。我上了一辆出租汽车，不久就到达斯堪第克饭店附近。下车后，我像个特工那样隐蔽地接近饭店，没能摆脱这样一个非常愚蠢的念头：那里有人知道我来访的动机并且猜出了我的企图。

饭店包裹在一层易碎的不真实的氛围里，特别是在几盏红灯发出的琥珀色光线照耀下。我抬头看看争先恐后从天而降的鹅毛般的雪花，愉快地欣赏着饭店大楼窗户里的灯光。在某个房间里，睡着裸体的马赛拉。某人在陪伴她。这是我的直觉。我心想,就在她的背叛已成事实的时候,我应该跑上去,敲门,当场捉奸。但是,后来我反复思量,平静下来,心想,也许马赛拉与古玩商会面是真的；我还想，所有这一切——我乘火车的马尔默之行、眼前这个在白雪和灯光照明下辉煌耀眼的饭店、甚至皮包里的情爱衣物——仅仅是我当作家的想象、纯粹编造的话语和虚构情节的结果；而不是我们生活里发生的事情，只是我通过特斯劳莫这个人物写在小说里的东西，或者是有人在别的小说里写的事情。可是,片刻后,我一面深深呼吸着夜间寒冷刺骨的空气，一面猜想：这里，在十九世纪灯笼的乳白色光线和纷纷落在我面颊上的雪花映衬下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现实，我妻子的背叛也是如此。是的，虽然我不能证实她的背叛，她那情爱衣物是存在的；尽管我不知道她最终的意图是什么，她来马尔默的旅行是事实；眼前这座饭店不是纤维纸板和空话制作的，而是一座矗立在夜空之中的庞然大物。即使眼下她没有躺在情人的怀

抱里，也只是因为她还在跟古玩商谈生意，但是，随后不久就会去找情人幽会的。我心里呼唤着自己的名字“：克里斯托瓦，你永远别相信女演员的话，因为她们总是在不停地表演。”

在一种难以形容的情感（毫不费力地占据我的心头）推动下，我迈进饭店的大门，向服务台走去。唯一的女服务员正在打电话。我浑身紧张，血液涌上面颊，我担心这样的表现会暴露我的意图，使得女服务员报警 这里可能要发生恐怖事件。但是，那位金发姑娘还在打电话，没有察觉我的到来。我一面等候女服务员打完电话，一面把双手插进衣袋里，掩饰手臂的颤抖。终于，女服务员挂上了电话，向我走来。我用英语问她马赛拉的房间号码，她立刻露出笑容，因而变得亲切起来。她查查电脑，让我再重复一下我妻子的姓名。

“这里没有这个名字。”她说明道，准备还回去打电话。但是，我的困惑神情留住了她的脚步。

我猜想，马赛拉没有预订房间，而是住在情人的屋子里。但是，我随即排除了这一猜想，因为她一定估计到我可能试图找她；如果她的名字不出现在客人名单上，肯定会引起怀疑。

我坚持请她在登记表上再找一遍。我态度坚决的神情引起了女服务员的警觉，脸上的笑容不见了。这是每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基本手段，哪怕是在最困难的时刻，也要微笑。根据她眼下顺从的表情，虽然态度疏远，她却去服务台后面的办公室了。回来时，她身后跟着一个高大青年，同样是金发，西装革履，很像刚毕业的药剂师。他和她一面查电脑一面用瑞典话交谈。小伙子不信任地瞅了我一眼，然后转身去输入名字。这一回，看来电脑提供了他要找的东西，因为他担心地看看我，好像在犹豫要不要把情况告诉我呢。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让我开心起来：马赛拉和她的情人出了要命的事故。

小伙子问我“：您跟客人是亲戚吗？”

“我是她丈夫。”

他沉思了一会儿，显得犹犹豫豫，这更增加了悬念，最后他慢慢说道：“很抱歉。您夫人中午时取消了预订的房间。我们能帮您什么忙吗？”

我乘夜间最后一班列车回到斯德哥尔摩。在中央火车站我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这个时候街上空空荡荡，一片寂静，如同希区柯克[1]影片中的巨大空间。快到家门口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房间里有灯火。进门后，我看见马赛拉在厨房里。她正从烤箱取出蛋糕。她的黑眼圈变大了，面颊上有红晕。

她一面往蛋糕上抹草莓酱——这种草莓生长在拉普尼亚，是瑞典人非常喜欢的食物，一面解释说：“我留在斯德哥尔摩没走你上哪儿去了？”

“在市图书馆查资料后来在市中心跟法古塞喝了几杯。”我说的这个法古塞是智利大使，我的朋友。我一面说话，一面偷偷看看她的大腿，想象着可能不久前一个男人的手指抚摩她那婀娜的腰肢，让她干下背叛丈夫的事情。

我登上二楼楼梯，打算偷偷检查一下我俩的卧室，同时我确认了马赛拉有不忠行为，但是这并没有熄灭我这个受害人心中的欲望，而是更加刺激了我的冲动。我相信人们不会因为一时的恼怒就不爱自己的心上人。冷漠不会在已经失恋的人心上产生，而是会滋长出一种更强烈的欲望：继续占有那个已经不爱你，已经不想留在你身边的人。眼下，我就是这种情况。在这个领域里，不存在对称和平衡，只有残酷。我走进昏暗的卧室。双脚踩在地板上，发出吱吱咯咯的抱怨声。我走近衣柜，拉开抽屉，屏住呼吸，伸进双手。

在抽屉里面，袜子和衬衫之间，放着那包衣物。

[1] 希区柯克(1899-1980)，英国出生的美国电影导演，以拍摄悬念片而受到普遍欢迎。重要作品有《蝴蝶梦》、《深闺疑云》、《列车上的陌生人》等。

六

那天夜里，我没敢详细询问马赛拉白天的活动。我留在房间里的时候，如前所述，从窗户可以看见白桦林后面的波罗的海。我想过马赛拉死亡的可能性。我强调一下：是她自己死亡，而不是杀害她。抱着这样的念头，我沉浸在昏暗之中，而不能看清楚自己，与此同时我看看床头柜上的镜子，想起爱尔兰著名作家贝克特[1]笔下一个人物说的话“：我是不存在的。事实很明显。”因为有时我也喜欢思考类似的事情，比如，我想到了并且相信“我是不存在的”，因而我是不存在的。是的，你可以认为你存在的方式就是你的感知，但是，最大的可能性是你存在的方式与他人不同，即使是通过我的写作和说话，也仍然不同。总之，的确，简单地说，把马赛拉与死亡匆忙地联想起来是可疑的。但是，我再三强调 我想象过她的死，尽管不是我动手，而是别人杀害她。

(1) 贝克特(1906-1989)，1969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等待戈多》。

所有这一切,我都反复掂量,思考,策划过,都安排在我习惯的这种虚拟的现实里、这种把我包围起来并与物质世界分开的现实里 同样地,我们的面部表情和话语,面对他人的时候,都掩饰着我们的真实意图。昏暗中，我隐约看到镜中的我，感觉到那双眼睛不是我的眼睛，就好像你昏睡后起床、突然发现镜子里的自己不是自己，你却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接受这样的事实：你老了，失去了往日的魅力；不得不承认：你这张脸开始与从前自己的形象分离了。一看到我的身影而又不能辨认出是我自己的时候，立刻想到：马赛拉或许听说了我和女演员卡尔拉的事情，我认为自己是在欺骗妻子，说不定那时马赛拉就已经看到我这副样子了；从那时起我可能就开始这样照镜子，渴望镜子里那个模糊不清、变化无常、不忠不义的怪物离我而去。但恰恰是马赛拉掌握了主动权，大概想从根本上打破我的猜测，因此我一回到厨房，她说：“最后，我留在斯德哥尔摩没走，因为一位古玩商病了。”

说着，她切下一块蛋糕。我一向佩服她这样的本事：一面说着重要的事情一面做着琐碎的小事，例如，熨床单，或者削土豆皮。她能够特别灵巧地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物质世界和理论世界 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spagat[1],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在文学世界里漫游。

“你什么时候知道他病了?”

“在中央火车站。我给拉尔森打电话,告诉他我要上车了。他说,见面的事最好以后再说,因为他感冒了。”说着,她用一片锡纸盖上了蛋糕。

这话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但是有可能拉尔森真的在最后

[1] 德语：体育或者舞蹈中的劈叉动作。

时刻取消了约会。在工作方面，瑞典人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值得信任了。社会保障和高额征税破坏了瑞典人的劳动精神。马赛拉一面把餐具放进洗碗机里，一面从起居室传来萨蒂[1]作品的旋律。我俩都喜欢萨蒂的音乐，他那优美、朴实的钢琴协奏曲以及长期投身创作的完美、精致的小品，都非常吸引我们，好像他的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要打败任何形式的巴洛克和浮夸的风格。

“因为我也没有多大兴致要旅行，就取消了会谈，回家了。遗憾的是你不在家。否则咱俩就可以出去吃晚饭了。”马赛拉平静地说道，没有过多的热情，可也没有使用责备的口气。

我最钦佩她身上那股子不屈不挠的劲头。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我俩为什么远离祖国，来到这万里之遥的瑞典。她一直梦想当个大演员。但是，凭直觉，她及时意识到：由于她是那个臭名远扬的上校的女儿，就永远别想在智利登上舞台。此前，她第一次在首都美景小剧场演戏时，立刻有专业评论家在次日的专栏里提起皮诺切特时代军人的作用，也不乏向舞台上抛掷红墨水或者当场谩骂马赛拉的观众。这些证据都表明：她在智利将永远无法摆脱父亲的阴影，因为在类似的情况下，记忆不仅来自往事，而且来源于别人对往事的回顾。或许只有在经过多年以后，不再有别人回忆的压力时，她方才可以重新演戏。那天夜里，当她确信在圣地亚哥山边剧场里没有艺术前途的时候，我俩策划了自愿出国流亡的计划，可以获得新生的计划，因为她已经厌倦了代替父亲受过的生活。马赛拉是在父亲的庇护下长大的，而她父亲是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政权的铁杆支柱，在专制统治时期，她父亲令人畏惧，那样的生活影响了马赛拉，把她变成了老反对派攻击的目标，也把她变成了令人瞩目的人物。我估计，由于她坚

(1) 萨蒂(1866-1925)，法国作曲家。他的作品对二十世纪欧洲音乐特别是法国音乐有重要影响。代表作有：《穷人弥撒曲》、《游行》、《苏格拉底》、《夜曲》等。

信自己应该远离父亲才能获得独立的人格，这样的信念雕塑出她钢铁般的性格，这也是我非常羡慕的长处。

我想，古玩商得病的说法可能属实。我看着她把蛋糕重新放回炉内，把厨房用的抹布挂到门钩上。可是，我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她的情人用手机在最后时刻发出了不能约会的信息。也许就是这个信息，而不是什么拉尔森的病，改变了她的计划。或者就是她自己决定取消了约会，因为她觉察出我现在有了怀疑，或者她意识到我发现了那些情爱衣物。

“过几天我还要去马尔默，除非拉尔森来斯德哥尔摩。”她宣布道，然后转身去检查窗户旁边、暖气片上的仙人掌。

我不知道拉尔森是何方人士。实际上，我从来不操心她跟什么人见面，做哪路生意。突然现在我觉得应该开始仔细怀疑她身边的一切了。结果事情并没有多大变化，因为在我发现那些衣物之后的几天内，尽管东西照样在抽屉里，可是马赛拉仍然参加了一些拍卖会，仍然和一些古玩商见面。但是，无论怎样，她都没去马尔默。这说明不了什么，因为马尔默那个男人完全可以来斯德哥尔摩看她。马赛拉眼下似乎集中精力在为一个巴西富有的收藏家寻找波罗的海画家十九世纪的油画；为一位斯堪的纳维亚后裔的中美洲某国的前部长寻找同一类型的玻璃柜和衣柜，这位前部长一夜暴富，其手段是通过在他入籍那个国家里特别巧妙地领导了私有化运动，这家伙如今正在热带阳光充足和湿润环境里修建的豪华住宅，伪造祖先的历史，按照他的伪史，他的祖先不是欧洲的普通农民，而是远古祖先中的贵族。这个政客，从本质上说，为我提供了一个道理：我们不是我们，而是讲述的我们，而别人则接受了这样的讲述。但是，马赛拉高度评价造假行为，因为她确信炫耀地位和政治野心是她最好的同盟军，是在艺术和古玩市场上抬高物价的主力。

今天发生了一件让我感到非常悲伤的事情，如同西贝柳斯

的交响乐在我心里产生的感觉一样。起先，我去银行核实我岳父从圣地亚哥为他女儿做生意需要的每月汇款。回家后，我开始写长篇小说的另一章；现在，我把日常生活的现实纳入我的作品，特别是那个受骗的作家没有成果和耐心的思考。中午的阳光温暖着我的脊背，但是太阳很快就要落到地平线下面去了。这时，我听见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一阵凄惨的哭声。听见这样的哭声让我感到惊讶，因为在这个隐藏在森林中的美丽而安静的居民区里，由于地当波罗的海海岸，永远处于宁静之中。这里没有广播声，也没有来自远方的喇叭声，不像专门的拉丁美洲小区；这里也没有汽车马达的轰鸣，没有狗叫，没有娃娃的哭声。所有这一切往往使我觉得处在白桦林和海岸之间的我已经变成了聋子；或者更加糟糕的是，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死去了，因此，这凄惨的哭声才特别让 我惊讶。我停止打字，走到面向邻居家的那扇窗子跟前。可是什么也看不见。接着，我换到面朝波罗的海的窗户跟前向外张望。终于，看见街道的雪地上躺着什么东西。

我快速下楼，边穿大衣边向外跑去。我猜到躺着的是什么了：一个孩子。

“怎么了？”我问他。他身穿保温潜水服，戴着皮帽和手套，从远处看去，像是水手服装。

孩子绝望地哭着，面颊贴在雪地上，像个偷懒的动物；每过一会儿，他就在抽泣声中，反复几个我辨别不出来的单词。

“你住在哪儿啊？”我一再问他，一面要扶他站起来。

突然，我身后有个声音说：“他在叫妈妈。”

我转身，看见另一个孩子，比地上的那个大，约有十二岁，也穿着保温潜水服，戴着皮帽和手套，长着蓝蓝瞳仁的大眼睛，一头金发，嘴唇冻得发紫。

“他在叫妈妈。”他又说了一遍。

我用英语问他：“妈妈在哪儿啊？”

“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个小的还在不停地哭泣。

大的解释说：“因为妈妈死了啊。”

“就你们两个吗？”

“不。还有爸爸。”

于是，我明白了：这是邻居马尔库斯的孩子。

我拉起来小的，牵着他的小手，慢慢向我以为无人的住宅走去。我们经过雪人和雅典娜女神的雕像。孩子仍然不停歇地哭着；他哥哥默默地走在我们前头，态度成熟而冷静，好像明白这是应该坚强忍受的痛苦仪式。我看见邻居马尔库斯在汽车库里，大门开了一半。他正在修理一辆沃尔沃牌轿车的马达。他旁边有个更小的孩子，骑在一辆缺少一个车轮的三轮自行车上。

“我叫克里斯托瓦·帕索斯，是您的邻居。很高兴认识您。”我站在大门口，没敢向他表示哀悼，“看来您的孩子有些不舒服。”

他走到孩子身边，蹲下身说了几句瑞典话，摸摸孩子的脸蛋，拿出一把螺丝刀给孩子玩耍。

“我叫马尔库斯·艾里阿松。”他亲切地回答说。在裤子后兜上擦擦手，握住我的手，又说：“谢谢您的帮助。”

这是个年轻人，长长的脸蛋，淡绿色的眼珠，面颊上有粉刺。我不由得立刻联想起博耶娜和她的推测来。但是，这张面孔上的某些特征说明他的忧虑和淳朴，说明他小时候是个顽童，说明他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当然，这么早就成了鳏夫，实在太年轻了。

他解释说：“孩子为妈妈哭呢。她刚去世不久。孩子不得不习惯妈妈回不来的生活。日子对全家都很难。”

我以为明白了马尔库斯试图冷静地描述事实，好像他希望孩子们能理解死亡是正常现象，时时可能发生，就像我想的那样：生死相依，因此没有道理总是哭泣。但是，我从他说话的声音

里察觉出一种无法掩饰的悲伤情绪。

“很抱歉。”我说道，觉得自己愚蠢、无能，因为在这寒冷和无助的氛围里不会表达机智、真正可以安慰人的话。

“我妻子病得极度虚弱。一个疏忽，一些安眠药落到了她手中，您明白那后果……”

我明白。博耶娜早就说过了。我又一次想 安眠药怎么会离病人那么近呢？当然，我什么也没说，更不会提到博耶娜怀疑马尔库斯杀害了妻子，更不会说那时我也抱有同样的怀疑了。但是，眼下，看到他这个样子，看到他努力安慰孩子的神情，看见他沉浸在寒冬里扮演着父亲兼修理工的角色，看见他这张年轻单纯的面孔，我后悔不应该把他想得那么糟糕。我尤其没有资格评判别人，因为不久前我还在盼着自己老婆死掉呢。假如马尔库斯用昨天夜里我在卧室衣柜镜中观察自己的目光看我，那么可能会发现我的真正意图和猜测。我们在冰冷的车库里呆了片刻，耳边只有来自波罗的海呼啸的风声，眼前只有整齐排列的工具架、用于扫雪的铁桶和铁锹，因而更显得寂寥。

在浩瀚无垠的海面上，天空和白桦林使得大海小了许多，两个身穿红色衣裳的滑冰人，灵敏而安静地在远处移动着。我在离开车库之前，结结巴巴地说：“很抱歉。无论如何，我和我妻子希望您哪一天来我家做客。”

一看见有人在波罗的海的海面上，在远离海岸的地方，飞快地滑动，我总是提心吊胆。我害怕冰面突然破裂，滑冰人落入水中，可是岸上无人察觉，那就会死掉。即使滑冰人采取预防措施，死神也总是与他们为伴，如同光滑的冰面上的身影，如影相随。

马尔库斯·艾里阿松说：“好吧。哪一天，我可能去拜访。但是现在很困难。”他指指正在玩螺丝刀的孩子。

“别担心，您可以带孩子一起来。”

“真的吗？可马赛拉会怎么说呢？

“她会很高兴的。”我回答道。但是，我撒了慌，因为她不喜欢孩子。她认为地球很有敌意，不愿意过多的人类居住。她还认为，如果我俩有个儿子，那会妨碍她的专业发展，因为说到底，最后是她，而不是我，要负责照料和教育儿子。

我回到家里，马赛拉的手机正在叫唤。手机躺在客厅的沙发上，被主人遗忘了。我拿起来回话。给我的印象是，那边的人一听见是我说话，就立刻挂机了。我等了一会儿，屏住呼吸，满腹疑团，接着，在语音信箱上看到进来一条信息。按动键钮后，显示的只是我妻子的出生年月日。随后，我听见一个男子用英语说了一句：“下星期四，五点钟，我在最近见面的那个旅馆等你。”

七

面对马赛拉，我只好选择假装不知道背后发生的一切；只好忍耐着，等将来当场捉奸。或许现在她的背叛和我的假装之间建立起种无言的对话关系，很可能是从前那种关系的延续：那是在卡尔拉时期，我欺骗了马赛拉，而她则假装不知身后事。假如的确如此，那么就很应该问一问：为什么我妻子现在背叛我？是不是一时心软？是不是一时冲动？是不是仅仅出于报复？最后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心。仅仅出于报复就会欺骗吗？还是为了恢复自己的尊严而有意为之？

我立刻想起阿丝特丽，那个德国女人，那是在莱比锡，她四十岁，我刚二十。她丈夫是政府官员，经常出差在外，常常有不忠于妻子的行为。我和她是在电影院里相识和相爱的。她教给我在我宿舍狭窄的单人床上性交的方法，她那娴熟的技巧首先建立在我年轻、喜欢借助短暂、几乎是有准备的宣泄并在床单上调节冲突的克制心理上，还建立在她稳重而利落地服从自己的性欲

上。我发现，只要一开口说话、眉目传情，只要特别关注或者评价某个动作，只要发生在远离床铺的舞台上的尊重和小心翼翼，如同间谍早在大战爆发之前就采取行动那样，她的性欲高潮就开始了。于是，我明白了 她的性器官一直延伸到耳朵和眼睛上。在我贴满切·格瓦拉和古巴海报的狭小房间里，阿丝特丽纯粹出于报复而教我掌握一套考究的性爱技巧，根据是她丈夫——曾经为之倾心相爱的人——如今在东德和国外一些城市有几个情妇。可能她认为对称是爱情或者冷淡的关键，所以经常拿我当工具，使用我的频率与她怀疑丈夫欺骗她的频率相等。就在我认识她之前，我还坚信，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是知道我在性爱里寻找什么。但是，通过阿丝特丽我才明白充分的享受实际上取决于首先要了解她指望从性爱里得到什么。通过阿丝特丽，我还发现，仅仅出于单纯的报复就可以对丈夫不忠。这种想法今天也可能在马赛拉脑海里盘旋。因此，基于这番经历，到了揭露真相的时候，我一定要避免悲剧性的场面，要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人的冷漠态度行事，或者像侦探小说作家那样：保持冷静的头脑，坚持到故事的最后一页。

也许我在语音信箱里听到的那个男人迫使我思考：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爱马赛拉了；我想腐蚀我俩关系的单调生活，已经是即将来临的冷漠关系，而冷漠往往会破坏男女感情；我想，为让妻子留在身边的愿望会滋生没有把握的感觉，而这一感觉会造成我们习以为常的惯例而走向全面衰落。若果真如此，我就只能接受这样的结局了；只能出于骄傲而确定这样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完蛋的，因为人们总是把爱情关系的结束与两人的分手混淆起来，而实际上，分手仅仅是以无可挽回的迟到方式证实了爱情的死亡而已。伴随着我确信自己正在被骗的过程，刚开始的惊讶感觉渐渐变成了一种刚出现的钦佩混杂着好奇的感觉，钦佩马赛拉把自己一分为二的本领。日常生活中，她有两张面孔：真

脸和假脸。如果说从前她是把真脸对我，把假脸对外人，那么现在刚好相反：对我展示一张漂亮的假脸，为别人保留一张白皙的面颊、鲜红的嘴唇和明亮的眸子。或许我应该拉开距离观察所有这一切，要有人种学家平时研究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冷静态度，如同每当我写小说卡壳时，我比较冷静观察花园对面邻居家的动静一样。

数日后——记不得几天了，晚上，邻居突然来访。那是九点钟，天空布满星斗，月光照得波罗的海银光闪烁，我在听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悲伤的华尔兹》。一开门，我看到马尔库斯·艾里阿松一手拿了一束玫瑰花一手拿着一瓶法国波尔多葡萄酒。但是，马赛拉不在家，她跟那位智利女建筑师看电影去了，至少她是这么对我说的。估计她俩在看阿尔莫多瓦[1]的影片，我想是《关于母亲的一切》；看完电影，她俩会去哈瓦那餐厅吃晚饭，餐厅位于市中心，有西班牙饭馆的气氛，有热带地区的音乐和难以下咽的古巴饭菜。

我邀请马尔库斯脱下皮靴和大衣之后到客厅坐下。客厅周围挂满了拉丁美洲画家的作品。当然，这些画立刻引出他一片赞美之辞。如果马赛拉在场，或许立即会向他推荐一幅。即使她认为这种生意慢慢地成为摆脱父亲阴影的方式，我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一种从蒙图法尔上校那里获得好处的无耻方式，因为这些作品是上校捞来的，多年以来为我俩的生活提供了资金。但是，眼下，我要描述马尔库斯的来访，暂时不想说我自己以及居住在这里的缘由。实际上，前面我说过，我的情况与马赛拉的情况相似，虽说我再强调一下：我父亲不是一个被解职的军人，而是著名的科学家，可能是唯一有威信的人物，始终保持对皮诺切特军政府的忠诚。

[1] 阿尔莫多瓦（1949-），西班牙电影导演。成名作：《斗牛士》。

“我这个不谈政治的人让你大哥成了大企业家！”一天下午，父亲冲我吼道。当时，我们在争论他在独裁统治时期为什么扮演小心谨慎的角色。接着，他咳嗽一阵，用手捂住心口，仿佛得了心肌梗塞一样，又说：“只有你才是我的耻辱：作家，政治积极分子，背叛自己阶级的叛徒！”

眼下不是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不是提及我第一次自愿流亡东欧、如何加入左翼政党的时候，也不用说看见我父亲是如何去世的：躺在皮椅上，望着窗外的草坪、游泳池以及在遮阳伞下打盹的猎犬。如今，这切都已经成为纯粹的话语、每时都在改变和调整的模糊记忆。眼下，唯一实在的是马尔库斯·艾里阿松这个人物，他还在欣赏我们墙壁上的绘画。

他对我说：“在我看见的所有这些作品里，最喜欢的还是雷内·波多卡雷罗①的油画。”

对此，我并不惊讶。这幅油画，还有俄国画家阿罗塞尼奥斯的一幅作品，是我们家最成功和报价最高的艺术品之一。是马赛拉从一个古巴流亡者那里买下的。此人用不正当手段把油画带进了瑞典。我们不准备出售。马尔库斯告诉我，几十年前，他幸运地在哈瓦那富克萨大楼里见过波多卡雷罗。画家和他的情人住在那里。马尔库斯赞美了古巴和西班牙。他是在萨拉曼卡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的；在哈瓦那进一步提高，所以他的西班牙语有加勒比地区的口音。他掌握这门语言是为了把自己公司的活动拓展到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去。他高兴地笑着，百分之百地模仿着哈瓦那的说话方式。他说，古巴的音乐、绘画和人都让他着迷。

我问他：“女人呢？”

“我说的就是女人。”

我打开葡萄酒，斟满酒杯，端上来油橄榄。至少现在我对马

① 雷内·波多卡雷罗（1912—1985），古巴画家，擅长大型壁画。

尔库斯似乎已经放松下来的样子并不讨厌。他好像已经学会控制因妻子去世而感到的悲伤。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是在哈瓦那认识玛利亚的。他语气肯定地说，认识玛利亚的时候，他正在跟一个哲学系的古巴女生恋爱。这女孩因为马尔库斯迟迟不肯写下婚约而分手了。

“您想想我的生活发生了多大变化吧？”他问我。我只是笑一笑，为难地点点头，因为人人都愿意想自己的生活可能不一样；因此，面对我们实际注定的唯一而有限的生存，总是喜欢写自己的小说、设计出理想化的选择。

他不无伤心地承认，那时由于没有采取果断行动，结果备受折磨。他忧伤地说，如果那时他跟那女孩(名叫罗萨里奥)结婚，那么他会生活在古巴，会在蓝天白云下，在棕榈树和香蕉林里，在加勒比海风的抚摩下，或者坐在海岸旁的门洞里，逍遥度日了。

最后，他不高兴地得出如下结论：“结果相反，我生活在这里，过着没完没了的冬天。”

“至少您不是住在拉普尼亚[1]啊。”

片刻间，他没有说话，好像我的话不能完全令他信服。后来，他谈起妻子的极度虚弱，是一种周期性的疾病，严重时连最简单的事情都做不了，比如，洗衣裳，或者看孩子。她虚弱不堪，渐渐沉没在无人可以搭救她的深井内。

“根据您的描述，看来她活着的时候就不行了。”我含糊其辞地说道，不知道我对马尔库斯是不是过于严肃，也不知道对他的话是不是理解正确。

他沉重地继续说道：“我原以为睡眠疗法可以治好她的病。可她最后的决心吓了我一跳。无论如何，她不应该这么做啊。”他

[1] 拉普尼亚，瑞典的北部地区，位于北极圈内。

耸耸肩膀，又说：“现在我们不得不学会安排未来没有玛利亚的生活了。”

我从酒窖里又拿出一瓶新葡萄酒、法国西南部出产的门多沙酒，味道比波尔多还好，或许又有法国南部苏尔松河畔罗尔弗尔地方出产的羊乳干酪和真正的蓝色斯提耳顿干酪下酒，所以马尔库斯受到鼓舞，跟我谈起他的妻子来，好像她还活着似的。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少见的举止中，马尔库斯向一个陌生人敞开了心扉，他坦率地告诉我：玛利亚最后的这几年已经成为一种酷刑,因为她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厌恶社交,拒绝来访,不肯与亲朋交谈。马尔库斯具体地说，有时他妻子过得很恐怖，她下令拉上窗帘,因为害怕阳光 有时,不愿意见任何人,她认为陌生人——最后包括马尔库斯本人和孩子们也变成了陌生人——让她感到恐惧，好像这些人有意伤害她似的。

我想说明，在这些逐渐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的章节里，我如下的信念强调得不够：我们生活里发生的一切都是某部小说、诗歌、戏剧或者电影情节的组成部分 经验——有时甚至包括我们生活本身的场景——之所以让我们觉得新颖和具有独创性，仅仅因为我们没有阅读或者看过出现那些故事情节的作品或者影片。有可能我这套理论显得没有理智，或者我这个人显得痴呆；但是，我百分之百地相信这套理论，因为事实证明我有道理。每当我查阅那些文学家、艺术家阐释自己创作活动的书籍时，虽然他们使用一种与事实隔膜的语言极力自吹自擂、极力强调自己所谓的天才，可我看到的只是证实了我的理论而已。

马尔库斯再次端起酒杯,惬意地品味着干酪,一面说道“:您想象不出跟一个这样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是什么滋味。更糟糕的是……您知道跟一个这样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最糟糕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我冷淡地回答说,有些茫然,因为我关于艺术创

作的理论仍然在心头徘徊不去。

“最糟糕的是，尽管她秀色可餐，尽管你每天夜里在床上与一个裸体美人睡在同一个被窝里，可是她完全没有性欲了。因为我妻子的情欲从心里开始熄灭了，虽然她的外貌依然像从前那样美丽动人，我像蜜月时候那样爱她。”

“我理解。”我说。我联想起雅典娜女神的雕像，想到了许多体形动人的雕像是铁面无情的，比如玛利亚那样。

“您不能理解。”他反驳说。随后起身，走到面对他家的窗户前面，手里拿着酒杯。萨蒂的钢琴协奏曲结束了，我们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日死一般的寂静。“您想象不出一个人跟一个没有生气的洋娃娃同床共枕、沮丧地躺在她身边的滋味。”

我想起罗萨里奥·费莱[1]的一个短篇小说，讲述一个有心计的医生跟一个政治寡头的女儿结了婚，结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在社会上炫耀一下。结果，她变成了一个洋娃娃。突然，我想，马尔库斯是不是在考验我？会不会他已经知道了马赛拉对我不忠的行为？是不是他想调查一下他的话在我心里引起了什么样的联想？莫非是我发疯了？或者是酒精让这个年轻的瑞典鳏夫放开了手脚？或者，他给我讲述自己的悲剧，仅仅因为我是个外国人和陌生人以及不会冒让我从中渔利的危险？外面又飘起了雪花；波罗的海在雪花和夜幕中显得模糊不清。忽然，我心中蠢蠢欲动地想向他坦白，我妻子也在折磨着我，虽然理由不同；但是，自尊心没让我开口。如果说他老婆因为一场可怕的疾病而浪费了他美好的青春年华，那么我妻子则利用这宝贵时光欺骗我，或者进行报复，报复那个莱比锡的阿丝特丽。可是，如果阿丝特丽还在世的话，那也一定是个失去记忆的驼背老太婆了。我打算改变话题，就跟他谈起费莱那篇小说来，告诉他很早以前我的猜测，即

[1] 罗萨里奥·费莱（1938-），波多黎哥女作家，文学杂志主编，女权主义运动领袖。

前面我说过的：任何一种生活都已经事先包括在文学之中了。

“很有趣的理论。”他平静地回答说“那我就可以让心理学家去研究文学艺术而不是他们现在研究的愚蠢玩意儿了。”

这个瑞典人的面部表情变了。他用嘲讽的口吻说道“也许我老婆已经变成了那篇小说中的洋娃娃。可是，假如我没记错的话，您和您妻子也被写进小说里了，不过是另外一部作品……”

“哪一部？”

“《堂吉诃德》。”

“我不明白。”

“真奇怪,您不知道《堂吉诃德》这部世界名著里插入了一个故事，讲的就是克里斯托瓦和马赛拉。您不知道这个故事？”

“那人名叫克里索斯多莫,而不是克里斯托瓦。”我纠正他的说法。

“在那个时代，克里索斯多莫和克里斯托瓦是一回事。我在什么书上看过,是同一个人。”马尔库斯反驳说。

“有可能,既然您说……”

“马赛拉是个有文化教养的姑娘，出身贵族，她决定当牧羊女,就到大自然里去生活了。她是今天嬉皮士的老祖宗。”马尔库斯笑一笑,继续说下去“克里斯托瓦爱上了她。可是她不接受这份爱情。克里斯托瓦就自杀了。马赛拉厌倦了城市生活，厌倦了那个时代的恋爱规则，对结婚、生子不感兴趣。您应该重新读一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一定读读。”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比我还了解《堂吉诃德》，这让我感到汗颜。实际上，脸红迫使我不得不结束那天夜里的谈话。

“可是马赛拉怎么还不回来啊？”他不时地看看手表问道,眉头紧皱，好像他是焦急的丈夫。

“她只要和女朋友出门,回家就晚。”

"要小心啊！"他警告的方式既令人吃惊，又不慎重，让我十分惊愕，因为瑞典人通常是谨慎的。"女人骗人可比人们想象的厉害。对女人可得注意呢！"

这番议论让我苦笑一声，因为里面散发出更多的是墨西哥大男子主义的宣言，而不是现代斯堪的纳维亚男人的断言。但是，我宁可不予理睬。马尔库斯想不到，他这一警告恰恰与我的处境吻合，因此对我有伤害性。也许他发出这一警告是因为他了解了事实真相。我不应该忘记贝贝·克里斯多在旧城区提醒我的那番话："你要小心，斯德哥尔摩是个小城市，任何事都会弄得家喻户晓的。任何事！"

马尔库斯一味坚持地说："是的，是的。女人骗人超过丈夫的想象。至少在斯德哥尔摩是这样。拉丁美洲人如果发现老婆给自己戴了绿帽子会怎么办？"

这个问题，阴险狡猾，会弄得我心神不安。

我回答说："这取决于他的水平和性格。"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丈夫是个粗人，就会暴打妻子如果是个知识分子，文人，性格温和，可能就干脆分手，或者用别的方式处理。"

他失望地看看我。

"什么方式？"他问道。

"很难预测。"

"好啦，比如是您，那会怎么样？"

"不知道。无论如何，和平解决吧。"

"可是我以为拉丁美洲男人如果发现妻子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就会杀死老婆。"他断言道，一面紧紧盯住我的眼睛，毫无疑问是想调查我的想法。"一个拉美男人无论杀死不忠的老婆还是情夫，都是该流血的流血。我说得不对吗？"



八

在我发现手机语音信箱里的信息之后，便开始秘密跟踪马赛拉,连城里最错综复杂的小街、小巷也不放弃。

我跟在她身后，心头充满愤怒、谨慎和好奇，但也担心发现真相,同时害怕被她发现。但是,无论我妻子在商店、画廊还是香烟缭绕的咖啡馆里聚会，我都看不出有什么令人不安或者激动的事情。在斯德哥尔摩当间谍很容易，尤其是在冬天，行人都穿着大衣,戴皮帽,鼻子上架着太阳镜(抵抗雪地的反射),于是就混迹在一群看不出性别、面孔和年龄的人群中；于是，追踪者和被追踪者最终就融化在行人里了。街上密集的车辆有助于我的跟踪，斯德哥尔摩人长距离的散步爱好有助于我的跟踪，马赛拉需要紧急出行时坐地铁的习惯有助于我的跟踪，因为斯德哥尔摩如同任何一个现代化城市一样，寻找停车位实在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可是，尽管斯德哥尔摩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间谍提供了如此之多的方便，我还是没有能够找到渴望找到的证据。一个电

话，一个男子的声音，一个只有两个人才知道的时间和地点的模糊口信，都不足以为一个置身于游戏之外的第三者提供准确的寻找方向。

有时，马赛拉在某个地方谈买卖绘画或者家具的条件时，我就在她附近的咖啡馆里消磨时光。我一方面牢记自己的间谍身份，一方面利用时间为这部小说打草稿，塑造其中的叙述者和主角，就是那位侦探小说的作者——前面已经说过了——他很像我；但是，他还缺乏形象、灵魂和信念，显得很被动，是个纯粹的观众和事情进行的描述者。顺便说一句，几天前，一位女读者给我发来一个电子邮件，她批评我从前的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不能掌握和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意见让我在孤独和寂静的书房里发出一声无精打采的笑，首先因为我看这位女读者拿虚构过于当真了；其次，因为我的信念是：人类并非总是反抗逆境和不幸，而是忍辱屈从，对自己的命运往往逆来顺受，而不是改造历史。

但是，我最好离开推测，因为推测让我陷入新的怀疑之中，突出了我证据不足的现状。实际情况是，马赛拉还没有察觉我在跟踪她，我也没有当场抓住她不忠的证据，这让我可以暂时喘息片刻，有个类似战斗中的间歇，让我抱有一线希望：一切只是我发烧的推测；事情有可能换一种方式解决，夫妻关系还会好起来。我承认，这仅仅是一线希望，也就是说，有可能出好结果，虽说那些情爱衣物固执地悬在这希望之上，虽然那些衣物出现或者从我女人的抽屉里消失，但终归是存在的。

尽管如此，在另外一些时候，就在我隐蔽于行人里，无论是公交车站上，还是某个屋檐下，等候马赛拉的同时，我都相信她已经知道我在跟踪她了，知道她与画廊经理、古玩商以及亲密女友的会面，或者她想在西班牙语话剧团弄个角色表演的打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仅仅都是伪装，以便躲避我

的跟踪。对此，我要加以证实。马赛拉想在这里当演员是很困难的，首先因为这里没有讲西班牙语的剧团；其次因为她的表演生涯太短，如果不算她在弗朗西斯·多雷奥[1]根据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改编的作品中扮演的丝比拉·瓦内。总而言之，她的走动仅仅如此，就是为了延迟幽会时间、阻止我会证实自己的怀疑的一种诡计。在这个格拉西安[2]式精明算计的游戏里，或许她已经发现了我的企图，所以她急于实现自己的计划，利用我的精疲力竭来欺骗我。

经过一下午徒劳而谨慎的跟踪之后——下午我都在大饭店对面等候她，心中盘算着当场捉奸然后杀死马赛拉和她情夫的想法；可是事情发生了变化，变得让人可以放下心来，于是我准备回家，这时，我透过市中心咖啡馆的玻璃窗看见了马尔库斯在里面。陪伴这位邻居的是一个金发披肩的姑娘，脸庞白皙，几乎是半透明色，肯定是斯堪的纳维亚人。那咖啡馆在奥斯特马尔附近，奥斯特马尔是个由豪华商亭组成的市场，价格昂贵，顾客很高雅，是大众市场的反义词。后者在地道里，形成一个多种族、多文化混杂的大熔炉，有欢乐、喧闹的开斋节的气氛，香烟缭绕，异国风情的菜肴香味扑鼻，外来移民多有光顾。大众市场是那些生活在城市边缘地带被歧视的外来移民聚会的少数场合之一。但是，我说了：发现马尔库斯在一个姑娘陪同下出现在那个狭窄和便于躲藏的咖啡馆里，让我迷惑不解。

我走进咖啡馆，装作没有看见马尔库斯和他女伴的样子，走到吧台末端，等候要咖啡加牛奶。我刚来到斯德哥尔摩的时候，这些瑞典咖啡馆让我很生气，你得排队提出要求并且交费，然后

[1] 弗朗西斯·多雷奥，智利剧作家。

[2] 格拉西安（1601-1658），西班牙哲学家、作家，擅长用精练和夸张的妙语连珠表现哲理。代表作：《好评论的人》。

等待通知。对于来自地中海文化的人来说，他们习惯快速有效的服务，因此会觉得这种程序实在太繁琐了。但是，对于瑞典人来说，这是家常便饭，虽然他们善于组装宜家家具，也习惯在自动取款机前排队，在药房里拿号码等候买药，在连锁店等候购买酒精类饮料。交完钱，我发现那姑娘突然离开了咖啡馆，可能是马尔库斯提醒了她。而他本人则拿起餐桌上的《每日新闻报》[1],装出阅读的样子。我向他走去。

“我可以陪陪你吗?”

“当然可以。克里斯托瓦,很高兴见到你。”他亲切地笑一笑，把桌上的报纸折叠起来“我就要喝完咖啡了。不过,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马尔库斯详细为我说明了他公司运作的情况之后，对于我在家中写些什么表示兴趣。实际上，我不记得跟他说过我写这部小说的事情,无论在车库里,还是他来我家做客,我都没有说过；可是让我吃惊的是，他知道我是个小说家。但是，由于我的记忆力不大牢靠,我没把这个当回事。回答时,我回避了细节 当然,我没告诉他，我准备把我日常生活里发生的事件加入到我写的作品里——比如，他妻子之死以及博耶娜传播的谣言——我也没告诉他，我热衷于把虚构和现实蓄意地混杂在一起；我也没说，打算在多大程度上确定简单和赤裸的现实可以抓住小说读者的注意力。但是，我提到了这样一个老话题：日常生活是否有明白无误的意义和方向，如同小说和电影提示的那样，或者，意义和逻辑是否是作家和电影导演为了包装自己的产品和让产品变得更有说服力而需要补充的调味品。只是在几天之前，马尔库斯把我的生活与《堂吉诃德》里的故事联系起来，我都没觉得那

(1) 《每日新闻报》，在斯德哥尔摩出版的晨报，瑞典最大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以全面报道艺术、国内外消息而闻名。

些想法是理论上的放纵。

他坦白地说:“我一直梦想当作家。”这时,咖啡馆里顾客减少了。这增加了我的希望 给我准备的咖啡快要煮好了。“咱俩找一天聚一聚，谈一谈，我可以给您提供一大堆创作素材。”

他的话我并不感到吃惊。实际上，我们小说家常常会遇上这样的人——特别是在渴望当作家的人——他们自信脑袋里装满可以写小说的奇异故事。通常，他们总是设法让人相信：之所有还没有写出作品来，仅仅是因为缺少时间；当然，他们不知道故事情节是作家脑袋里最丰富也最折磨人的东西。由于当作家似乎更多地取决于个人意志而不是外部现实，作家就成了精英。而医生、工程师或者律师就不会有这种事情。

我从柜台端回咖啡牛奶，一把长勺露在杯子外面。滚热的玻璃杯烫着我的手指头。我说：“显然，这不是我将来再选择的职业。不是职业，而是一种待遇很差、没有固定上帝可信仰的教士工作。”

“可是我有写作的野心,哪怕是为了阿尼卡写作。”马尔库斯这个年轻的鳏夫说道。我看出他有些脸红，好像因为说出了阿尼卡这个名字而后悔了。

我猜测阿尼卡就是那个刚才小心翼翼离开马尔库斯的姑娘。我装出剥开糖纸的样子，一面心里想：他是从什么时候认识这位姑娘的呢？现在比较清楚了：是在玛利亚自杀之前。难道是阿尼卡引发了玛利亚之死？博耶娜说到马尔库斯背叛妻子的原因时，影射的就是阿尼卡吗？

刹那间，一个想法闪过我的脑海：玛利亚的去世可能会让马尔库斯高兴；他或许早就希望或者加速妻子之死，为了一心跟阿尼卡在一起。但是，随后我感到震惊和害怕，不是因为这个邪恶的想法，而是因为这给小说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情节。是的，我兴奋地想：我可以让叙述者放下杀妻的意图，而把叙述者的邻

居变成计划杀害病妻的人，这位病妻与我的老邻居一样，也可以叫玛利亚·艾里阿松,模样也像玛利亚。此外,我还可以把美丽的阿尼卡纳入到作品中来，把阿尼卡变成一个搞阴谋的家伙，变成希冀继承马尔库斯遗产的人，因为后者犯了杀妻罪。这样，我就可以在这样的渴望中来个飞跃：给描写的单调日常现实注入悬念,也就是说,赋予日常现实能够吸引读者的突变。今天,大批读者躲进了电影院，对此，我不能负责，应该负责的是我那些令人厌倦的同行作家。

如果我成功地像谨慎的新闻记者那样深入地把这个想法引进我现在叙述的作品里，那么不仅可以写成一部更动人的作品，这可以吸引新读者，而且可以深入到侦探小说弯弯曲曲的路径中去，但是又拒绝了侦探小说规定的奴役性的要求，比如，要事先拥有事件发生的详细路线和一位调查事件的侦探——官方的或者私人的。

“工作起来很苦吗？”马尔库斯追问道,打算把我从这文学的讨论中拯救出来，虽然他也参加了。

“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我进展缓慢。”我说,注视着他的眼睛，希望找到他妻子去世给他带来的轻松感觉，为的是随后我可以在孤独的房间里描写出来。“但是，在我离开瑞典之前一定要写完这部小说。”

“离开这个国家是您能做的大好事。瑞典是拉丁美洲人的坟墓,你们在这里变得面无血色,失去了出怪相的风趣,甚至幽默，最后变成了咖啡－牛奶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他如此冷漠地对待我要离开瑞典的计划，尽管还是模糊不定的,让我感到惊讶,于是问他：“您将来有什么打算？”

他看看外面,避开我的目光,解释说：“退休,很快带着孩子们去西班牙或者美国佛罗里达生活。”

“这么年轻就退休？”

“是的。”

这主意不坏。对于一个瑞典人来说，每年要忍受黑暗、寒冷和严酷的冬天，现在能迁居到一个四季如春、居民热情开朗、物产丰富的地方，难道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永别了，土豆烤鲱鱼 永别了，绿苔 永别了，扬松[1]的“侏儒姆米”！而在西班牙，每天都有葡萄酒、苹果酒和肉煮饭！或者烤乳猪加豆米饭！番石榴酱加干酪！还有甘蔗甜酒！马尔库斯一定积蓄了一小笔财富才敢梦想来一次如此罕见地改变生活之举。那个悄悄溜出咖啡馆的姑娘是不是也陪伴着他呢？我感到在博耶娜暗示下、我那些冥思苦索的问题，现在由于马尔库斯突然宣布改变生活而得到了证实。我心里正在想这个事的时候，觉得好像那个姑娘，对，就是阿尼卡，从窗外走过，身穿着皮大衣，头戴皮帽，飞快地看了马尔库斯一眼。

“好吧，克里斯托瓦，我该回家了。找一天我去拜访您，一边喝着法国美酒一边聊天。我很想看看您的房子。从远处看，我觉得里面保存着大量绘画。”马尔库斯一面说着一面起身，可手里还端着空酒杯呢。我不知道他是否察觉我已经捕捉到了发生的一切。

我不想提醒他早已经去过我家了。他之所以忘记了这一点，我想是因为阿尼卡的再次出现让他紧张起来了。

我说：“您随时可以来看我。而我只要有时间，就一定开始找那天您给我说的那部作品。”

“您指的是什么？”他惊讶地问道，已经准备迈步走了。

“指的是可能会讲述我命运的故事。”我极力帮助他回忆那本书。“您不记得啦？”

[1] 扬松(1914－？)，芬兰艺术家，擅长为儿童文学作品插图，她塑造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侏儒姆米’世界，在北欧和中欧广泛流传。

“别担心。我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笑着断言道。

“是《堂吉诃德》里马赛拉和克里斯托瓦那一章。您对我说……”

“啊,对了。是的,是的。当然,当然。我一定去看您,克里斯托瓦。我很想看看从我花园里远远瞥见的那些绘画。’他回答说,可是从这番话里我只是闻出为了骄傲地摆脱困境而使用的托词。

九

上午，我刚刚到过地下室，在那里看到了马尔库斯带来的葡萄酒瓶子；这是他来我家做客并且让我回忆起他做客情景的铁证。他做客的事让我回想起卡门·马丁·凯特[1]的《后面的房间》；书中的女主人公兼叙述者，是著名的女作家；一天夜里，她接待了一位身穿黑衣服的男人。两人一面喝着咖啡，一面交谈；男人向她提了许多关于生平和创作的问题。无论读者还是叙述者都不清楚 所有这些是真实的呢，还是梦境 但是，人们容易相信这是梦境。不过，当女主人公醒来时，她发现桌子上有两个咖啡杯以及客人留下的一个小箱子。这里，跟我写的作品有关系的是：毫无疑问，马尔库斯的瓶子就在地下室；由于他妻子之死或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他渐渐失去了记忆力。

[1] 卡门·马丁·凯特（1925-）西班牙女作家，擅长创作神秘、怪诞的小说。这里提及的《后面的房间》写于 1978 年。

此外,我查阅了《堂吉诃德》,作品里的确有两章插叙牧羊女马赛拉的生活以及克里索斯多莫的葬礼[1]因为马赛拉拒绝克里索斯多莫的求爱而自杀了。我指的是上卷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引人注意的是——也可能是令人不安的一点——这个故事,特别是悲惨的结局——虽然名字不是我的，却在一些方面与我的情况吻合，恰恰有可能就是我的文字命运。马赛拉是个聪明美丽、出身良好家庭的姑娘,逃避城市生活,当上了牧羊女。追求她的人很多;但是,她选择了孤独,我们不知道她的结局如何。她在堂吉诃德面前讲了一通维护妇女权益的漂亮话："凭着上帝赐给我们天生的理解力，我知道凡是美的都可爱；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因为美丽而被爱为什么一定非得去爱那个爱她的人呢！"或许，我应该认真对待这爱与被爱的对应关系；但是，我不应该忽略的是,认定我的生命恰恰早已在《堂吉诃德》里定型,实在是太狂妄了。

完全证实了马尔库斯来过我家之后，利用马赛拉去参加布阔夫斯基商店绘画拍卖会的机会，我拿起电话，找我岳父。老人家刚刚从军人俱乐部喝完下午茶回到家中。

"真难得啊,克里斯托瓦。你俩好吗?"

"好。您别担心。买卖在正常运转呢。"我回答道,不想让他着急。

我和岳父只要一谈话，就总是说具体问题，说健康、天气或者生意。我和他不很合得来。我知道他希望马赛拉跟别的类型的男人结婚，或许就是他女儿离婚的那个意大利人，或者跟一个军人。但是，我想时光磨平了他的幻想以及我俩之间的龃龉；每个人只好接受了对方：他接受了我这个小说家；我接受了他这个被指控犯有破坏人权罪行的军官。

[1] 详见《堂吉诃德》上卷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人民文学出版社第85页,杨绛译。

“什么原因给我打电话？”

“问问您是不是打算近期来瑞典？”

“没想过。不过我得去一趟西班牙，给一个朋友过生日。几年前，他在圣地亚哥当武官。让我从斯德哥尔摩经过一下，这主意不错。”

是的，有一段时间我和蒙图法尔上校相处得还好。恰恰是因为我父亲之死才结束了这友好时期。现在，我们还能互相容忍。总而言之，我俩的关系比我跟我岳母维持——或者没有维持——的关系还友好些。眼下，我根本不想提我岳母。

“什么时候过来？”

“两个星期后我必须到巴塞罗那。不过，我可以先经过瑞典。出什么事情了吗？”

“没有，没有。”我说，但是很想把一切抖搂出来。怎么开口说出衣物的事情呢？“就是马赛拉非常想念您，虽说她没有讲出来。您知道，这斯堪的纳维亚的冬天、漫漫长夜、寒冷……”

“我明白。”

“您别跟她说这是我讲的，劳驾。提都别提！”

“放心吧。我就跟她说我将要路过瑞典。”

“谢谢您了。”

“告诉我另外一件事吧……”

“什么事？”

“没有动静吗？”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一直对这事感兴趣，总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当上外祖父。眼下，就我而言，还是想当父亲的，因为我想我还是——无论如何——仍然爱着马赛拉的。

“没有。上校，暂时没有。”

“好吧。我给马赛拉打电话。我准备过几天就出访。你们还是努把力，因为你已经不年轻了……”

与岳父通话之后，我又写了几章小说，到了中午时分，像每天那样，看看来自圣地亚哥的智利电视频道。我还不知道是不是敢给我岳父讲述现在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帮助我恢复理智，会不会鼓励他女儿跟我分手。我还是等他来这里再说吧。总之，看智利频道是我的习惯，是一种难以控制的填补我精神空虚的办法，使得我在荧屏前浪费许多时光，就为了看看智利那边发生的事情，为了决定我是不是应该回国，为了我和那个世界重建联系，因为那个世界让我远距离地想念，同时我又不得不离开。我应该回国，那个地方讲我的母语，我了解那种语言的奥妙；可是，那里已经让我感到不习惯；从过去看，它是个陷入过困境的国家，它没有能力走向未来和摆脱三十年来运作的旋转木马。这套智利节目，我经常细看，以至于有时我能想象出只要电视机一关，我就会跳进圣地亚哥那炎热和躁动的大街，而不是在这里面对万里冰封的波罗的海，欣赏这白雪皑皑的风景。有时，我以为自己真的生活在智利，以为屏幕上发生的一切就是真实的生活，以为我在斯德哥尔摩过的这种与世隔绝、孤独寂寞的生活属于一部即将结束或者被商业广告打断的影片。让我产生出这种感觉的不仅是荧幕上的形象，而且还有每天阅读的报纸、听见的广播、互联网上看见的新闻以及跟马赛拉或者这个、那个智利移民的谈话。这是一种精神分裂状态的体验，它抵消不了我的孤独感、隔膜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是，却能让我忍受在斯堪的纳维亚逗留的时光，把逗留的日子变成一种梦呓。

我一旦关上电视或者关闭电脑上的智利网页，就又重新陷入这个瑞典人的世界了；这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秩序、准确和寂静。斯德哥尔摩似乎并不富足，不像汉堡或者纽约那样。这里的一切都已经准确地量化了；似乎人们已经习惯了量化的生活。马赛拉常常在商店里找不到需要的衬衫或者鞋子；天一黑，超市里就没有了新鲜牛奶；我们家里需要电工或者管工的紧急服务时，

他们几个星期之后才登门。餐厅里缺少跑堂的；咖啡馆里，顾客不仅要自己端杯子，而且还要在出门之前把杯子放到支架上。今天，瑞典人尽管过着相对繁荣的生活，却在消费问题上，有着战时心态。如果他们在家里请客，与我们在拉丁美洲请客时提供的丰富菜肴相比，他们拿出来的饭菜实在太寒酸了。在聚会时，他们礼仪性地端出小小的酒杯，斟上一点点葡萄酒。人们如果去超市购物,就尽量少花钱,好像总是缺钱似的,总是担心东西太多。他们习惯于最低水准的生活。这里最缺乏的当然还是阳光。

博耶娜的意见是，瑞典人过着富裕的生活，干活少，挣钱太多了。但是,我想,博耶娜看待事物的观点深受她经历的影响。她充分利用了生活在这里的时间，一个月的收入可以供她在波兰生活一年。她断言，政治家糟蹋了波兰，而新上台的政客个个是腐败分子。她把自己过去的党员身份深深埋藏在遗忘之中，显然是打算给自己在柏林墙倒塌后的生活赋予新的意义。如果历史不是发生了如此激烈的变化，这个女人今天大概是克拉科夫[1]的马克思主义女教师，而不是在斯德哥尔摩擦地板了。我估计，她今天对瑞典的兴趣就是肮脏的地板、肮脏的浴盆和肮脏衣裳，因为这给她提供了生活需要的来源，可以让她攒钱在克拉科夫买房子，过上体面的生活。如今她已经五十岁，许多事情不再吸引她了，无论漫长的冬天，还是所谓的瑞典模式，无论博物馆还是免费的公共图书馆,她都没有兴趣了。我猜想,无论爱还是性,对她来说，都没有吸引力了。

三十年前，我在东柏林住过。那是共产党执政时期，我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的波兰人每天来到商店购物，这里的商店比波兰的供应情况好得多。东德人羡慕这些讲斯拉夫语的人们，因为他们可以穿越社会主义国家的边境去西方旅行；而东德人则不可

[1] 克拉科夫,波兰南方重要城市。

能。从那时起，我脑海中的波兰人形象就与这些穿人造革夹克和黑色风雪衣的男人以及头戴围巾、身披大衣的妇女联系起来；他们像伤兵一样穿过亚历山大广场，直奔免税商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大和供应最好的商店，仿佛要把商店抢劫一空似的。

一天，博耶娜和我在厨房里的时候，她痛苦地说："我们的政治家和你们的政治家都是一路货色。在智利，有些昨天还是被迫害的人，今天就与军人妥协了。在波兰，很多领导人和团结工会的头目把国有企业据为己有。可是，老百姓呢，仍然受苦受难，为的是别饿死。"

她说的不无道理。表面上她是家政服务工，可是经常显露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方面的功底。在智利，许多曾经坚决反对军事独裁统治的政治家们，现在和皮诺切特达成了协议，减少了对往事的批判，为的是在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今天，由于他们更操心的是保住这个高官厚禄的位子和继续升官发财，就呼吁稳定与和谐，忘记了他们从前激进的要求，而强调他们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因为据说这对昨天的被压迫者有好处。

"可至少咱们的国家今天是生活在自由的空气里了。"我对博耶娜如是说。我没有兴趣讨论政治问题，这玩意儿已经让我疲惫不堪了。

"您说这是自由，那就是自由吧。"她趴在地板上回答说。她正在用刀子奋力刮掉顽固地粘在地板上的面包渣。

生活为我提供了好运气，往往让我感到担心。我认识一些同胞，三十年前，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东柏林的大学生，今天在统一后的柏林城里出售安第斯山人的手工艺品。一有警察出现，他们就收拾破烂，塞进用危地马拉粗布织成的背包里，撒腿向最近的地铁车站跑去。他们从前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文学或者社会学，后来想当第三世界理论家的计划破产了，因为那个社会制度消失了。另外一些同胞，在勃兰登堡附近向旅游者出售前苏联

红军和民主德国人民军的制服、钢盔和勋章。有时，这些同胞恰恰就是过去曾经梦想回国参加武装斗争的人们。他们目前的境遇很像博耶娜这个波兰女人，在这个发达的世界里勉强活着，可是他们死也不肯回拉丁美洲去，因为那里等候他们的是贫困和不幸。

一想到这样的情景我就感到茫然：我可能走上和过去那些同志 -样的命运之路，也可能今天漫游在柏林街头，出售我曾经羡慕过的军服和勋章——过去我甚至肯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换取的东西 与此同时，我曾经信任过的政党领导人，如今在国内，更加老奸巨猾，小心谨慎，腰缠万贯，分别占据着政府、议会或者部委的要职，好像过去的独裁统治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仿佛他们对军政府不应该负任何责任。可是我自己如今居住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房子里，撰写这部长篇小说，甚至可以经常去孔斯伐登广场的滑冰场滑冰。显然，命运给每个人保留了不同的角色，例如，死神一度在马尔库斯的家门口、而不是我门口停留，这就是证明。我想，这永远的不确定性，这种与我们有关的事情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发生，而世界历史的总方向并没有改变的感觉，常常迫使我同情被生活赌盘击败的人。

“跟我一起喝杯咖啡吧！”我对博耶娜说，没把她看成家政钟点女 工，而是柏林墙如果不倒塌就可能当上的马列主义博士。

她用怀疑的眼神看看我。长期以来，她经受着受雇人家的白眼，很难会有这样的邀请。我俩坐下来，静静地喝茶。我猜想她不喜欢喝茶。但是，她一言不发。她像一头被包围住的动物，不敢正视我的目光。她的眼睛是蓝色的，灵动活泼，一点也不丑 嘴唇平庸，头发染成了红色 这使得整体上显得不和谐。她身体健壮，乳房高耸，过去肯定有过令人垂涎的时代。今天这个女人浑身散发着烟草和汗臭，而在往昔另一种统治时期表现得如何呢？是极“左”的教条主义分子，喜欢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还是灵活而善解

人意的女性？但无论如何，都轮不到我来评判她。过去，她在盖莱克[1]和雅鲁泽尔斯基[2]统治下，扮演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角色；如今，她有些尊严地为打碎的盘子交付赔偿费。

“您知道为什么我离开了那家吗？”她从地板上站起来，在咖啡里加上糖块，问我，一面冲着马尔库斯家的方向扬扬颌骨。

“我不知道。”

“因为马尔库斯待我不好。”

“怎么不好？”

“一看见有脏，他就冲我大喊大叫。要么就指责我划破了家具，或者说我打碎了盘子。”

“玛利亚呢？”

“她是个大好人。可是，她整天睡觉，就像以前我给您说的，心情压抑。丈夫经常欺骗她，她能不压抑吗？”

博耶娜告诉我，马尔库斯早在多年以前就跟一个姑娘有暧昧关系。马尔库斯的妻子，玛利亚，打算恢复正常生活，但是失败了，马尔库斯依然我行我素；玛利亚由于无法说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害怕将来一人孤独，无可奈何而又冷静、克制地接受了丈夫的不忠行为。那个姑娘大概就是阿尼卡，那个从咖啡馆里溜出去的女孩。我猜测，博耶娜知道许多关于马尔库斯夫妇生活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多。之所以如此，大概是玛利亚在绝望中把一些麻烦的隐私说给博耶娜听了；还因为面对马尔库斯的不忠行为，虽然玛利亚装出冷漠的神情，但是心里非常痛苦。或许，她只能忍受这种折磨，因为如果选择没有马尔库斯的生活，恐怕更加

(1) 盖莱克(1913-？) 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曾任波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0-1980)，1981 年因经济政策失败而下台。

(2) 雅鲁泽尔斯基（1923-），波兰陆军将领及共产党领袖。1981-1989 年为政府首脑，1989-1990 年为波兰总统。1990年 12 月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总统后，雅鲁泽尔斯基将共产党的最后一点权力交给了反对派。

糟糕。

博耶娜说"：他和她经常吵架，就是说，只要她一睡醒，就吵架。那家伙趾高气扬。有一天，他甚至喊叫着说，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要求马上离婚。"

玛利亚说："你要是离婚，公司就没有你的股份了。"

马尔库斯吼道："公司是咱俩的！"

"对，可百分之九十的股份是我的。"

怒气冲冲的丈夫喊道"：我一定想办法离开你。"

"你就跟那个来历不明的丫头走吧！"

"对，去争取幸福。"

"你只能等我尸体凉了才能幸福。"

"那就等着好了。"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和博耶娜一面喝茶，她一面绘声绘色、详详细细地讲述马尔库斯夫妇吵架的场面。博耶娜一面注视着我的眼睛，看看我是不是感到吃惊；一面从餐桌上方飘过来混合着烟草味的廉价香水气味。她是个烟鬼，经常放下手里的清洁工作，站到房子门口吸烟，同时沉浸在思念父母和家乡的心绪中。

"他俩吵架的时间距离玛利亚自杀的时间很远吗？"喝完茶，我问她。这时，我真的不想再听博耶娜关于玛利亚之死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说法了；按照她的说法，可怜而绝望的马尔库斯是有责任的，他希望重新开始生活，几乎想不起自己干的事情了。

博耶娜把茶杯拿到洗碗机那里去了。她放出热水，一面寻思合适的词汇。她看看外面白雪覆盖的花园，远处是一排白桦林。片刻后，我正要上楼去书房时，她补充说道"：帕索斯先生，那些事情都发生在玛利亚去世前两天！"

十

有可能玛利亚之死并非那么简单。也许马尔库斯给他妻子提供了过量的安眠药。至少是博耶娜暗示的那样，马尔库斯杀害妻子的企图是把公司据为己有，跟别人结婚。如果我承认几天前我曾经希望马赛拉和她情人——我根本都不认识——能够完蛋，那么博耶娜的理论也绝非胡说。现在，没有疑问的是，邻居的房子里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因为另外一种可能性是马尔库斯帮助妻子自尽，是一种参与性的自杀。按照博耶娜的说法，玛利亚有时卧床长达好几个星期，拉上窗帘，不闻窗外事，没有兴趣读书和看报，不想看电视和孩子，好像真正与世长辞了似的。起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虚弱、沮丧，还是发现了丈夫对她不忠？现在，这些问题混杂在一起，在我家一片宁静的氛围里，萨蒂美妙的旋律飘上楼梯，在房间里回旋。应该查一查起初发生了什么事情。总之，马尔库斯有可能帮助妻子实行安乐死，因为如果有真诚的爱，也就会有安乐死，这

一点对于一个擦地板的钟点工来说，的确难以理解。

然而，我望着邻居家孤零零的房子，望着雪地上轮胎留下痕迹的威艾依大道的孤寂景象，望着白雪，冰封，万籁俱寂，在灰蒙蒙的天空下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波罗的海，我承认通过乱糟糟的议论来深入了解情况是不恰当的。我的推测仅仅建立在博耶娜简单的暗示上，可能是恶意的暗示上。博耶娜在怨恨和愤怒情绪的驱使下，企图在我面前作践她过去的雇主。如果我一定要揣测的话，我至少应该以事实为根据；而唯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医生们指出的证明：自杀是玛利亚的死因；这样的事实表明马尔库斯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过他想过的生活。

昨天，我独自吃过早饭后，像往常那样上楼去书房——马赛拉还在睡觉，因为前天晚上她跟女友巴罗马去吃晚饭，我在电脑前坐下，继续写这部长篇小说。坐下来，我发现妻子没有关闭她的电子信箱。一阵寒意立刻袭上心头，因为马赛拉总是小心地保存着密码。在好奇和怀疑的驱使下，我踮着脚尖，来到卧室门口，证实妻子在睡觉，返身回到书房，悄悄关上房门，准备动手检查她的书信往来——我承认这勾当卑鄙下流。我再重申一下：干这种卑劣的勾当不是我的习惯。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疏忽造就窃贼，马赛拉的疏忽把我变成了间谍。可是，当我发现信箱里储存着十几封信，其中多数是没有打开的，我立刻想揭开谜底的希望开始落空了。

但是，我不放弃。不错，大量是女友的信，是在咖啡馆或者餐厅聚会的确认，是关于国际政治事务的意见，是关于图书和影片的建议，还有《纽约时报》、《国家报》和《费加罗报》的文章，还有公司的报价和艺术品画廊的咨询问题。我并没有泄气，因为我相信，在马赛拉语音信箱里留言问候的男子，肯定会在什么时候给她发送邮件。这是种屡试不爽的预感。我耐心地寻找，尽管是连她也还没有打开的信息；我找到最近几周来的三封信，寄信人

是个假名，我有些怀疑安达莱斯。前两封的内容只有两行字，是确认见面地点的：一个在歌剧院咖啡厅，另外一个在保尔与诺贝特咖啡馆。这两个地方都是为讲究饮食的人们准备的场所，建立在斯德哥尔摩黄金地段的中心。信的结尾处只有一个简单的“安”字。行文的口气冷淡而实用，或许恰恰是这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想，通常的商业信息总是包含起码预示生意兴隆的礼仪套话。但是，这里，行文的枯燥乏味，伪装出寄信和收信之间的距离，却不能令人信服，而恰恰给我提供了相反的联想：这是一种可能由合谋犯罪关系——秘密商定的电码和密码——形成的伪装。当我打开第三封信时，我的疑心就更重了，因为我看见那里有一封邀请信，让马赛拉于星期四前往“上次见面的那家旅馆”。这封信气得我浑身乱颤，痛苦万分，怒火中烧。我强打精神，一面竖起耳朵听听老婆是否醒来，一面心中暗想：这一切的唯一好处就是约会还没有实施，因为是两个情人未来日程安排的一部分，这就至少为安排跟踪马赛拉提供了时间。

我下载了一些仍然有一点疑问的信息，准备随后仔细研究；对于上述发现，我保持沉默。到了星期四，我还在研究这些疑点和撰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最新几章；当然，这几章相当灵活，但是还不能让我信服。实际上，我做的事情就是改变了作品里主人公（作家）的身份和动机，用马尔库斯代替作家，变成马尔库斯相当真实可信的画像。我承认这手法很像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表现；今天，许多人认为这种手法过于讲究模仿现实而加以否定。我想，如果这部作品起名后出版，肯定会立刻引起到处写图书评论、到处发表书评演讲的著名文学专家的批评。不管怎样，搞文学评论、自封为审判官的作家有十足的癖好，尽管从来没有人授予他这个职称，其起因是一种症状。我常常在想：孩子们会不会梦想当文学评论家，就像他们梦想当医生、工程师、间谍、足球运动员、魔术师或者作家那样？我用自己的脑袋打赌：没人梦想当

这种玩意儿；最后当评论家的结果不是来自一次间接的选择，而是几次文学创作失败的产物，而这些失败或许可以说明某些评论家对某些作家无法掩饰的仇恨。

一句话，还是回到我正在写作的小说上来为好，忘记别的考虑为佳。推测是给我提供写这个故事所需的动力思想的手段：那个瑞典人，爱上了一个名叫阿尼卡的恋人，他必须杀死有病的老婆，通过一个阴谋，让老婆吃下过量的安眠药。这样，他没有引起警察的怀疑。警察善意地——斯堪的纳维亚人善意的美德之多，如同拉丁美洲人和西班牙人的嫉妒心之重一样——猜想：这是又一起自杀案件，而在这个世界角落漫长而又黑暗的冬季里，不少斯堪的纳维亚人会使用自尽的手段结束人生。

如前所述，星期四上午，我在彻底的沮丧情绪中完成了日常规定的工作。实际上，我一心渴望快些开始跟踪马赛拉的活动，以便了解真相，因为真相往往不如未发现的骗局那么痛苦和神秘。被欺骗的人如果发现了不忠行为，不会像蒙在鼓里、度日如年那么痛苦。我反复琢磨：马赛拉忘记关闭电子信箱，是一次简单的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是不是预先想好的行动，试图让我知道她的不忠行为，让我加以干涉并且结束夫妻关系。人们永远无法预言不忠行为可能选择什么发展方向；不忠行为是以第三者通过甜言蜜语、思想感情和肉体接触的勾引为开始的，经过无所顾及和不负责任的纵欲，最后导致关系破裂和强烈的复仇欲望。不过我也偶尔有过逆向思维——马赛拉用这种巧妙、冷酷的方式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在我认为可疑的约会里跟踪她，而实际上，这个约会只是纯粹工作性质的往来。也许这是个计谋——开头让我出错，让我妒火中烧，最后证明我的怀疑是多么下流，马赛拉的行为多么正派。一想到她的疏忽可能是个圈套，就让我感到不寒而栗。

“你上哪儿去？”马赛拉来书房跟我道别时，我问她。今天，她

身穿一件套装，显得又合身又年轻，头发披散，浑身是她喜爱的香水味。

“去阿莱克斯餐厅吃午饭。”她声称，一面用小手指抹抹眉毛。我觉得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动作。

阿莱克斯餐厅是个高雅的地方，只有知道那里有美味佳酿的人们才掌握相关的资料。吃午饭的说法，我觉得很新鲜，因为我预测她那天是要在下午才出门，去赴电子邮件里提出的约会。这个时候，她只打算与某个女友见面，我估计，这个女友一定是她活动时候的掩护。

我问她“: 吃完午饭后干什么 ?”

她露出一个意义含混的表情,有些漫不经心。接着,补充道：“在市中心逛逛商店,喝喝咖啡,泡泡旧书店。但是,我会早早回家的。啊，我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 ?”

“我爸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打算去巴塞罗那旅行时来这里看咱们。”

“他什么时候旅行 ?”

“很快。”

马赛拉爱她的父亲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既深沉又批评；在公开场合,她表现得深沉,私下里则持批评态度。这是矛盾的感情，自从她母亲去世后这种矛盾加剧。她母亲几年前死于癌症。但是，尽管她表示热爱父亲，老爹的来访却让她感到不快。父亲的出现会打破她的心理平衡和平静；她宁可与父亲保持一个审慎的距离，因为这种方式不仅可以让源于她童年时期的幸福回忆在父女二人心中占据上峰，而且使没有日常冲突时产生的亲情处于主导地位。

“他要在这里逗留多久 ?”

“这你是知道的，他呆的时间总要比事先说的多。不过这一

次他要去西班牙参加纪念活动，这样就不会在这里停留很长时间。”

我永远也无法理解马赛拉和蒙图法尔上校之间的关系。现在，我要赶快补充一句：我也不理解我跟我岳父之间建立或者说我同意建立的关系。但是，具体到我妻子身上，情况要严重一些，因为蒙图法尔上校负有这样的罪责：在军政府统治时期，我岳母索非亚夫人的一位老朋友失踪了。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军政府上台初期，这位老朋友那时是个儿科大夫，因为参加左派的活动被捕入狱了。大夫的家属前来向索非亚夫人求助，她就恳求丈夫运用在军队里的影响力，释放那位儿科医生。蒙图法尔上校纹丝不动。时间一长，医生被列入被捕失踪者的名单了。过去我就一直不明白索非亚夫人怎么能继续跟上校生活下去！

只是又过了几年以后，我岳母已经去世了，我们通过岳母的一位中学老同学的口中，方才得知或许可以解释上校纹丝不动的原因：医生原来是索非亚夫人的初恋情人，已经订婚，几乎就要结婚了。但是，索非亚的父母反对这门婚事，因为小伙子还是个大学生呢，而且他父亲是共济会成员；父母坚持索非亚跟另外一个追求者、一名军官结婚。索非亚为了尊重父母的意志，放弃了对心上人的爱，与蒙图法尔结了婚。

“但是，据我所知，俩人一直保持情人关系。”一次，在瓦尔帕莱索港口的元旦之夜的聚会上，索非亚的一位女朋友告诉我俩。那天夜里，大家都喝多了。“索非亚结婚以后，俩人经常见面。你父亲就粗暴地干涉，把医生轰走了……”

马赛拉抽泣起来。与会的人们还以为马赛拉是因为新年来到而激动得哭了呢。但是，我至今不知道马赛拉的哭泣是因为母亲放弃了唯一所爱的人呢，还是认为她父亲是个牺牲品。几天后，当我已经忘记了那次谈话，或者确切地说，我把那次谈话与酗酒之夜的模糊情景混淆起来的时候，马赛拉对我说：“情况我

都知道了。那天夜里露面的女人，自称我母亲的老同学，是医生的妹妹。她是个顽固不化的左派分子，为了报复和伤害咱们，她骗了咱们。”

“真相从来不会害人的。”

“你现在还不相信我母亲对我父亲是不忠的吗？”

“怎么会不信呢？”

她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火苗。

“因为那是一种骂人的方式。”虽然她并不确信自己的话，但是却骄横地说道。

“咱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因为一对情人，或者说，所谓的两个情人，已经去世了。真相就是咱们现在相信发生的事情；而我觉得你母亲寻找真正的爱情以及你父亲能够原谅她，都是很高尚的。”

上午十一点钟，马赛拉登上等候在街道肮脏雪地里出租汽车。我向她卧室跑去，那里的床铺已经井然有序。我飞快地检查她的抽屉，看看包装情爱衣物的口袋是否还在，结果是不见了。我像个疯子似的下楼，上了陈旧的沃尔沃牌轿车，全速向城里驶去。但是，没能发现马赛拉的影子。我极力安慰自己镇定，镇定！道理很简单：马赛拉跑不出我的手心，因为我事先已经掌握了她约会的地点。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我看到阿莱克斯餐厅附近有个停车场。我离开半条街泊车，免得引起注意。马赛拉已经在一张餐桌前坐下了，从那里可以看见街上的动静；她身边有两个年轻人，模样相似，穿着高雅。我仔细捉摸周围的环境，寻找一个可以安安静静监视她的地方。终于，我在附近一家‘七十一’连锁店里找到藏身之地。我不时地翻翻迟到的《新闻周刊》，喝着咖啡，吃着仅仅要十块钱的面包夹香肠（难吃之极）。我没有别的选择，那里是唯一有暖气、可以给我当观察哨的地方。

哪一个年轻人是她的情人？哪一个又是拉皮条的帮手？我一面吃着充当饭后点心的苹果派，一面开始想象某种发烧的场面，但是并非没有理智：两个小伙子都是她的情人，酒足饭饱之后，三人去旅馆或者单元房。为什么不可能？‘三人共处’是当下的时髦玩意啊，说不定就是她的亲密女友建议的呢。一头冷汗出现在我前额上，一瞬间，腹部发痒；但是，我立刻平静下来，心里想：不可能出现那种场面。我估计，午饭后，马赛拉回家去了，可能就在家里睡午觉，其余的一切都是我胡思乱想的产物。是的，有可能她在午饭后回家，正如她事先对我暗示的那样，尽管眼下根据我从远处证实的那样，马赛拉正在与两个小伙子调情，一面吃吃喝喝，好像品尝点心的事留在其他的环境下再做。

突然之间，我感到马赛拉是个与我无关、陌生和神秘的女人；一想到她可能去开发其他寻欢作乐的领域，我甚至激动起来了。这仿佛是天开了，在我头上落下闪电雷鸣的倾盆大雨；人和物都改变了模样。我闹不明白这感觉变化的原因，仅仅知道：眼下，在我从连锁店里监视的同时，可以确认我和马赛拉的爱情已经变成了纯粹的伙伴，变成了难以忍受的厌倦，变成了几乎会掩饰厌倦的东西，尽管我俩的共同生活还有一点脆弱的意义。是的，我俩的关系已经是一场已经宣告并且可以预见的失败了；而对于马赛拉来说，那两个小伙子说不定就是一个救生圈，如同几年前女演员卡尔拉对我的作用一样。或许，爱情来得快、去得快是真的；人们明白并且接受这个道理比较迟钝也是事实；或许正如法国《世界报》最新一篇文章所说的那样：当代男女不是非要生儿育女、成立一夫一妻的家庭不可，而仅仅是追求一个独一无二的空间——比如，生活舒适的单元房——一笔数额可观的银行存款，游山玩水，享受快乐时光，这一切都不排除偶尔骗骗对方。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自己还是爱马赛拉的，仿佛在遵守一个出版的电影脚本，与我意愿无关的事情，如同这样的事实：我

这一辈子也当不上瓦图西人[1]，当不上柏柏尔人[2]，或者摩纳哥王子。没法子逃避这样的爱情，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命运的安排。

我知道这一切无新意可言，对此，我不打算议论。在70年代的东德，夫妻之间完全是自由的。我记得我在莱比锡读大学的时候，一次晚会上，有个美丽动人的中年女子邀请我跟她一起过夜。我接受了邀请。我俩走进她的单元房，就在她的婚床上肆无忌惮地做爱。实际上，是她用各种各样的姿势和性交技巧让我大开眼界，而这样的姿势和技巧我本来是寄希望于马赛拉身上的。几度云雨之后，我俩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卧室的房门发出吱吱咯咯的尖叫声，把我给吵醒了。一个男子踮着脚尖走进来，把我吓得半死。但是，他只是打开衣柜，掏出些什么东西就离去了。卧室重新陷入半昏半暗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他是谁？”我把一只手放在女伴的细腰上，低声问她。

“我丈夫。”她回答说，一面把温暖的肉体贴在我身上。“他来找干净的内衣。”

我在好长时间里，在我的拉丁美洲朋友圈子里，吹嘘那次在莱比锡的艳遇。在征服女子的斗争中，我战胜了另外一个男子，这推动我去征服更多的女子。但是，如今我在思考自己是否真的从那个德国女人或者她和她丈夫那里夺走了什么。我占有了她和她丈夫的什么关键性的隐私吗？占有了他俩什么性命攸关的东西？占有了什么可以授予我权力、一种关键性的密码从而破坏他俩恢复幸福的可能？而这样的幸福，她和他在初恋阶段是应该有的。莫非我仅仅是个工具，为的是他俩的夫妻关系可以与世长存？在拉丁美洲，男子坚信——教会也认可——性交的时候，他

(1) 瓦图西人，卢旺达和布隆迪境内的尼罗民族。以占有牲畜和从事牲畜交易为生。

(2) 柏柏尔人，非洲土著。主要从事农牧业。

们从女人那里窃走了什么东西。似乎我们男子占有了女人最大的珍宝、隐私、秘密以及某种不可复得的东西。似乎性交在女人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永恒印记；而在男人的记忆里仅仅留下一些甜蜜的回忆。具体到那对夫妻——我至今也没有忘记——那就是胡说八道了！假如那女人心里还有我，那么我还能记得一点什么。但是，如果她丈夫也变成游戏的一部分，那么我仅仅就缩小为一个小卒、一个有用的傻瓜、一个可以巩固他们夫妻关系的工具了。

总之，有可能我之所以现在坚信这一切，目的就是安慰自己、对付慢慢逼近的苦难时刻，或者为了迎接一旦果真确认老婆跟上两个年轻人去旅馆开房间时刻的到来。忽然，马赛拉和两个小伙子仿佛一下子注意到天晚了，便离开餐桌，走出阿莱克斯餐厅，登上停在我窗外附近的一辆宝马牌轿车。看见他们三人满面笑容、无忧无虑的样子，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浑身肌肉僵硬，动弹不得，无法躲藏。片刻间，我担心马赛拉从窗户外面会认出我来、让我暴露无遗。幸亏，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她不停地在说话，一个小伙子为她打开了后车门。等到我重新来到街上、寻找出租车跟踪他们时，宝马的车影一闪就消失了；这一闪意味深长，好像是诡秘地眨眨眼，向旧城区方向驶去了。

十一

我回到自己的轿车旁，可是无法从两辆汽车中间开出来；我猜测，这是有人故意要拦住我的去路。我说过了，我不是个实干家，而是玩语言的，并且玩的是语言文字，而不是口语 如果有口才，我就当政治家去了。除去政治以外，我瞧不起的职业不多 说实话，政治就是装假，就是做秀，类似永远在说假话、不忠不义的玩意儿。

一句话，我知道，这是另外的话题了，在连锁店里，暂时不提了。顶着漫天飞舞的大雪，我又回到了连锁店，一路上脑海里好像有个主旋律似地在盘旋着马赛拉急匆匆离开餐厅的方式。她独自坐在宝马车的后座上，宝马是时髦的昂贵轿车，设有舒适的皮质座位 此时此刻，宝马在向一个我不知道的地点飞奔。不过，我总是猜想成一家旅馆或者住宅，这种令人绝望又无法驾驭的情况，让我感到既恼火又无奈 为什么不说成是病态而又惊惶的焦躁呢！处于这样的时候，怎么办才好？

这时候是下午三点半，已经无计可施了。手机上那个陌生男子约请马赛拉在这个下午某个钟点前往某个旅馆见面。照看这家旅馆的土耳其人一直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好像担心我策划什么打劫行动；或许最好我尽快离开旅馆。还有可能就是这个钟点马赛拉跟那两个年轻人泡在某家咖啡馆消磨时光，或者闲逛市中心的哪家画廊。她这种生存的秘密、活动的范围，使得我处于她生活重要部分的边缘，让我避开了她的生活，但这不仅是在与她有关的爱情方面，而且是她的整个为人；她把我变成了一个透过虚掩房门，冷漠地注视着她的纯粹证人，如同那个穿西装、戴高筒帽的男子一样：我们在古斯塔沃·卡耶博特[1]的油画里看到了他的背部，他靠在铁栏杆上，注视着奥斯曼大道茂密的浓荫下某个不确定的东西。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我还是在那扇门的那一侧——至少我以为是在那一侧——或者是在巴黎的阳台上，对这一切全然不知，绝对信任，我觉得这是合乎逻辑的正常的心态，也是唯一的心态，因此我甚至都不会用准确的词汇评述它。但是，我应该深思熟虑，抛弃墨西哥电视剧才有的感情虚假的态度，好好安排下面的步骤，仔细想想：一旦辨认出那个匿名情人的身份，我究竟采取什么行动而辨认其身份，只要克服自己嫉妒的迷雾，看见那男人模糊的身影就行了。

我来到街上，嘴里有苦味，心里头却坚信：如果我认为自己应该冷静而客观地安排一切，那就错了。的确，你能在小说里把某些文学人物——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加以严格而准确的形象描述，在绘画和雕刻上，艺术家可以修改线条，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真实的生活远远超出小说之外，超出马赛拉那扇虚掩的房门——事实顽强地对抗任何人为的操纵，因为事情的发

[1] 古斯塔沃·卡耶博特（1848-1894），法国画家、收藏家，是将学院派风格与印象派艺术结合的代表人物。早期作品多表现十九世纪50、60年代巴黎奥斯曼男爵所造的林荫大道和住宅。

生仅仅是完成命运的安排而已，命运如同一篇乐谱，注定要我变成傀儡。我不知道，或许自己乱了方寸，无法制定计划和按照计划行事。眼下，我离开了“七十一”连锁店，走在铺满松软白雪的街道上，使我感觉到彻骨的冷静；我开始漫步在整修得如此完美和令人惊叹的街道上，仿佛历史在这里抛锚了似的。只是穿着色彩鲜艳的羽绒服的行人以及停泊在路旁、落满雪花的少量轿车，让我想起：这都是假象，我们不是在十九世纪，而是处于二十一世纪的开端。的确，瑞典人越来越艺术、越来越运用高科技来整修斯德哥尔摩的这一部分：多亏了法国和瑞典的建筑设计大师科比西埃的拒绝，这一部分才逃出了拆迁的劫难；毫无疑问，才变成了斯德哥尔摩城内最美的地区之一。我只要继续前行即可，相信会找到我那辆老沃尔沃。不管怎样，即使我有了汽车，事情也改变不了许多，因为就是开车回家，也是为了坐在客厅里耐心等待老婆回来。

我远远看见街口处有个电话间。我要给老婆的手机打电话。我要在妻子犯下不忠行为的当口加以干涉，如果的确有这样的行为，就会有恰如其分的时刻，或者准确的“震中”，我要粉碎她的活动，告诉她：无论她在哪里，我都会去找她，拉她一起回家，要搅乱她和情人或者朋友在一起的计划：说不定她在某家旅馆里正在跳脱衣舞，那些小伙子在欣赏她那曼妙的舞姿呢。

我脑海里闪过的想法是一种自我毁灭性的想象，但是绝对有意义。下面我再加以说明。我还敢向马赛拉提出令人屈辱的建议：她、她的情人们和我，大家一道生活在同一天花板下。这会消耗掉我的嫉妒和愤怒；但是，这无可辩驳地证明：我是多么爱她！为了破镜重圆，我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向她做根本性的让步！但是，眼下，此时此刻，应该做的事情是我要搀和到他们中间去。这是最令人兴奋的时机。一旦我通知她：我在大雪纷飞的阴暗下午等候着她，要给她讲述重要的事情，那么我就会变成捣蛋分子。

她可能在好奇心、恐惧或者由于不可能集中精力干事的情况下，中断和情人的幽会,出来找我。但是,忽然之间,仔细想象这事之后,我反复考虑,心想:我只会在老婆心里引起同情,而同情是一种有害的感情,最终会变成一种回来伤害自己的“螺旋飞镖”,因为同情恰恰会孳生爱情里的谎言。而我宁可要仇恨、拒绝和愤怒，因为这三种情绪会迫使人接受真相。

我看看手表。刚刚四点钟。我在斯德哥尔摩胡乱走了将近两个小时。现在来到了中央火车站。我觉得以前我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怀着类似的感情走过同样令人痛苦的地方。我惊慌地发觉：重复发生这样的事情会把记忆融化在非现实中，融化在一种迷雾里。我从前来过这里吗?为此,我就记得此事?要么,这样的记忆仅仅是我编造和设计一个并不存在的往事的想象结果？冷空气开始钻进手套和裤子，让我浑身打颤，一下子扫荡了我的思绪。我赶忙躲进车站的咖啡厅里，就是几天前我去马尔默前停留过的同一个地方。如果从这里我乘上地铁或者出租车，可以很快到达马赛拉的所在地，如果她在那里的话，我估计是在市中心。

也是在上次那同一个拱廊下，我要了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和一盘杏仁蛋糕，在一张没有桌布的铁皮桌前坐下，位置靠近玻璃窗。就在旅客们手里拿着报纸、提袋或者行李，脚步匆匆地走过去的同时，我想象着此时此刻马赛拉在干什么，或者策划什么。我不能排除这样的念头：她正在旅馆里与那两个小伙子纵欲狂欢呢。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就在他们吃午饭时，我觉得从远处就能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满面笑容，过分的热情，这在生意人里是不寻常的；不可思议的是，这让我朦胧地回忆起我俩在欧洲和美国新婚生活的岁月。

我不只一次为马赛拉好出风头的本能提供动力。实际上,在她离婚之后，曾经度过一个非常沮丧、心理压抑、吸食毒品等等糟糕的时期；当我俩重新相聚的时候，她坦白地告诉我：与那个

意大利人结婚之前，她经历了一生最痛苦的时刻，因为她初恋的未婚夫突然抛弃了她，竟然跟她最要好的女友结婚了。这个打击推动她企图做应召女郎，哪怕是短暂地做一做。这是后来我俩在曼哈顿华盛顿广场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一面做爱一面交谈时，她告诉我的。她严肃地——好像这样可以让她的选择变得不那么可悲——解释说，她的动机不是捞钱，而是希望自己能变成包法利夫人，变成高级应召女郎，变成可以陪伴大款周游列国、出入豪华酒家或者高级娱乐场所的交际花。她想知道卖淫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不是那种港口上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卖淫活动，不是那种衰老、多病、粗俗女人的皮肉交易，那些女人只要给几个小钱就可以在街上卖肉；而是那些年轻、美貌、受过教育、毫无顾虑的女孩从事的金光闪闪的交际，这些女孩渴望了解大世界、住豪华饭店、乘游艇出海、在国际航线上乘坐一等舱旅行，哪怕是偶然透过小小的窗口看看天下也好。

“我要是做了，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那样至少可以补救我因为相信青春爱情而浪费的一切。”

实际上，对于像她这样的姑娘，这计划看来是可行的，因为她掌握四门外语，漂亮，开朗，又是独身女孩。由于她失恋期间，一个招募模特女郎的法国女人的电话落入马赛拉手中，她就登门提供服务了。那法国女人在一间面向中央公园的宽敞而阴暗的房间里接待了马赛拉。法国女人很高兴，立刻把马赛拉登记在特别目录里，因为她缺少拉丁身段的女子；尽管她建议马赛拉去做隆胸手术，为的是及时满足时下流行的欣赏品味。

蒲莱瓦斯特[①]夫人断言道：“你在手术里花的钱，有五次会面的机会就能捞回来。亲爱的，只要来点聚硅酮就能改变你的生活啊。”

[①] 蒲莱瓦斯特，法国女人的名字。

马赛拉因为这样的前景而兴奋起来：这是个既可以赚钱又需要小心的冒险，值得试试——她不知道我就要再版艳情小说和电视小说的大量章节，于是和整形外科医生预定了见面的时间，目的是一夜之间变成法国女人圈子里最受欢迎的姑娘。但是，报纸上一篇揭露这类手术很有危险的文章——马赛拉理解为这是来自高层某人的警钟，让她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计划并且不理睬蒲莱瓦斯特夫人固执的邀请。

"我小时候,母亲就对我说,应该把处女宝留给丈夫。"一天，在奥斯曼林荫大道咖啡馆给我解释说。我去那里是参加一个关于商业许可证的座谈会。"那是一种诈骗，因为父母鼓励男孩从小就尽可能跟女人上床。"

"那是你母亲当时就相信那个道理。"我用调和的口气说道，打算安慰她，冲淡她那女权主义的理论。

我俩吃鸡蛋饼，喝葡萄酒。可是，我脑海里摆脱不了这个念头：卡耶博特笔下的男子正在从某个阳台上注意着我俩呢。

马赛拉说："也许我母亲是假装相信。"

"为什么假装？"

"为的是让我父亲相信她呗。"

"那你为什么还去找蒲莱瓦斯特夫人？"

在那段日子里,我把一切都记错了 马赛拉的年龄——她比我小得多、她失败的婚姻——引起她的复仇心理，去反抗一切关于肉体和快感的教导——以及她个人的历史：她是蒙图法尔上校女儿的事实。这是一张小资产阶级女儿的完美图画，她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渴望在性爱领域采取报复行动。

"我找蒲莱瓦斯特夫人是因为想补救没有享受到的东西，因为我本来希望等卡洛斯拿到文凭以后跟我结婚。结果，他跟别人跑了……"

"已经浪费的快乐是补救不了的。"

“求求你,别放空炮。没用。我不听这个。”

“显然要达到目的,你还差得很远。”

“你指的是什么?”

“你是知道的。就是看进进出出谁占优势了。”

“你比头脑简单的情人还庸俗。”她生气地说道。接着,吃了一口鸡蛋饼,看看对面大楼上的阳台。我敢发誓,阳台上有个男人在注意我和马赛拉。

到这时,我才推测出那个著名的卡洛斯和那个英俊的意大利人,在性交时只会一个姿势:传统的男子上位,而且急急忙忙,好像兔子行事,既没有序言,也缺乏甜言蜜语的余波。可是,马赛拉恰恰十分迷恋前戏和结尾。她像个女孩那样瞅瞅我。这时,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手风琴音乐——是的,是巴黎手风琴,因此一切都很像旅游明信片——她说:“可是如今跟你在一起就不同了。这里没有任何承诺。我要享受生活,品尝一切,补回浪费的时间。只有将来等我深刻认识了生活之后,或许我们再考虑结婚、生子。”

十二

就在我认识马赛拉的当年，发现她有裸露癖。那是在美国迈阿密旅游的时候，我俩走进一家脱衣舞厅。那是个宽敞而凉爽的大厅，中央安放了一个灯光明亮的舞台。上面有几个穿内衣的姑娘在跳“开场白”。舞台四周，半昏半暗中，浮现一些餐桌，坐满了观众。欢乐，没有半点淫秽的气氛弥漫其间。观众在喝彩，鼓励台上才艺水平不齐的裸体姑娘。

我已经不记得我俩进去的原因了，可能仅仅因为里面有空调可以躲避室外中午炎热的空气；或者仅仅因为好奇，总之，我俩占据了一张桌子，要了饮料；在音乐的感染下，开始欣赏起表演来。演节目的姑娘们看上去像大学生，跳裸体舞仅仅是为了挣几个美元，显然缺乏经验。其中胆子最大的敢来到舞台边缘，等候某个观众表示要把钞票塞进她大腿根处的丝袜带里边。于是，我俩明白了：为了赚一点小费，姑娘们也到桌子旁边脱衣裳，距离观众很近，这样就变成了为个人表演的脱衣舞，看上去，也更

加刺激。

“要个姑娘为你跳，好吗？我掏钱。”马赛拉问我。她那时正处于所谓了解真实生活的初级阶段，用英语说，就是了解“THE REAL THING”，至少她这样暗示过。我估计那时我俩已经喝多了。后来，我俩经常喝醉。

我拒绝了她的邀请，不是不感兴趣，而是不好意思。既然马赛拉在场让我感到不好意思，我从一个裸体姑娘性感的虚假微笑中能捞到什么，哪怕这姑娘赤裸裸地坐在我的膝盖上？

“那我来跳！”说着，她坚决地离开了座位。

很快，主持人宣布给节目来点变化：一位拉丁美洲姑娘上台表演，她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面前脱光衣裳。掌声震撼了大厅。接着，备受欢迎的邦尼·迈克的和弦传进了耳中。马赛拉在舞台上出现了，五颜六色的聚光灯追随着她，使得肌肉格外光洁。我觉得那是她，又不是她；在观众热烈的喝彩声中，我愚蠢得满脸通红。我至今还记得她身体那灵活而性感的动作：膝盖灵巧地弯曲，胯骨轻盈地摇晃，臀部有力地耸挺，大胆地向桌旁喝酒的人们微笑，像泰国舞女般美妙地伸展双臂，令人刺激而准确地解开衣衫的纽扣。不久，观众开始伴音乐打拍子了。一个身穿牛仔裤、头戴得克萨斯草帽的男子，长得有点像布鲁斯·斯普林司顿（Bruce Springsteen），企图靠近并且爬上舞台，但是舞厅里的保安及时赶到，将其按倒在地。这时，马赛拉已经脱去内衣，裸露出丰满的乳房：在光柱下，我觉得它们比我俩做爱时或者她在房间里漫步时更加鼓胀。一想到人们会以为我是给自己老婆找主顾的家伙，我就脸红起来了。但同时我承认马赛拉的舞蹈真是绝妙得很，比起舞厅里身材姣好、可是缺乏曼妙的舞女来真是好上许多了。

后来，她扯开了裙子上的拉锁，让裙子滑落到地面，除去小三角裤外，几乎一丝不挂。片刻后，她向前迈出两步，动作优美、

轻松、几乎像女孩一样，把三角裤脱下来了。"这些她是从哪里学来的啊？"我暗暗思量，因为显然她像新手，不像在这里表演的姑娘，更不像那个匿名军人的女儿：曾经在修女学校读书，后来试图摆脱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身份。观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喝彩声和鼓掌声，因为马赛拉高举起双手，全身裸体；观众的表示随即变得震耳欲聋了，因为她又开始伴随着非洲舞的快节奏跳起一丝不挂的摇摆舞来，同时不停地向大家展示笑容，一面眨动着睫毛。最后，她以一连串非洲羚羊般的轻快动作结束了舞蹈。接着，她面向椅子靠背坐下，下巴和双臂支在靠背上面，望着观众，雪白、强劲的大腿伸张开来，露出了阴暗、潮湿的秘密洞穴。这时，黑暗开始逐渐吞噬她苗条的身躯；就在掌声四起的同时，我心里有两种对立的感情在打架：陌生的羞愧感和眼下人人都渴望抚摩、我更想抚摩的感觉。这一切她是在什么鬼地方学会的？几分钟后，当马赛拉回到我身边时，观众的目光——有人好奇，有人微笑，更多的人是猥亵的眼神——把我俩紧紧围住了。于是，我俩决定离去。一回到旅馆，我俩就酣畅淋漓地性交起来，她一面给我讲述着让她感到激动的其他幻想。

故事讲到这里，一切听起来有些奇怪，甚至变态；这可能是我疯狂想象的产物，企图制造一个扭曲的马赛拉的形象，为的是如果她将来出走的话，我不会遗憾。不幸的是，我描写的这一切缺乏有力的铁证；我的根据仅仅是随着时光流逝的记忆。我还知道，马赛拉为了报复失去的岁月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我的同意和支持下进行的；为此，我不责怪她，仅仅梳理一下对那个与今天完全不同时期的记忆；而眼下马赛拉偷偷背着我在研究真正生活的秘密。

一年后，我和马赛拉又有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一天夜里，也是在迈阿密，这一次是休假；马赛拉要我给她摄像，同时她按照迈阿密音响公司制作的一首歌曲旋律跳舞。几分钟后，她身上

就剩下了黑纱面罩和在南海滩买的银白发套，那商店附近有个多米尼加人开的咖啡馆；假发套在她头上效果极佳，让我想起库勃里克[1]的影片《恐惧与欲望》。我承认自己很高兴拍摄一个既是我的又是他人的女子提供的场面；这个女子拥有化装脱衣的惊人才干，又有变成她最本色形象的本领；这个女子不仅渴望认识自我、摆脱假面具，而且还希望探究生命的秘密。我记得她跳了好长时间，始终没有乱了节拍，没有失去潇洒的风度或者性感的姿势；最后，精疲力竭地昏倒在床上，展示着令人垂涎的隐秘洞穴，让我的录像机拍摄。

次日，我俩走在机场大厅里，准备登上前往华盛顿的航班。她不做任何解释就走进一家咖啡厅，靠近一位五十岁左右、衣冠楚楚、正在边读《华尔街日报》边喝咖啡的男子面前，说了几句什么，随后把什么东西给了那家伙。接着，她返回报亭，因为我在那里等候她呢。

"我把录像带给了他。"马赛拉对我说道。然后，加快了步伐，高高兴兴地向我俩的登机门走去。"那家伙永远不会再见到我，也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我一直就想做这样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马赛拉出国之后，一旦远离了她父亲投下的阴影，一旦远离了那个曾经是她未婚夫——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家之长，每个礼拜日都去做弥撒，经常与妻子一道出现在报刊的社交版面上——的消息，她就有了勇气和性爱想象力。是的，远离祖国在我老婆心里激发出情欲想象力，产生了勇气。我理解她，应该承认这一点：我们是这样一种民族：面对真实性时，我们喜欢整齐划一、可以预见、讲究规则，仿佛我们的前面拥有

[1] 库勃里克（1928–1999），美国电影导演和作家，他的影片具有冷静而严谨的画面风格，注重细节，常常流露略带讥讽的悲观情绪。重要作品有：《恐惧与欲望》、《荣誉之路》、《斯巴达克思》、《洛丽塔》、《怪癖博士》、《2001 年太空漫游记》、《幻觉》等。

许多种生活，而眼前这一个仅仅是试验。

另外一次——讲完这一次，我就不再讲述这类非常隐秘和令人发窘的故事了，我和马赛拉下榻在芝加哥一家面对一条狭窄、阴森小巷的老旅馆的房间里。我俩住在楼房的最高一层，到了上床的时候，已经喝下两瓶加利福尼亚好酒，这时才看出来，我们的窗户外面，由于楼与楼之间的距离很小，我俩清楚地辨别出对面办公室和走廊里的详细情况：此时，那里有一群清洁工在干活。

马赛拉打开收音机，调出正在播送爵士乐的电波，让房间只留下床头灯的光亮，开始站在窗前倦怠地摇晃着身体。清洁工们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欣赏起这意外的表演。

“你疯了？人家看着你呐！”我冲她喊叫起来，因为这只能是发疯的产物，或者是一种难以控制的裸露癖冲动；对于我的口味来说，实在太可怕了。

“那又怎么样？让他们看好啦。反正他们永远也不知道我是谁。”

忽然之间，本来她已经在窗户旁边了，这时发生了引人注目而荒唐的事情：马赛拉开始脱掉衣裳。我吓了一跳，并且感到不快，便躲到一个柱子后面去了，免得让对面楼房里的人看见我。马赛拉那天晚上血液里流淌着酒精，举办了一场精彩的脱衣舞表演。完全脱光衣服之后，她把长长的黑发披散在肩膀上，拉住我的手，向双人床走去。她仰面朝天躺下，分开双腿，而此时对面楼上的玻璃窗后面，无名的观众们如过江之鲫一般拥挤在一起。接着，尽管我没有置身于她和窗户之间，她要我亲吻她 后来，她眼睛望着小巷，为我撅起臀部，亮出两个又白又圆的‘月亮’。我的高潮来得强劲而绵长，只是这时她才关闭了电灯。

只是这时，我才大着胆子瞥了一眼对面的楼房。那里的男人们仍然惊得目瞪口呆，紧紧地搂住吸尘器和鸡毛掸子。

十三

醋意把我折腾得神魂颠倒，在斯德哥尔摩街道上闲逛一通之后，我决定回家。我永远也查不清楚马赛拉是否跟那两个嘴上没毛、穿戴华贵的年轻人或者别的什么男人有染。没有铁证在手，我不敢与她当面对质，现在只能挥舞多疑的大棒和滑稽地影射那包情爱衣物——已经消失不见了——然后再争取她自己坦白。

回去找我的轿车之前，我从法托威斯顿——一家灰色的商业中心，建于七十年代，地点在卡尔拉布兰广场附近；从前在这个地方，据我从城里老档案里调查，建有十九世纪气势巍峨的高大建筑——的一个电话亭里给马赛拉电话。我从商业中心出来，竟然没有留心自己在做什么。马赛拉过了一会儿才给我回话。我发现她在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里流露出焦躁、怀疑和激动的情绪，好像她身边有人在抚摩她。我立刻想起我俩初恋的时期：她和我关在我的单元房里做爱；她常常在我不得不接一些固执的电话

时，用湿润的嘴唇亲吻我的乳头或者大腿。面对话筒，我极力装出自然的口气，尽管我担心可以肯定我过分拉长的间隔或者急促的呼吸最终会暴露我的真相，就像眼下会暴露马赛拉一样。

“你还好吗？”我问她，一面想象着她躺在床上的样子，与此同时，一个灵活、柔软的舌头在舔她的肚脐眼，或者在她胯部画圆圈，然后沿小腹缓缓下降，弄得她汗毛竖起。这时下午六点钟了，是安达莱斯可能发来电子邮件的时候。

“我很好。怎么了？”她问我。这让我感到自己在这个广场旁的电话亭很可笑。我对面有一家出售宠物的商店，橱窗里一只孤独又悲伤的黑兔似乎在观察我，在思考我的身份。

世界上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欧洲的宠物商店里摆满的那些来自热带穷国的蛇、鸟、鱼、虫了。欧洲人把这些动物安放在伪造的蛇窝、鸟巢、鱼池和草丛里，以为这样就可以让动物幸福了。欧洲人想象不出，就是这样看看窗外飘舞的雪花，就会让来自亚马孙地区的鹦鹉、哥斯达黎加的红鱼或者智利的狼蛛患上乡愁。欧洲人把乡土混同于安逸，以为安逸是可以代替乡土的。

我对马赛拉撒谎道：“我就想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咱俩能不能见面？眼下我在家里。”

她沉默不语。我觉得她在通过手势和表情跟什么人进行交流呢。我猜想，那个陌生人在舔她的乳头，手指在她潮湿的深处滑动，仿佛那私密处是一个多汁的成熟芒果。我想，如果她要我过一会儿再谈，因为现在她有个躲不开的约会，那我该怎么办呢？

马赛拉说：“说实话，现在不能见面。”

“你在哪里啊？”

这时电话掉线了。在这个所谓电讯发达的国家里，这是家常便饭。我在口袋里摸硬币。找到了。我把钱投入到已经损坏的黑匣子里。绝望地拨动号码。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手

机。又过了一会儿，她才回话。我估计是她没法回答我的问题才挂断电话的。

我固执地问道“你在哪里啊？”

我身边的一家咖啡馆突然就没有顾客了，好像警报驱散了顾客似的。瑞典人有古老的群居交往制度，可以不用说话把人群召集起来，也可以突然集体离开某地。比如，冬季，成千上万的人会同时前往冻冰的波罗的海和湖面上去滑冰和钓鱼，但是在某个时刻大家又会同时服从一道不成文的令人畏惧的法令，或者某个秘密信息而迅速离去，身后留下一片白茫茫的孤寂雪原。现在，商店里最后一名店员穿上皮大衣，熄灭灯火，离开店铺，一头钻进霓虹灯下的广场里。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亲爱的。”马赛拉说道。这个从她嘴里吐出来的‘亲爱的’是不大常用的，等于告诉我发生了某种不正常的事情，这让我警觉起来了。“希望你别再挂断电话了。我在健身房里。刚才在长跑机上练跑呢。现在我要去做桑拿浴。”

她在斯图勒体育馆订有会员卡，斯图勒很有名气，按照规矩保持斯德哥尔摩的最优秀水平，通常是富人区（名叫于什霍姆）喜欢舒适的人光顾的地方。健身之后，有人常常在底层的餐厅里吃龙虾、鱼子酱或者鲑鱼，喝香槟或者白葡萄酒；同时，闲谈聊天，望着广场上来去匆匆的行人。

“你洗完桑拿，咱俩能见面吗？”我问马赛拉。

“恐怕不行。因为我要跟巴罗马去吃晚饭。我大约九点左右回家。不用担心。我很好。对不起，我要着凉了。”

她挂断了电话。我在这个可恶的商业中心里感到烦恼而孤独。我想念我岳父——这是很奇怪的。假如蒙图法尔上校在这里，或许他可以帮助我有效地监视马赛拉。他在这个方面一定有经验，因为毕竟有好几年的时间秘密跟踪持不同政见的人们。如果我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上校，让他看看那些情爱衣物，请他帮忙

跟踪自己的女儿、查明她背叛丈夫的证据，上校会做何反应呢？但这切毕竟只是推测啊。蒙图法尔可能不会跟踪自己的女儿。也可能会。谁知道呢？眼下，我只好去找汽车，然后回家。走进家门，我决定去拜访邻居，尽管我没有事先通知马尔库斯，这在瑞典是不常有的。但原因是马尔库斯不久前没打招呼就在我那里做客啊。

马尔库斯一开门，我就对他说："我来看你。希望没有打搅你。有时间继续谈谈吗？"

他请我进屋，一面解释说：孩子们这个星期留在祖母家。他家里回荡着一种奇怪的音乐，好像一架调音不准的钢琴试图模仿中国音乐的嘈杂声。马尔库斯说，他准备去迈阿密旅行，看看有没有可能带孩子们一起搬到博卡拉顿[1]。我估计他的情人阿尼卡也在家里，虽然他想要给我的印象是：他一个人在家。接着，他从厨房里拿出一瓶波尔多葡萄酒和一块法国奶酪。我俩在一间宽大的客厅里边吃边喝，说话不多。房间很大，有大窗户和藤条家具。在一个角落里，靠近窗户有个桌子，上面有地图、画笔、一张水彩画和外科医生使用的手套。突然，他说他很振奋，因为已经感觉到自己有能力规划未来，还因为与他妻子逝世有关的许多麻烦的法律事务就要解决了，这样就不仅可以顺利领取人寿保险金，而且可以卖掉产业、去博卡拉顿安家了。他指出：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因为这个小镇以及瑞典寒冷的气候只会加深孩子们的悲伤。佛罗里达的日子肯定比斯堪的纳维亚好过，因为生活在瑞典更多的是凭借信念和纪律约束，是对夏季的朦胧期盼，是寒冷的空气有时恩赐的变化无常的小小间歇。他补充说，在佛罗里达，或许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他和孩子们可能重新得到

[1] 博卡拉顿，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棕榈滩县城市。1925年设镇。1957年设市。有豪华饭店、俱乐部和高级住宅。

幸福生活。

“遗憾的是上帝把您妻子接走了。”我说,口气里有相当做作的冲动。我俩坐下来。藤椅发出“吱吱”的叫声,好像在抱怨。那奇怪的音乐让我感到不安和焦躁，如同藤椅发出的抱怨声。

“我希望您虽然来自拉丁美洲,可别是个教徒……”

“啊,我不是教徒。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徒。”

他笑了:“那我就放心了。因为跟教徒谈话让我感到费劲,尤其是那种相信上帝的人，他们认为，上帝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咱们的各种行为，最后会惩罚作恶的人。”

我用调和的口气说:“我理解。”

“那些人糟蹋了上帝，把上帝变成了有窥伺癖的病人，变成了对洗衣妇谈话、对旅馆老板的阴谋、对处女的贞操和醉鬼的谎言感兴趣的是非篓子。因为上帝要监视几十亿人的行动，他可能是宇宙中最大的骚乱煽动者。”

“最好不讨论上帝的意志和宗教问题。”我说,用了一句我父亲在辩解自己在军政权统治下完全献身给科研时说的话。

“我刚刚看了一个关于神仙的展览，发现登记在册的神仙有数千之多。哪路神仙最有道理呢？对我来说，只是在把宗教看成人类文化的又一个层面时才是有意义的。”

马尔库斯再次去厨房,回来时,还不错,拿着一个开塞器,接着就忙于开启葡萄酒的瓶塞了，同时断言道：他丝毫不怀疑起初上帝是存在的，但是后来被魔鬼打败了。世界上发生的一切证明 魔鬼已经非法篡权。他强调说,从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这是唯一他能接受的说法。我心里想，这说法很有意思，不过早在一百多年前，患有梅毒的尼采就公开提出了这个说法。

“我只要看上三分钟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就足以知道：上帝死了，因为广播里整天在说世界上的饥饿现象、非洲的内战、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人的恐怖活动、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实

施的暴行。'他说道,一面严肃地注视着我,仿佛因为我来自拉丁美洲,就可以平息这个地区的宗教狂热"如果有上帝,那么他对非洲儿童的悲惨处境表现出了冷漠的态度。"

"或许您是对的。'我不安地嗫嚅道。与此同时,马尔库斯手腕抖动地在给我斟酒。

我险些问他:您是否记得去我家做客,因为我发觉他现在给我斟的葡萄酒与带到我家去的波尔多酒一样。但是,马尔库斯今天晚上不准备听我说话。

斟满酒之后,他把波尔多放到桌子中央,口气坚定地说"我曾经恳求上帝救救我的妻子,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孩子们。可结果是上帝百分之百的冷漠。因此可以肯定,即使上帝存在,那他也是宇宙中最冷漠的家伙。"

今天晚上,醋意啃噬着我的心,因此没有情绪去讨论神学问题,仅仅想喝喝酒,消磨时光,等候马赛拉回家。对于马尔库斯责怪和谩骂上帝的口气,我不感兴趣。相反的,此事如果发生在危地马拉的玛雅人中间,我会着迷地看着玛雅人前往教堂打倒和咒骂那些没有完成他们要求的神仙。这谩骂声在中美洲的原始森林里是悦耳的;但是,这里,在斯堪的纳维亚无神论者的土地上,是没用的。不过,马尔库斯的这番宏论可以帮助我忘记马赛拉,可以帮助我更加真实和有说服力地描述那个名叫马尔库斯的人物。他在我的长篇小说里所扮演的角色,毫无疑问,就是要反映我邻居的生活。通过他刚才表述的那些激进的看法,当然在许多人看来,这些看法是卑鄙下流的,而我可以把他构思成一个毫无顾忌地用安眠药摆脱老婆的人物。因此,我极力对他关于反对宗教的宏论装作不理解的样子,而同时聚精会神地注意这间有窗户的客厅的摆设:窗户的朝向与我的书房一样,注意地上的破旧地毯,注意这些大概是从菲律宾进口的藤条桌椅,注意那张水彩画,注意那双外科医生用的手套有一只从纸匣露出来了,

注意那个摆满了艺术书籍的隔板。

过了一会儿，他说："昨天晚上我睡不着觉。"

"您害怕暴风雪？"

"让我心里不踏实。但最坏的是有只乌鸦，很大，声响淫秽，大风中，它在我窗前折腾，好像要进屋似的。"

"您说是在夜里？"

"天黑的时候。您会以为我疯了。可是那时我有个可笑的感觉：乌鸦好像要跟我讲话。您相信恶兆头吗？"

我俩静静地喝酒。正如我的同胞们用品酒专家高傲的口气表达今天暴发户们得意心理的说法：这种葡萄酒毫无瑕疵可言。总之，我无论如何不会说：这只会说话、企图进家门的乌鸦能给住户带来什么好预兆。虽说，马尔库斯到了这个地步还能有什么更大的不幸呢？

我说："您总不会让一只小鸟给吓着了吧。"

"不会，不会，真的不会。"

"另外，您这个故事让我想起希区柯克的影片《群鸟》。"

"大概您猜出来了 实际上，我更喜欢英格玛·伯格曼[①]的作品。有时，我觉得这两位大导演在广阔、荒凉和寂静的空间的运用上相似，尽管伯格曼绝对不会像希区柯克那样用歧视的态度和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角度表现群鸟。那样的态度和角度不符合瑞典人的精神，因为瑞典人是热爱大自然的。"

我想我已经多次坚持自己不具备深入探究哲学领域的条件；因此，我决心改变话题，说一个此时此刻与我暂时有关系的题目。

⑴ 英格玛·伯格曼，二十世纪享有国际声誉的瑞典导演和电影剧作家。善于讲述人类孤独、脆弱和痛苦的境遇。重要作品有《第七封印》、《野草莓》、《犹在镜中》、《冬日之光》、《沉默》、《呼唤与细语》等。

“这是什么音乐？”

“我知道您会问我这个问题的。”他得意地说，“您更喜欢浪漫的旋律，传统的音乐。您家里有大量萨蒂、贝多芬、西贝柳斯和斯藤汉美尔的唱片。不错，您还不痴迷巴洛克音乐，这种音乐是给精神无知的人们听的……”

“您这个音乐的作者是什么人？”

“他叫约翰·凯奇[1]，是我的朋友。您应该知道他，因为虽说他有部分音乐源于亚洲，可别的部分来自非洲拉丁乐鼓。您现在听到的仅仅是给‘加料钢琴’写的曲子。‘加料钢琴’就是在琴弦之间放进螺杆和螺母。您知道吗？凯奇是个佛教徒。”

有时，这位邻居让我感到愤怒。我不知道这是否由于他在某些实际的或者文化方面的优势，比如眼前这个音乐问题，还是由于内心深处明显漠视斯堪的纳维亚的传统精神所反映出来的思维方式。我装作没有听见他的话，假装在注意倾听那支“加料钢琴”的曲子。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他的关于鸟类学和音乐的宏论都落入聋子耳朵里了，因此烦躁起来，便问我：“您知道吗？我清楚是那个波兰钟点工说了一些我的坏话。我非常明白，因为我了解她。不过，我提醒您一件事：一点也别信她的话。她骂我，是因为我解雇了她。”

“您指的是什么？”我问他。心里对我俩的谈话突然改变到如此庸俗的方向感到泄气。

“指的是她那些关于我的事。您千万别信她的话。我和玛利

[1] 约翰·凯奇（1912-1992），美国先锋派作曲家。主张创新和离经叛道，对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音乐产生重大影响。从 1939 年开始试验“加料钢琴”，即在钢琴的琴弦之间放进异物，目的是产生扣击性和超自然的音响效果。他还用录音机、电唱机、无线电进行试验，努力超越西方传统的音乐范畴。最著名的作品有：《4分 33秒》、《幻景第四》、《奏鸣曲与间奏曲》、《方坦纳混合音响》、《廉价模仿》等。

亚一直非常非常幸福。她的自杀是在她身体虚弱的情况下的意外事故，既突然又缺乏理智。”

“那为什么您猜测博耶娜跟我谈了您的事情？”

“我仅仅是凭直觉猜到的。”他严肃地说道并且有意地高举起酒杯“总之，别信她的话。说到这里，我敢保证她已经在小区的别人家里说您和马赛拉的坏话了。别忘了：假如我是您，在事情变得没法忍受之前就把她解雇掉。”

十四

马赛拉回到家里以后，我没有提及自己的怀疑，因为她的背叛行为我还没查清楚。我承认很想张嘴；但是，我刚刚说到她和那两个青年会面的事，我解释说：我好像看见她坐在一辆宝马的后排座上，她立刻回答说，那辆车是一对同性恋兼古玩商的车子；起初是在威卡卡但区的一家餐厅吃午饭，后来两个小伙子带她去市中心，她逛了书店，去了体育馆。

“你就为这事给我打手机？”她有些语焉不详地问道，如果谈话有成绩，她准备扮演一个激动人心的角色。

“那时我很好奇，想知道你要上哪儿去。”我平静地说道。我和马赛拉坐在厨房里；窗户的玻璃上映照出我俩苍白的身影，仿佛两个蜡人像。从客厅里传来一首奏鸣曲温柔、甜蜜的旋律。“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两个商人……”

“我不相信能够达成什么具体协议。他们就是瞎吹，在拉丁美洲的艺术品市场上，不会筹划。可我感兴趣的就是找到能够长

期安排艺术品的画廊经理。我不会再跟这些装模作样的家伙浪费时间了。”

假如马赛拉跟某人一起骗我，那可是骗我的完美方式，因为只要闭口不谈她行程中的一个停留点——最担风险的那一站，就可以粉碎我的任何怀疑。这个计谋说明了一种高超的狡猾程度 其余的一切——在阿莱克斯餐厅吃午饭,乘汽车旅行,逛书店,去体育馆,回家——与实际上发生的事情配合得天衣无缝。恰恰是欺骗行为本身在假装成逛街时消失不见了。而我要想不落得滑稽可笑的地步就说出心中的怀疑，那是不可能的。她会用嘲讽的口气说：行啦,亲爱的,活到这个份上,你是怎么啦?暗示我：你说背叛，那可得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单凭推测是不行的！

几天后，我在她的手机语音信箱里又及时发现了有人给她发来邀请。马赛拉去超市了，把手机扔在家里了，丢在客厅的沙发上。这是个男子的声音，可能就是以前那同一个人，他用英语说：两天后，在市中心某个停车场三楼交费机前等候她，那停车场在一家超市附近。我急切寻找的情报：约会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在实施之前，终于落到我手中了。这为我提供了可以跟踪监视她和他的时间和机会。我估计她和他可能在停车场上汽车，于是决定早一点驾驶沃尔沃去市中心。

但是，在那紧张和秘密等待的几天里，我抓紧时间把日常生活里的新情况纳入到这部长篇小说中来。比如，我决定最终选取这样一个视角讲述故事：作者是写侦探小说的，他因为妻子的背叛而产生了满腹疑团。作者像我一样是个外国人，生活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于什霍姆小区，跟我一样也经常监视邻居的生活；而邻居似乎借助超量安眠药刚刚杀害了妻子，目的是和情人结婚。我承认这是一部过于贴近我生活的小说，过于贴近我在于什霍姆小区观察、感觉和经历的一切，但这是唯一能让我给这样一个

故事打上悬念的烙印：这个故事一开始缺少明确的目的，随后又有半途而废的危险。

在她约会的当日，我一大早就去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了；我在停车场大楼的阴影处等候弄到一个收费机附近的位置；我坐在沃尔沃里等候着她和别人见面，我是从美国侦探电影里学来的监视方式。我感觉自己就是一部好莱坞电影里的角色，好像是影片的情节就是在我的生活里拍摄的，把我的生活变得更加真实和火热，好像与电影或者近似就证明了日常生活的合法性。此时，尽管一切表明马赛拉和她的情人很快就要见面了，我却担心，如果马赛拉发现情报被盗，那么就会在最后时刻改期或者取消约会。我安静地呆在汽车上，躲避在阴影里，倾听着萨蒂的音乐磁带，不时地发动一会儿马达，抵抗寒冷 只是有一次下了车，去买饮料和那难吃的香肠，花了十块钱。

马赛拉准时到达。她头戴宽边帽，还有我曾经在手提包里见过的假发套，还有大号太阳镜——与其说是伪装，不如说是吸引行人的目光。她身穿长裤，大衣里是黑色毛衣；虽然没有察觉我在现场，却左顾右盼，观察停放的汽车，同时向收费员问了一些什么。看见她这身打扮，我觉得她从来没有这么妩媚动人和神秘莫测过，仿佛这样一装扮把她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变成了可以让我心中旧情重温的女子，我很想走到她身边，邀请她去喝咖啡，就好像我和她不认识似的，想和她开始来一段新的浪漫史，抛开从巴黎开始的那段关系的障碍。这念头一开头很让我兴奋了一阵子，可是后来我觉得既不妥当，也很俗气。总之，跟踪自己的老婆是很难受的，想象着她是陌生女子、很值得跟她谈一谈、冒险玩一玩、虽然她同时又去找别的男人睡觉，也是很痛苦的。如前所说，我觉得有难以控制的欲望：下车，含混地建议点什么，但是要新颖，急忙和好，激动地请求原谅，哪怕代价是查不清楚她情人的身份。但是，突然间发生了某种让我立刻回到现实中来

的事情。

一辆奶油色、瑞典生产的绅宝汽车，本来停在我附近，突然打开前灯，不停地眨动着“眼睛”。这情景好像加入到米歇尔·凯恩[1]成功演出的间谍片一样。从驾驶盘上方看去，我发现座位上有个男人的身影。那是个体格健壮的家伙，打着领带，身穿皮大衣，神情严肃，形同雕像。马赛拉脚步匆匆、模样紧张地靠近绅宝，目光扫视着周围，看看有没有人注意她。接着，她轻车熟路地拉开车门，在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坐下。那陌生男子发动马达，随后轮胎发出一声尖叫，向大楼的出口奔去。

我跟在绅宝后面，保持一定距离，沿着市中心的大街前进，此时街道上充满了车辆和行人。我看见绅宝向北方驶去，开上了通往乌普萨拉[2]的18号国道。在公路上，我觉得跟踪起来比较容易，因为瑞典人总是在最高限速之内驾驶，所以交通流畅。这时，绅宝离开国道，向通往索伦蒂纳[3]的支路驶去，这条路直达诺尔维克湖。我们到达了一个瑞典传统建筑的住宅区——木结构、尖屋顶、红色墙壁、白色框架的住宅群，位于湖边的森林里。绅宝缓缓穿过没有人影的街道，随后沿着斯特朗特瓦根大道前进，再绕过冰冻的诺尔维克湖畔，在一座小山顶上、一幢有大窗户的住宅旁边停下来了。

我的心脏激烈地跳动着，好像要在里面爆炸一样。我查看了周围的环境：房屋处于黑暗和宁静之中，光秃秃的树枝如同死神的魔爪，还有覆盖着荒凉街道的皑皑白雪。我看见在湖边，一棵没有树叶的大树下，有一堆篝火，一些流浪汉围着火堆在跳舞。

⑴ 米歇尔·凯恩，美国电影演员，以表演硬汉形象著名。

② 乌普萨拉，瑞典一省会城市，距离首都60公里。

⑶ 湖边小城。

我想起德国浪漫派画家卡斯帕尔·威廉姆·佛里德里希[1]；我想起他常画的那些广漠而孤寂的风景 苍穹，冰河，雪原；后来，我明白了湖边那些奇怪和荒唐的人们为什么要夜间聚会：他们很像西班牙大画家戈雅笔下的巫师们群魔乱舞，而实际上是“小流氓”，对，是小流氓，就是一些调皮、捣蛋、怀疑一切的年轻人；他们在刺耳的打击乐伴奏下跳舞，身穿大衣，上面有金属片和金属链在月亮和火焰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他们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了，以至特别卖力地围绕篝火转圈，而不可能注意到我的存在。

我熄灭了马达，弯着腰，钻进夜幕里，向马赛拉和她同伴进去的房子靠近。从小山顶上可以看见威严的诺尔维克湖。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北极风扫荡着路面，传过来公路上经久不息的隆隆声、湖边的音乐声和小流氓们的呐喊声。在一棵白桦树后面，我稍事休息，心里想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这是在做梦，或者是在电脑上写作。但是，从这里，透过大窗户，我看到了马赛拉和那个男子在客厅里谈话。两人似乎都很兴奋；她脱下了大衣；男子解下了领带。两人走近酒吧台，斟上了威士忌，随后坐到沙发上喝酒，互相并不对视，背对着我，好像聚精会神地望着挂在壁炉上方的油画。虽然我和他们有距离并且有玻璃阻隔，我觉得那男子随时有可能把马赛拉拥抱在怀里亲吻。

那男子大约有三十或者三十五岁，也就是说比马赛拉小；从我这里看，他很帅气，高大，健壮，有点英国人冷漠的气质。但是，这男子不是马赛拉那天约会中的瑞典画廊经理，即她描述的那对同性恋情人中的任何一个。两人在室内惬意地聊天，与此同时，在屋外我这里，寒风凛冽刺骨，浑身都想快快离去。人们从来

[1] 卡斯帕尔·威廉姆·佛里德里希（1774－1840），浪漫主义绘画先驱。擅长描绘广漠而孤寂的风景，表现出人在自然威力面前的孤立无援。重要作品有《山上的十字架》、《冰河中航船失事》等。

不准备迎接生活里的逆境。忽然，马赛拉拿起手提包——我猜想里面有情爱衣物，走过客厅，消失在一扇门后面。寒风冻僵了我的灵魂。可我知道马上会看见一出对我来说极其痛苦的表演了，会亲眼看到马赛拉背叛我的行径；凭直觉，我感到自己没有勇气能够容忍她这样做。其原因要归咎于此事是真干，不是那个在迈阿密或者芝加哥旅馆窗前赤身裸体的马赛拉，她那是追求刺激、享乐和病态心理下的伪作。眼前这个马赛拉的行为是为了自己和她情人,而不是为我;我是环境所迫的"石头客人"[1]。就在马赛拉躲进另外一个房间，大概是在穿戴那些我发现的情爱衣物的同时,那男子低着头,手里拿着酒杯,全然不知我在监视他。他在等候看表演、马赛拉准备的表演、同时也是我自己痛苦的表演。随后,他起身,点燃一支香烟,再次斟满酒杯。这时,他慢慢向马赛拉所在的房间走去了。于是，我向那个房间的窗前跑去，不想错过那个我希望看见的表演。我的双脚深陷在雪地里。等到我走到窗前的时候，我失望地发觉：像我邻居的住宅一样，窗户上拉上了窗帘，因此挡住了我向里看的视线。现在，陪伴我的只有冷酷地笼罩在雪景上的夜幕。

片刻后，好奇心混杂着窥淫癖患者特有的模糊和恶意的快感促使我向住宅大门走去。我一推，门就无声地开了。我真希望蒙图法尔上校能够在这天夜里跟我在一起，亲眼看看他这个父亲的保守的教育结果。可是，事情的发生并不以人们的愿望而转移。眼下，我独自闯进了暖烘烘的房间，在半明半暗中听见有个沙哑但热情的女声在唱歌，大概是爱里卡·达尔的声音,从一个音量适中的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我胸口憋闷，太阳穴疯狂地跳动；突然感到有必要给情人们上一堂永世不忘的功课，对，就是

(1) 指冷眼旁观的石像。

现在,毫无疑问,很有必要。我迈着猫步,沿着客厅前进,同时听见马赛拉用英语低声在说话。在手持菜刀冲入房间之前，只要再等上几分钟，就足够她和他脱光衣裳、拥抱在一起了。我还记得马尔库斯关于假如我发现自己老婆在欺骗、我会做出什么反应的问题。眼下我承认自己既缺乏预见性，又很矛盾；还承认在马尔库斯提到的情况下，我的反应与加勒比人、阿拉伯人或者非洲人毫无区别。我要把奸夫和淫妇都杀掉,至少弄死我老婆。但是，我极力克制自己；我还记得自己早就打定主意不搞流血事件；我还记得自己发誓绝对不让斯德哥尔摩的报刊拿我的事情在他们的头版上开“大餐”。不,决不。我要像个侦探小说家那样,冷静地行动,不生气,不惊慌,而是突然打断二人的性交活动,一面挥舞着闪亮的裁纸刀，一面威胁要砍掉他和她的脑袋。然后，等到马赛拉和她情人跪下求我饶恕时，我就离开房间，让她和他陷入恐惧和羞愧之中，没勇气控告我，或者再重新恢复那可恶的亲密行为。

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在几个抽屉里悄悄地翻动。我找到一把锋利的长刀，很像锥子。我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回身时觉得颇有安全感。这是我第一次挥舞利器，从前只是让我作品中的人物耍刀子；这种抓住具体家伙的感觉、能够吓唬别人的感觉、可以提出条件彻底改变事物发展方向的感觉、甚至可以残害人命的感觉，让我浑身不寒而栗和产生快感。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马赛拉从隔壁房间开始发出阵阵叫声。的确不是因为快感而发出的叫声，因为如果是快感，我可以从一里地之外就辨别出来，而是抗议和拒绝的声音，混杂着谩骂声，被骂的人叫什么维克多。不久，我就听到了那男子粗大嗓门的声音,说的是类似瑞典语的玩意儿,但也很可能是挪威语。接着,我听见一记沉重的撞击声，好像身体摔倒在地毯上的声音。我还没有来得及躲藏起来，房门就打开了。马赛拉惊恐万状地逃出来，

躲到沙发后面保护自己，一面不停地啜泣，距离我只有四五米。我只好从躺椅和大窗户之间的狭窄走廊里爬出来。我不明白马赛拉为什么没有看见我。估计是高度紧张影响了她的视力。而实际上，她大惊失色，充满了恐惧。因此，这情况显然不是一对喜欢性变态的男女在玩性虐待的游戏，而是发生在这诺尔维克湖畔偏僻住宅里生死攸关的搏斗。

片刻后，那男子出现在门口，大步流星地穿过客厅。马赛拉企图溜进厨房，但是撞到中央的小桌子上，脸朝下摔倒在地毯上了。那家伙立刻大吼一声扑向马赛拉，恶狠狠地打她耳光，叫喊着我听不懂的话。马赛拉猛烈回击，手抡脚踹，其中一巴掌抡到了那男子脸上，让他'哇'的一声喊起来。就在他用双手捂脸的同时，马赛拉主动反击，狠狠地在他两腿之间踢了一脚，打得那家伙跪倒在地上。但是，那男子并没有认输。突然之间，他从中央小桌上抓起有大理石底座的台灯，高举过头顶，可糟糕的是他拉掉了插头，房间立即处于黑暗之中了。他仍然举着台灯，准备砸向我妻子的头颅。

我利用这个意外的大好时机，握紧刀子，扑向那男子后背。随后，在黑暗中，我把一切都混淆了紧张的情绪、混乱的记忆力以及对事件本身的叙述。我想，但不能肯定：我用某种方法——下意识地从美国电影里学来的——在那男子锁骨上方准确地扎了刀。台灯轰然落到了地板上。

马赛拉喊道："小心他有枪！"

就在此时，那男子克服了疼痛和我的攻击给他造成的困惑，翻身而起，从夹克衫里掏出一把手枪，瞄准了我。

我以为这回可完蛋了，尽管脑海里还有个牢牢的念头：这仅仅是场噩梦。但是，马赛拉这时抓起台灯上的一块大理石，向那男子的后脑勺猛然砸去。这一回，他像个木娃娃一样'扑通'栽倒在地上。他脑壳发出恐怖的'啪嚓'一声，把我给吓瘫了那声音

如同陶瓷落地摔碎的声音一样；特别是一想到这一切不可能是噩梦，也不是电影片断或者小说的章节，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更把我给吓坏了。我记得，我和马赛拉紧紧拥抱在一起，浑身颤抖，默默不语，心力憔悴 我感到她的乳房紧贴着我的胸膛，分不清谁的心脏跳得更快；她温暖的泪水流到了我的面颊上；我不知道是她还是我在说些含含糊糊的话语。音乐声——一首瑞典叙事诗——这时几乎听不清楚内容，却难以置信地突出了我俩的疲惫感。在黑暗的客厅里，我俩无言地啜泣着，平静的夜色从大窗户渗透进来了。突然，那男子的身影又站立在我俩眼前了。这时，他手里挥舞着我的刀子。

一切发生得既快速又混乱。有人递给我一把手枪。但是，我还没来得及用它，那男子就凶猛地扑上来夺枪。忽然，枪走火了。子弹大概射进了墙壁，因为我的敌人还在继续抵抗。我清楚地记得，火光像闪电一样照亮了客厅；枪声无情地划破了夜空。我不清楚我和那男子搏斗了多久，或许只有几秒钟，但是我却以为是无尽无休。就在我感到筋疲力尽的时候，突然间，我觉得又是马赛拉用什么利器打在男子头部。我立刻抢回手枪，用枪柄狠狠地打下去。这之后，一切都像慢镜头一样地发生了：维克多发出一声怒吼，望望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用怀疑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最后扑倒在地毯上了。

十五

我和马赛拉用在厨房里找到的抹布和海绵擦掉手印和脚印——至少我俩以为是擦掉了种种痕迹。随后，我俩捡起手枪、马赛拉使用的酒杯、大理石碎块、威士忌瓶子，悄悄地离开了房子。室内，那个男子躺在地毯上，浑身是血，失去了知觉。湖边，小流氓们远远地已经安静下来，仍旧面向火堆，松树上投下了他们的身影。

“咱们应该报警。”马赛拉建议道。这时，我俩已经离开诺尔维克湖畔，沿着20号国道，向斯德哥尔摩驶去。由于她头戴金发套，给刚刚发生的一切抹上了一层非现实的色彩。

“你疯啦？”掌握沃尔沃的方向盘，我有些麻烦。“如果在公共电话亭报警，人家会辨别出咱们的身份。再说，咱俩的声音和口音也会让咱俩露馅……”

“要是报警，他们最多会认为是那些小流氓干的……”

“可是不用多久就会查明不是小流氓干的。”

我想用这样的猜想说服马赛拉：那人伤得不重，还会引发出丑闻，尽管的确需要把那人送到附近的急救中心去治疗。但是，我们决定不叫任何人。被发现的危险实在太大了。

“别担心了。维克多有很好的社会关系。”马赛拉哭着说道。“只要他一苏醒过来，就能找到人。”

“维克多是他的名字？”

“是的。”

“你从什么时候跟他在一起的？”

我们离开了诺尔维克湖，开上国道。

“你在说什么呀？”

马赛拉摆弄着我俩出于谨慎从那房子里带出来的物品。眼下都摆在她裙子上。我的大衣口袋里躺着那把手枪，已经上了保险。

我说：“我指的是那家伙，你他妈的那个情人。我早就在跟踪你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他混在一起的？”

“什么我的情人！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家伙我只见过一两次，是因为生意上的问题。我甚至连他是哪国人都不知道。是瑞典人？芬兰人？还是立陶宛人？不知道。”说着，她嘴对着酒瓶直接喝了一口。

“啊？是吗？可是你跟他呆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啊！太适合谈生意啦！

她生气地回答说：“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回事！求求你了，刚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现在还指责我跟那家伙鬼混？”

“那你都干什么了？难道说你把油画和木刻卖给那家伙不成？还是出售波希米亚的灯泡？”

“眼下我不跟你细说。”她说着，又喝了一口。随后，她摘下假发，长长的黑发直落到肩膀上，并且遮盖了面庞。这个样子也不是我在巴黎认识的那个女子。“我现在唯一想告诉你的是：我根

本就没有做你想象的那种事情。”

“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相信。假如你至少告诉我,他是你情人,告诉我,你爱上了他并且打算甩掉我,或许我还能理解。”

“为什么说这个你才能理解？”

“因为才有可能重新开始一切。”

“这事没有任何重新开始的可能性。”

“首先你应该承认你已经做的事情。”

“承认什么？”

“我说过了。我什么都看见了！”

“你那是窥淫癖的毛病。你是想让我给你讲讲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给你的毛病提供营养。求求你啦！难道你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否认这一切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在那种情况下，争吵变得很愚蠢，这更像是发生在一部影片里的故事，而我就在电影院里欣赏它呢。事情就是如此，淫妇和奸夫一旦被发现，总是否认自己的背叛行为。上校有一天曾经对她说过:“要否认一切,你的说法就会胜利。”这让我想起西班牙中世纪一位国王发现妻子有不忠行为的故事。王后的情人听见王后亲口告诉他：国王已经什么都知道了，这时情人吓坏了，因为厄运在等候他,便回答说:“王后,我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看见了你；绝对没有想到认识你会让我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我不记得这个故事是怎样开头和结尾的，但是好像记得王后被砍头示众，而她的情人则被绞死了。两人都否认了爱情，可是仍然不能救命。可现在企图躲进文学里去是显然没有意义的，无论这文学多么古老；因为眼下唯一严重和明显的是我打伤了那个什么维克多。

马赛拉说:“听我说,别犯傻了,我累了。明白吗,我不知道他是谁！还要我再说一遍吗？我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我跟他就是

商业往来。我去那个地方是检查卖给他的一幅油画。他非得说那是赝品。”

“啊？是吗？你就在那个环境里做你那著名的生意？孤男寡女单独在一个大房子里听音乐，喝威士忌？”

“克里斯托瓦,或许以后我会把一切都说明白。现在,重要的不是弄明白为什么我到那栋房子里去，或者为什么你要跟踪我，而是考虑考虑：假如维克多去报警、去告发咱俩，咱们应该怎么办。懂吗？”

沃尔沃在坚实的雪地上前进，好像在废料堆上滑动似的；与此同时，我心里想：这一切都是虚构的，很像那个王后背叛丈夫的故事，是个只有在我写的小说里才会发生的真实故事；我是小说里的主人公和叙述者，而不是发生在实际生活里的事情、不是我和我话语之外的事情。马赛拉的冷漠态度比我想象的事情更加令人感到震撼。但是，尽管她说的当务之急是确保我们的安全和自由是有道理的，我仍然坚持要求她说清楚与维克多的关系：什么时候认识维克多的？在我背后策划过什么阴谋诡计？她继续喝酒,仍然声称 维克多的事情,她知道的不多 她唯一感兴趣的就是：维克多苏醒之后别去警察局举报我们。他的举报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因为据我老婆说，维克多是个心黑手狠的家伙，在斯德哥尔摩有权有势有关系，从事浑水摸鱼的勾当，其中还有倒卖艺术品……

我反驳说：“谁也不会因为几幅画去杀人。你们中间有什么事情，老早就有事情，所以才在那么一个地方约会；你还戴了假发,那是一种耻辱。”

“别耍小孩子脾气！我戴假发，为的是不让别人轻而易举地认出我来。”她把假发举在手里,说道:“这和谈恋爱毫无关系。再说了,就是我真的背叛你,也不会找这么一个家伙。”

“那他为什么非要杀你？”

“我跟你说过了，他以为我用画在骗他。”

“行啦，马赛拉，那你就说说究竟在干什么鬼勾当。是买卖艺术品呢，还是倒卖赝品？”

“这两种活动之间没有一个清楚的界线。”她说着，又喝酒。汽车里散发着威士忌的气味。如果遇见警察，就得面对大麻烦。“这里面你可能不知不觉就在买卖赝品。”

“撒谎，除去你说的这些之外，你跟那家伙还有别的事情。你看看这个乱子吧。你欠他多少钱？”

“为了一幅乌依伏莱多·兰[1]画的油画，他付给画廊经理10万美金，现在他要求归还。”她疲倦地说道，舌头有些不灵活了。距离斯德哥尔摩不远了。“我只拿了我的中介费。可怜的5千美金……”

“后来呢？既然画是假的，你们为什么不把钱还给人家呢？”

“那两个瑞典人不愿意。”

“就是你跟他俩一起吃午饭的家伙？”

“对。那是一对同性恋情人。中午，他俩发誓说，画是真品，还说维克多不仅要把他亲自弄来的一幅赝品退还给他俩，而且还要把钱留下。这你还不明白吗？我就完蛋啦！”

“你说的一点都不能让我信服。”

“你想要我说什么？你以为一切都有个合情合理、详详细细的解释，都有哲学上的逻辑，就像你那些侦探小说里的逻辑一样？”她喊叫起来。“生活就是这样，没有道理，非常混乱，就是一个缺乏意义的婊子。有很多事情是你不想选择去做的，可是就发生在你身上了……”

“那栋房子是维克多的吗？”

“不是。他不住在斯德哥尔摩。他下榻在大饭店里。”

[1] 乌依伏莱多·兰（1902-1982），古巴著名画家。作品有强烈的非洲一古巴色彩。

“你们为什么不在饭店里见面？”

“他喜欢在另外的地方。我猜想是出于谨慎。我不知道那栋房子是谁的但是有个房间里存着绘画和雕塑。但愿不都是赝品……”

“可是房主又是什么样的‘鸟’呢？”

“不清楚。这你也不相信？”

我俩不说话了。开往乌普萨拉的汽车灯光不时地让我俩眼花缭乱。我的车开进了斯德哥尔摩。这时，心情比较平静了，我上了18号国道，前往我们的于什霍姆小区。首都的街道此时行人稀少。我们的车与一辆巡逻的警车相遇。酒瓶、酒杯、大理石碎块和假发，仍然呆在马赛拉的膝盖上。从车外看我俩，我们肯定更像从电影院里出来或者吃完晚饭的情侣。

就在马赛拉说有可能维克多去报警，因为她的生意性质是不明不白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人生的命运是注定的。人生如同一枚金币的两面：祸福相依。攻击那个男子并非我的本意，可是结果我给了他致命的一击。事情就是如此，我敲开了意外之门，迎接我的是不幸，我心里这样想着，车子慢慢驶过于什霍姆小区空无一人的街道，眼下前进在黑暗中波罗的海岸边的兰德尔纳大道上。最后，我把汽车停放在我家车库入口处。马赛拉显然是醉了，不停地说些只言片语。我俩正要上台阶开门时，身后突然有个声音吓了我俩一跳。

“我终于可以自我介绍了。马赛拉，晚安，我是马尔库斯。”有人穿过我家花园与街道相邻的干枯灌木，一面这样喊道。是个男人。他身边有条狗。好像是从海边走来的。

要想藏起假发、酒杯、大理石碎块和威士忌瓶，实在是来不及了；在门灯的照耀下，这些东西在我老婆手里闪闪发光，吸引了马尔库斯的注意。

“很－高兴－认识－您。”马赛拉结结巴巴地说道。她很想

撤退，而不是谈话。一步难看而不是开心的踉跄证明她喝得过了量；而马尔库斯则把马赛拉的踉跄理解成可以在寒夜里谈话的机会，这样的事情只有斯堪的纳维亚人才想得出。他身后跟着猎犬走到马赛拉身边，面带微笑，在我老婆面颊两侧分别送上一吻。马赛拉在混凝土的第一级台阶上努力保持平衡。

“我俩参加了一个相当热闹的晚会。”我说道，试图解释马赛拉手中那些东西的来源。同时，我感觉到我大衣口袋里的手枪变得越来越沉重。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是我很着迷的那种晚会。人们带走从杯子、酒瓶到女主人的假发套。”马尔库斯冷嘲热讽地说道。“是很有花絮的那类拉丁美洲晚会吗？”

“是的。”我回答说，一面托住马赛拉的臂肘，让她一下子登上台阶。

“下次一定要请我去啊。我喜欢狂欢节。我想我还能迈出古巴孔加舞的步子来。”

“放心吧。一定会邀请您。”在继续上台阶之前，我补充说道。“马尔库斯，祝您晚安！”

十六

第二天，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客厅的地毯上，嘴里又干又苦，胃里有火烧的感觉。马赛拉蜷缩着身体，睡在沙发上。时间是上午十一点钟。天空刚刚放亮。我头疼欲裂，仿佛脑袋里有个约翰·凯奇在演奏他那刺耳的乐曲。我想，只是做过一场噩梦，近几周来发生的一切都不是真的。我猜想，就在这个房间里我躺下的夜晚，或许就开始做梦了 也是在梦中，我打开了街门，看到马尔库斯手持鲜花和葡萄酒站在外面。这样的想法对我是个安慰，因为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确立了我希望在世界上和小说里维持统治地位的逻辑和秩序。但是，突然间，我的双手撞上了什么东西，让我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是我老婆的手提包。我翻了一遍，没发现里面有什么特别的物件。

“马赛拉……”

她睡得很香。我急于给她讲讲我的噩梦。

“马赛拉……”

没有反应让我泄气，只得起身，走下木梯，去地下室。倒霉的是我的脑壳撞在通向二楼的楼梯上了。我摸摸前额，发觉点鲜血染红了手指。我刚好想到：这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发生在博尔赫斯[1]的短篇小说《南方》的主人公达尔曼身上。眼下，我就是那个达尔曼，他意外受伤[2]，最后死于一个高乔人的匕首下，地点在遥远的潘帕草原上一个偏僻的小酒馆里。我摇摇头，一面继续下楼，又想起某个阿莱夫[3]可能在某个阶梯上。我迷惑地笑一笑，深感安慰的是这样的事实：我毕竟在波罗的海海岸，远离布宜诺斯艾利斯，远离阿根廷的潘帕大草原。到了下面以后，我动手翻找装葡萄酒的木箱。正像我估计的那样，没有发现梦中的任何东西，这让我放下心来。可是，我刚要上楼去准备早饭，目光却撞上了我担心的木箱。我在里面找到了有口红印记的酒杯、威士忌瓶、大理石碎块和手枪。

骂了一声："妈的，命苦啊"，这一次不知道原因就想起了西班牙著名女作家安娜·玛利亚·马图特[4]的《后面的房间》。毫无疑问，我这是在故事里转来转去，在小说里迷失了方向，落入了种种可变的娱乐世界。我不得不在黑色咖啡壶附近坐下来恢复平静；咖啡壶突然像渔船马达发动一样轰鸣起来，这吓了我一跳。我发觉额头上的伤口很小，估计很快可以愈合。我用手帕擦擦前额和手指，一面想起坏人在犯罪之后消灭痕迹的情景。

顶着早晨的寒风，我前往于什霍姆小区的商业中心，那是一

[1] 博尔赫斯（1899-1986），拉丁美洲闻名遐迩的大作家，阿根廷人，擅长写富有哲理性的短篇小说。

[2] 额头撞在窗户上。

[3] 阿莱夫，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阿莱夫》中的圆球，是一和多的象征物。

[4] 安娜·玛利亚·马图特（1926-？），著有长篇小说《亡儿》三部曲、儿童文学作品《只有一只赤脚》等。

条不长的宽敞大街,两侧排列着银行、超市、图书馆、服装店和烟草专卖店。我查看了报纸上的大标题，没有发现特大新闻，买了几份报纸和一些食品。我和马赛拉一面吃早饭，一面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算是消磨时光的话，我们只好假装过正常生活，然后离开瑞典，去一个遥远和安全的地方安家落户。

“咱们应该选择一个差别很大的国家。”马赛拉说道。她的话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她依然使用“咱们”,显然令人吃惊,因为即使可能她对我说的关于维克多的事情是真实的，那么我对她背叛的怀疑仍然存在。

“比如什么样的国家？”

“我怎么知道！一个咱们能够重新开始生活、感到有保护的国家。”

我再次翻阅《每日新闻报》和《瑞典日报》[1],寻找关于诺尔维克湖畔的新闻。一无所获。这可能意味着受害人没有报警或者他死了。一想到那个陌生人整夜在流血，我就浑身颤栗。

“报纸上不会有任何消息。”马赛拉说道。“可以肯定事情发生之前报纸就开印了……”

“有道理。不过,还有别人知道这次约会吗?”

“我这方面是没有人知道，但不清楚维克多是不是跟哪个合伙人说过。”马赛拉一面回答一面把桌子上的报纸折叠起来。

“要是他死了,又有人知道这次约会,那咱们就麻烦了。”

“好啦,冷静冷静吧。报纸报道这事还太早了点。广播或者电视今天或许能有些消息……”

“但愿他只是受伤,失去了知觉。”

报纸要耽搁多久才会报道维克多的消息？两天，还是三天？邻居们这么快就发现维克多是不可能的。瑞典人从来不会不事

[1] 《瑞典日报》,在斯德哥尔摩出版的晨报,编辑方针与保守党保持一致。

先通知就去陌生人家里；也不会管别人的闲事。那么如果维克多苏醒之后离开那里，会不会决定不向警方举报受伤的事情呢？马赛拉认为有可能，但是她想维克多一定会找上门来讨债，或者更糟糕的是来报仇。可以肯定绝对不会等闲视之。或许，有可能就是房子的主人，大概是维克多的好友，那天上午发现了维克多，及时进行了护理。无论如何，马赛拉神情严肃、目光注视着窗外，提醒说：咱们得防备不速之客啊。维克多是个倔强的家伙，这已经很清楚了，他会抄起武器报复的。

“也许你说得对。那咱们最好报警。”我犹犹豫豫地说道。“要是维克多来找咱们，肯定是要干掉咱们的。”

“可咱们怎么解释这件事呢？”

“什么怎么解释？那家伙是要咱们的命啊。这难道还不够吗？”

“怎么解释咱们跟他的关系啊？”

“你先告诉我，那幅画是不是假的？”

“可你真的认为真假是关键吗？我的妈呀，克里斯托瓦，你绝对是疯了。我跟你说过了：对乌依伏莱多·兰的作品，我一无所知。维克多交钱，收画，拿走。现在甚至连他打算退还的那幅画是不是我给他的那幅，都没有办法查清了。那两个瑞典人，就是你以为是我情人的小伙子，实际上是一对幸福的同性恋情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去美国旧金山生活，他俩坚持说：提供的作品是原创的。我相信他俩的话。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这种市场规定，货物一经售出，概不退换。”

马赛拉的眼睛因为哭泣，睫毛膏被泪水冲走了，眼皮肿胀了。她极力编造一个合乎逻辑的说法，但是由于紧张，稳定的情绪被破坏了。我长长地叹息一声，扪心自问：跟蒙图法尔上校的女儿结婚，我在这里干的是什么事啊？我为什么也背负着蒙图法尔这个姓氏的累赘和不能消除的污点呢？或许我应该承认：这里

没有事先的算计。尽管有这些事，我仍然还爱她，所以容忍了发生的一切，相信总有一天可以摆脱蒙图法尔这个身份和马赛拉的情人。

我起身收拾桌子上的盘子，一面说道"：告诉我一件事！你这些买卖交易是不是做得干净啊？"

我承认，发生了诺尔维克湖畔事件之后，这个问题听起来非常滑稽可笑。

"你别天真了！"她厌烦地回答说。这种态度本身就包含着危险；其中之一就是赝品问题。所以，人们总是建议顾客聘请著名的专家做认真的鉴定，但这花费可不便宜。

"那就常常不做鉴定了？"

"很多人宁愿相信自己手里拿的就是真正的乌依伏莱多·兰，或者米罗①的作品，以自己的印象为准绳。另外一些人不在乎真假，因为只要价钱便宜就行。还有，他们不明白自己钻进了什么口袋……"

"你好像也不明白咱们钻进了什么口袋。"

我登上二楼，洗澡，虽然情绪不佳，还是动手写起小说来。我猜想，马赛拉一定拿着手机，在厨房里翻阅古玩杂志呢。她相信维克多会给她打电话的。中午，我俩听了瑞典和智利新闻广播，随后看了地方电视台的午间新闻。可是，没人提到诺尔维克湖畔事件，这证明那件事还没有传播开来。只好等候维克多来电话了，可以提出安抚他的某种条件，以便我俩争取时间逃离瑞典。

我想这是第一次我认真收听播送与在智利设立的电台相似的大众节目的智利广播节目②。这个节目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智利水平，那时播音员都流亡出国了。这个针对智利人的节目描绘出与我每天通过电视见到的国家大相径庭的一个国度。它播

(1) 米罗(1893-1983)，西班牙著名画家。

(2) 指瑞典办的对智利播出的节目。

送博莱罗舞曲、秘鲁华尔兹舞曲、撒尔撒舞曲，还有移民们小企业的广告,例如储运、修理、代办旅游手续、房地产中介办公室。其中,就有贝贝 · 克里斯多的计算机工作室,位于林克比小区,那是个来自第三世界流亡者组成的居民点。贝贝 ·克里斯多白天在自己的工作室干活,用处理的零件组装廉价电脑 晚上,在一家意大利比萨饼店洗盘子；这是他为资助在智利的子女读书的唯一办法。不久前，他要求我一旦打算处理这台手提电脑的时候，一定要先通知他。他保证立刻用现金买下，当然出价很低；他还说，如果我要买新的，他可以免费为我提供咨询。

在西班牙语广播中，有个电台非常独特，它名叫“南方广播电台”，里面有个播音员是阿根廷人，他充满激情和雄辩地播送带有冷战时期内容的政治节目。他在节目里反复强调：人类的敌人就是华盛顿；世界的希望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先锋就是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这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内容的节目，伴有进行曲、国歌以及赞美革命的欢呼声，是由瑞典捐助者通过补贴少数族群的项目提供资金的。总之，我之所以提到这些事情，仅仅为了说明没有任何广播节目涉及诺尔维克湖畔事件。

天又黑下来了，我不安的情绪也随之高涨。我想，如果一个人杀了人——我以为那个悲惨的夜晚是杀了人了——就很快不去操心杀人的事情本身了，因为人死是不可逆转的；而是会去思考是否真的消除了犯罪痕迹，是否能够有说服力地对付警察的调查。当然,自责或者后悔的心理是毫无意义的。恰恰相反,对于我的所作所为，现在的感觉是惊人的冷漠，这可是我从来没有料到的，如同那些已经忘记的摄影胶片，是我自己的一个让人焦虑的侧面，是希望警察不要来抓我。我想，所有这一切可以让我更好地理解我的岳父，更好地证明他那不向后看的明确愿望是有道理的。当诺尔维克湖畔事件的一切都彻底埋葬在时间的大山下面时，我肯定也不愿意回忆严格说来我没有做、而是刚巧发生

在我身上的事情。

但是，几天后，我和马赛拉在吃早饭的时候，发现晨报上有这样的消息：在诺尔维克湖畔的一栋房子里，有人发现了一个俄国商人的尸体，他名叫维克多·亚辛。马赛拉一看见这条消息，立刻发出一声可怕的大叫，飞跑着上楼去了。接着，我听见她推开洗手间的门，拧开了浴盆的水龙头。忽然，血液冲上我脑袋，我害怕头颅要爆炸了。我变成了杀人犯啊!!!胃里翻腾得厉害，我感觉恶心，非常厌恶自己。发现尸体的是一位老妇人，房主去西班牙塞维利亚躲避瑞典的冬季时，她负责收信。维克多头部受到利器的打击，警方正在调查可能找到杀人肇事者的线索。这就是全部内容。消息简单，很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办事的特点，让我感到仓皇失措；一想到警方的失去线索可能是假装的，是暂时稳住我俩、然后突然抓捕我俩的计策时，我就格外害怕起来了。

“现在怎么办?”马赛拉眼睛红红的，一回到厨房就问道。她脸色苍白，憔悴，但是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平静，如同拂晓时分的湖水。

“唯一的指望就是没人知道你跟维克多的约会。”

“我说过了 约会是我单独跟他商定的。”

“但有可能他对别人说过啊。”我已经站在逃犯的逻辑上分析此事了。“他肯定这样说了。你知道他为谁工作吗？”

“他是搞中介的。我猜测他属于俄国的暴发户。他从来没有给我讲过很多自己的生活情况。干这种买卖最要紧的是谨慎。没人问作品的去向和款子的来源。”

“假如赝品的事出现在报纸上，你那对瑞典同性恋情人肯定会检举咱们。”

“别提他们了。他俩可不是三岁小孩，对警察没有半点好感。我估计他俩的真正买卖就是倒腾赝品；我猜测我为他俩做成的第一笔交易，价钱很低，仅仅是在试用我。”

“你是怎么认识那个俄国人的？”

“通过巴罗马一个在彼得堡念过书的女朋友。她在那边认识他的。她们有他的材料。他那时正在斯德哥尔摩寻找艺术品。”

我俩吃完了早饭。我上楼去书房，要把早晨发生的这一切描写下来。当你发现自己杀了人时，脑海里会冒出许多难以想象的念头来。比如，你以为事情有可能恢复原状；你以为明天会从噩梦中醒过来，会重新得到幸福；或者你以为会身陷囹圄，或者能够逃避警察的追捕，或者这一切能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的骨架——就像眼前我正在进行中的事情一样。我听见马赛拉出门散步去了。我独自呆在家中死一般的寂静之中，极力说服自己不会成为一个杀人犯，因为我不曾预谋杀害任何人啊。再说了，我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更确切地说，是保卫自己的妻子，这在任何一位法官面前都能成为有利于我的因素。于是，我开始一步步具体写出这个啃噬我、让我感到焦虑的故事细节来；就在我眼下用键盘写出这些文字的时候，就在我描写出这个令人压抑、窒息、卡夫卡式的处境，写出这个我不想犯下的罪行、而命运——或许是一部写成的书——强加我头上的罪行时，我确认这一切都是虚构，是令人遗憾地看上去像虚构，而同时又是可以触摸得到的客观现实，又同时是启示情节、把情节引向连我和叙述者都不知道结尾的情况和链接的总和。

十七

预料中的情况不久就出现在《每日新闻报》和《瑞典日报》上了 警察已经确定杀害维克多·亚辛的凶手们在犯罪的夜晚逃走时携带了一把手枪、一个玻璃杯、一瓶黑色商标的乔尼·沃克牌威士忌以及一块台灯底座上的大理石碎块；警方希望居民们提供如下线索：看看什么人携带类似物品，警方保证举报者的匿名权。

警方的初步结论是，俄国人维克多·亚辛通过房地产中介公司租赁了那幢带家具的房子,他亲自给凶手开门,说明了亚辛认识凶手。杀人嫌疑人之所以带走上述物品，是因为物品上有他们的指纹，这意味着凶手是惯犯，曾经和受害人一起喝过酒。根据推测，这可能是一桩算账引起的冲突。估计，这个俄国人在非法的古玩交易中有些名气，与东欧国家艺术家的制造假画 的活动有联系。

我惴惴不安地看到，无论维克多的子弹夹的类型，还是射人

客厅墙壁中的弹头，都支持了这样的看法：这是职业杀手所为，因为弹道学分析小组已经认出子弹属于马卡洛夫[1]式的俄国造手枪，九毫米口径。报纸上透露说，人们不会跟携带这类武器的女孩来往的。此前，我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思研究这种枪支，因为一想到手枪在我大衣口袋里沉甸甸的情景，就让我感到不寒而栗；就让我回忆起维克多·亚辛最后轰然倒地的那一瞬间的表情 躺在地毯上，满脸是血，死不瞑目，露出怀疑的神情。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维克多担忧自己双手染满鲜血的表情既令人感到可怕又不合乎时宜，好像这个事实不是造成他致死的条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极力安慰自己，心里说：我们至少消灭了一个黑帮坏蛋。

但是，最令人担忧的却是马尔库斯看见我俩在犯罪之夜回家时携带着那些危险物品。这样一来，我们的邻居就变成了危险分子，变成了一夜之间就会敲诈勒索我们的家伙。在诺尔维克湖畔，似乎没有人看见任何异常现象，包括在篝火旁聚会的流氓集团。一想到那些危险物品没能逃脱马尔库斯的察看，我就感到不安；一想到马尔库斯不久会把这些物品与杀人案联系起来，就会要挟我们，或者干脆检举我们，我就紧张得喘不过气来。马赛拉陷于极度的沮丧之中，她后悔不该致维克多于死命，为马尔库斯可能产生的怀疑而焦虑。我陪她走进卧室，里面的照明、整齐排放的物品和芳香的气味，都让我感到陌生，好像那是陌生人的住宅。

她像个胎儿一样蜷缩在床单上，鞋子不脱，喃喃咕咕地说道“：现在咱俩的小命都在邻居手里了。你很清楚 这里能判处咱们无期徒刑。”

(1) 马卡洛夫（1849-1904），俄国海军统帅。曾经发明过穿甲弹头。后来用他的名字命名一种苏式手枪。

透过窗户向外张望，我能看到马尔库斯正在穿过花园向自家的车库走去。刹那间，时光仿佛停滞了，好像我正在醒来，要去给他开门；好像他站在门外微笑着等候我，手里拿着美酒和鲜花。我想，宇宙中有某个瞬间的确出现了那样的情景：马尔库斯站在我家门外，等待我开门，准备给我一个惊喜。但是眼下，马尔库斯在栅栏那一边，生活在另外的时光里，不是我的回忆，也并非宇宙的某个瞬间，而是当下时刻，近在咫尺。他向车库走去，他经常修理汽车的马达，拒绝我按动生活的 REWIND[①]，或者退回到这部小说手稿的开头段落。没有办法能让他忘掉看见的一切。事情一旦发生，它就摆在那里了；这里不可能支持贝克特笔下那个人物[②]的说法：此事不存在。我在担心与慌乱中突然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今天下午马尔库斯有可能因窒息而死在自家车库里。马达在燃烧，库门是关闭的，一个吸入过量二氧化硫的人，在无人发觉的情况下晕倒在地了。总之，为什么不可能呢？我放弃了这种猜测，暗暗在想：马尔库斯会不会把杯子、酒瓶与发生在诺尔维克湖畔的杀人案联系起来呢？或者这样的推测让他觉得太难以置信了，如同我想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一样地不可思议？此时此刻，那个鬼鬼祟祟的博耶娜会在什么地方呢？一想到有这样的可能性真把我给吓坏了：博耶娜一来我家干活，就会钻到地下室去，就会发现一堆破旧报纸、杂志的下面掩藏着一个放置葡萄酒的木箱，里面埋伏着那些物品。当务之急就是赶快消灭那些物品。如果马尔库斯怀疑我们是罪犯，他将会有两种选择：一是报警；二是来找我们谈话，澄清疑问。

“你应该把那些东西扔到什么地方去。”马赛拉闭着眼睛说道。此时，她枕着双手，侧卧在那里休息。

①英语 回放机。

②指《等待戈多》中的主人公。

假如我从一开始就正视她的背叛行为并且完成现在我打算做的事情，确切地说，就是尽快离开瑞典，与马赛拉一道躲藏到某个偏僻的地方去，开始过一种隐姓埋名的新生活，事情就会全然不同了。可是，现在，我却在瑞典人和马赛拉的手中，而关于她的背叛行为，我丝毫没有弄清楚。她的情人一定在斯德哥尔摩或者马尔默的街道上走来走去呢，他一定是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一定是心满意足地偶尔享受一个拉美窈窕美人奉献的健康躯体；他全然不知这个笼罩在我们头上、指控我们的黑暗；而这黑暗同样弥漫在瓦尔帕莱索港口[1]黄昏时分的大街小巷。此外，仿佛所有这一切还太少似的，我还必须承认：是我干掉了那个俄国人。相反地，我妻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如果我冷静分析一下此事，那么我是搀和到一种本来与我无关的情况里来了。在瑞典人的法庭上，可能会有尖刻的指责对准我。审判会是怎么样的呢？可以肯定是在宽敞的大厅里举行，中间有高高的顶梁柱，厅里冷冰冰，四壁光秃秃，律师们谢顶，表情严肃，法官们干瘦，眼睛近视，身披黑色礼袍，好像我们小区的乌鸦羽毛。一想到如下的情景我就浑身发抖：我，一个写侦探小说的作家，一个远离闹市的消极的人，逐渐适应了这样的念头：被捕并且在铁窗后面度过余生。

不，这样的逻辑只存在于小说里，而不是现实中，正如马赛拉很有道理地坚持的那样。什么用理性维持世界秩序的想法，是启蒙世纪以来哲学家告诉我们的谎言。让笛卡儿和卢梭那一套见鬼去吧！他们那套世界是由可认识的规律主宰的思想是一种乌托邦，如同黄金世纪或者切·格瓦拉相信的'新人类'那样，是一种幻想的玩意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为了追逐那些子虚乌有的玩意，我们浪费了生命中多少时光啊！我们并没有超越罗贝·

[1] 瓦尔帕莱索，智利海港城市。

德·阿吉雷[1]和埃尔南多·德·索托[2]的水平。我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个荒唐的有风险的处境，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这会让我蹲上二十年大牢，我这是上演一出缺乏意义、与我无关的悲剧。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头上呢？而最糟糕的是这一切的发生并没有能让我发现老婆心中的秘密。严格地说，我至今还不知道她是否真的背叛了我以及她为了这样做所挥舞的理由，尽管我倾向于这样的猜想：她的欺骗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听说了我跟卡尔拉的性爱关系，是因为通过一种凶狠的报复行动可以取乐。但是，我很难接受的是她这种行为仅仅出于这种思想感情。我猜想她情人那里有什么事情，在那个没有表情的男人身上——一度我把这男人跟那个俄国人混淆起来——一定有某种她在我身上找不到或者我没有给她的东西。但是，怎么查出这样的东西呢？它在什么地方？它为什么藏起来？它要达到什么目的？并非任何谈话都能让人们接近和沟通起来；很多谈话仅仅为了保持距离，或者加大距离，为了掩饰感情。我想我永远也无法了解马赛拉；我认为我只能检讨自己对她勾画出的思想；我感觉自己只能检讨在涉及老婆时使用的词语。但是，我没有深入到她的内心里去，就是说，我仅仅分析了她身上的象征与标志，纯粹是我的而不是马赛拉的概念。因此，我永远也找不到答案因此，她永远是个海市蜃楼，是一条地平线，是你可以用近似的形式描写的想象物，但是绝对不可企及。

“我想出门去扔那些破烂是不合适的。”我不高兴地说道，心里又想起：马赛拉的背叛是所有这些事情的罪魁祸首。

“为什么不合适？”

⑴ 罗贝·德·阿吉雷（1511-1516），西班牙派遣到美洲去探险的军官。曾经前往亚马孙原始森林寻找“黄金国”，以性情残暴、滥杀无辜著称。

② 埃尔南多·德·索托（1500-1542），西班牙派遣到美洲探险和进行征服的军官。曾经率领军队征服尼加拉瓜和秘鲁，后在发现密西西比河的途中逝世。

“总会有人看见的。”

“要是你在家里把瓶子、杯子和大理石块砸碎，然后把碎块扔进垃圾箱里呢？”

“手枪怎么办？”

“拆成零件再扔掉。”

“收拾垃圾的工人们能发现这些东西。”

“你真的以为清洁工会——检查垃圾袋吗？”

你根本不知道组织起来的群居民族有多大能量。也许马赛拉有道理，而我夸大了事情的严重性；也许我假设的那种严格的组织性并不存在。但是，如前所说，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感觉、梦想和话语之中；而眼下在困惑中，我想面对瑞典警察自己是不会错的。我不能一开始就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我已经引起环卫工人和公园管理人员的注意了。毋庸置疑的是，罪犯，确切地说，就是我俩，企图销毁罪证，把罪证扔进垃圾箱、大海、大河或者大湖里去。这是非常可能的。为此，我不愿意冒这个风险。我觉得随着每分钟的逝去，手枪、瓶子、大理石和杯子的体积越来越大。

“要是你去远处废品回收站，把这些东西扔进一个废品箱里呢？”

这主意不坏。但是，我直觉地感到自己不会镇定自如地去一个废品回收站，通常那种地方是宽敞和没有人烟的；我不会平静地选择一个准确的行动时间。说不定，警察已经日夜二十四小时地悄悄监视那些地方了。总之，人们总是根据电影里或者侦探小说中看到的那些加以猜想。电影和小说里总是有目击一切并且埋藏罪犯的意外证人出现。

“克里斯托瓦，你要是在花园里挖个深坑呢？”

“马尔库斯会看见我的。”

“可是咱们不能让这个白痴捆住手脚啊！”她生气地吼道，一面从床上坐起来。“咱们总得想法子扔掉那些破烂啊！”

我离开了房间，因为我想或许这样可以平息她的怒火。我想我开始恨她了，逐渐而有意识地恨她了；但不是因为她对待我的方式，而是因为她把我弄进来的这种处境。现在，我不能上街扔那些东西，可能全体居民已经与警察合作，明白我俩因为不安会不得不笨拙地销毁罪证。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那些东西维持现状，现在警察来我家搜查是不大可能。显然，我们有个好处：我俩不像维克多·亚辛那样属于什么黑帮；因此，我俩不会出现在第一批嫌疑犯名单里。一个俄国黑手党成员和一对智利知识分子夫妻之间怎么会有联系呢？

我回到书房，再次坐到电脑前，把今天上午报纸上公布的通告纳入小说里来，这时我又看见了马尔库斯。他低头弯腰，身穿风雪大衣，沉思地向花园尽头的储藏室走去。那里是放工具和玩具的地方；那里就是我和马尔库斯第一次谈话的地方我已经不记得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马尔库斯穿过雅典娜女神雕像和轮廓已经模糊的雪人之后，突然抬起头来了。我觉得他的目光有几分钟是停在我的窗户上的；甚至可以发誓说：他认出我在窗户后面的身影了，所以我才打开一扇窗子，冲他喊道："你好啊，事情进行得如何？"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态度冷漠，目光突然变得孤僻和不相信别人了，而且不讲礼貌地表示沉默。我关上窗子，确信马尔库斯已经怀疑我俩了。

十八

今天中午，斯德哥尔摩警察局凶杀组的一位探长来家里了。他自我介绍说他名叫奥里威里奥·董甘，有五十岁，探究的眼神是黑色的，皮肤晒得黑红，头发完全银白，灰色的胡须已经有几天没刮，整个面相有罗伯斯庇尔[1]的模样。他身穿全丧服，西班牙语说得十分地道，对此，我并不感到吃惊 他出生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发动军事政变之后，他流亡到瑞典定居。

董甘的突然出现让我感到不安。但是，我极力装出天真、无辜的样子，虽说一想到他的出现可能与杀害那个俄国人有关，我就浑身直打哆嗦。我想，可能我俩在那所房子里留下了什么痕迹；或者某个小流氓看见我俩从那里出来，或者记住了我们的车牌。已经无计可施了，太晚了，甚至连销毁藏在地下室的手枪、威士忌酒瓶（几乎空了）、大理石块、杯子都来不及了。假如董甘开

(1) 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之一，属于极端革命派。

始检查，我俩就完蛋了。

我请董甘进会客室坐下，希望正在二楼睡觉的马赛拉不要醒来，因为她那副沮丧的神情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我们真是要大难临头了。前天晚上，仿佛火上浇油似的，我俩通过智利电视新闻看到法庭开始审讯我的岳父。一个由失踪者和因政治问题被处决者亲友们组成的委员会，控诉蒙图法尔上校在军政府处死一些人的问题上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马赛拉一看见父亲在法官面前交代之后，他极力躲避记者们的围攻，在保镖们的簇拥下，与律师们一道狼狈逃窜时，就伤心地哭起来了。过去的反政府人士有好几年的时间都没把矛头对准蒙图法尔上校；但是，如今，他们使用充足的炮火轰击上校了，因为他们知道军队上层不会为一个属于过去时代的老军官拼命的，恰恰相反，上层宁可忘记那个时代。可是，正如我从前说过的那样，在今天这种情况下，过去的时代是另外一些人、尤其是受害人牢记在心的。

“于什霍姆小区之所以有名气，是因为有夜莺光顾。”董甘一边在衣帽间对面脱下潮湿的皮靴，一边说道。他说话的口气和话题，立刻让我觉得他已经变成了瑞典人。“我住在阿尔兰达，在国际机场附近。夜莺不去那里。冬天之后第一个回来的小鸟就是夜莺。您听见夜莺唱歌了吗？”

“实际上，还没有。”我慌乱地回答说。我甚至没有察觉到冬天开始撤退了。我觉得董甘是个性情孤僻、但同时又敏感的人，不大像我阅读或者写下的小说里的侦探。一句话，一个关心小鸟的警察，可以说是不大常见的警察。

“夜莺的歌声有持续的颤音。它宣告冰封期结束了。有人认为夜莺吓跑了冰块。”我带领他通过走廊进入会客室。他继续说道：“这几天您注意听，能立刻辨别出它那温柔的歌声，那带有疑问和乡愁的颤音。”

董甘走进客厅，看看绘画。他喜欢雷内·波多卡雷罗的作品；

他低沉而严肃地声称：这个古巴人是个了不起的画家,他最有价值的作品正是这样的油画 ,反映了老哈瓦那的面貌。董甘在沙发上落座之后，掏出口袋里的笔记本和圆珠笔，眉头紧锁地说道：

“我猜想您知道是什么事情让我来这里的。”

一阵寒战袭遍全身，我再次感到肠胃紊乱，双腿发软了。董甘是那种智利人：他们喜欢只要自己一露面就能把别人吓倒。只要眉毛紧锁，只要浓密的眉毛显得严厉些，只要眼睛露出强烈和深邃的黑光，或者露出冷笑，让人感到害怕和阴沉，就可以把人吓倒了。我坐下来，担心他会发现我头上的一层薄薄的汗水。

“说实话,我不知道您为什么来访,探长。”

我想到了马赛拉，想到了她过去急于离开智利的愿望，为的是避免某一天被智利警察传讯。她常常做的噩梦之一就是警察因为她在军政府期间与父亲合作而前来逮捕她。她担心有人会指控她曾经出卖过维亚比斯塔小区剧团的某个同事，而实际上，她没有出卖任何人。但与她作对的是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有三个演员,马赛拉与他们一道工作过,是左派成员,勇敢善战，被军政府的调查局逮捕，受到酷刑拷打，那时马赛拉正在剧团工作。人们找不到任何对马赛拉不利的证据。但是，马赛拉决定辞职,告别舞台。从一开始,虽然没有人表示出来,马赛拉就觉察出同事们心里躁动着怀疑的浪涛。这是她宁可出国的原因之一。如今，面对这个为瑞典效力的智利警察，她的噩梦开始成真了；如果用某种方式说出来，这种噩梦有个奇怪的本事：此时此刻，迫使我下最后的决心：绝对不让人家逮捕我，拿我当杀人犯审判。我绝对不能让他们感到满意；我会在被判无期徒刑之前给自己脑袋上一枪的。

“您是作家,对吗？”

董甘来访就是为了谈我的职业？不可思议！

“对,小说家。写侦探小说的。您也写东西吗？”我问董甘,仅

仅为了打破僵局。

“哪敢啊！但愿我能有那样的本事。我就是写写案子报告什么的。”

“那这么说,咱俩的活计有相像的地方了。”

“不多。我不是来谈文学的,而是别的事情 两天前夜里,给您家里干活的波兰女人被杀害了。”

“是博耶娜 ?”我惊叫起来,以为这是个名字近似或者搞混了什么的问题。

“她全名是博耶娜·基罗夫。”他一边说明，一边目光锐利地注视着我的眼睛。“她是在林开比大街的单元房里被杀的。有人搜查了她的家，大概偷走了一些东西。”

我无法相信他的话。因为就在短短几天前我和她还在厨房里喝茶呢。一回想起她那带有男性的面孔、那发红的头发和浑身强烈的烟草气味，我就感到沮丧。可怜的博耶娜还没有来得及交付在克拉格维亚买下的房屋费用；她的父母已经年迈，现在只好自己解决问题了。尽管如此，虽然我不愿意承认，我开始慢慢体会到某种轻松的感觉：这个警察来我家不是为了那个俄国人维克多，而是为了波兰女人博耶娜。如果我冷静分析一下此事，那么董甘是来问我一桩与我无关的杀人案；这说明警方还在摸索诺尔维克案件的情况。

我热情地介绍说：“博耶娜是个勤劳、朴实、少言寡语的女人。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结局。是抢劫吗？”

“我们还不知道详情呢。”

“可怜的女人！一辈子辛辛苦苦地劳动，经常谩骂那个把国家弄得贫穷落后的政权；可是如今竟然这样结束了自己的……”

董甘瞥了我一眼，接着摸摸下巴，稍稍改变了一下话题：

“我们觉得她的死亡可能要归咎于一次算账上。”

“算账？”我很难想象博耶娜会被卷入类似维克多或者马赛

拉那种浑水里去。

“为了贩毒、走私或者盗窃之类的事情算账。谁知道呢！但这事有黑帮插手。”

“探长，看来在瑞典从事非法活动的前激进阵营的移民实在太多了。”我好像一个卑鄙的叛徒那样声称，口气更像蒙图法尔上校。“不久前有人在诺尔维克湖畔杀了一个俄国人。或许这两个案子有联系。您说呢？”

我感觉到董甘有些无精打采和不信任地望着我；我觉得自己由于刚才顺便说了那些话，下子钻进狼嘴里去了。莫非他能真的知道我妻子是谁？我岳父是谁？难道他能注意到这里，在斯德哥尔摩，政治上会来个大翻身？就像古老的吉拉帕雍[1]歌曲要求的那样，让安第斯山那边他和他的弟兄们、被历史抛弃的人们，会来个大翻身？

“有可能，有可能。”他含糊其辞地说道，仿佛想表明：无论问题还是推测，只能由他提出来。

“那么您刚才说博耶娜属于黑帮集团啦？”

他厌倦地斜靠在沙发上，双腿交叉，两手玩着圆珠笔和笔记本。令人吃惊的是，他身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黑色的。我推测，他在智利期间一定参加过人民阵线发动的游击战，或许是阿连德总统的神秘贴身保镖之一；或者是左派组织情报部门的成员。身份难以确定，但现在的举止却暴露出他是70年代革命的老地下工作者。我曾经作为幻想羡慕过这样的‘职业革命家’。如今，董甘在流亡中，距离祖国万里之遥，似乎以探长的身份，至少部分地在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

“任何假设都是可能的。”他用调和的口气回答说。随后低下头，甩掉一只衣上袖的一根绒毛。“我们在做前期调查。家里有这

(1) 吉拉帕雍，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首领。

么多值钱的东西，您不觉得奇怪吗？”

“您指的是什么？”

“我看到了绘画上品，雕塑，比如那个罗贝托·马塔[1]的作品。我估计您妻子有金银首饰……最近几周以来，没有发现丢了什么贵重东西吗？”

我在回忆；与此同时，董甘再次摸摸下巴，不停地注视着我，好像不相信我在回忆，觉得我在装蒜。不，不，我没有发现少了什么东西；恰恰相反，我们的财物好像原封没动。让我感到困惑的倒是从博耶娜身亡的消息造成的痛苦影响下，突然转向了这个波兰女人是不是盗窃了我们的东西。我对董甘说，一切好像都在原来的地方。董甘咬了一下上嘴唇，声音严肃而缓慢地问道：

“一星期前，博耶娜最后来过这里，对吗？”

“差不多吧。”

“由于某种原因，她没有再回另外那个地方工作。我想，她曾经在马尔库斯家里干过活，不过有很长时间已经不去了。”

“自从马尔库斯的太太死后。”

“是的。”他喘了一口气。

“再说，我不相信她敢去那里。”

“为什么不敢？”

“那家人对她不好，所以就不大高兴地离开了。”

“总之一句话，事情就是这样的，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这是我母亲经常跟我说的话。”他低着头，有信心地说：“好啦，假如您忽然想起什么的话，给我往办公室打电话就行了。”

“放心吧，探长。我会的。”

“不过，帕索斯先生，请允许我提个问题：博耶娜是不是跟您

[1] 罗贝托·马塔（1919–），智利画家，受超现实主义影响，创作了一些“梦幻”作品，很有影响。

说过什么让她担心的事情？”

“探长，我不明白您的话。”

董甘扫视一下墙壁，仿佛在寻找一种更准确地说明问题的方式 接着，他皱着眉毛，说道：

“她是不是说过什么让您觉得有危险的事情？她没跟您说过她知道一些不敢公开说出去的事情吗？”

就在此时，我看到窗外马尔库斯正驾驶着沃尔沃离开车库。阳光照射在他的车顶上，反射出一片光辉；沃尔沃缓慢地开上兰代尔纳大道。在这种阳光灿烂、天空湛蓝、能见度极高的日子里，瑞典的生活好像是快乐的。这环境感染了我，让我很想看看晨报，或者在市中心某个地方阅读一本优秀小说，当然，旁边需要摆上热气浓香的咖啡。

董甘的问题以某种方式指向那个驾驶沃尔沃轿车的男子，他在那个诺尔维克湖畔事件的夜晚看见我和马赛拉拿着那些危险品。现在，仅仅提到马尔库斯的名字，我脑海里就回响起约翰·凯奇那刺耳的钢琴曲，那作曲中真正前所未有的形式但是，坦白地说，如果说博耶娜什么时候跟我说过一些慎重的事情，那就是关于马尔库斯的，关于马尔库斯对自己妻子之死应负的意外责任。严格地说，装有安眠药的瓶子莫名其妙地出现在马尔库斯太太身边的床头桌上，这证明她的死亡不是像警方推测的那样是自杀，而是马尔库斯预谋的行动结果：那天夜里他秘密回到家中，目的就是把安眠药送给妻子，或者说就是把安眠药放到妻子伸手可及的地方。但是，博耶娜早已提供过相应的证词；如果后来又把马尔库斯卷到这里面来，那是极其有害的。如果我这样做了，那就得与马尔库斯当面对质；而有可能马尔库斯出于反击，会提起那天夜里的事情：他亲眼看到我和马赛拉从轿车里出来，手里拿着那些物品……

“我没有跟那个波兰女人说话的习惯。”我这样说道，心里明

白董甘绝对查不出真相来了。“博耶娜准时来干活，她做她的事情,完了就走。只是到了付钱的时候,我才跟她说话，一小时七十块,当然是漏税的。”

探长不慌不忙地望着我，相当疏远，好像在看一部缺乏说服力的影片。我的感觉是,他恰恰不明白我所说的‘漏税’,因为他调查的这个案子实在太棘手了，很难不犯小过失我决定继续抚慰他：

“我不会说波兰话。她也不掌握英语或者西班牙语。没有办法交流,探长,除非打手势。”

突然,董甘显露出某种困惑的神情。我明白这是他唯一一次面部表情暴露了他的心思。看来，他常常思考的是别的事情，而同时假装注意地倾听，似乎他的大脑不满意此时记录的内容，因此不停地推测其他方面的问题。他这种小心谨慎的神秘态度，他极强的掩饰能力，都让我感到惴惴不安。

探长收起一字没写的笔记本和圆珠笔，起身，说道：“一句话,帕索斯先生,谢谢您的宝贵时间。如果想起什么重要的事情，请您给我打电话，哪怕我去查别的什么小细节呢。无论如何，别忘记我给您说的夜莺的故事。听听夜莺的歌声吧。能让您放松，真的。您需要放松啊……”

十九

马赛拉继续装成一切正常的样子，努力买卖艺术品或者家具，努力争取在某个话剧团里找个位子；总之，她装出生活一如既往的样子，免得引起别人怀疑。实际上，她总是非常关注报纸上的警方报道；注意董甘探长再度来访的可能性。我俩生活的这种不踏实状态，把她变得怯懦起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连博耶娜的葬礼都不敢出席。而我则相反，由于我怀疑博耶娜是被马尔库斯杀害的，我有了勇气，穿过全城，一直来到法医研究所。要是不去就好了！我徜徉在空荡荡的走廊里：高大的顶梁柱，一道道沉重的白色大门，铺有瓷砖的地面，走在上面发出脚步声；我迈进一间灯光昏暗、死气沉沉、不很通风的房间，里面有三个人静悄悄地坐在一张长椅上。片刻后，没有任何交接仪式，一个瑞典人把装有博耶娜的棺材交给了一个外交官模样的男子。我估计当天就会把博耶娜遣送回波兰；父母给她下葬。

我一回到家中，马赛拉就问我："你怎么样？"

“压抑。就好像进了卡夫卡的《城堡》一样。”

她没有再说话。从几天前开始，她就沉浸在无言之中；只是为了提出什么问题才开口，可是她对答案似乎并不感兴趣。从外面奔波回来——我愿意相信这是真正职业需要的奔波，她就把自己关闭在卧室里，看书或者打盹，等候智利频道和瑞典广播电台的消息。最糟糕的是这几天智利电视台又提供了针对蒙图法尔上校的新背景材料。眼下，至少没有人把上校与马赛拉联系起来了，这是幸运的，也是起码的公正行为。显然，我岳父绝对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个场面：失去了军方的正式支持，无依无靠，不得不去法庭回答问题，而命令他去法庭的则是军队的上级。这真不失为历史的嘲讽：昔日国家情报室令人畏惧的头目，今天在民主时期面对失踪者和被处决的政治犯的家属们的指控；与此同时，特务头子的女儿梦想摆脱家庭的过去，结果又在瑞典卷入杀人案；而上校的女婿，一个作家和政治叛徒，却生活在斯德哥尔摩，换言之社会民主的楷模，在这里作家夫妇每月得到经济援助，过着舒适的生活。在独裁统治开始时期，谁能多年以后想到：有一天，敌我双方——就是说，我和蒙图法尔之间——会握手言和，会编织一种互相依赖、同流合污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协商大赦培育出来的呢？通过电子快讯，我得知干下类似勾当的并非我一人。别的人，昨天还是激烈反对军政权的运动领导人，杰出的领袖，今天成为赫赫有名的大律师了，成为将军们和大亨们的顾问或者智囊，而这些将军和大亨曾经是独裁者皮诺切特的顶梁柱。此外，今天这些领导人巴结军方，在争先恐后地变成军方的宠儿，为新自由主义喝彩，企图从集体记忆中一笔勾销就是他们曾经从流放地号召人们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去推翻独裁统治。剩下的只有少数革命党人依然忠于自己的传统立场，尽管为此他们已经变成了博物馆的展品和一股微不足道的力量。

我不了解马赛拉内心对这里——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一切有何想法；对于她可能的不忠行为，我的调查也没有什么进展。当然，此时这已经占据次要地位了。眼下，不是责备和破坏性批评的时刻，正如一位精明的政治家所说，面对敌人的进攻，应该加强团结。马赛拉仍然是我的同谋，尤其是现在马尔库斯还在威胁着我俩，而且她也怀抱着寻找新避难所的想法瑞典无论如何已经不能继续扮演这个角色了。我也还需要确定究竟是什么原因勾动了我老婆的不忠行为。我这样想，不是出于大男子主义的刺激，或者怒火中烧，而是因为渴望了解真相并且弥补部分损失，如果是我的责任，或者在将来不重蹈覆辙，假如我与别人重新开始生活的话。当她告诉我：她与维克多并没有什么亲密关系，我更倾向于相信她的话，因为如果她与维克多有染，那么她不可能如此天衣无缝地掩饰维克多之死带来的悲伤，而且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仅仅害怕落入司法机关之手。但是，我的疑问依然如故：那么她的情人是谁呢？她和什么人一起骗我呢？为什么会有那些情爱衣物呢？为什么她不告诉我真相，也不和那人出走呢？或许那人已婚，是个不可能与马赛拉保持公开关系的家伙？我推测，如果她与维克多有什么隐私，那也仅仅是一夜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后果，这是许多男人寻找和渴望的一种关系——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有可能她的情人、那个至今躲在暗处的无名氏，仅仅是在肉体方面吸引了她，尽管也有可能她同他谈及一些不能跟我谈及的话题。但是，她从来没有给我说明过那是些什么话题，虽然她经常责备我跟她无话可说。不知者，无罪啊，怎么能指责不知者呢？这不公平啊！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有道深渊横隔在我和马赛拉之间；这是一道我俩永远不可能在上面修桥的深渊。马赛拉只是说，女人是不一样的，好像我不知道男女有别似的 她还说，男人不理解女人，好像理解女人是很容易的事。对，我同意，这话作为理论的提出，听起来也不错，肯定会得到女

权主义者和被丈夫压迫或者被男人抛弃的女人们的支持；但是，这等于白说，因为不会有任何结果。

几年前，就在她一再说什么我作为男人不理解她的时候，我对她说："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要你离开你那男性世界,向我靠拢。"

那时,我俩躺在床上,熄灯了,每人都是把脊背留给对方,脸朝外。我俩刚刚看完电影，在外面吃了晚饭归来。我已经不记得吵架的起因究竟是什么了；但还记得在那个星期里，她几次对我说，我应该从一个不要太男性的情欲角度向她靠拢；我应该明白她性欲开始点燃的方式,不是触觉,而是听觉,就是说,她主要的性器官是耳朵和大脑，不是大腿或者乳房。由于那时我正和那个女舞蹈演员搞婚外恋,便问她："莫非你要我提供找情人的机会，为的是能够恢复快感？因为从你指责我的话里看来，是我剥夺了你的性欲能力啦。"

她沉默起来，好像在掂量我提的建议。我承认那个时候我或许可以容忍她玩两次一夜情，至少我想那种一夜情别让我生气，条件是得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放到卡尔拉身上去。据说，如果情人被及时发现还可能与妻子(或丈夫)和好如初,破镜重圆。我承认这些思考和我这些话出现在电脑上的方式非常冷酷，但这是我现在的感觉，我认为能够清晰和冷静地表达我的感情还是高兴的事。

"这么说你给我提供找情人的空间啦？"马赛拉失望地问道。我感觉到她在黑暗中转过身来了，虽然还在床上跟我保持距离。我能感觉到她的体温，但不是她的皮肤。

"是这样的。"

"你的话证明你根本不理解我说的是什么。你就知道按照男人的想法考虑问题；你不能跳出你自己的局限性。我的问题不是二十厘米肉茎的事情，而是气氛和说话。明白吗？"

老实说，我不明白她的话，或者确切地说，我不知道她想说什么莫非她要我放弃男子汉的感觉？难道她要我按照她的感觉，当然是女子感觉的灵感？我准备这样做，虽说换个时代，我会认为这是无法接受的条件；但是，我根本不知如何去做啊。再说，谁能向我保证她建议的这种同性恋行为最后不消灭我的男性特征、完全失去我吸引她也吸引卡尔拉的面貌特征呢？或许在这个意义上马赛拉是有道理的：简单地说，有些事情不适合跟丈夫说，只是应该跟情人谈谈。渐渐地，从那次谈话开始，我逐渐明白了：说话对于马赛拉是极端重要的。对她来说，话语和表情是爱情的关键。而对我来说，最本质的是确凿而有响动的事实，是肉体行为，是刺激女子兴奋起来的触摸手段，是让女子舒服的动作、技巧和计谋；对，就是跟那个德国莱比锡女人学来的一切，跟别的男人谈话、从我看到的电影和书籍里学来的一切。这一点我公开坦白承认，哪怕随便哪个女权主义者看到这里会臭骂我一通，而且证实了她对男人最糟糕的假设。但生活就是如此。少年或者青年时期没有人教给你认识女人的思维和感觉方式，没有人送给你修建通向女人桥梁的工具和材料；而你就这样几十年来极力盲目地要过渡到彼岸去，就算你没有半途而废吧。代替我们上过的那些无用的体操课和教材，学校本应该告诉我们什么是女人的感觉以及她们特别喜欢的性爱技巧，是的，本该如此；而这一切本该从女人角度、从女人的情欲和想象力的最隐秘的深处视角来上课，而不是从臭名昭著的男子角度进行讲授。

不久前，我这样对马赛拉说过："你告诉我一件事！"

说这话时，我俩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呢：她在炉子上烧鲑鱼；我在炒芦笋。外面下着大雪。我俩早就打开了一瓶智利葡萄酒，是大使法古塞送的礼物。整个亲密的气氛使得现在的同谋活动成为可能。

"怎么了？"

我冷不防地问她：“你跟什么人一起欺骗我？”

“你又发疯啦？”她恼怒地吼起来。“这话又是哪儿来的？”

“闻出来的。”

“那你闻错了。”

“你有情人！”

我发现她脸红了，尽管那很有可能是炉子烤的结果。

“或许可以说，我不缺乏这样的想法，也不缺乏这样的男人。克里斯托瓦，你瞧，我知道咱俩有问题，我意识到了。”她用和解的口气说：“从想法到有情人，还差一大截路呢。我想有情人的那一天，一定会让你知道的。放心吧！”

“你肯定会告诉我？”

“肯定。”

“你看，你应该告诉我，因为我准备接受很多事情。不久前咱俩谈过类似的事……”

“你有病啊，真是疯了！”

“我没疯。”

“你是疯了。另外……”

“另外什么？”

“真正让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你现在还不能怀疑我。看看你的吃醋把咱俩弄到什么地步啦……”

“不是我吃醋把事情弄到这步田地，说句外交辞令，是你那罕见的行为方式……”

“你真是有病了。”

我固执地说道：“你有情人！”

“这些蠢话我真的听腻了！”她说道，极力不失去冷静。铁板上的鲑鱼等待着加热呢，我突然觉得这是个淫秽而残酷的节目。“你十吗不忘掉你对我干的事情的胡思乱想？或者忘掉用我的资金准备干 的事情的担心‘？你为什么不好好想一想哪个国家可以

给咱俩当安全的避风港？”

“说实话！你欺骗我没有？要是你有情人，就尽管说出来。我不会给你的事情添麻烦的。”我在撒谎，因为如果说过去我排除了与马赛拉离婚的可能性，那么现在，经过诺尔维克湖畔事件之后，我的出路就是紧紧抓住她。杀人犯罪把我俩给变成了同谋犯；只有保持这种关系，才能保证她不检举我。要么是马赛拉跟我在一起，要么是我被迫选择另外的道路、一条真正令人震惊的道路。

“我没有任何情人。”她说，一面离开我，去食品柜里拿橄榄油瓶。“我要是外面有情人，一定会告诉你的。我可不像你！”

“马赛拉，我的事已经过去了，毫无意义了，没有任何意义了……”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承认了我俩一直没有触及的话题。

“那事我已经没有兴趣了。什么女舞蹈演员的故事，我不想听，尤其是现在，咱俩这种状况。”

我惊慌地把一小瓶调料倒进盘子里，放在餐桌上。葡萄酒杯已经摆好了。对，就在这个时候马赛拉知道了我跟女舞蹈演员的暧昧关系。真是难以相信！她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这件事，也不责怪我的冒险活动……

我嘟嘟囔囔地说：“女舞蹈演员的事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

“反正都一样。这事我早就把它给忘记了。”

“可你为什么现在还藏着那些情爱衣物？”

她的瞳仁在闪闪发亮。我感觉她脸色发白了，在费力地寻找有说服力的回答。

“你搜查了我的东西？”

“马赛拉，你听我说！是偶然发现的。问题不是搜查不搜查你的东西，而是那些衣物是干什么用的！那人比我还爱你吗？就因为这个你打算甩掉我？”

“你总是在身体问题上找钥匙,”她注视着鲑鱼,一面用刷子抹油,一面继续说“:你总是操心生殖器的大小,性交的姿势,对方的反应,总是看长短、角度和时间的说明书。行啦,你难道就不明白性交不是什么措施和节奏，而是你能营造什么氛围吗？你真的不可救药了！”

“这番话的意思就是你另有新欢啦？”

“这话的意思就是那些衣物属于一个女朋友的！”

“谁的?”

“跟你没关系!”

“当然有关系!是谁的?”

“一个女朋友要我好好给她保管。”

我突然感到一阵轻松，尽管很有可能这是个出于怜悯而说出的谎言。

“你骗我。”我还在坚持,但口气平静了许多。

“没有骗你。真是女朋友的。我替她保管着。”

“为什么管这个?”

“她有情人，喜欢跟情人见面的时候穿戴上。”

“她是谁？”

“我跟你说过,这是秘密。我不能泄露。”

“是那个古巴女画家吗？”

“不是。”

“行啦！我知道是她。她丈夫比她大得多。她叫巴罗马。我一直觉得她很放荡。是巴罗马，对不对？”

马赛拉喝了一大口葡萄酒，起身，快步上了楼梯。卧室猛烈的关门声使得房屋都震动了。

二十

今天，首先去了中央图书馆，归还了法国中世纪绘画方面的图书以及斯藤汉穆(Stenhmmer)和歇莱克(Gierek)的密纹光盘；随后前往附近一家咖啡馆，它名叫斯特林堡，里面的古老皮椅、斑斑驳驳的地板以及面向斯维阿沃根大街的窗户，都让我感到极为温暖、亲切。中央图书馆大厦是斯德哥尔摩城市建筑的骄傲之一。是上个世纪 20 年代由建筑师阿斯布鲁德设计的，全部涂成黄褐色，中心是个圆筒形建筑，耸立在大厦之上，很像一座观测站。我刚要走进斯特林堡，就听到身后有人叫我。

我转身一看。是个女嬉皮士，黄头发，蓝眼睛，黑睫毛。她身穿一件也是黄色的长大衣；鼻子上有金属环；眉毛上贴着几个小环。

“我不懂瑞典话。”我用英语说明。

“I saw everything(英语 我看见了那件事。)”她喊道。

“What do you say? (英语 你说什么 ?)”

"I saw everything, you pig。(英语 我都看见了,你这头猪。)"

她这几句话吓了我一大跳。我感到早晨的冷空气像匕首一样刺进了我的喉咙。我在这个大巴士和小轿车喧嚣的斯维阿沃根大街上听见的这些话难道是真的？这个嬉皮士女孩究竟看见了什么？我没有时间去查问。说真的，我想的确没有时间去做任何事情了。可是也不能冒险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毫无疑问，这女孩就是诺尔维克湖畔之夜围着篝火聊天的嬉皮士中的一个。

"喝杯咖啡吧？"我指指斯特林堡，发出邀请。

她勉强接受了，但是步伐坚决地走进了咖啡馆。一进门就看见了空桌子，我俩就坐了下来；桌面上有瓶塑料花卉和一个烟灰缸。我要了一份咖啡加牛奶；她要了一份让我吃惊的混合饮料：浓咖啡加葡萄汁。我脱掉了大衣。她解开了大衣的纽扣，里面穿着开领衬衫。几乎是平坦的小小乳房之间的沟渠——她大概有二十岁——让我感到心头一紧。她那白皙而光润的皮肤引起我一阵想摸一摸的冲动。

"你要什么？"我问她。

"钞票。"她骄横地回答道。这是个目光深邃的女子，但是也有朦胧的男子气概，好像大卫(《圣经》中的人物)建立了功勋一样。

"你说你都看见了是指的什么？"

她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卷的香烟，忽然间我觉得像是一支大麻纸烟。她点燃了。从涂抹成黑色的厚嘴唇里吐出一口浓烟后，空气里明显地散发着大麻的气味，她开口道：

"得了吧。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现在咱们不谈全部内容，尤其在这里不能谈。"

"我问心无愧。"我撒了谎，准备一切都豁出去了。

"犯罪的都爱说这句话。"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开始冒汗了。

“要是我跟警察谈谈,你的记忆力就会恢复了。”

女服务员送来了咖啡和葡萄汁。我付了钱，接着迅速而紧张地向大街方向瞥了一眼，好像针对这一讹诈的答案就藏在窗户外面行人的大衣里面，而这些窗户给人的印象是我俩在瑞典农村一座偏僻的茅屋里似的。我缄默不语。她则小口呷着葡萄汁，一面无情地审视着我；那贴着小环的眉毛下面，眼神变得凶狠和野蛮，她的嘴唇和指甲都涂上了黑色。这女孩很像死神。她警觉地坐在那里，像个不安静的小鸟。是的，很有可能她亲眼看到了诺尔维克湖畔之夜的全部情景，否则的话她不会在大街上拦住我的。现在我成了一次讹诈、电影式的讹诈的受害者，尽管我很难理解这是为什么。我鼓起勇气问她：

“咱们说个数目吧!”

“你看着合适就行。”

我猜想她一定急需钞票，数目多少都可以，因为她肯定是个“瘾君子”，所以，在谈价钱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和解的态度。

我掏出一张面值百元的钞票,放在桌子上。她那涂了睫膏的眼睛露出惊讶的神色。我把钞票沿着污渍斑斑的台布推过去。邻桌的几位太太没有礼貌地紧盯着我俩。她快速而准确地伸手抓走了钞票,仿佛一条迅速出击又回防的蛇头。她把钞票一卷,塞进了大衣口袋里。

她神情严肃地声称:“我希望这不是全部。”

“我就有这么多。你以为我是个富翁吗？我是来自拉丁美洲的穷移民。你找错人啦……去过拉丁美洲吗？知道我说的意思吗？”

“差不多吧。”

“那我指的就是这个,就是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古巴、玻利维亚；我们是穷国。我是穷人。明白吗？我是穷鬼。去找个美国佬,或者德国鬼子吧!”

“你是头蠢猪。对不对?”

“嘿,我来这里,可不是让你骂的。明白吗?”

“什么时候再见面?”

“我要出门去旅行,没有时间再见面了。”

“得了吧!你知道就凭着你干的事情,就永远也离不开这个国家了。”

我浑身直打冷战。她说话的神情很严肃,是有道理的。有个女人起身,向柜台上的电话走去。她跟那个煮咖啡的伙计说了几句话,然后拨电话号码。大概是要举报我俩。

“你从臭狗屎一样的国家来到这里。可是现在又不愿意离开这个同样是臭狗屎的国家。”女孩断言道,但是没有挑衅的意思,好像仅仅在描写形势情况的人一样。

“你叫什么名字?”

“伊瓦尔。”

“在瑞典语里伊瓦尔是男子的名字。”

“一样,一样,反正都一样。别人认为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你认为我是男人?”

“你像女人。是个很有魅力的女孩。遗憾的是你这身打扮,因为你长得非常漂亮啊。”

“混蛋,别说了 咱们什么时候见面?”

“我跟你说过了。我得出门。”

她说:“三天后,我在这里等你。多带钱。多多地带钱来!”

我别无选择。再说,我也缺乏必要的冷静来思考和选择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回答。人们一遇到紧急情况,很少能做出正确反应。你没有准备采取行动,这一点我在诺尔维克湖畔住宅里就验证了。我岳父会说,打完仗以后,大家都是将军。

我建议说:“等一下。最好咱们别在这里碰头了。”

看见她那副深深吸烟又缓缓吐出的样子,毫无疑问,她肯定

是个“瘾君子”。那烟的气味是印度大麻,非常独特。要是我不尽快脱身，肯定会被警察抓起来。检察院会控告我贩卖毒品和教唆少女犯罪。我就会落入探长董甘手中。

“为什么你不愿意在这里碰头？”

“因为我如果不能来,你在这里等着,会出麻烦的。要是我不来,你就得自己付账了。”

“那怎么办啊？”

“你在中央图书馆等我。在二层,二层的侧室里等我。那里是存放拉丁美洲文学图书的地方。”

那是个好地方,稳妥,偏僻 如果伊瓦尔言行无礼,我可以较好地驾驭局势的发展。

“你是文学家？”

“我想是的。”

“别臭拽 锐吧 来,还是不来？”这时,她脸上已经没有了丝毫善意的模样。我是她(或者他)手中的猎物,她不先闹明白我是不是答应她的条件，肯定不打算放我走的。

“要是我没来，你就第二天这个钟点再来。这样直到我出现为止。”

“你以为我是傻瓜？”她的眼神令人胆寒。不是那种少女的目光,而是被生活变得冷酷无情的成熟女人的神情。“别开玩笑。”

“我说话当真。我尽快回来,一定回来。”

“带钱吗？”

“带钱。”

“你必须回来。否则的话,我会去你家里。要不然,我就直奔警察局。”

二十一

今天上午我一听见有人敲门，立刻就猜测会不会是伊瓦尔来了。我放下这一章不写，去卧室给马赛拉报信 别到一层来。随后，我一面下楼一面让自己镇定下来。我感觉嬉皮士和警察组成的包围圈正在我俩周围收缩；我俩在事态严重之前要赶快逃走。有些事情你知道要发生，可是你无法避免它的发生。我想眼下就是很早以前某人写好的脚本应该搬上舞台的时刻了，就是决定我俩命运的时刻了。

我一开门，看见的不是伊瓦尔，而是蒙图法尔上校。他身穿大衣，戴手套，没有帽子，面带微笑，脸庞刮得干干净净，洒了香水；他身后是浩瀚无垠、白浪滔天的波罗的海，这个时候突然来访让他很开心。一只乌鸦在树上"哇哇"叫着。

"惊喜是最好的礼物。你没料到我会来吧？"

的确，上校吓了我一跳。我一直以为他身陷圣地亚哥的法律纠纷之中，以为他四处寻找大牌律师，与记忆力惊人的证人们和

铁面无私的法官们对簿公堂呢，至少智利电视台传播的形象就是如此。我绝对没有想到上校能够在欧洲闲逛，因为智利国内对他的指控是很严厉的啊。我请上校进门。送他来的出租车在阴沉的天空下已经远去了。

“你吓了一跳,因为电视看得太多。”他一面脱大衣一面继续说下去。“那些记者能把狗屁大的事情变成闹剧，他们毫无原则可言,从前可没有这种事情。可是,你瞧 我来了。不费吹灰之力。马赛拉呢？”

自从他妻子逝世后，他对马赛拉的父爱与日俱增。父女二人的关系有时是爱和恨的混合物。马赛拉是上校的独生女；但是，我猜测，虽然上校对女儿表示了种种关爱，心里头却很想有个儿子,而不是女儿。儿子可以步父亲的后尘 当军官 可以延续蒙图法尔家族的香火。结果却生下一个“丫头片子”,长大了当上了女演员 如今躲在北欧,跟一个信誉可疑的作家同居。的确,马赛拉这个修女贵族学校里的校花，没有过上她父亲思念的那种生活。但命运就是如此冷漠；我想，蒙图法尔已经预感到自己身后审判的脚步声了，现在也开始觉得生活是不讲逻辑性的，感觉到生活是不愉快,不公正,是多灾多难的,总是让我们摔得鼻青脸肿,总是给我们出难题。

我们走进客厅。我给岳父端来咖啡和点心，放上瓦格纳的音乐，这是上校喜爱的作曲家。他是昨天夜里到达斯德哥尔摩的，下榻在甘拉斯坦大街的外交旅馆。他比上一次看上去强壮，健康，无论如何都不同于那个倒霉的军官：多次走出法庭，多次在电视镜头面前重申自己是无辜的。我猜想，他的出庭和他被一心报复的人们所追捕，都服从一个精心写出的脚本：极力传播这样一个形象：一个老兵,为别人牺牲了,还没察觉出自己的过失。

等到我去通知马赛拉她父亲已经到达时，回来后上校继续说道：“那些人还会搞他们那套运动的。可我的双手是干净的。我

在智利做的一切，都是有原则的，都是根据来自最高命令行事的。不要忘记 那个时候我仅仅是个普通一兵，只能服从命令。但是，我相信司法机关，相信法官不会忘记反对派也不是圣徒。这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这就是他的作风。我很想问他：他曾经为之效力的军政府的最高负责人如今作为退休人员与儿孙生活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而他则面对昨天的敌人的报复，他做何感想？但是，我没敢挑衅。他经常干这种事情：先对某个确定的话题抛出一个声明 随后，不等对方回答，就提出一些改变话题的问题来。这一套可能是在军事学校里学会的，也可能是指挥团队时掌握的。天晓得啦。这样，在争论时就无法把他击败。他认为争论对自己有利就坚持到底；随后，他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就扯到别的话题上去了。

我很难相信蒙图法尔应该对那些指控负责，因为同时他又那样迷恋瓦格纳和古斯塔沃·马勒[1]的音乐，那样喜欢古典家具、历史、拉丁美洲绘画以及礼拜天的弥撒。那里面什么是假的呢？我在开始与马赛拉来往的时候，经常思考这个问题。难道那些政敌的说法是假的？要不然就是他声称的爱好是伪装出来的？到了今天，我倾向于这样的看法：他践踏人权和喜爱艺术的两个侧面，虽然矛盾，却都是真的，都构成这个自我矛盾的人的侧面。只要我有机会跟他在一起，我就悄悄观察他那双洁白的手：修长、细白的手指和精心照料的指甲；于是，我想，这样的手难道杀过人，会打人，会电击过俘虏，或者会把双手捆绑的俘虏从高空飞行的直升机上推下去？

这张面皮能够伪装到这种程度，实在让我惊愕不已。这就如同马赛拉苗条和充满欲望的身体，丝毫没有暴露出对丈夫的背

[1] 古斯塔沃·马勒(1860-1911)，奥地利作曲家。

叛；同样，如同我岳父的这双贵族式的手，丝毫没有暴露这位军政府的前情报局局长犯下的罪行；同样，像我这双当作家的手，丝毫没有暴露出我是杀害维克多·亚辛的凶手。实际上，咱们大家都是这个生活大舞台上的演员；这张面皮是咱们最好的伪装：蒙图法尔上校面对镜头装出痛苦的感觉；马赛拉装出爱丈夫的样子；我则装出一副纯洁无辜的神情。其实，都不是我们的真情实感。而最糟糕的则是：没有接近事实真相的办法，因为本质上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话语以及别人关于我们的话语，而绝对不是我们的真正本质；同样地，我们的人格是无限假面的总合，而根本没有一张终结性的、可以说明问题的面具。也正因为如此，也就不存在坦白可言，因为任何坦白都是装假，都是一张新的、得以维持装假的面具。

“有什么问题啊？”蒙图法尔上校固执地问我，让我退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

此公实在令人吃惊。我一打算改变话题，打算回避他喜欢说的事情，就发现没办法拐弯抹角，因为蒙图法尔总是固执地回到他感兴趣的话题上去，好像马儿非要回到自己喜爱的饮水槽去不可。

“我们有了危机……婚姻危机。”我说，不想用耸人听闻的口气。话一出口，我就感到难堪，因为我确认，仅仅由于蒙图法尔来访的突然性，我已经身不由己被拉到坦白的路上去了。

可是，为时已晚。我已经说出了上面的话。无计可施了。我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岳父通过马赛拉在万里之外就获悉了全部情况。马赛拉敢把自己的偷情活动讲给父亲听吗？我和她在诺尔维克湖畔发生的事也告诉上校了？难道马赛拉把杀人的事告诉一个几十年前杀人或者命令杀人的人，会比较容易些？只要一回想起维克多·亚辛血淋淋地摔倒在地毯上的情景，就足以让我明白，所谓我妻子不忠的话题，此时此刻，已经是次要的了，几乎

是个笑话了；可恰恰是我愿意谈这个话题的啊。

“那个瑞典女人叫什么名字？”蒙图法尔问道。他身穿那套无懈可击的灰色西装、白衬衫、深蓝色的领带以及那永恒的珍珠夹。那模样与他为之效力十七年的皮诺切特将军相同，把满头银发严格地梳向后边。

“什么？什么瑞典女人？”

“那个瑞典女人。她叫什么名字？”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明白。”

“就是你弄到手的小女子。”

他那碧绿的瞳仁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到这个时候，我方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根本没有什么瑞典女人。”

“没有？”

“确切地说是个瑞典男人。”

他有些迷惑，为了争取时间，喝了一口咖啡，然后把杯子和小碟放到沙发扶手上面。这是不在他计划之内的问题。

片刻后，他神情严肃地望着地毯上的阿拉伯图案，说道：“克里斯托瓦，你听我说：男人有了外遇又被老婆发现的时候，男人要负责任。女人有了情人又被丈夫发现了的时候，负责任的还是男人。生活就是这么不公平。这是一个被人用忘恩负义来回报的男人对你说的话。已婚的男人就好像是军人在智利发生的事情一样：永远要担待责任，哪怕反对派被古巴和苏联情人吞进肚子里的时候。”

楼上，洗澡间的门响了，水龙头‘吱吱’在叫，淋浴的水流淌下来了。

“她要下楼了？”

“还得几分钟。”

他又喝起咖啡来，大概很高兴说了那番关于夫妻反目和男

人负责的道理。

“你有那件事情的证据吗？”

“证据，证据，没有；但是有些蛛丝马迹。”

“莫非你自己有毛病？”

“什么？”

“是的，伙计。我指的是你肚子里面是不是状态良好啊？”

“不，不，与肚子毫无关系。”我红着脸回答道，“在这方面，我和马赛拉相处得很好。我想，问题是女人的事情，是感情问题，是某些举动，是她说的我没有能力营造某种氛围……”

他奇怪地望着我。

“氛围？你说什么氛围？”

“是的，氛围。”

“可是，咱们在谈大气变化吗？还是什么别的玩意儿？”

“上校，这里指的是浪漫气氛，是指心灵的颤动，是指感情的变化……”

“到了你这个年龄，别说蠢话了。”他心平气和、毫不做作地声言。楼上，淋浴的水已经停止了。“对女人，就是要关心，要给钱，让她好好管家，满足她各种爱好。其余的事情都是胡说八道，是掩盖真相的作秀，是女权主义者为了那些不满意的妇女们编造的问题。我爷爷常说，对女人就是鞭子加钞票。其余的事情，我说过了：都是胡说八道。你如果既不缺钱也管不住风纪扣，有几个情妇也可以。如果分手，那公司还办不办下去？”

“我们没有说过这个问题。”

“有件事情，我要说清楚：你们的生活想怎么过随你们的便，过日子的事你俩早就成熟了。但是，我不希望你们给公司添麻烦。我已经投入很多钱了，占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既然看来你俩要疏远了，我可不想听见坏消息，因为我已经联系上新的古玩商和艺术商店的老板了。”

马赛拉下楼了。我们听着她踏着楼梯的脚步声。上校起身，解开西装中间的纽扣，整理一下领带上的珍珠夹。我想他还碰了碰鞋跟。

“好了，你已经清楚了。把这里收拾一下，别留下什么残渣，对咱们都没有好处。无论对你还是对我……”

二十二

我出门了，让马赛拉和她父亲留在家中。我去瓦萨博物馆，那是一座木结构的雄伟建筑，位于于什卡登公园，里面完整地保存下来世界海洋史的奇迹之一：瓦萨[1]战争中的大海船,是十七世纪瑞典海军的旗舰与骄傲，它从造船厂离岸二十分钟之后，面对成千上万庆祝它下水典礼的斯德哥尔摩人的注视，竟然沉没在平静如镜的海湾里，吓得人们目瞪口呆。三个世纪以后，经过了不计其数的断送人命（比那次海难中死亡的人多得多）的意外事件，工程师们成功地运用一套气动装置打捞起这艘大海船。波罗的海和梅拉伦湖[2]的水，在瑞典首都眼前汹涌地混做一团，阻挠了那可怕玩笑的闯入，保护了大海船，好像它刚刚离开造船厂似的，仿佛时间停留在首都周围浑浊和冰冷的潮汐里了。

① 瓦萨，瑞典的一个海滨省份。

② 梅拉伦湖，斯德哥尔摩西郊的湖泊。

我喜欢观赏大海船上满怀爱意修复的种种细节：粗短的龙骨，有楼房的一层高；雉堞以及双排大炮布满了铜绿；木制甲板上则满是雕像和贵族的族徽；总而言之，那里处处散发的历史气息让我感到惊讶。再往上去是指挥塔，只有登上五层楼高的阳台才能看见；还有桅杆、高高耸立在博物馆屋顶之上的桅杆，它们与城里的钟楼以及铜制圆顶一争高下。我倚靠在三层甲板的栏杆处，沉浸在寂静和昏暗中，长时间地观察着船头优美的装饰：一头木雕巨狮，定格在非常可怕的一跃之中，这个奋力跳跃的动作不仅让它长长的浓密的棕毛飞舞，而且使得浑身的肌腱和爪子处于紧张状态，这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狮子散发出来的凶猛劲头，让我回想起但丁《地狱篇》里的诗句："我眼前出现了一头雄狮／鬃毛挺直，喉咙冒烟／恐怖得空气都在颤抖……"突然间，我身后有个沙哑的声音说道：

"帕索斯先生，很高兴您能喜欢船只。"

我吃惊地转身去看，本以为自己是冬天上午这个钟点的博物馆里唯一的参观者；结果令人目瞪口呆的是，我居然看见了董甘探长那张孤僻的面孔。他又是一身黑色服装，刹那间让我想起伊瓦尔，想到命运为我安排的可能性，因为探长的出现只能意味着他在为诺尔维克湖畔杀人案在跟踪我。

面对探长的突然出现，我假装有些无动于衷，一面说道：

"这样的宝贝真让人赞不绝口。"

董甘用红衣主教般的表情将双手放在栏杆上。他散发出一种清凉香水的气味。我猜测他胳膊下面夹着一顶哥萨克式的皮帽。

他说："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瓦萨大船。唯一的区别是，尽管您不相信，有人把瓦萨展览出来，有人掩藏起来，或者至少是有意掩藏起来。"

他讲话的回音传遍大船的上上下下；他长了几天的胡须赋

予他一种不拘小节和智慧的样子，颇有魅力。

我说“：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瓦萨一度是瑞典人的最大骄傲，是那个时代最令人赞叹和先进的技术成果。”他进一步明确地介绍说，一面咬咬上嘴唇，浓密的胡须几乎完全遮掩了嘴唇 随后，他补充道“：它刚刚下到波罗的海十五分钟就沉没了。几个世纪过后，它被打捞出来供人们观赏。一个民族用这种形式承认自己的失败，您不觉得应该赞扬吗？”

“探长，我想我刚刚明白了您的话。”

“有些民族宁可忘记自己的失败。”

“瑞典人则愿意正视自己的失败。”

“看来是这样的。不过，就像我对您说过的那样，虽然每个国家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瓦萨沉船事件，可是多数人都企图掩饰真相。可任何托词都是没有意义的啊。帕索斯先生，瓦萨总会浮出水面，完整地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您想过您的瓦萨是什么吗？”

他对托词的影射，并且伴有凶狠的眼神，仿佛那头跳跃的雄狮，让我浑身打颤。他是在暗示嬉皮士们已经把我给举报了吗？或者是他察觉到我隐藏犯罪用品的地方了？我暗暗骂了一声为什么那时自己不敢把东西扔进垃圾箱里呢！说不定，恰恰就在此时此刻，警察正在搜查我的家呢。对于蒙图法尔上校来说，抄家肯定会吓他一大跳，虽说很多人指控他在军事独裁统治下亲自指挥特务搞搜查。仅仅一联想到这样的情景，我就出了一身汗：董甘最后给我戴上手铐，把我从瓦萨船上拉到法庭上去：那些穿长衫、披礼袍、戴礼帽和假发套的金发碧眼的法官们，会判处我无期徒刑。

“多年以前，我在智利参加过一个革命运动组织，我们企图从根本上改变事务的现状。”过了片刻，他继续说道，口气平静，双手仍然放在栏杆上，目光依旧注视着大船；当然，他在影射萨

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府。“可是我们失败了。糟糕的是我们继续隐藏着我们的瓦萨，眼睛里只盯着政敌的失败。”

“探长，您在瑞典呆了多少年了？”我问董甘，大衣口袋里的双手直冒汗。我之所以继续这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对话，仅仅是为了争取时间，为了寻找机会逃走，先到公园浓密的树林里找个藏身之处。

探长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或许因为我突然转换话题而有些厌烦了，他邀请我去博物馆的餐厅喝咖啡。餐厅的大窗户面对一个海湾，古老的木制码头冬季里空无人烟。探长双手插在敞怀的大衣兜里，挺起胸膛走路，露出了微微隆起的腹部，说明他的生活很有几分资产阶级化了，这种生活他在智利阿连德时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但这样就成了流亡生活，如同人们在黄昏时分从飞机上观察夜幕覆盖安第斯山山嘴的情景一样，是渐渐远去的地点和环境，你不再是你，而变成了某种模糊不清、含糊不定、无依无靠的东西了。董甘知道我岳父是什么人吗？而他监视我，是因为他怀疑到我头上了？如果他在跟踪我，那么他是不是注意到今天上午来我家的客人呢？而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个客人是伊瓦尔那个嬉皮士女孩呢。就在我端着咖啡杯向窗户旁边的小桌子走去的时候，路上不小心撞上了一位中年妇女。她像是地中海国家的人，气质高雅。碰撞的结果是咖啡飞溅到托盘里了。她身穿缝制讲究的外套，脖子上系着丝绸头巾，浑身散发着香水气味，戴满了珠宝首饰。我敢发誓：这是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官夫人。她没要我道歉，而是目光恼怒、还有些傲慢地盯了我一眼。这让我想起了智利高高在上的那些人士。随后，她向柜台走去，寻找自己的东西，一面对某些同胞有损国格的作风摇头，一面好像在说“这种人真差劲，什么东西啊？”当我来到董甘等候我的餐桌旁时，一想到日光下我的反应很可能比包围瓦萨的黑影中的表现更加暴露无遗时，立刻浑身直打冷战。我估计，探长已经知道

马赛拉是什么人了，知道我是谁了；我猜测，他已经了解了我的革命历史和变节经过；可能让他生气的是，我们这些人今天居然与从前流亡出来的人们紧密相连了，居然享受着一种相当受尊敬的生活，居然自由自在地漫步在这个批准他避难的国家里了。在这个问题上，流亡者表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不容忍态度，往往最后觉得自己就是这里的主人，以为自己有责任哪怕为这里的缺点辩护，他们完成这个任务的热情之高，远远超出本地居民。

董甘讲述了他在瑞典的生活，他说已经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虽说有些困难，特别是气候方面。经过二十年的流亡生活，他承认，思乡之情越来越淡薄，大概相当于记忆力忘却的速度；他还谈到他认为无法比较的事情：夏天，他驾驶帆船游遍了整个瑞典群岛。看来他是个优秀的帆船手，是个热爱大海、梦想有一天航行到加勒比海去的男子汉，我猜测：他打算访问古巴，那里可是每个左派成员的神话之地。就在探长与我坦诚相见的同时，这让我在一定程度上放下心来，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他对我并不怀疑，他的面孔始终保持沉着、冷静的样子，好像中美洲玛雅工匠巧夺天工地雕刻出的五颜六色的面具一样。但是，让我感到苦恼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董甘恰恰在今天来逛博物馆。是纯粹的偶然，还是在跟踪我？

“探长，您来这里找什么？”

“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

“我会想您在跟踪我。”

他对我说的话并不在意，或者至少装出不在意的神情。

“我经常参观这个地方。这里可以很好地象征警察的使命。”他补充说道，一面注视着空旷码头上一个滑冰的人。“我的任务就是打捞人群里的沉船：瓦萨。”

我的咖啡变得淡而无味了。我试图再次改变话题。

“您不打算回智利？”

“为了什么回去？”他用那摩尔人样的眼睛盯着我，“就为了找个关系好的人帮忙谋得一个职位？就为了离开这个平等、没有偏见的地方？就为了一头钻进一个阶级斗争气氛浓郁而又充满了伪善的世界去？就为了加入到一个只会迫害穷人、拍富人马屁的警察队伍里去？”

毫无疑问，他属于战败的一方，属于觉悟到自己失败的人群，但是他们拒绝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即使董甘心里有股强烈的怨恨之情——怨恨自己的国家——他却仍然是个“职业革命家”，这一点从我认识他开始就猜测出来了，后来法古塞大使也是这样给我介绍的。他对国家的弊端疾恶如仇，可以肯定的是，他主张彻底消灭社会病毒。我猜想，他对我的政治生涯所做的结论肯定是无情的。但是，我用不着为此事担忧，生活就是如此充满了烦恼，而它是在别处、由陌生的人拟定的。此外，就像我岳父说的：整个世界不可能人人愉快。Everybody's darling, nobody's darling。[1]这不是你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事情落到你头上了。这是马赛拉的看法。

“探长，您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就像小说和电影。”他开心地问我，“眼前这个场景，您觉得像什么？”

“像不久前我读过的一部侦探小说，它讲述一个古巴侦探的故事，他定居在智利，眼下来斯德哥尔摩调查一个案件。”

“书名叫什么？”

“《深蓝酒家的约会》，或者类似的名字。一个名叫安布埃罗的作家写的。”

“是前参议员安布埃罗吗？”

“不，他不是前参议员。好像叫罗德里格，或者是拉蒙。有可能是前参议员安布埃罗的儿子或者亲戚。不过都一样。总而言

[1] 英语：人人都是亲爱的，就没有亲爱的了。

之，今天这里发生的一切，很像那部小说里的一个场景。”

他摸摸胡须，并不吃惊地说：“有可能。虽然我喜欢侦探小说，可是没有读过这部作品。智利小说，我知道的很少；总的来说，智利小说非常乏味；作者总是在讲述自己童年受到的伤害，或者伟大的梦想，显然是些智力练习，是只有作者的祖母或者未婚妻才能读到结尾的东西。很抱歉说了这么一些话。不过，我从来也没看过您写的作品。”

他含糊其辞地说完最后这句话，仿佛某人远远地看见——幸亏是远远地——看见了一位过去从来没有亲近过、现在也不愿意说话的老同学一样。我估计，他的结论肯定是令人泄气的。一个写侦探小说的作家总是害怕真警察那注重现实的眼睛。

“探长，您一点也不糊涂，也就用不着担心什么了。如果我是您，有您这番经历，肯定会写出来的。”

“您知道，我的经历不是虚构的。我的事情就是开证书，发消息，写报告，填表格，都是让人讨厌和乏味的活计，都要求做到准确无误，来不得主观臆测。官僚政治在腐蚀警察；警察与电影和小说里讲述的警察事迹没有多大关系。实在令人遗憾啊。”

我调和地说：“也许您离开祖国的年数太多。”

“帕索斯先生，国家也好，个人也好，都没有变化。”看看我已经喝完了咖啡，他说道：“所以二十年我本来会损失的东西也不多。国家不像小说那样，小说应该从头开始。你可以随时迈进智利的国门，总是可以理解那里发生的事情。要么就是你绝对无法理解智利的事情；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或者无论在哪一页，事情都一样，您会说，人们一定会回国的。实际上，智利的一切仍然一如既往，没有变化。那是个木马转盘式的国家。”

“我不明白。”

“很简单，那是个木马转盘式的国家，因为它总是在原地兜圈子。它什么也不学，或者仅仅学了一点点。有时，您以为它前进

的速度很快。原地旋转得再快，又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让人们头晕目眩,可是一下车,您还是在原地没动。”

“我看您喜欢讲哲理……”

“帕索斯先生，这里，在瑞典，事情至少像胡卡斯·哈尔威(Jukkas Jarvi)笔下的冰面那样透亮。我追捕犯罪嫌疑人，不管他们是贫穷的移民，还是流亡在外有影响的政客或者企业家；由司法机关来惩罚他们，不管他是谁。”

“这值得表扬。”

“在那边,在拉丁美洲,您很清楚,司法机关里喊冤和同情的人太多。甚至有给富翁准备的特别监狱，确切地说，是带铁条的旅馆,例如卡布齐诺监狱[1]的附属建筑；例如关押军队罪犯的拘留中心,比如,彭塔监狱。可耻之极。我怎么能捍卫那些东西呢？我怎么能再回到那里去呢？”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董甘是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话让我脸红。但愿他别发觉我窘迫的样子。

“请您百分之百地相信,我对嫌疑犯肯定要一追到底的。”他起身,把空杯子放到托盘上,向柜台走去。我跟随在他身后边,动作笨拙,好像鬼魂缠身一样。“哪怕罪犯藏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他们。我曾经从曼谷、达累斯萨拉姆和乌斯怀亚[2]把罪犯带回来,送上法庭。帕索斯先生,这就是我生活的意义。好啦,不说废话了。我得回总局去了。帕索斯先生，您去过总局吗？”

(1) 卡布齐诺监狱,圣地亚哥的一座监狱。

(2) 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首都;乌斯怀亚,阿根廷一城市。

二十三

与董甘见面之后，我至今也不知道那次相遇是偶然的结果呢，还是他在跟踪我。现在，我利用马赛拉和她父亲在城里观光的机会，躲到最优秀的斯图加特艺术馆在走廊里开设的咖啡厅，因为那里经常有斯德哥尔摩的嬉皮士出现。我急于思考一下发生的一切，需要像下国际象棋那样设想如何挪动棋子。咖啡厅里倘佯着贡萨罗·鲁巴尔卡瓦节奏放纵的钢琴曲，使得咖啡厅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因为在窗户外面,雪花飞舞,寒气逼人,行者匆匆。

我一面喝着葡萄酒，一面在小本上做笔记；我在想手上这部长篇小说中留下的许多空白。比如，我想到，书中的人物从妻子造成的忧虑状态轻而易举地就过渡到了面对警察发现的危险而感到的煎熬中。我还想，伊瓦尔那张少女的美丽面孔仍然在折磨着我，我想起了她那双纯真与傲慢结合的蓝眼睛，想起了她那金色的短发：见习水手的发型，很像箭猪那样耸立的头发，想起了

她那瘦小、没有曲线的身躯大衣上挂着镀金链条和别针,还想起了她那为保守诺尔维克湖畔事件秘密而要钱的挑战神情。萦绕在我脑海里的还有她那涂抹成黑色的厚嘴唇，那隐约露出的年轻乳沟,那早晨起来就对烈酒的依赖,那含糊其辞的神情,那怀疑一切的态度和满嘴的脏话，那直截了当地蔑视一切与她吸毒无关的态度，她唯一渴望的就是毒品。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对付伊瓦尔。在未来我可以活动的时间里,我要去见她,前往中央图书馆旁边的小房间里与她约会,那里收藏着西班牙语图书。没有人会去那个地方的；那里散发着幽静的尘土气息；墙壁上布满了金属书架，上面摆着无人查询的书籍；那里有几把破旧的椅子，尤其有沉沉的寂静，静得令人发憷。下次见面时，我要给伊瓦尔更多的钞票和一瓶烈酒。随后，我会对她说,游戏结束了,你可以随便上哪里去了,可以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但是，别想再从我这里拿一分钱了。她得明白这个道理，忍受这个现实，再回城里当乞丐去。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我对她说话的信心和严厉的态度。

或许更好的方式是用文火熬汤，每个星期给她几块钱和一瓶烈酒，满足她的爱好，以便我争取时间离开瑞典？我竟然落在一个嬉皮士女孩的手里了，真是不可思议，很难相信这个女孩在诺尔维克湖畔夜里会走到住宅前从窗户外面目睹了里面发生的一切。我本以为自己是窥视到那桩事的唯一人物呢，结果同时还有另外的眼睛在监视着我的行动。我是那桩事的参与者，受益的却是另外的看客。所有这一切都在提醒我：马赛拉偷偷在阅读我写出来的事件,我觉得这很有可能。严格地说,你看戏的同时,也会有人看你，观察者同时也是被观察的对象。总而言之，有个情况是明白无误的，想到这里真的吓了一跳，因为一个危险的想法是：我根本不该记笔记；仅仅就是设想一下，也让我出了一身冷汗……事情是明摆着的：只要伊瓦尔活着，她就会不停地敲诈我。

我还想到了卡尔拉，就是那个女舞蹈演员，此前我曾经多次、但是非常简洁、几乎是打电报式地提到过她。在这个小笔记本上，她仍然是个简单的侧影，仍然是个用黑纸剪出的人物形象，那些剪纸人物只能辨认出他们面孔和身条的轮廓；在十八世纪照相技术出现之前，他们享有盛誉。在前面的段落里，卡尔拉从来没有超出我粗心的速写范围；现在我认为这事有些不公平，而且没有说明她对我的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我不准备描写她的体貌特征了，因为我已经感觉到这样作为时已晚；还因为每个读者到了这个时候对她已经有了一个印象。或许我可以说的最重要的是，她对我理解和实践情爱房事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不想把性交与爱情混淆起来的女人为数不多，她可以算其中的一个。这解放了我，引导我在深层次上发挥我的情欲本领，而又没有良心谴责的负担。为性交而性交的存在方式真是妙不可言啊！因为性交结束之后没有任何附加的利益驱动，也没有任何会冲淡气氛的承诺！

“别出洋相！”卡尔拉常常对我如是说。“性交是一回事，爱情是另外一回事。二者没有必要走同一条大街嘛。再说了，只有跟情人性交才味美无比，跟丈夫绝对不可能。”

“你从来没有结婚，怎么会知道跟丈夫不可能快乐呢？”

“是一些结了婚的女友告诉我的。”

十二世纪西班牙有一首歌颂圣母玛利亚的赞美诗，作者是一个名叫穆萨的吟游诗人，他把一个放荡的女人描写成“窈窕、妩媚，但是放荡而缺乏头脑”。卡尔拉窈窕、妩媚、放荡，但是并不缺乏头脑；她似乎已经把头脑用于职业上了，那就是舞蹈；还用在她特别喜爱的癖好上，用她的话就是情爱实践。我不知道用了多少个礼拜才发现她身上另外一个侧面，而一开始我是很难接受的，即她还喜欢玩女人，年轻、有魅力的女人，带点高雅的女人。那时候对她的确既喜欢男人又喜欢女子的做法，我是很难理

解的；让我很难理解的还有，她以百分之百的大方态度解释为什么某些时候喜欢男人、另外一些时候喜欢女子，而有些时候则喜欢 menage a trois[1]。她曾经有一年整的时间，在放荡不羁的贝亚皮斯塔小区，跟一个跳芭蕾舞的女孩生活在一起，那女孩名叫贝阿特里茨，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同居的还有一个阿根廷音乐家，名叫维尔西里奥，长得很帅，很成熟，喜欢夜游，傲慢自负，能像 Coleman Hawkins[2]那样演奏萨克斯管。事情本来进行得很好，直到贝阿特里茨爱上了一个男人，急急忙忙地跑掉了。根据卡尔拉的猜测，那位佛罗伦萨姑娘急忙出走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突然感觉有必要埋葬掉这种杂居生活，而不是突发的对异性的激情。三人同居完结之后，小区里的男女恋也烟消云散了。跟那个阿根廷人在一起，卡尔拉觉得日子变得难熬起来，两人不久就分道扬镳了。

“是的，有些情爱关系仅仅存在于一种宽泛的气候里。”卡尔拉说道，一面完全裸体地望望房间里镜中的侧影。“那是很遗憾的，因为那个阿根廷人是个了不起的音乐家。”

我为什么回忆并且写下所有这些事情呢？那是因为我一直想写出这个我和卡尔拉的故事来。一句话，现在已经用不着继续讲述细节了，任何一位读到这些文字的人，都会明白我要说的话。假如不明白，那就不要再继续阅读这些文字了。你不可能像竹筒倒豆子那样一下子把什么都说出来的。有些事情应该慢慢来办，或者仅仅暗示一下即可。有人有时梦想遇见一位聪明的读者 你还没张口，他已经明白了你要说的事情。此时此刻，我唯一想讲述的事情就是：我和卡尔拉的关系不是因为马赛拉的缘故

(1) 法语 三人同居。

(2) 霍金斯(1904-1969)，美国爵士乐音乐家。由于他即兴演奏次中音萨克斯管的高超技巧，使这种乐器成为爵士乐队中最流行的乐器之一。

而告吹的；马赛拉获悉我的不忠行为，恰恰是卡尔拉本人告诉她的。

大概是在最后一次约会的时候，卡尔拉对我说：“我干吗要跟你兜圈子呢。我一向喜欢直来直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现在就是这样，你听明白了：你和我的事情到此为止吧。我已经又见到了贝阿特里茨。我要跟她生活在一起了。”

我一面回忆往事，一面在这个咖啡厅里写出这些笔记。此时，贡萨罗·鲁巴尔卡瓦的钢琴曲已经被阿巴组合演唱的广为流传的一首歌曲所代替了。尽管外面依然雪花飞舞，行人不停地走来走去，我一定要下定决心摆脱对马赛拉不忠行为的疑心病。当然，这是早应该做的事情：直截了当地去见巴罗马，问她：那些情爱衣物是不是她用的东西。

二十四

我把轿车停在巴罗马家豪宅的前院里。豪宅耸立在里顶格小区的山顶上。从那里可以鸟瞰大海和小岛。一个斯拉夫人长相的妇女在门口迎接我。她大概是清洁女工，担任着里顶格小区里类似博耶娜的角色。我一面想着清洁女工的身份一面跟随她向客厅走去。客厅里有几扇大窗户，有最低纲领派们讲究的家具，有瑞典和拉丁美洲画家的油画；其中最突出的是哥伦比亚画家费尔南多·伯特罗画的肥胖女人：她们穿着游泳裤躺在沙滩上。此外，还有墨西哥著名女画家福里达·卡罗的小型自画像。这两幅作品可是价值连城啊。巴罗马的丈夫比巴罗马大四十岁，是爱立信电子公司的股东，是美国养殖鲟鱼公司的主要合伙人。这个舒适、和谐的环境里的一切，波斯地毯，古斯塔夫[1]风格的斜面镜子，波希米亚生产的玻璃大吊灯，等等，都显露出一个男人的财

[1] 古斯塔夫，瑞典王室。

富。而我仅仅见过他一两次，而且还是在远距离之外。

“哇塞!你怎么来啦 欢迎,欢迎!”巴罗马对我说道,一面夸张地在我面颊两侧各吻了一下。我俩沿着宽大的花岗岩楼梯向楼下走去。下面一层有书房、客房、健身房和桑拿浴室。这一切确实宽敞,设备齐全。她吩咐女仆里斯贝达 给我们上咖啡和点心。

我俩单独呆在这个挂着一半窗帘的地方，室内散发着油彩的气味，周围一片乱糟糟的画笔和颜料罐。窗户外面，可以看到大面积冰冻的海面和长满白桦树林的岛屿。但是，今天上午吸引我来这里的，不是这个画室，不是这个有高尔夫球洞的地方，也不是窗外的自然景观，而是这个二十五岁的黑白混血美人（几乎是绝色佳人）健美的身材,亮丽的面庞,很像意大利莫迪里亚纳地区的妇女 她只穿着一件白色睡衣,肥大,但是很短,显露出了大腿根和丰满的乳房。很久以前，大概是从我发现马赛拉的情爱衣物以来，一直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强烈的突发欲望所诱惑。近来,我在和马赛拉做爱的时候(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我的行为更多的是受这样动机的驱使：骚扰和破坏她同情人的秘密关系。但是，现在一股所向披靡的隐秘感情，由于这个几乎裸露的身躯而引发出难以控制的情绪，而且是在这样孤男寡女的亲密空间里。

“海北[1]在新加坡。”巴罗马这样一说更加强调了我俩单独相处的微妙关系。“是生意上的事情。他要在那里逗留整整一个星期呢。”

她在后脑勺上梳了一个西红柿状的发型，但是有两绺头发耷拉在那张令人着迷的美丽面庞两侧。她那漂亮的杏仁眼和秀气的鼻子让我感到心慌意乱。我平躺在一张牛皮制成的chaise—longue[2]上，这是科比西埃设计的。她则把画笔放进装有

(1 海北,巴罗马的男人。

(2 法语 躺椅。

稀释液的瓶子里。我正要为我的突然造访表示歉意的时候，她回答说，她只要给三脚架上那幅画最后来上几笔就可以完工了。可是，我只能看见三脚架的背面。

“请原谅我没有给你看画。是根据《圣经》里的传说画的。这幅画准备送给瓦伦贝里家族[1]的一位朋友，他非常热爱古巴。”她解释道。我心里在想着多里安·格雷(Dorian Gray)第一次去巴西里奥画室的情景，他觉得浑身都被那位画家吸引了。“马赛拉好吗？我好久没有见到她了。那个讨厌鬼失踪了。”

“今天她跟她父亲在一起。”

“在智利？”

“不是，不是。在斯德哥尔摩。”

“上校又来啦？他怎么样？可怜的老头，已经有一把年纪了。”

“你是知道的，他仍然拿养老金，仍然给什么公司当顾问，做买卖。另外，这样那样的诉讼还没有结案……”

“可怜的人，尽管上了岁数，那些变态狂还是不让他过安静日子。”

我听着她这番话，相信她不会讲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坏话。作画之余，她喜欢的活动之一就是发表演说。人们传说，她丈夫在古巴旅游业也有投资。几年前，他在古巴认识了巴罗马，那是一次商务旅行；卡斯特罗亲自为他开路，让他把这个女人带到了斯德哥尔摩。据说，巴罗马在哈瓦那从事绘画工作，但是也当过高级暗娼。那个行当，马赛拉有段时间也想试一试，在那些穷岛上，做这个行当的人是相当普遍的。但是，现在我脑海里回荡的是她那句话：“马赛拉失踪了。”对于这个古巴女人来说，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几天？几星期？几个月？女仆里

[1] 其中的劳乌尔是个传奇人物，是瑞典商人和外交官，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营救过大量的犹太人。1945 年 1 月被苏联红军逮捕，后神秘失踪。

斯贝达悄悄走进了画室，手里端着一个银制托盘，上面摆着咖啡杯子和装有巧克力饼干的小碟；她把托盘放在桌子上。离开时，她眼神像同谋犯，一副拉皮条的表情。这样就更强调了我和巴罗马的亲密关系"；亲密"二字刺激了我，让我的腹部产生抓痒的感觉；尤其是眼下，巴罗马坐在地毯上，双腿交叉，展示着她那光亮和结实的肌肉；围裙仅仅遮盖住两腿间的一小部分，即年轻、肯定芬香和湿润的性器官。真想伸手摸上一摸。我怀着异想天开的快活心情和一点骄横的态度欣赏着她；我努力想象她跟丈夫性交时的情景。丈夫比她大四十岁，几乎是她年龄的三倍，大概在床上无法满足她的全部需要。我想，马赛拉暗示我：有情人的是巴罗马，这不是撒谎。我可以想象出她仰卧在这张地毯上的模样：奉献出丰满的乳房和鲜嫩的嘴唇，半张半闭着眼睛和急促地呼吸，忍耐着丈夫那长满老人斑的双手和干瘪的嘴巴游走在她美妙的躯体上。忍耐就是她的责任，哪怕她随后去找情人，哪怕为情人穿上那些我在马赛拉手袋里发现的情爱衣物。是的，我想象得出来：巴罗马会顺从地接受这个瑞典丈夫在她年轻、鲜美和丰满的身体上行使权力；这美妙的胴体是从遥远的加勒比地区运来满足他老年人的幻想的。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她问我，一面递过来一杯冒热气的咖啡。

"我在写一部爱情题材的长篇小说。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的意见？"

"我一写女人的事情，就发觉我对你们知道的太少。这很奇怪。你整天想征服女人，可是从来不能真正了解她们。"

"那么你想要我帮助你。"

"至少给这本书出出主意……"

她微微一笑，笑容让她张开了嘴巴，露出了洁白如玉的牙齿和健康的牙龈。我意识到我的借口弱不禁风，甚至滑稽可笑。但

是，她好像接受了这个借口。也许她需要暂时休息片刻，或者厌倦了绘画，而我的来访可以让她消遣一下。她说，我重视她的意见并且以为她是爱情方面的专家，这让她很高兴；她提醒说，在这个问题我的确错了，因为爱情是一道谁也躲不过去的门槛，不可能只当玩家或者看客。

“小伙子，爱情是浪漫派诗人的发明。”她严肃地补充说“就是那些诗人让咱们沾染上了一个狗屁思想：某种像爱情一样昙花一现的玩意是不朽的。扔掉这些愚蠢的想法吧！没有人会一辈子只爱他（或者她）的伴侣的；最多爱上一两个月或者一两年而已；随后确立的就是常规啦。”

“你把爱情简化为激情了。”我反驳她的看法。不知道我能不能抓住某个时刻问她我发现的那些情爱衣物以及说明我来她画室的原因。

“我的孩子，爱情是假正经编造的委婉说法，目的是给激情命名并且控制激情。你没看见人们害怕肉体吗？人们害怕肉体纯粹和粗鲁的吸引。这股吸引力能点燃你的全身，能让你熄灭怒火，能让任何人立刻抛弃丈夫、甚至子女而私奔。”

“那么爱情就是假正经了？”

“对。,,

“那么此时此刻你对海北的感觉如何？”

面对这个不怀好意的问题，她惊讶地瞥了我一眼。我也吓了一跳。我甚至没有及时察觉自己的问话。她把杯子放在地毯上，收拢双腿，用两臂抱住，下巴颏支在膝盖上，让我又一次看见了她漂亮的大腿。她问我：“你要的答案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小说？”

“为了小说。”

“我猜想你觉得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不可能热恋上一个大老头子。我可以被一个岁数大的男人吸引，可以在许多方面感到

满意；但是，事情更多地还是围绕我对某人的钦佩进行的，这是一种感激之情,因为他给你提供了保护、关爱、镇静和理解,这些都是我同龄的小伙子绝对办不到的。”

“别的方面呢？”

她理解了我的问题，知道我说的是性交，是赤裸裸的粗野性交，是她谈及的性交，肯定是她那年轻、充满欲望的肉体要求的性交。

“生活里不可能一切都有。”她解释说,一面伸出双臂,指指这宽敞、舒适的房间,口气是认命的。

她的话至少告诉我有个裂缝。我可以钻进去，前景喜人，因为能让我继续探索秘密。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忘记了是我杀掉了那个俄国人，仿佛这与巴罗马的独处、这通过话语和讲述可以缩短的近距离、这近距离可能会让我俩甚至干出我强烈渴望干的事情，就是脱掉她的睡衣、那里面没穿内裤、就在牛皮躺椅上做爱并且设法让她讲出关于马赛拉的全部真相，仿佛这与巴罗马的独处消灭了我危险的生存处境。但是，现在巴罗马把话题拓展到自己的哲学上去了，她重复说：文学和电影都是骗人的，都要人们相信爱情只有一种，是永恒的，忘记了爱情是多样的和短暂的；人们的错误在于试图在真正任性和暂时的冲动上确立一个永久性的标准样板。我于是想起了博耶娜，想起了她那关于爱情是永恒的信念，永恒的爱情仅仅就是正确地选择对象，因为对象、就是那个被真正爱情选中的人，可能早就印刷在我们的基因里了，好像印制在底版上一样。在博耶娜看来，只要你按照上帝的启示找到了我们基因要求的那个人，那么永恒的爱情就诞生了，其余的男女关系仅仅是你应该放弃的过眼烟云，都是海市蜃楼。

“你有情人吗？”我问她,感觉我的双脚踏进了冰冷的污泥浊水中了。

她无精打采地一笑，说道："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太相信一个女画家的话。"

"我原来以为你会说别十分相信女演员的话。女演员就是从事装假，从事伪装工作的人，她们一辈子都在伪装。那是一种永远作假的行当。"

"我已经猜想出来你是怎么想象自己的妻子了。"

"好啦，归根到底，她是个戏子。"

"画家更坏。他们差不多都为国王和王子服务，为保护人或者大企业家效力，都是受人之托、取悦他人和领取酬劳才绘画的。我不大相信历史上提出的什么现实主义。无论委拉斯盖斯[1]还是伦勃朗[2]都没有向我们真正展示他们笔下人的真相。他们的全部作品都是作戏，都是向委托他们画画的人的自我感觉的纯粹让步。"

这番话让我想起了尼采。这位大哲学家说，不存在事实，只有阐释我本想继续聆听巴罗马的理论思考，但是我来这里不是做文艺理论研讨的，而是来弄明白我老婆变化的秘密。

"告诉我，你真的有情人？"我固执地追问道，带有一点绝望的口气。要想弄清楚马赛拉的真相就取决于巴罗马的真心回答了。

"行啦。克里斯托瓦，你是谁呀？就连海北都不问我这种问题。"她开始自卫了，因为意识到我已经走得太远了。

"海北不问你这种问题，是因为他知道你的回答会破坏夫妻关系。巴罗马，任何关系都需要谎言来维持生存。可是，你要是说出来的话，不会影响你和海北的生活，而是能够充实我的作品。"

"你是个大坏蛋。"她微笑着说道，一面侧身躺在地毯上，沾

(1) 委拉斯盖斯，西班牙大画家。

(2) 伦勃朗，荷兰大画家。

满颜料的围裙下面，一侧的胯骨有力地突出起来。

“有没有啊？”

“小伙子,这可是绝密的。你根本不该问这个问题。这话你怎么不去问马赛拉啊？你是害怕吗？”

我发觉她的眼神里有一丝恶意的闪光，好像知道什么我不清楚的事情。她支吾搪塞的口气说明的确有情人；她这娇好的身躯可并不是仅仅留给丈夫享受的，而且还有别的男人，肯定是年轻的男子也占有她。

我回答说“:我不害怕。但是,她肯定不会回答的。”

“那我为什么就应该回答呢？”

“因为回答以后不会对你我有任何实际上的后果。就是说，答案仅仅用到我的作品里而已。”

她笑了，说道：“就在海北决定永远不再问我性爱幻想的问题的当天，我和他的关系就垮台了。”

“也许是性爱幻想毁坏了夫妻关系。”我评论说,同时我的想象力开始狂奔起来，心里描绘着如此热气腾腾的场面：巴罗马光裸着身体出现在虚拟气氛的男女中间。“性爱幻想一定非常有力量。”

“可那毕竟是幻想啊。”她泄气地争辩道。“他天真地以为如果我俩不再谈论我的性爱幻想，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幻想也就不存在了。你从什么时候就不再询问马赛拉性爱幻想的事了？”

她这个问题吓得我心惊肉跳，首先是因为问题突如其来的性质，这可能夺走我在谈话里的主动权；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涉及到一个近年来我已经忽略了的话题。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已经不是杰出的了吗？是因为我想马赛拉不抱有秘密的幻想，或者仅仅因为我害怕面对她的幻想？有相当数量的男女，其中一方常常宁肯无视问题的存在，以为随着时间的消失对方性压抑欲就消失了。我从什么时候起就不问马赛拉所有这些

问题了呢？现在我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虽说并非咬文嚼字。很早以前，马赛拉就不和我说心里话了；在推心置腹这一点上，我和她已经形同路人了。

“你告诉我一件事。”我说道，有意改变话题，尽管我知道巴罗马意识到了我回避问题的理由。“你跟你情人幽会的时候，用特别的情爱衣物吗？”

“特别的情爱衣物？”她开心地笑了，相信自己现在是可以改变问题的主人了，想往哪里改变就向哪里改变。

“我说的是你是不是给情人存着某种特别的衣物……什么特别的加热内衣……”

“克里斯托瓦，难道你一直住在丛林里吗。”她用怀疑的口气、兴致不错地断言道：“这种衣物如今商店里都有专门的部门出售了。”

“我说的是更具挑逗性的用品，就像三级片电影里女演员的衣物那样……”

她大声笑起来了，为了打破我俩身体接触的魔力，她起身，从瓶子里拿出一支画笔，准备在那张画稿上重新工作。我对那张画稿如同我对妻子的爱情生活一样感到陌生。我想自己大概是犯了错误，是撕毁了密码本，是破坏了什么规矩。

“要是我有情人而他也喜欢我使用什么提高格调的衣物，那么不会给我的生活添什么麻烦的。”她在三脚架的画布另外一侧回答道。三脚架把她和我分隔开来，似乎是强调我俩之间应该存在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在丈夫和情人面前使用那些衣物的。我干吗非得傻乎乎地冒险让海北发现我有那些衣物呢？”

二十五

巴罗马不知不觉就背叛了马赛拉，她落入了我布置的陷阱而没有觉察；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她在我俩谈话的某个时刻发觉我实际上在寻找马赛拉的生活细节，而不是她巴罗马的；她还发觉那些情况不是写小说的需要，而是实际行动的需要，同时我在这部小说里正在描述着这个实际情况。如果巴罗马有情人（对此，我坚信不移），而情人又迷恋情爱衣物，那么她会毫无拘束地在他和她年老的丈夫面前使用这些东西，这是用来欺骗的绝妙战术。换句话说，这隐藏衣物并不是巴罗马的问题。这是马赛拉缺乏的简单手段，结果把马赛拉暴露在我面前，最后造出来占据我脑海的噩梦，从博耶娜告诉我邻居妻子之死那天起，这个噩梦就挥之不去。那时我是怎么描写那个时刻的？在笔记本的第一章里是这样说的“一星期前，我邻居的妻子死了。可是直到今天我才知道。”

到此前为止，我觉得世界还是完整无缺的，没有断口的；此

前，我是个心满意足的作家，是通过写作当上的作家，但是个天真汉。一个小说家绝对不应该是个天真汉。我甚至见过这样的同行，他们预先就打算寻花问柳，仅仅为的是能够逼真地写出什么是不忠的行为以及简洁而下流、隐蔽而不择手段的形式来，但是这些形式一定要大胆和与谎言为伍，不可能通过作家的想象力来虚构，因为这种想象力是为了生存而像一个严肃的蜘蛛那样劳作的。在此之前，在这一页之前，我认为自己是个幸运儿。死神尽管很坏，却躲开了，改变了方向，去马尔库斯·艾里阿松家了。我如果不是现在钻进了牛角尖，本可以仅仅为了活着而感到庆幸。正如蒙图法尔上校所说，这就是生活：事情发生了，它是不遵循法律而发生的。即使在屏幕上我敲打键盘退回到小说开头去，如同录音机按动倒退键那样，那也丝毫改变不了事实。哪怕重新写这些章节也不行。令人震惊的是，我可以退回到第十三章去，退回到那些可怕的段落里去：我使得亚辛重伤致死；我可以沉浸在那些文字里，重新体验我曾经感受到的一切。但是，我缺乏再版那些章节的本领；我没有办法在那天不去驾车跟踪马赛拉和那个俄国人，结果一直追到诺尔维克湖畔。我不可能阻止杀人的事情发生。现在，我明白了：真实与虚构之间不存在准确的界限；真实与虚构仅仅是对某些人在特定时刻发生的事件的解释。区别不在于解释的内容，因为内容包括全部可能的选择，包括一切存在的选择，包括全部可以想象出来的舞台；区别在于这样的事实：那些解释出来的一种说法是不可逆转的。而这个唯一不可逆转的说法就是真实。只有当你辨认出这一真实并且证实了它那该死的不可逆转性的时候，原因就是你能肯定自己正在面对事物无情的阐释，而其余的一切都是虚构的。如果说有什么能区别真实和虚构的话，那是因为真实是彻底的，它拒绝改正风格。

我行驶在斯德哥尔摩大街上，思考着所有这些问题，心里想：如果我和马赛拉想要躲开监狱，那么就应该尽早离开瑞典；

因为董甘的包围圈——伊瓦尔的包围圈也一样——每时每刻在缩小。我把筋疲力尽的轿车停在市中心的一条街上，步行在商店和咖啡馆里，消磨时光。突然，我脑海里回忆起来一首多年前阅读过的西班牙中世纪的诗歌，虽然有些模糊不清了；诗歌的题目是《兰达里克的谣曲》。现在，这个一味不忠的女王和被她欺骗的国王的故事，我已经完整地回忆起来了。这是一首抒情诗，充满了柔情和质朴，第一次阅读时我浑身毛骨悚然。但是，今天这首诗让我感到心酸，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描绘出我身处的时刻：骗局被发现，写作被中断。“国王为了清晨回家／没有通告王后，就进了家门／为的是让她惊喜／她没有料到／这时她已经起床，正在洗脸／正在望着镜子里没有梳理的头发／国王用一把扇骨戳戳女王／她发觉后以为是情人来临／非常献媚地喊了一声：心肝，兰达里克／好心的国王以为自己听错，困惑不已／王后回头一看，满面通红／国王一言不发，转身离去……”王后因为背叛丈夫而被斩首；我估计，她的情人也以同样的方式死去。他自己的舌头背叛了王后。大概马赛拉就是女王，而我就是国王；兰达里克是个陌生人。将来马赛拉会告诉我她情人是谁吗？还是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她已经不再爱我；我不得不容忍她的感情对我是个禁区？五点整，我走进歌剧院咖啡厅，这里是瑞典烹饪术的圣殿，宽敞而华美，属于德国的青年艺术风格，这让蒙图法尔上校着迷；眼下咖啡厅如同每天这个时候一样，迎接着尊贵的客人们。父亲和女儿占据着一张小餐桌。我一面走过去一面猜测：马赛拉已经说出了我俩关系直线下滑的情形以及维克多·亚辛死于我俩手中的经过。

“我们来早了，外面太冷了，不适合散步。”我的岳父说明道，因为他发觉我看到他和马赛拉面前摆着的空盘子而露出了吃惊的神色。他穿着无懈可击的蓝色西装，打着绣有玫瑰花朵的灰色领带，用夹子别着。他眼睛里闪烁着有伪装成分的乐呵呵的神

情。在这种下令杀人的人身上，目光里总有某种难以消失的东西，某种傲慢无礼、厚颜无耻的东西，那是一辈子都会挂在面相上的。

“我是在一家书店里找到这本书的,价钱不错。”他指指一部厚厚的艺术著作。“十七和十八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绘画界最优秀的东西全包含在里面了。你呢？到什么地方去了？”

“给我正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搜集资料。”我回答道,一面翻阅着那本书。

“你写东西是根据真事呢,还是纯粹想象？”

“上校，小说总是把真事和想象混杂在一起的。我现在写的这一部是明显的杂拌。”

“我一直闹不明白小说是怎么写成功的。你瞧瞧我这个想法。你是先有一个想法呢，还是先有故事情节？究竟是怎么回事？”

“最好还是你点菜吧。”马赛拉这时插话进来,帮助我摆脱了这个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

跑堂的拿了单子走了。我刚刚确认了歌剧院里今天弥漫着一种特别沸腾的气氛，仿佛今天是星期五似的，全城好像因为又一个周末的临近而高兴起来了。这个地方有些传统的东西：玻璃吊灯、厚重的帷幕、舒适的木椅,好像一个欢送会。忽然,我心中不安地想到，或许所有这些都过去之后，如果我能生活在别的地方，我会想念这座城市的某些地方和街道，想念它那宽敞、整齐的公园、市中心慢条斯理的节奏、秋日那如同天鹅绒般的琥珀色光线，还有夏季早晨那明亮、清新和一览无遗的阳光，让湖水和和海水像水银一样习习生辉。将来再来怀念这些，恐怕为时已晚；因为事情早已经有了不可逆转的性质；甚至，就在这个咖啡厅里，就在我妻子和岳父身边，这个怀念的时刻已经永远消失在我们称之为‘过去’的胡同里了。

我很快发觉，蒙图法尔上校喜欢这个地方无忧无虑的气氛，它弥漫在吃喝、聊天的瑞典人周围。这种挤满人群、散发着新鲜点心和咖啡的地方让上校开心。原因大概是在圣地亚哥他躲避公共场所，因为害怕过去的敌人会伤害他。大部分时间，他是在老同志家里、军营或者专门的俱乐部里度过的；他在这些地方可以吃喝玩乐，似乎是要忘却这样的可能性：突然有人伸手把他从舒适的退休生活里揪走了。过去，我曾经问过上校是否并不担心左派指挥部会派遣人来杀害他。上校回答说：“我这个年龄除去等死，还能等什么？在床上老死或者死于癌症岂不更糟糕。我宁愿让人杀掉。那他们就把我给变成烈士了。”这番话让我想起一个名叫查尔科·德·桑格雷[1]的古巴革命检察官说的话，这几天他就在圣地亚哥。上校和检察官虽然过去为互相敌对的政权效力，但是都在完成同样的工作，都宣誓绝对效忠自己的政权，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这些惊人的吻合之处使得我在想：两人是不是曾经在商场相遇，是不是在某个外交招待会上握手而不知道对方几十年前是做什么的，是不是像两个天真的老汉礼貌地寒暄，而同时漫步在同一个公园里。我注意观察上校那光洁和发红的面孔、那英国钢琴家式的双手、那有教养的手势，虽然有些紧张，却让我明显感觉到他与古巴检察官惊人的相似之处。是的，上校和检察官只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而已。

当我发现上校和我妻子长时间注意着我的眼神并且等待着答案的时候，我便对上校这样说道：“一开始有个大概的想法，随后具体化为情节和许多场景。”

上校问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灵感吗？”

“我从来不知道灵感是什么意思。”

“马赛拉正在告诉我，生意不错，这让我很高兴。”上校过了

① 意思是“血海”。

片刻后这样说道。这表明他对我写的东西并不真的感兴趣，尽管他作为军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类似的活动中度过的：一再针对邻国或者部分国民营造假设的战场，建造在巴拿马美国军校里教育军人做的东西。“马赛拉还告诉我，你们打算搬家。这事我赞成，因为这里的气候对你们的健康不利。只有北欧人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根据我的观察，上校不准备干涉我俩的感情危机。我想，他只对事情的原由感兴趣。像他这种人，多年来以探听别人的事情为生，肯定会对自己独生女的变化感到好奇。但是，现在他把话题集中在生意上，这本身就可能意味着马赛拉已经向父亲坦白自己有了情人，或者暗示她父亲我疯了。可是，他对我俩未来计划的了解——尽管作为真正具体的计划是并不存在的——说明，马赛拉已经把诺尔维克湖畔事件告诉她父亲了。于是，我又重新提出了那个老问题：一个有着上校这样阴险历史的父亲能够向一个犯有过失杀人罪的女儿提出什么劝告呢？劝告女儿自首，还是逃之夭夭？

“如果你俩要走，就要消除银行的账户，别留下债务，交纳税款。不要通知任何人。尤其是你俩还准备长期过隐姓埋名的生活呢。银行、债主和税收部门是世界上最无情的追踪者，是唯一不会忘却和饶恕别人的人们。既然现在你俩已经明白了，那就别留下蛛丝马迹。千万小心谨慎。”

上校怀着满腔智慧和热情说了这番话，毫无疑问表明了他也要帮助我的愿望。我有时这样想：上校不能担当一切过错，是环境和他的上司驱使他做了那些事情，或者是左派说的那是他干的事情。假如上校不是生活在皮诺切特时代，而是生活在另一个革命国度，他会扮演什么角色呢？我这样想，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上校。他或许也能当上一名革命检察官，就像‘血海’那样。那位检察官在60年代负责枪毙成百上千的反革命分子，他曾经接

受智利记者的采访，承认每天夜里睡眠良好，没有因为下令杀人而感到良心的谴责 他说，每天上午，一面抚摸着孙子们的脑袋，一面朗诵西班牙抒情诗人贝克尔的作品，还给妻子送鲜花。可以肯定如果上校真的当上了一名革命检察官，年轻时代的我会热烈鼓掌的。总而言之，每个政权都需要自己的蒙图法尔上校和自己的' 血海 '检察官。极端主义者会说，这是社会发展规律。就是这种人，他们从事肮脏的工作，为的是让别人双手干净地登上主席台，去发表演说，为开幕式剪彩，制定伟大的目标。这是分工问题 我想，说到底，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

" 爸爸，您别担心。"马赛拉极力安慰上校。" 这个我们很清楚。我们会把应该交的钱都交上。我们不会说离开的事情，更不会说去什么地方。 "

" 克里斯托瓦，你已经知道了 别在这里摔盘子 也别在任何地方撂挑子！好好保护咱们的成果。记住：不要自毁家园。 "

二十六

今天上午蒙图法尔上校起程前往巴塞罗那。昨天下午，上校在歌剧院咖啡厅与我告别时，丝毫没有提及他到达时我说给他的事情。我也没能来得及详细告诉上校关于马赛拉的情爱衣物，更没有告诉上校我跟巴罗马谈话里暴露出来的问题。上校乘今天第一架航班走了，带走了女儿的秘密，留给我两条建议，以便离开瑞典时不要引起怀疑。我凭直觉感到，今后不会再见到上校了，或者仅仅能从电视上看到他了，就是他回到智利以后，要在法庭上，面对因政治原因失踪和被害者的家属们的指控。

“别忘记咱们的生意给你的许多好处以及将来可能给你的更多好处。”他站在咖啡厅的门口，紧紧握住我的手，坚持他搞好生意的看法；他坚信他的敌人要把他关进监狱的打算是办不到的。“别撂挑子！你会看到咱们大家的企业能让马赛拉重登舞台；能让你继续写作。只要办好咱们的公司，一切都有；没了公司，一切全无。记住这话。”

我又在想：说爱情有错是否恰当，或者是否就应该简单服从爱情的力量，抹掉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呢？怎么鬼使神差我就爱上了马赛拉呢？莫非我是爱上了她的形象，而不是她的人品？爱上了一个美丽又有见识、独立而又时髦的拉丁美洲女孩？那时她在巴黎机场咖啡厅阅读一本书，而且她与我讨厌并且反对的政权保持着密切联系。难道我爱上了一个高雅而聪明的女性，就因为她凭借个人好恶而削弱并且压倒了我过去想象出来代表独裁统治的形象吗？难道我爱上她就因为那时我需要一张亲切的面孔，以便对付智利另外的嘴脸、那个我既恨又怕的国家？我痛恨它对人权的践踏，可同时又钦佩它振兴国家的能力，因为多年前它已经走到了臭不可闻的地步。难道不正是通过马赛拉我才在不知不觉中穿过大桥向敌人走去，为的是在敌人心脏里建造起一个虚拟、统一、和谐、不会窝藏——不为左派，也不为右派——假、恶、丑的东西、罪恶和仇恨的国家吗？而实际上，智利真的一度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

我翻一翻今天的《每日新闻报》，这是我去于什霍姆小区中心买的报纸。在里面的版面上，我发现了俄国人亚辛被杀的短讯。我早就盘算过，当然很天真，认为这个案子已经被遗忘了。可是，我看到，事态在恶化；警察声称抓住了一群经常在索伦蒂纳城聚会的嬉皮士，该城就在诺尔维克湖畔。警方认为他们是杀害俄国人的嫌疑犯。警方以为死者是被一个年轻姑娘欺骗了，目前他们还不能确认那姑娘是谁。那姑娘可能为死者提供色情服务，目的是进入住宅，然后为其他的同伙开路。那姑娘肯定是伊瓦尔，这是没有疑问的，应该是她。这个消息的确震动了我。如果伊瓦尔落入警察之手并且指控她有罪，那么她很快就会检举我。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下面我会说明；由于警方还没有查出亚辛有什么特别的活动而且他手里有俄式武器，这些事实就支持了如下的看法：这是黑手党之间的算账。瑞典人早就一致认

为，俄国黑手党比意大利黑手党还要血腥和狠毒，虽说从来不像阿尔巴尼亚黑手党那样居心险恶。《快讯》,一份专门报道动乱和凶杀的、追求耸人听闻消息的晚报，补充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内容：根据黑社会内的情报，亚辛生前在找一个用乌依伏莱多·兰的赝品欺骗了他的人，这幅画——还有其他一些作品—— 后来在亚辛下榻的大旅馆里被发现了。恰恰是这幅赝品会留下线索和手印，最后会牵连到我俩头上。

最后，在一篇专栏文章里，这家可恶的报纸说出了本该从开始就说出来的话：由于证据不足，那群年轻人已经被释放了。这样就能说明关于黑手党之间算账的猜测更加牢固可信了。总而言之，警察以为手机是偷来的，或者是黑手党之间的算账，都会让我俩松一口气。警方目前没有怀疑我俩。《每日新闻报》则比较温和、谨慎,它解释说 诺尔维克湖畔的居民们回忆说,除去嬉皮士聚会之外，不记得看见什么住宅附近有可疑的犯罪活动。住宅的主人，一位名叫斯特温斯的退休职员，由于被卷入了这样可悲的事件而生气,他强调说,每年冬季都出租这所住宅,仅此而已，他本人则去西班牙躲开瑞典的寒冬。租赁房屋的中介人则极力维护自己的声誉，大肆宣称：他的任务就是拉来殷实、可靠的客户 起初,维克多·亚辛似乎都具备上述条件。

别的情况就没有了。我非常希望见到伊瓦尔。为此，我就必须跑一趟斯德哥尔摩。可是一看手表，已经太晚了。即使伊瓦尔去赴约会，大概已经走了。她不像是个对文学感兴趣的姑娘。

我找到伊比里安美洲广播电台的频道。播音员对世界大事漠不关心,只广播探戈舞曲、笑话和占卜未来。在南方广播电台，一个阿根廷人用颤抖和激动的声音宣告：社会主义在全球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他还顺便警告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组织，由于该组织在欧洲面对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后退，将会受到地狱般的惩罚。没有什么消息是与我有关系的。

事情正在慢慢走上新方向，应该谨慎地适应这个变化。马赛拉遵照父亲的指示，将会以更大的干劲从事自己的商业活动，同时特别小心地在为撤退做准备工作，小心翼翼地抹去可能暴露去向的痕迹。现在，她坚信自己完全可以在别的地方从零开始进行艺术品和古玩的生意。我趁机提醒她：别把一切关系都抛掉；别干买卖赝品的勾当了。但是，她不理睬我。现在，我推测 这恰恰是最来钱的生意，蒙图法尔上校是了解这一点的，而且在操纵和鼓励这种买卖。总而言之，尽管我俩的关系似乎彻底地冷却了，甚至有时变得难以忍受，我仍然努力保持镇定，耐心行事 否则的话，我会有这样的危险：马赛拉可能沮丧，可能受事情和父亲离去的影响，感到惊恐，最后向警察坦白交代了一切。

“ 对那些东西你不要耿耿于怀。”第二天，她站在洗澡间的镜子面前一面梳妆打扮一面对我说道。她这是要去市中心赴约会。看上去，她的确漂亮而又难以接近。

“ 我不明白你指的什么事情。 ”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我只想执行与上校达成的协议：与他女儿维持夫妻关系，哪怕这婚姻已经明显地无可挽回了。如果分手，至少达成一个协定：两人保证永远对发生的事情保密。如果我俩能够保密并且在可能被捕时做到攻守同盟，那么就可以嘲笑国际刑警了。

“ 我想你是主次颠倒了。”她温和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一面在嘴唇上涂抹深红色的唇膏。这提醒了我：明天我应该去看看伊瓦尔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诺尔维克湖畔的事情是根本问题。你不应该怀疑我出门的目的。没有道理嘛。 ”

“ 我为什么不应该怀疑 ？”我抗辩道。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她不允许我猜疑，这是我的权利嘛，尤其是发生了亚辛事件。不应该忘记的是，这是她自己不忠行为的结果嘛。

“ 我是做了一些发疯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件是伤害咱俩要害

的事。’她承认自己有错。

“说明一点。我不明白你的话。”

“你对我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你在我父亲和那个古巴女人面前的表现是可笑的。”

“你指的是巴罗马？”

“是的。”

那古巴女人嘲弄了我。不能指望一个婊子干什么好事，而且是靠卖屁股买来的自由。

“你在寻找我不忠行为的证据。你永远也找不到的。’马赛拉补充道。她说话的口气表明现在她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你侵犯了我的隐私权。你监视我，好像我是你的敌人。”

归根结底是巴罗马和蒙图法尔背叛了我。巴罗马把我和她的谈话告诉了马赛拉；上校则企图从把我俩也卷入其中的肮脏买卖里金盆洗手。简直让人难以相信。马赛拉对着镜子说话和打扮，好像这对话没有什么意义。

“我不知道我在巴罗马面前的表现是可笑的。”我倚靠在洗手间的门框上说道。“但是，明白无误的是那些情爱衣物不是属于她的，就像你说过的那样。”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话。”

“可能你不是准确地用这种话说出来的。但是，你让我理解成这个意思。巴罗马不是那些衣物的主人……”

“你整个怀疑了一通，又不尊重别人，就以为没有足够的动机会造成咱俩分手吗？”

“见鬼去吧！我只想知道真相。这要求算高吗？说实话，我真的不理解你。”

“假如你要知道我一发现你有情人时我多么痛苦的话，你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了。”

“可是，马赛拉，那是老早以前的事情了。你别胡搅蛮缠。另

外,你曾经说过,那点事你已经不在乎了。那算不了什么。那只是咱俩婚姻中的小插曲。”

“你说那是‘小插曲’?”

“那是没有什么后果的逢场作戏。”

她咬咬嘴唇，开始上口红。实际上，她这种表现只不过是不肯让步的小伎俩而已，为的是不承认自己的不忠行为，不吐露情人的面貌。

她用权威的口气发表论断：“婚姻总会产生后果。无论好事还是坏事，无论尊重还是冷漠，无论甜言蜜语还是保持沉默，都是后果。夫妻关系纯粹是记忆。难道你以前不知道吗？”

她这种伪装成有高深学问的冷漠态度气得我浑身发抖，不知所措。此前，我估计马赛拉不了解我和卡尔拉偷情的细节。可显而易见的是，她一直没有忘记和原谅的偷情活动，她用不掉色的墨水写在自己的脑海里了。

我撒谎道:“我不明白你说的这个总会产生后果是指什么。”

“别装蒜！你以为我没有看见她寄给你的信吗？你以为我没看见你衬衫上的口红痕迹吗？你以为我没听见你俩的电话交谈吗？你厚颜无耻，又龌龊肮脏！”

“所以你就安排了这一切？”

“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是你包里那可恶的衣物。告诉我：你是不是故意放到我可以看见的地方，为的是报复我从前发生的事情？你等了好几年的时间而且营造所有这一切，就仅仅为了惩罚我和你眼下肆意发泄积累的仇恨？”

“别胡说八道！报复！谁在说报复？你狗屁不懂。你以为生活就像上课用的黑板那样手边总有个板擦不成？”

“劳驾了。请把这愚蠢的比喻用到别处去吧。”

“克里斯托瓦,生活里没有板擦,没有橡皮,没有消除键。事

情做了,就做了,就留下痕迹了,就不会褪色了,就像你的手稿一样。”

“如果说过去我欺骗过你,那么请你原谅我。”我说,口气不大有信心“以前我不大负责任,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不知道你是多么的珍贵。”

“幸亏被骗者能够容忍骗子,欺骗也就不存在了。”她口气平静地回答说“我一听说你欺骗我,我就决定让自己变成同谋,没让自己成为你的牺牲品。这就是拯救我的办法。”

“但是你不能因此就决定找情人啊。这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你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这仅仅是视角不一样嘛。”她说明道,一面把眉笔放进黑色的手包里,准备出门,心里觉得自己控制了局势。

“难道你以为只要我同意你逃走，那咱俩就处于可以继续同居的平等地位了吗？你以为这就是一架天平，应该用怨恨的砝码去平衡吗？”

她那黑色的大眼睛注视着我，接着挑衅而痛苦地一笑，问我“你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某个情人偷走的吗？”

她这个问题与我在手稿里提的问题一模一样，在手稿里我提的是我年轻时跟已婚妇女睡觉时有过的问题。那些不忠于丈夫的妇女曾经是我爱恋的对象；但实际上，我的爱情壮举仅仅能帮助她们继续忍受自己的婚事，帮助她们掩饰生活中的坎坷，帮助她们装饰一下房间和床上的孤独。那些女人里没有一个表示愿意离开丈夫跟我过日子。她们对丈夫的不忠行为是一种报复，同时也是一种维持婚姻的手段。但是，既然马赛拉引用了我在自己小说里写的话，这只能意味着我担心的事情是真的：她在看我这部手稿，了解了我的思想感情和未来的计划，掌握这些故事的目的是用于她自己的利益。

“你的情人可能会偷走我的尊严。”我一面回答一面觉得脸

更红了。“跟你偷走我尊严的方式是一样的，就是你偷偷在看我正在写的小说。”

“我看你的小说？难道你疯啦？”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大声喊叫起来了。“已经发生了这些事情，老天爷，我哪里有功夫浪费在看小说上啊！你说：你是不是真的疯了？你不知道咱俩的麻烦有多大吗？”

“你面善心黑。我了解你这套。你不仅偷看我的小说，而且还跟什么人鬼混。”

“那如果我有情人并且详细向你坦白了呢？那就能恢复你的尊严了吗？”她问我，一面走下楼梯，再次引用我手稿里的句子，都是从我的作品里偷出来的，把我的话变成了她的话，把我的虚构变成了现实。

她在楼梯上停下来，目光轻蔑，坚决，很像伊瓦尔的眼神。还有，与伊瓦尔相同的还有，马赛拉不开玩笑，哪怕她向我提出一个不诚实、不合适宜的建议，她也不开玩笑。

“将来你会以为我没资格回答你的问题。”她一面下楼，我一面看着她穿大衣一面说道。

我应该千方百计地把她留在我身边，否则的话，一旦她心血来潮，会把一切向警察交代出来的。是的，这两个女人，马赛拉和伊瓦尔，让我发疯。我应该安抚她俩，直到我离开瑞典为止。她戴好帽子，穿上皮靴，打开门。狂风吹得我浑身打颤。她一一系好大衣的纽扣，一面说道：“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

“继续这个样子生活下去吗？到什么时候为止啊？”

“方式当然不同。但是，每个人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自由。”

“自由？你怎么理解这个玩意？”

“操，现在别让我下什么定义。”她很恼火地抗议道。“自由，你知道什么是自由。祖国的先辈们曾经为争取自由而奋斗过。自

由就是做一个自由人，对，自由人。”

“啊，是吗？那么这著名的自由你需要多久啊？”

“多久？好吧，这不取决我们，而是我们的命运。也许明天那个革命党人董甘由于仇恨的刺激，把咱俩抓起来了，那一切都完了。或许咱们很快就离开了瑞典，人们永远发现不了咱俩在这期间的角色。”

就在她要关门的当口，我告诉她：“啊，是的。可是你真的以为诺尔维克湖畔没有人看见咱俩吗？”

“就是咱们这个邻居。”她压低声音答道，“可是因为他也有东西要掩盖，好像不大容易开口……”

“你错了。还有另外一个证人。”

她吃惊地皱起眉头。这时，她的面部表情很像她父亲发怒的样子。雪花纷纷落到了她的大衣领子上。

“你说还有一个证人？是指谁啊？”

我一时没有开口，故意增加她的不安情绪。冷风大股大股地钻进我的鼻孔。

“那天夜里有个嬉皮士看见了咱俩。是个女的，名叫伊瓦尔。”

“臭大粪！”她声嘶力竭地吼了一声，狠狠一摔门，走了。

二十七

我来到中央图书馆大楼前，它的外观很像天文台。我检查一下装在塑料袋的酒瓶没有被人动过，便大步流星地从水泥楼梯登上二楼，心里一面盘算着伊瓦尔会不会在旁边的小房间里等候我。我发觉我的脚步声有力地在巨大的圆顶内发出回响。四周的书架上摆满了图书，但是，馆内空无一人。我记得马赛拉猜测伊瓦尔在说谎；此事虽然难以相信，却是以文学情节为基础的。马赛拉的看法是，伊瓦尔这个嬉皮士女孩在玩花招，这手法出现在西班牙著名女作家安娜·玛利亚·马图特的短篇小说《良心》里，其中有个流浪汉在一家客店里弄到一张免费的床位，他用威胁的口气对客店女主人说：“我接受你的款待，因为我看到了一切。”

今天上午，就在我出门前不久，马赛拉冲我喊道：“难道你就不明白那女孩是在欺骗你吗？其实，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她大概在学校里读过马图特的作品，对任何容易上当受骗的人都玩这

一套。”

我生气地反驳说：“你就不想想那岂不是太巧合了吗？那天夜里我亲眼看见了那群嬉皮士；那女孩，就是伊瓦尔，属于那一群里的。为什么你认为她恰恰选中了我呢？难道为了糖球？”

“克里斯托瓦，并不是她选中了你。她对任何人都玩这套把戏，跟马图特作品里的流浪汉的手法一样。你把她捆起来，看看我说的是不是有道理。”

“难道你愿意她直接去警察局检举咱俩？”

“她在撒谎。这是她捞钱弄毒品的方法。你以为她要是真的看见了那件事，就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一百元和一瓶烧酒？”

“是甜酒。”

“一回事。克里斯托瓦，就算是甜酒吧。你也别犯傻。那个女孩用短篇小说里的故事骗你呢。”

马图特的短篇小说我没有读过。而眼下我走在按照环行分布排列的图书旁边，我承认我这一辈子读过的女作家的作品为数不多。说实话，我几乎没有看过女作家的小说。莫非因为这个我就不理解女性？马赛拉争吵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女人对我来说既陌生，又能让我产生激情。我惴惴不安地走进小房间，心想：伊瓦尔有可能欺骗我，或许是在说真话。我扫视着一排排书架，看看伊瓦尔会不会隐藏在书架子中间。我还想：弄清疑团和惹怒了伊瓦尔只会让我完蛋。不错，只要伊瓦尔活着，我就摆脱不了一次又一次被敲诈的危险。这个小房间里没人，一个人也没有，有的只是无人问津的西班牙语图书。泄气和绝望的情绪涌上心头。我无意中用酒瓶敲打了书架，刺耳的声音让我恼怒。我坐下来，估计伊瓦尔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此时此刻，她正在感到惊喜和满意的董甘面前提供证词呢。因为我知道董甘恨我，他不可能看好我妻子，更不可能原谅我在政治上的变节。

我把装有酒瓶的塑料袋挂在一个书架上，突然间，就在我用

手指抚摩书脊的时候——它们在那里等候有人来借阅，而这在瑞典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瑞典人宁可阅读经过翻译的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文学作品，而大部分拉丁美洲移民，由于生活在贫民区并且在漆黑的工厂里从事着瑞典人拒绝的沉重工作，则缺乏读书的兴趣——而这个时候，我再说一遍，抚摩着这些让我高兴的语言图书的书脊，因为我百分之百地理解这门语言，我决定寻找安娜·玛利亚·马图特的作品。

我找到了马图特的一些作品。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我急急忙忙脱下大衣，把它扔在椅子上，因为这个狭小的房间里实在太热了，它狭小得像桔瓣，因为它是构成图书馆主厅的巨大圆柱路线的延伸。我耐心地检索着目录卡片。就在我准备放弃搜索、打算回家告诉马赛拉伊瓦尔已经背叛了我们的时候，我找到那篇小说。

是的，就是《阿尔塔米拉故事集》。1961 年第一次出版，那时西班牙还在佛朗哥统治之下，它更像拉丁美洲的某个国家，而不是欧洲国家。故事的题目叫《良心》。很短。仅有四页。“她再也忍受不了了。她相信自己再也忍受不了那个可恶的流浪汉的出现了。她决定结束一切。不管结果多糟，一下子了断，绝对不忍受他的专横压迫了。这场斗争已经进行了将近十五天了。”

我不得不坐下来继续阅读，因为激动双腿开始发抖了。我估计自己正在为自己进行有价值的说明，因为这个马赛拉建议我看的故事可能成为一个我多次说过的虚构母体；这个母体从自己的路线出发设计出我的命运轨迹，无情地决定我随后发生的事情。我继续读下去，坐在大衣上，感到不舒服，但是无所谓，因为在我眼前逐渐展开来的故事，越来越像我在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事情。的确如此，作者描写那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手里拿着帽子，摆出求乞的样子”，那一天如何恳求客店女老板马里娜提供一宿的食宿。“老板太太，我是个老流浪汉……不过，有时老流浪

汉也知道一些事情。是的,当时我就在那里。太太,那件事我看见了。我亲眼看见了……”

“狗东西,你在胡说什么呢?我警告你,我丈夫十点钟就坐车回来。他可容不得别人开玩笑!”

流浪汉说道:“我知道,我知道他容不得别人开玩笑。所以,您绝对不愿意让他知道那天我看见的事情。是不是?”

马里娜有许多事情是瞒着丈夫的;其中有些事情很可能让流浪汉看见了。惴惴不安的心理迫使她同意让老流浪汉在客店再住几日的要求。

到此为止,我不清楚那个陌生的老人看见了什么。根据我暂时看到的内容和对时间的估计,我认为马里娜不应该冒险。在这个意义上,她的处境很像我目前的状况,或者刚好相反,我的处境像她,因为这个故事里发生的事情远在我的事情之前。伊瓦尔在我眼前,在这里,在斯德哥尔摩,等于是小说里的西班牙流浪汉。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急于知道这些如何结束。我发现小说的结尾处,当流浪汉决定离开客店时,他来到马里娜身边,说道:“老板太太,实际上,我什么也没看见。好啦,我甚至都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可看的。”

我合上书,把它重新放回原处,预感到伊瓦尔欺骗了我,她了解这个故事,直接拿来用于日常生活弄些钱吸毒。尽管如此,仍然有可能她并没有看过小说,可是的确看见了发生的一切。一旦她来了,因为她肯定要来拿我的供品,我就要对她说:我发现了你在玩花招,其来源是小说。我要奉劝她:尽管你玩花招,但是只要你别害我,咱们每星期可以见面一次,我给你钱和酒。因此,我只好等候她出现在这个小房间里,摇晃着她刺猬式的头发、乌黑的嘴唇和长长的大衣,上面挂满了锁链和别针,遮盖着里面柔弱的少女体型。

二十八

一想到我手里攥着邻居杀害博耶娜的关键性证据，就觉得足以去董甘探长办公室，给他讲述我知道的事情，为的是让邻居马尔库斯 ·艾里阿松落入警方之手。但是，如果我检举了他，那会让他的孩子们沦为孤儿，会使得孩子们永远孤独无助，当然包括那天我从雪地上抱起来的男孩，那时他因为母亲的去世而哭个不停。孩子们要找母亲的哀号声常常从花园那边传入我们耳中。孩子们一哭，马尔库斯总是急忙跑去安慰他们。

至少现在他还关心孩子们。他将来会有情人的，说不定就是那天我在咖啡馆里远远看见的那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我至今没有在邻居住宅附近见过那美人。无论如何，马尔库斯今天在照料和看护着自己的孩子们。他不是坏人，他可能杀害了妻子和女佣博耶娜，但是——这个“但是”听起来有点邪恶——他杀人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也不是坏人，虽然我也杀了一个男人——要我承认这事是很困难的。问题来了，因为我们从小时候开始，大人就

教育我们凡是伤害别人的人，根据定义，就是坏蛋。但是，大人们从来没有说明有些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是你并不希望发生，事情就发生了。生活里有多少事情是无条件地落到了我们头上啊？有多少事情是我们命中注定要忍受而不能改变的呢？在很大程度上，小说和电影是罪魁祸首，因为它们让我们接受这样愚蠢的想法：人类是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所有这些都应该写进我的小说里，应该强调马尔库斯这个人是自相矛盾的：他既是颇有算计的杀人凶手，又是善良、忠厚、充满了人情味的人。这样也就可以知道博耶娜是不是撒了谎，还可以知道玛利亚是否不仅因为无力忍受而自杀，还有博耶娜或许与俄国黑手党合作，是不是为了报复马尔库斯才恶意诽谤他。可能马尔库斯拒绝在出国旅行期间为毒品集团“带货”。而博耶娜由于害怕马尔库斯去警察局检举她，就散布谣言说马尔库斯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否则的话，我就无法弄明白为什么博耶娜对马尔库斯根深蒂固的排斥。总之，一切让我觉得模糊和冗长，结果很难让我把这些东西清晰地写入小说中。

通常在上午，我一边写作和努力平息心中的苦恼，一面听着约翰·西贝柳斯的音乐。来到北欧之前，我不能理解西贝柳斯的作品；但是，今天凭着直觉我明白了他如此优美的抒情风格来源于冬天沉重的早晨，因为雪花让森林披上了白衣，而阳光在试图冲出云端时失败了。我猜测，西贝柳斯管乐中震撼性的激情来自北方熄灭生命之光、席卷一切、令人胆战心惊的暴风雪。我父亲常听西贝柳斯的作品，也听爱德华多·格里格①和斯藤汉穆（Stenhammer）的曲子。父亲非常着迷北欧的社会秩序和纪律。他报考军事学校，没有被录取。我估计这是父亲内心痛苦的根源。或许就是这个原因，父亲总是要求我和我兄弟们保持房间清洁，

① 爱德华多·格里格（1843－1907），挪威作曲家。

有序；要求我们皮靴光亮，短发并且整齐。我想只有大哥依格纳西奥神甫在修道院里才遵守这些最高指示。二哥图里奥，那个成功的企业家，过着一种扭曲的生活，外表漫不经心，身穿博斯牌西装，意大利生产的领带，但是不系紧领结，衬衫的领口敞开。大家说的这句话确实如此：如果你希望儿子成为极端主义者，你就强迫儿子每个礼拜天都去做弥撒。

我渐渐在改变这部小说开头几章的风格，打算加入更多的现实主义成分。实际上，现在开始由一位侦探小说家讲述故事了，他跟我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与他妻子在一起，一个与马赛拉相似的女人，也用马赛拉这个名字，也喜欢古玩和表演。这对男女生活在这里的原因，是我从我俩的生活里提炼出来的。这对虚构的男女——由马赛拉和克里斯托瓦组成——离开祖国、以便甩掉父辈留下的姓氏累赘的企图，毫无疑问，将会给作品提供更多的真实性。总之，先把文学理论放在一旁，咱们还是继续说咱们的事情，它实在令人感到不安了。

无论如何，我至今还在怀疑是否应该在这部手稿里保存这样的描写：对马赛拉所谓“疯狂”以及我面对她的不忠行为表现的和解态度的时机。我猜测，我妻子已经偷偷读过了我的手稿；我估计她已经了解了我最新的想法和打算。或许因为如此，如果这部作品道出事情的全部真相和我的感情，那就欠妥了；或许因为如此，我应该从这行文字开始掩饰我的思想感情和计划。或许，我应该写一部改头换面的作品，一部表里不一的作品，对外来假的，对内来真的，其主要功能就是迷惑读者。伪装自然会成为我面对马赛拉时最好地保护自己、隐藏我的隐私的最佳方式。还有，从此刻起，我要告诉那位敢于阅读——或者正在阅读——我这里写出的一切的人：我不保证讲述的故事是真实的；但是也不保证故事一定是虚构的。如同在没有救生人员的游泳池里的告示一样，凡是来这里使用设备的人，责任自负，危险自己承担。

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我关于“疯狂”的思考不仅出于个人因素，而且还有修辞方面的考虑。如果我把草稿里的写法坚持到现在，那么我就会有这样的危险：本书的重力会从作者的内心世界转移到与他妻子复杂关系的天地里去。而我是不肯写一部探索培育或者消灭爱情原因的小说的，因为我仅仅表现一个男人生活里的片刻时光。当然，是决定性的时刻，是能够表达他与世隔绝的状态、对妻子无法理解的心境、与妻子破碎和失败的交往的。我希望写一个这样的故事：它仅仅是一种更为广阔的生活里的一组画面而已，不是有开头、中间和结尾、逻辑严密和浓缩的常规故事。我想直截了当地描写在我眼前流动的生活，如同间谍在情报里写的那样，他们有时注意一些有承诺的人物，但是进出舞台都不留痕迹；或者有时简单地捕捉偶然遇见的情况，一种连续性的事件和无足轻重的想法，一种被偶然的飓风破坏而又不会给任何人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我想看看如此无足轻重的事件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因为在无足轻重的小事和重大典礼之间就是我们平常过的日子，因此，我坚持小说要贴近现实，要跟随现实走，如同一对在飞翔中交配的蝴蝶；但是不把小说变成自供状，因为有一天有人会用来攻击我，根据发生的事情来谴责我。

今天，在跟贝贝·克里斯塔尔谈话之后——他坚持要买我的电脑，劝我再买一台新的——我给智利大使何塞·法古塞打了电话。在发生诺尔维克湖畔事件前，我经常与大使见面，地点在体育馆或者健身房。我俩先是喝咖啡，随后去他的住所品尝智利的美酒，一面谈论着文学与政治。

法古塞大使在市中心有一套单元房，宽敞，舒适，装饰得十分高雅。在做外交官以前，他在斯德哥尔摩避难长达二十年之久。他曾经是左派革命运动组织领导人；而如今，经历了无数的波折后，他是享有声誉和威信的大使。虽然有时会产生可以想象

到的分歧，但是我们之间可以互相理解。正如我了解他对总统的忠诚可以经受一切考验一样，他也清楚我与蒙图法尔家族的亲戚关系以及我的亲属在军事独裁统治下曾经享受过的优越地位——特别是我父亲和我那位企业家的哥哥。但是，由于他也知道我没有参与对左派的镇压活动，便高兴和尊敬地接待了我。而他对待马赛拉的态度则是疏远的。我猜想，他错误地怀疑了马赛拉在迫害左派的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这是不公平的，因为马赛拉那时很小，还是个天真的女孩，不可能参与政治。但是，智利的政治是由动乱的幸存者、原教旨主义分子、变节者、叛徒、机会主义者、坏蛋、腐败分子，还有伪君子组成的。总之，所有这些典型人物以及其他种种分子，总是可以在自己志同道合的圈子里找到场所和空间的。此外，法古塞知道民主党人应该无条件地容许别人的选择；他知道政治仅仅是谋生的又一种方式而已，如同保险营业员、教师、杂耍演员或者房产经纪人一样。

我向大使打听董甘探长的情况。大使轻而易举地说出了探长的事，尽管在瑞典居住着四万智利侨民。当然，董甘是在瑞典警察局工作为数不多的侨民之一。

“董甘在阿连德时期社会党人的情报系统里有个职务。”大使说道，一面吸着古巴雪茄。依我看，雪茄会破坏葡萄酒的香醇。“董甘不得不出国避难。如果皮诺切特的军人抓住他，肯定就没命了。他是那种死硬分子。”

“他至今还有前苏联克格勃的样子。”

“他参加过危地马拉的游击战，后来到了这里，学会了瑞典话，进入警察局工作了。如今他青云直上。这可是个聪明的家伙。他的专业是侦查与外国人有联系的案件。他经常出差在外。你怎么遇见他了？”

我给大使详细说明了情况，还向大使坦白交代了自己担心会卷入一桩警察在调查的事件中，而这时恰恰是我打算离开瑞

典的时刻。

“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准备离开啊。”

“是该走的时候了。我们还不知道上哪儿去。但是一定要走。”我故意说得含糊其辞，这是蒙图法尔上校的教导。

大使沉思起来，他对着橙黄色墙壁上悬挂的蜡烛台吐出一口浓烟。从客厅的窗户向外看去，斯德哥尔摩的屋顶上全部覆盖着白雪。他说：“虽说董甘为人谨慎，我也能打听出来案情，说不定他会告诉我博耶娜发生的事情。”他补充说：“你用不着担心。瑞典警察太小心谨慎了。”

“我担心博耶娜可能为俄国黑手党提供了服务。”

“这不是不可能。可是你用不着担心。我找董甘谈谈。如果你愿意，换个环境，我把你介绍给他。也可以在这里，咱们一起喝点什么。可能有好处。大家谈一谈总是有好处的。”

我不想强调我曾经在一个提供情况的气氛里已经跟董甘谈过了；也不想说我担心董甘会因为我与蒙图法尔家的联系而尤其不宽恕我。正如马赛拉的看法那样，董甘有可能是个有怨气、爱报复的家伙。

“你应该跟他谈谈，为的是平安地离开瑞典。”大使重复道。与此同时，我俩在吞烟吐雾。

有可能再次见到董甘，这让我感到不快。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他探究的眼神里有某种东西，询问的口气里有某种东西，调查谈话对方的最新思想的老习惯里有某种东西。说不定马赛拉是对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警察那指责的手指和认真的态度就是以仇恨为基础的。不管怎样，掌握一些关于他的情况总是有好处的。我想把这些情况用在这部小说的侦探性格的塑造上，尽管我还要把这些情况与我自己收获的素材结合在一起，例如，他把博耶娜的犯罪与诺尔维克湖畔杀人案——小说叙述者所为——联系起来的能力。

让我不安的是想到，我用这样或者那样形式写出来的手稿，一旦被人发现，就可能在某一天有人用来嫁祸于我。当然，为此，司法机关就不得不证明我的每句话是确凿无疑的，这很麻烦，因为我的话是说在虚构王国里的；但是，任何一个司法机关都会努力指出：侦察人员没有条件区别小说家——就是说，我这个人，现在写下这些文字的大活人——与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者的关系，这个叙述者是虚构的人物，他声称在纸上写下了这些黑字——纯粹的话语。这类调查就意味着司法当局毫不怀疑地相信的确存在现实与虚构的一致性，这会让司法机关犹豫不决；会让司法机关成为笑柄，至少在欧洲范围是如此。这是一种自然包含着相当成分的风险和毋庸置疑的成功的游戏；但是，我不能中断这个游戏，因为一种强劲的叙事冲动推动着我与这个情节一道继续前进，引诱我用周围的环境滋养着这个情节，仿佛它是一头饥饿和神秘的野兽，它每天需要吞噬事实以便长大。

深夜，我笨拙地驾驶着轿车回到家中，因为我和大使都喝得过量了；我发现马赛拉不在家里。她大概跟哪个女朋友在一起，或者正在结束生意，这是唯一可以减少她压抑情绪并且使她快乐的事情。

她一回到家中，就对我这样说道：“咱俩走之前，一定要跟马尔库斯达成谅解。”

夜很深了。我还在客厅里，坐在躺椅上看杂志。茶杯冒着热气，放在中间的小桌上。

“跟马尔库斯达成谅解？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克里斯托瓦，你很少能明白我的意思。我要告诉你 要设法让马尔库斯保证对咱俩忠实，否则咱们不能离开瑞典。咱们别自欺欺人。他知道咱俩干掉了亚辛。”

“我想马尔库斯不愿意达成什么谅解。”

“那只要咱俩没有得到谅解，就不能离开。国际警察或迟或

早会获悉一切的。”

“这大概是你父亲的建议。但是，不管用。咱们这是在瑞典。”

“我父亲一点都不清楚发生的事情，尽管他可能跟我说起过马尔库斯的坏话。”

“那你怎么想得出来咱们要向马尔库斯提出谅解的事情呢？”

“如果他打算离开瑞典，他肯定应该关心咱俩的想法。问题是在必要的时刻咱们要触及这个话题；咱俩要马尔库斯看到，我们互相需要对方。”

马赛拉再次让我刮目相看。她是个象棋大师。就在我担心她会抢走我的一个卒子时，实际上她已经准备用双马将军了。她迅速地从忍耐过渡到了制定冷静和详细的计划工作中。现在我已经感觉出某种散发着敲诈气味的玩意儿了，那是一项目标对准我俩的活动。马赛拉没有道声‘晚安’就去睡觉了。我回到书房，在电脑屏幕前坐下，外面依稀可见马尔库斯的住宅。我准备再次继续喂养这头贪得无厌的野兽。

二十九

博耶娜被杀的消息终于出现在《每日新闻》的一篇文章里了。我是在一家书报杂志商店里发现这条消息的。我迫不及待地想看这篇文章，便没有回家，立刻在商店里要了一杯难喝的美国咖啡，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坐下，开始狼吞虎咽地读起来。文章不长，占据了四分之一的版面；文中说到了董甘探长，这的确令人不安；董甘怀疑博耶娜被熟人所害，因为她给那熟人打开了自己单元房的大门；她家位于郊区外国移民聚居的林开比镇上。

文章对事件的描写让我感到局促不安：博耶娜后背中了三刀,深入到了肺部 死前,她好像在卧室里寻找什么东西,这让人猜想到她和来客之间有某种程度的信任关系。凶手（大概是个男人）捅了三刀之后，证实了博耶娜的伤情，便用她的腰带将她勒死了。

刑侦队对现场进行了勘察，没有发现凶手或者陌生人盗窃钱财的证据。令人迷惑的是，那天夜里没有看见什么可疑分子在

那幢大楼周围徘徊，也没有听见异常的声音，虽说是在隆冬季节；鉴于瑞典的住宅封闭得十分严实，人们没有察觉外面的异常动静是可以理解的。

董甘探长在《每日新闻》上声称，他根据三种假设的基础开始工作。第一种假设是，博耶娜认识凶手；第二种，凶手假装需要商谈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而进入了单元房；第三种，这是个有经验的杀手，因为根据没有留下指纹判断，作案过程中，他使用了塑料手套。读到这里，我浑身发抖，因为想起来几天前在马尔库斯家里我看见的外科医生使用的手套；这让我想起马赛拉在推测他是凶手时说的话是有道理的。

在文章的最上端的方格里有董甘探长的照片，他呼吁林开比镇上的居民向警方提供案件发生的那天晚上是否看见什么可疑情况。我觉得他不大可能在一个外国移民聚居的镇上得到什么帮助，因为那里失业和处于社会边缘的年轻人是产生犯罪现象的理想的沃土，那里没人尊重警察。尽管如此，董甘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似乎依然坚信集体的力量，因此侦破工作要依靠群众。

马赛拉放下瑞典语－西班牙语词典，断言道："凶手就是马尔库斯，这是明摆着的。"当我手里拿着报纸从于什霍姆区中心回到家里时，她一下子就从床上跳下来了。她没有惊慌，而是十分满意自己的推测得到了证实。"说得浅一点，咱俩身边住着一个危险分子。他心里装着两条人命啊。"

我反驳她说："别说得那么清高！尤其是发生了那个俄国人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俄国人？"

"你是怎么回事啊？现在你还要在我面前表演吗？"

她冷冰冰地确定道："咱俩一直在谈马尔库斯。"

我俩到厨房里去，煮咖啡，烤面包片。她下结论的肯定口气

里有某种东西让我生气。

“你怎么能肯定马尔库斯杀害了博耶娜呢？”我用咖啡杯温暖着双手，一面想起马赛拉并不知道马尔库斯家里有外科医生手套的事情。

“我用推理就够了。他需要杀人灭口。博耶娜是唯一知道玛利亚死于药片的人。只要她对董甘探长说一句话，马尔库斯的麻烦就大了。尤其是现在他就要出国的时候。”

“但是,他的情况和咱俩的情况没有太大的不同。”

“这话几天前我就对你说过了。”

“什么话？”

“他和咱俩的情况相同，但是二者之间也有很大区别。”

“至少你没有对我说过什么区别。”

她生气地说道：“你和你的记忆力……你，你的记忆力和你的怀疑……区别在于：他的犯罪计划得详详细细；而咱们至今还在乱打一气。”

“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还觉得不够?他是真正的罪犯,杀人凶手。该做的,他都已经做了。为了自由,他消灭了媳妇,接着是清洁工,因为她打算告发他。”

从客厅里传来一阵阵艾里克·萨蒂的和弦,这在以某种方式暗示：世界还没有完全破碎。

我反驳说：“博耶娜不可能认真考虑告发马尔库斯。她唯一操心的是保证在居民区里有活干。她肯定早就知道类似的乱子意味着对簿公堂和丢掉于什霍姆小区的工作。”

“相信我的话吧。他杀了她啦！”

“有可能是这么回事。可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杀人。她并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去法院指控马尔库斯啊。”

“你怎么知道她证据不足啊？”马赛拉一面从冰箱里拿奶酪

一面问我。

“可能是她对我说的。我常常跟她谈话。她有过朦胧的怀疑，只不过是猜测。她不会用怀疑去威胁马尔库斯的。”

“那是别的事情促使马尔库斯杀人灭口。”

“那我就不明白了。”

“这很简单。他杀她，是因为她敲竹杠太过分了。”

“敲竹杠？”

这让我想起为了让马尔库斯保持沉默，马赛拉曾经向我建议敲竹杠。

“是的。”她说，开始在烤面包片上抹奶酪。

“你认为他要价太高了？”

“正是如此。我感到奇怪的是，一个侦探小说家不会想象敲竹杠。”

她的结论忽然让我觉得很有说服力了。几天前我也曾经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是排除掉了，因为马尔库斯不可能冒险再杀人而不露马脚，除非他是个精神病患者，可他不像疯子。但千真万确的是，博耶娜如果告发他，那就打破了他远离斯德哥尔摩开始过日子的美梦。我注视着马赛拉的面部表情，可是只看到她那狡诈的目光以及蓝色的眼袋，这说明她夜里失眠，诺尔维克湖畔发生的事件影响了她的健康，让她终日惊恐不安。所有这一切我都是推测，因为几天前我俩毫无戏剧性地决定彻底分房而居。她继续住在从前的卧室里；我如今则睡在书房隔壁的房间里。

片刻后，我说道：“写小说是一回事，预言现实的变化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好警察不一定是优秀侦探小说家；同样，一个优秀的侦探小说家不一定是好警察。有个东西叫虚构；有个东西叫现实。”我用相当高傲的教训口气断言道。

马赛拉合上报纸，开始喝咖啡。

“马尔库斯为了让博耶娜别去检举他，在她身上花了好大功

夫。”

“我想她没有能力去敲诈马尔库斯。她头脑太简单。”

“你注意一下：她早就不在马尔库斯家里干活了，因为她已经不需要那点工钱了，而且两人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你的想象力比我写小说时还要丰富……这些玩意儿你是从哪里掏出来的？”

她生气地喊道：“事实胜于雄辩嘛！”

“这实在太好啦！纯粹的推理可以充当破案的技术。好哇，好哇！了不起的柯南道尔太太[1]！幸亏你不是警察。”

“要是我告诉你博耶娜也曾经企图敲诈过我，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她讥诮地冲我一笑，由于我顿时哑口无言，她很高兴，得意地品味着自己刚刚吐露出来的故事。

“她企图敲诈你？”我结结巴巴地问道。“什么时候？”

“有一天我上亚辛的汽车时，她撞上了我。这对她来说就足够了，何况还发现了我那些衣物，就足以想象出其余的故事了。”

我想起来了，有一天上午，那是在玛利亚死后不久，博耶娜告诉我：她曾经发现玛利亚在斯德哥尔摩一辆轿车里跟一个男子亲吻。她看见的是马赛拉呢，还的确是玛利亚？那时我猜测博耶娜是在嘲笑我。我问马赛拉：“你对她说了什么？”

马赛拉一面收拾桌上的面包渣一面说道：“我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有你的许可，这样一来，她对我的敲诈就一钱不值了。”

“这么说，你是真的欺骗了我，真的有情人了。”

“够了，克里斯托瓦。难道你还要重新表演这出戏吗？咱俩是在说一件严重的事情，是敲诈的事。”她起身，手里拿着面包渣，扔到垃圾罐里去了。“可怜的博耶娜不大明白我的意思，可是也

[1] 讽刺马赛拉是神探福尔摩斯。

没打算再闹。”

“为什么以前你一点也不告诉我？”

“为什么要告诉你？为了让你着急？为了让你觉得证实了自己的怀疑？”

“你应该把她辞退。”

“不辞退，我可以更好地控制她。我让她以为她手里掌握着关于我的材料；让她以为可以随时用来对付我。”

“你真是狡猾得惊人。”

“别胡说八道！要是博耶娜发现了酒瓶、杯子、大理石块和手枪，也会敲诈咱们的。她是个无须多虑、不必担心的家伙。一定有什么事情她才被害的……”

“她直在攒钱，准备给父母盖房子……”

“你别来这套幻想了。别不相信大家说的道理。好好分析一下她那些行动的结果和对你的利弊程度吧。”

我心里温习了一遍每次与博耶娜谈话的内容，发现她在谈话中几次企图打听我是不是真的知道我妻子的生活情况。有可能她打听的目的就是打算敲诈我。而由于或许我给她的印象是允许马赛拉的冒险活动，她才没有当面向我提出这件事情来。我摇摇头，陷入了沉思，感觉自己真是非常不幸。最后，我说：“你说的实在太合乎逻辑了。”

“因为这个形势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每当马尔库斯去博耶娜家里付工钱时，她就涨价。最后，他实在忍受不了了。如果马尔库斯敲诈咱俩，难道你不会有类似的想法？”

我没有告诉马赛拉：我早就想干掉马尔库斯。不但没这样说，我反而盯着她的眼睛，说道：“我很难想象马尔库斯会干敲诈的勾当。”

“咱俩干了那样的事情之后、加上又是如何伪装到今天的，你难道还这么想？克里斯托瓦，我早就对你说过了，个正派人

是绝对不会杀人的。咱俩仅仅是偶然‘遇上’了那样的事情而已。咱俩事先是根本无法估计到的。”

“也许你是有道理的。”

“当然啦！切都是明摆着的：那天夜里马尔库斯去博耶娜家里付工钱这恰恰就是她开门的原因。所以没人发觉她有客人，也没有吵闹声他早就有杀她的念头，就像你想过要干掉他，或者干掉我一样；因此，她刚提出用大幅度涨工钱的要求来换取保密时，马尔库斯就失去了理智，只好动手杀人。这是一桩偶–然–撞–上的杀人案。”她一字一顿地说道“你明白了吗？”

我佩服她考虑周全的本事。实际上，就是这套本事在出售家具和假画时就施展出来了，因为直到今天我才完全信服：我老婆早在多年前就从事买卖盗窃艺术品和制造赝品的赚钱勾当了；今天我才信服：她演戏的本事就用在这上面了。总之，生活的狡猾脾气已经为时已晚的时候，它才教你明白一些道理。这些题材和思考应该尽早纳入到小说里去；因为我为了编造情节而努力想象的那些内容、因为表现出我丰富的想象力而在茶余饭后让我感到骄傲的东西，如今竟黯然失色了，竟被我亲爱的妻子发生奇妙变化后在我心里产生的这些想法冲淡了。

她态度坚决地问我：“你不觉得咱们应该插手了吗？”

“插手？怎么插手？”

“亲爱的，好好想想！你该怎么插手啊？”

“是给董甘探长打电话吗？”

“亲爱的，是给马尔库斯打电话，告诉他：他干的一切我们都掌握了，要我们保持沉默是有代价的。”



三十

我承认，从几年前开始，我对现实就已经不再感兴趣了。是的，我可以肯定，我不再关注我称之为似乎从生到死都包围着我们的所谓没有疑问和不可逆转的现实了，而是宁可看看小说，随便什么小说，看看电影，听听音乐，尽可能听浪漫派作曲家的作品，和那个时期流行的爵士乐，听大量的爵士乐；但是，不听约翰·威廉·科尔特兰[1]那种试验性质、令人恼火的演奏，而是本·韦伯斯特或者克莱曼·霍金斯[1]常常演奏的浪漫和抒情的曲调；或者欣赏美术和摄影，无论在博物馆还是看画册和相簿。其余的一切——对，就是这个北欧单调、灰色和寂静的世界、美国政府随

(1) 约翰·威廉·科尔特兰(1926-1967)，美国爵士乐演奏家和作曲家。一度专注于即兴演奏，所写乐曲在和声结构上试验新的即兴演奏方法。

(2) 克莱曼·霍金斯(1904-1969)，美国次中音萨克管演奏家。由于他的即兴演奏具有高超技巧，使这种乐器成为爵士乐队中最流行的乐器之一。其最受欢迎的唱片是《灵与肉》。

意发动的种种战争、破坏欧洲移民生活的种族主义以及拉丁美洲各国没完没了的衰退和缓慢解体，总之，我们急忙鉴定为现实的一切——很少与我有关，或者根本与我无关。

不错，由于诺尔维克湖畔事件的发生，这个不可逆转现实中的某些方面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是，这样的事实：我打算把这一切变成虚构、打算把这些可以度量、可以验证的事件纳入本书的章节里去、打算抹去真实与想象的界限，表明了我对现实的全面冷漠。莫非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会渐渐陷入冥想和独处，仿佛软体动物那样？甚至仅凭记忆和想象力、阅读小说和诗歌、看电影、听音乐、自言自语或者想象中的对话来生活？有时，我假设，孤独会在这条路的终端处等候着我；我猜想，我的整个一生仅仅是来来去去，仅仅是一篇绪论，以便接近在终端处等待我的孤独，如同黑格尔对大写的历史所期望的终结一样。不，我不会编造理论，或者给所有这一切寻找一个彻底的答案；但是，今天上午，认真权衡了这些事情之后，我决定深入虎穴，给董甘探长的办公室打了电话。他的办公室位于格林大街，在昆霍穆小区一幢十九世纪宏伟的宫殿里，如今是瑞典警察的总部。他本人接的电话，这让我感到慌乱，但是这同时又让我立即镇定下来。犹豫片刻之后，我对他说，我很想跟他谈谈。

“你看，在豪特盖特大楼的底层，有个供应瑞典最好的海鲜汤的餐厅。”他口气严肃地提议说：“那是天下独一份，没有第二家。中午我在那里等你。”

现在是上午十点，布谷鸟到今天还没有光临。我想，今年的春天可能来得晚了，尽管在邻居家的花园里，雪人开始融化了，充当鼻子的胡萝卜已经落在地上了。将来，花园里只会剩下雅典娜女神雕像以及常常在她头上栖息的乌鸦，仿佛它们停下来的目的是观察邻居的动静，或者思考仅仅与乌鸦们自己有关系的事情。因此，我决定了中断小说的写作，恰恰是在叙述者，就是

说，那位生活在于什霍姆小区的侦探小说家，在一股非理性冲动的驱使下，打算与警察接触的那一章停下笔来。而这位警察恰恰是调查波兰女移民博耶娜案件的负责人。后来，我差一点把这部小说保存在硬盘上；为了更保险起见，差一点从电脑上把小说删除，差一点把小说隐藏在某个秘密的地方。而我没能动手的原因是，有可能在我漫步斯德哥尔摩街头时，马赛拉在偷偷阅读这些章节。我觉得她通过阅读这部作品在监视着我；我觉得只要她阅读，就会质疑我的真情，就会处于压倒我的位置上。假如她不看这些文字并且没有想到我是在说她，那么这些文字就有能力变成故事和种种事情的回忆录，那么它就成为没有主人的另外形式和永远成为疑点了。我希望重申的唯一一点就是：现在这部马赛拉可以接触的手稿，已经不必要非反映我的想法、我的行动不可了 它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圈套、一个陷阱、一个伪装、一部过分修饰的作品，目的是仅仅制造一个现实的表面现象并且阻挠马赛拉深入了解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我的想法。我再重复一遍：在某种意义上，本文代表着一个转弯抹角的信息，换句话说，意味着一种拐弯抹角的威胁：我这里写的一切都不打保票；还有，更为慎重的是 本文是真的,同时又不是真的。

于是，如上所说，我去找董甘探长谈话了，尽管明知这是在玩火，因为他在调查博耶娜一案而来我家，或者忍受探长突然出现在瓦萨博物馆并且咨询问题，这是一回事；而与此完全不同的则是，直接去斯德哥尔摩警察总部找他，直接在虎穴里逗虎，就在警察总部大楼里引起探长的注意，实在完全不一样啦。我想，我下这样的决心是因为法古塞大使为我提供了董甘的资料，所以有了动力。既然有可能我和探长很快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见面，可以喝着智利葡萄酒，吃着腌橄榄果，我估计可能比较容易接近董甘并且忍受他那探究的目光。当然，我需要间接了解他的侦查方法；还有更为关键的是，干脆打听一下我和马赛拉是不是

出现在诺尔维克湖畔事件的嫌疑犯名单上了。我和董甘是一国同胞的背景，我俩都曾经有过差不多被迫害和流亡的历史，尽管后来生活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把我俩分道扬镳了，但是这个背景可以让我胆怯和非正规地了解一下他的为人。

十二点整,我来到超市大楼干净、整齐、货物充足的商店里。大街和屋顶上布满了白雪，冷风刮得刺骨，但是天空是蔚蓝的。我下到底层，一股温暖的香喷喷的热气扑面而来。我穿过一排排法国奶酪、意大利馅饼、土耳其蛋糕、以色列柑橘、中国炸糕和素食；撞上了一个阿拉伯人和一个缠头布的印度人之后，我终于来到董甘等候我的地方了。他像往常一样，身穿一套黑衣裳。

我没有心情品尝任何海鲜。

董甘说“:这里供应世界上最棒的海鲜汤。而方法很简单:您去拿一个汤罐、餐具和面包；厨师在柜台上给您舀汤。你可以多次去要汤。老外说是 All you can eat；这里人说是‘瑞典餐桌’。”

海鲜汤散发出的硝石和海藻的芳香可以唤醒沉睡的死人；让我立刻回想起智利南方的马利内拉舞。餐厅很简朴：一个长条柜台，上面摆放着一口巨大的带把的浅口锅、一盘黑面包片、放在啤酒桶旁边的杯子，还有光秃秃的小餐桌。我俩在其中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来。

“您说吧。”探长一面掰面包片一面说道,口气很像忠厚的神甫.接着,他喝了一勺海鲜汤。

我解释说，我是法古塞大使的朋友；大使给我讲述了探长的历史，这与我的过去有某些相似之处。探长继续无所顾忌地喝汤，好像他在操心别的事情，而我说的话似乎是不重要的。他只是不时地抬头看我一眼，那目光是短暂的怀疑的，仿佛要证实我是否还在位子上，那眼神在劝我：干脆吐出来这里见面的真正动机吧。他眼睛里闪亮的某种东西,这时让我发现了——或者也许是我自以为发现了——流亡者心里隐藏着的乡愁和痛苦；还有

他们——或者说我们，因为我也是流亡者——极力掩饰的乡愁和痛苦。

突然，他问我："帕索斯先生，发生军事政变那一年，您在干什么？"

"在东柏林学习经济。"我不安地说道，让这个突然袭击吓了一跳。"三年后，我搬到西柏林去了，接着在自由大学读书。"

"没有重新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吗？"

"从来没有。"

我知道承认了那次搬家的真正性质——同时也是政治性的搬迁——就等于在探长面前给我的命运打下了烙印。他不像我这样是个变节分子；他很可能瞧不起变节者，因为在瑞典他只能让自己的生活有些意义——这是一种永远远离家乡、亲人、风土人情的定居生活——即有意识地恢复在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前他曾经热情参加的政治理想运动。

片刻后，他吃下一口面包，说道："我没有责备您的意思。真正有过的那种社会运动是非常讨厌的。"

"的确，那一套的确太乏味了。"

"加入过共产党吗？"

"加入过一段时间，您是知道的，那时还年轻，充满了理想主义。"

"帕索斯先生，用不着检讨。智利有大量后悔的人们 后悔的共产党员，后悔的皮诺切特分子，后悔的恐怖主义分子，后悔的社会党人，后悔的自由主义分子，后悔的工会会员，总之，什么都后悔，甚至对后悔都后悔了。假如能把后悔分子出口到国外，智利一定会成为发达国家。'弃旧图新，或者强行改造'应该成为咱们智利的口号。总而言之，这是命运，否则的话，智利早就炸成碎片了。您在哪里认识法古塞大使的？"

"在国家学院。我们在那里念书。"

探长清清嗓子，喝了一口啤酒后，说道：“我问您这个，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您打算隐瞒什么，我不知道确切的事；但是，我觉得您有事瞒着我。很奇怪，对吗？”

我苦笑了一下。我说：“不知道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严肃地注视着我，浓眉下面露出不信任的眼神。

“您和蒙图法尔前上校有什么关系？”

我立刻意识到，探长一直在跟踪我，在瓦萨博物馆的相遇，不是偶然的，而是他职业努力的表现。我简单地解释了上校和我的关系；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掌握了这段历史，现在只是证实一下而已。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我反而失去了谈话的主动权，而这次谈话恰恰是我要求的，本打算顺便说些看法，最后能把马尔库斯牵连到博耶娜之死的案子里才好。

我话音落下以后，探长保持沉默，随后起身，去柜台那里盛汤。他在我对面坐下来，品味着海鲜汤——到这时我才发觉，汤的内容丰富之极：除蔬菜和土豆外，还有鲱鱼、鲑鱼、鲈鱼、牡蛎和对虾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叶子。后来，他说，他不愿意说国家历史上不久前发生的事件，尽管他已经习惯经常温习历史，以便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增加活力。他像我一样，也经常上互联网，阅读智利的报纸，看智利电视台的新闻；但是，有时他穿越时空，摆脱了过去的那一切，完全沉湎于北欧的生活，因为他害怕自己会患上精神分裂症。他承认根本无法忘记祖国；他承认自己已经不再是三十年前的自己，尽管他仍然还在捍卫那时的某些原则，虽然换了另外一种形式；他严肃地声明：如果他背叛了自己原来所信仰的一切，他会跳进那厚颜无耻的深渊里死去。

他用冷漠的眼神注视着我说：“我退出了危地马拉的游击战，因为有人要求我暗杀一个同志，理由是游击队的领导认为该同志是叛徒。我准备执行任务的那天上午，我在安提瓜的一个街口等候那个同志，我一看见他领着小儿子走进学校，我的心就碎

了。立刻，我心里说 董甘，你不能干这个 离开那些人 !你快跑吧！”

“ 我明白。”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从谈话改变的方向来看，他已经不怀疑我了。

他忧郁而无可奈何地又说“:无论如何，总得相信点什么吧。如果您允许我坦率地说出来，帕索斯先生，您引起我注意的就是这一点：您好像什么也不相信。”

“ 那您可说错了。我相信自己写的作品。”

“ 帕索斯先生，应该相信某些超越我们之外的东西。某些乌托邦的东西，一些超出纯粹个人或者物质之上的东西。例如，诚实、正直、认真、爱情、独善其身、恪守信用，等等，总之，至少应该相信点什么。”

“ 乌托邦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最害人和产生血腥后果的东西。”

“ 这没关系。”他打了一个手势，可能是指远方，或者无足轻重的什么事情。“ 我干革命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克格勃里的俄国人和情报总局里的古巴人，他们像我一样，都能够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是些有信仰、肯牺牲的硬汉子。”

“ 我在另外那个营垒里，也认识一些这样的人。”

“ 我能想象得到。”他清清嗓子，用嘲讽的口气说道“:就冲你有那样的岳父，我就不感到奇怪。但我说的是克格勃和情报总局里的那些老同志、那些有理想的人们、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为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思想而奋斗的人们。您知道今天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吗？”

“ 是牺牲在战斗里的英雄。”

他冷冰冰地声称“:是黑手党的杰出人物。社会主义一结束，他们就把自己的信仰扔进大海里去了；但是，还保留着为捍卫社会主义而学会的狡诈手段：一手拿枪，一手搞阴谋。最后的结果

就是当上了黑手党，就是背叛理想，这对任何人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帕索斯先生，不讲纪律，我跟您说，乌托邦思想就是永远要遵守纪律；如果不讲纪律，那人们就会干出种种坏事来。”

谈话超出了我原来设计的轨道。董甘认为，他那些过去搞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们最后都变成了黑手党成员了；在流亡中，他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前盟友们，都借助自己的父亲或者在国际组织里捞到的职位而大发其财了。如今，智利是民主社会了，他们又上台了，好像是软木人，总是飘浮在水上。

他皱着眉头，明确指出“：今天，那些 1970 年闹革命和 1989 年恢复民主制度的人是被排除在外的。1964 到 1970 年跟蒙塔尔瓦·弗雷① 在台上的人，如今还是他们掌握政权。后来，他们估计阿连德能够打败弗雷，就加入到左派阵营里来了。也是这些人借助他们过去在欧洲享有盛誉的人民政府的官员而过上了舒适的流亡生活——没有人说明他们原来是中间派政府的人。好像这还不够，又是这些人一夜之间在国外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分子，今天又回来治理国家了，也许明天会毫无厌恶地与右派联合继续掌握航行的方向吧。帕索斯先生，智利表达出单一阶级的全面统治，用葛兰西②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的全面领导权。有时，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会穿上左派的外衣；有时会披上社会民主党的制服，或者中间派的衣裳，或者干脆就是右派的打扮。他们总是根据要求穿衣戴帽；总是信誓旦旦地说：权力为民所用，特别是为底层的人们服务。”

他如此激烈地指责左派领导层让我感到困惑。我本来不是为了打听董甘是否把我列入了诺尔维克湖畔杀人案的嫌疑人名单的吗？我本来不是打算暗示探长：马尔库斯杀害了博耶娜吗？

① 蒙塔尔瓦·弗雷（1911- ），智利基督教民主党领袖，1964-1970 年担任总统。
②葛兰西（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眼下，在他引导下的这场谈话过程中，最重要的机会就要从我手中溜走了。

“您说到了黑手党。我猜想您指的是俄国黑手党。这让我回想起博耶娜被杀一案。”我说道，心甘情愿地跟着他的思路走。“我问这个，因为对我正在写的小说有用：您认为博耶娜是被黑手党杀害的吗？”

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朝着挂在对面的熏鱼看了一眼。大概我需要了解这个写小说的断言，他并不十分相信。

“我不知道博耶娜是不是被黑手党杀害的。”他说道。这话把我从沉思中唤醒：“但是，我很高兴您触及到这个话题，因为您在这个问题上说了谎话。”

“您指什么？”

我发觉自己的声音里在微微颤抖。

“您跟我说过您无法与博耶娜沟通。可是您和她都学过德语啊……”

我脸红了。我只好承认我骗了他。

“不，不，您没有骗我，只是对我说了谎话。”他用讲哲理的口气回答道：“但是，我知道您和博耶娜是可以交流，可以流畅地交流的。博耶娜毕业于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专业。您也曾经在柏林读书。您们必须说德语。您对我撒了谎。可是您为什么要撒谎啊？”

当然，我已经被他抓在手里了。凭着直觉我感到，他现在会问我诺尔维克湖畔俄国人之死的问题了。

我回答说：“因为害怕被牵连到黑手党里面去。那几天，诺尔维克湖畔有个俄国人被害了。我担心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您不这么认为吗？”

董甘喝完了第二次海鲜汤。我还在喝第一次的一半，因为饥饿感早已经消散。他用餐巾纸擦擦嘴，考虑了好长时间，目光注

视着柜台上的大锅。我发觉他声调里有怀疑的成分，似乎同时在思考是否值得第三次喝汤。

他说明道"：这是一桩我让它本身自己解决的事情。"

"我原来以为您的工作就是把人们藏起来的瓦萨王朝[1]打捞出来呢。"

"帕索斯先生，您瞧：那个俄国人原来携带着一把马卡洛夫式手枪，口径九毫米，真正的好枪，在俄罗斯人们叫它红星牌。这种枪有几种不同型号，其中有保加利亚型、中国型和东德型。苏联人于五十年代开始生产。从那时起，社会主义国家的保卫部门就使用它。但是，社会主义阵营剧变以后，它就落到坏人手里了。正像我跟您说过的那样，那种人已经丧失了伟大理想，剩下的是军事手段和阴谋诡计。"

"您跟我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要看到这事背后有俄国黑手党，实际上，就是克格勃的人。从前，我就认识他们，不过现在穿着另外的衣裳，讲究实用、不讲思想的衣裳，因为这是右派的要求。"

"这些人您现在还认识吗？"

"有时，我还跟他们谈话呐。"他平静地解释说"当然，只要这些谈话对我查清案子有用。但是，我对您说的这些话不是给您写小说的。"他严肃地警告说。

"您放心吧。"

"诺尔维克湖畔的那个俄国人不是像新闻报道那样说的叫什么维克多·亚辛，而是沃洛佳·波达诺夫。"

"波达诺夫？"

"您知道这个波达诺夫是什么人吗？"

"不知道。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吗？"

[1] 瓦萨王朝，瑞典和波兰的王朝，起始于1523年，结束于1818年。

“不仅重要。而且危险。有致命的危险。从前是克格勃的人。特别行动部主任。”

“我不明白。”我结结巴巴地说道，心里渴望着关于波达诺夫的详细情况。

“马上您就明白了：他是活动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黑手党组织的头目。他用匿名在斯德哥尔摩活动，原因还不知道。但是，这些都不能打动我的兴趣。将来说明白这个案子的不会是瑞典警察，而是黑手党自己。”

不安的心情让我吞咽口水。我觉得心脏要从嘴巴里跳出来了，面颊像火焰一样在燃烧，仿佛有人给我做过面部按摩似的。

“那么在所有这些工作里您的角色是什么呢？”

“您不记得一首歌里这样说的吗？Time is on my side，yes it is……①”

“这是罗林·斯通乐队里的歌手迈克·贾哈尔唱的。”我想起那个好说大话的瘦子来了，于是这样说道。接着，我再次发动进攻：“那么，您的角色是什么啊？”

这时，他的口气里露出某种宽容的态度：“帕索斯先生，唯一可能的角色就是耐心等待从我门口运过去杀害波达诺夫凶手的尸体。”他把两手交叉在一起放在餐桌上面：“因为黑手党比我们会调查，而区别是：他们肯定能找到自己的敌人。”

“那么您就不介入了？”

“用不着。黑手党内部的算账只能减轻我的负担和保护我的人的性命。”

“您认为黑手党肯定能找到他们的敌人吗？”

董甘盯着我的眼睛，强调说：“一定会找到。一旦找到敌人，他们绝对不手软，包括敌人的家属在内。帕索斯先生，时间会过

①英语：时间在我这一边，的确如此。

去,有时会过去很久 ;但是 ,黑手党一定会找到他们要寻找的人,无论那人在什么地方。有时,他们甚至求助警探……厚厚一叠钞票,加上威胁,再有可以出现或者消失在某些档案里的麻烦材料……这您是明白的。不过,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我不着急……”

三十一

我被吓醒了。有人固执地用力地敲门。天还早。我估计是董甘探长携带逮捕令来了；或者是俄国黑手党派遣来的使者、已故波达诺夫的同伙，他们是来找我算账的。根据昨天夜里董甘对我说的话，我猜测，我的来日已经屈指可数了，因为黑手党一定会严厉惩罚伤害过他们的人。我想站起来，但是头疼，好像有人给了我当头一棒。昨天晚上，我漫无目的地在旧城区的没人的小巷踏雪，迈进一家又一家酒吧，喝下啤酒、甜酒和葡萄酒，直到发现一个神秘而又不寻常的情景：面对城里的大教堂，有一扇敞开的大门。

我走到那里。门内传出热气、灯光、音乐和喊叫声。我进去了。大门建在拱形的混凝土里，通向一条长长的石阶可以下降到一间地下室的深处。我向下走去，沿着台阶下降，尖锐的摇滚乐震耳欲聋，湿气、酒气、汗气和海洛因的气味令人作呕。台阶呈九十度向左边拐去，两侧是石头墙壁，混杂着光亮、身影和蝙蝠的

飞舞。冷不防，我撞上了这样一个难以置信的场面、只有 Star Wars（星球大战）的星际酒吧特有的场面，或者 Eyes wide shut（大开眼界）开幕晚会上才有的场面：几百个嬉皮士身穿黑色皮夹克,摇晃着染发,挥舞着文身的胳膊,在乳白色的灯光下,在巨大的石头场地上,疯狂地扭动着、叫喊着。

我马上把这个场面与伊瓦尔联系起来了。这些天，伊瓦尔没有再去图书馆，因为可能她在制定复仇计划，也可能与那群在诺尔维克湖畔恐怖之夜烤火的嬉皮士们在一起。我用目光搜索伊瓦尔,但是没有发现。很多少男和少女都像她,他们一面扭摆,嬉笑,喝酒,狂叫,一面偷偷看我。可是,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伊瓦尔。我估计,如果她在这里,会毫不犹豫地走过来,向我要钱和酒,会用‘猪’称呼我,而我会不得不把她拉到偏僻的地方,说服她：最好别当着警察的面玩咱们的游戏。这些嬉皮士不是在跳舞，而是在龌龊的空气里愤怒地碰撞着身体，好像群魔乱舞。所有的人身上都有一股猴气；乐队也是如此，他们用电吉他和一组打击乐器演奏一首没完没了的刺耳乐曲。乐队成员完全是一副充当 Sex Pistols[1]的模样。我在想并且立刻怀疑自己的想法,虽然后来我证实了：无论昏暗的光线还是深夜的气氛，无论我走在斯德哥尔摩大街上不断喝下的啤酒还是我疲倦的眼神，都没有欺骗我。这就是一群 Sex Pistols。

的确，就是像这些事情让我讨厌现实，我的生活里无法接受这些事情；它们很像梦幻，闹得你最后把它们当成被一个剧本丢弃的简单虚构。但是，他们就在那里庆祝，其方式我觉得是不寻常的，他们认为是愉快的；他们就在那里，沉浸在他们喜欢的喧闹声中，全然不睬斯德哥尔摩大街上的寒冬和上面的统治秩序。

[1] Sex Pistols,上世纪 70 年代英国一支著名的朋克乐队，以各种尖锐、猥亵的方式,宣泄的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

这也是我可怕的悲剧，它居住在这个洞穴里，要不是有这个昏暗的光线，要不是有这盏令人目眩和发疯的聚光灯，要不是有这些电子乐器，我可能就处于史前时期了。我想，这些瑞典人真是怪人，他们总是那么专注、亲切又保持距离；他们总是准备给我一个惊喜。这些嬉皮士也是怪人，他们想摧毁这个我打算居住的世界；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就是希望的同义词。可是这些嬉皮士全都是繁荣、物质丰富和长期民主制度的后代，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只是一味地齐声合唱：

不要让别人告诉你
你想要什么，
不要让别人告诉你
你需要什么，
未来根本不存在，
未来根本不存在，你根本没有未来……[1]

“你是哪里人？”一个在我身边的少年，昏暗中看上去很像 Sex Pistols 乐队的歌手乔尼·罗丹，用英语大声问我。他身穿一件大翻领的衬衫，这让我想起了伊瓦尔。

“南美人。”我回答道，不打算细说。

“那就是你的错了。”少年喊道，手里拿着一罐啤酒，摇头摆尾地走了，丢下了我这个交谈者，向舞场内走去；随即开始又跳又唱，用胸脯撞击他的同伴。

再度响起的敲门声把我带回到现实中来；我想，昨天夜里地下室那个场面是真实的呢，还是仅仅是一场梦，或者纯粹是今天上午可能发生事件的预兆。我胆战心惊地从面向大街和波罗的

[1] 原文为英语。

海的阳台上张望。一看出是马尔库斯站在我家门前，我立刻松了一口气，系好了睡衣的纽扣之后，我平静地从木制楼梯下去给他开门。马尔库斯身穿大衣和皮靴，散发着一股酸性洗发液的气味。他像往常一样，给人的印象是已经做完健身操并且刚刚洗完淋浴。

马尔库斯说道"：我需要跟您谈谈。"

我把他让进厨房。我俩坐下以后，看到户外有一群麋鹿正在穿过花园，在雪地上寻找苔藓。于什霍姆小区一如既往地处于宁静之中，这让我沉浸在忧伤和焦虑的情绪里，好像生活是预先确定的一样，预先安排好来折磨我的。我想，马赛拉此时此刻正在自己的房间里酣睡呢。马尔库斯脱去大衣的时候，我去把咖啡壶放在炉子上加热。现在，我需要喝浓咖啡，因为大半夜是在失眠中度过的，耳中回响着摇滚乐的喧嚣声，心里掂量着董甘的话：亚辛或者波达诺夫，叫什么都一样，他的同伙如今在寻找我的下落 如果找到我，会不假思索地干掉我。

"您这个钟点来我家，一定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吧。"我说话的口气里有责备的意思，好像女老师为了不加重事情的分量而拐弯抹角地批评学生。"您要茶，还是要咖啡？"

"原谅我没有打招呼就来了。"他不安地回答说。我不知道他的脸红是由于外面的寒冷呢，还是由于突然造访可能产生的难堪。"可是我急着马上说明一点跟您有关系的事情。"

"那么要咖啡吧？"

"好的。不过您先听我说……"

在那样模糊不定的情况下，在我头上还高悬着那样的威胁下，而又没有人明确向我说明那是怎样的威胁，这时与马尔库斯谈话，毫无疑问，是我不大愿意的事情。我把咖啡壶又放回火上。随后，我坐下来，说道"：您说吧……"

"不久前，一个名叫董甘的警察来过您家里。"马尔库斯说

道。这让我吃了一惊。莫非为了掌握我家的生活情况，他时时在监视着我们？“我看见轿车。您别否认。”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么说董甘来过这里了。”

“不错，他是来看我的。可您有什么担心的？”

“是您叫他来的吗？还是他自己跑来的？”他故意不理睬我的答复，他的好奇心强烈得难以掩饰。

“他为正在调查的一件案子而来这里。”

“昨天您跟他在超市大楼里见面了。我从远处看见你俩在一家小餐厅里谈话。这个您也不能否认吧？这次见面是您提出的，还是董甘要求的？”

他眼下公开的不礼貌行为让我生气，尤其是他恣意放任的不恭时刻，更加让我气愤。北欧人平时比较谨慎。今天这个家伙实在太冒失了，而且这是什么方式啊。

我抗议道：“我不知道这番可恶的盘问究竟是为什么？马尔库斯，告诉我，您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了？您有当警察的癖好？别胡来了！我遇到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很难忍受您在这大清早跟我玩侦探的游戏。”

我起身，去拿咖啡壶。麋鹿已经不在我的花园里了。此时的早晨在金属般的光辉下，有一种黄昏阴森的景象。马尔库斯在我身后，用手指敲击着桌面，模仿来自远方马群的奔驰声。

他固执地又问：“可是您邀请了董甘呢，还是他本人的主动行为？”

“我再重复一遍，他是不请自来的。实际上，他在调查博耶娜的案子，难道他跟您谈的不是一回事吗？”

“他是几天前来看我的。他认为，案子的背后是算账。正像我曾经跟您说过的那样，博耶娜并不清白。”

我心里想，如果说马赛拉是对的，也就是说，假如马尔库斯

杀害了博耶娜，那么他现在担心的是，博耶娜此前曾经把他私生活里的有麻烦的内容给我讲过；还担心我会把这些内容转述给董甘了。这是唯一可以解释他焦虑的原因。

我从碗架上拿下杯子和勺子，一面说道："报纸上说，博耶娜跟黑手党人有联系。"

马尔库斯的双手攥着一把勺子，紧张地玩弄着。他脸上隐约露出猛禽般的凶狠目光。

"克里斯托瓦，您瞧，我就要办理法律方面的手续，准备离开瑞典了。"他声称："我猜想，博耶娜给您讲述过一系列关于我和玛利亚的假话，都是无稽之谈。我相信您不会相信她的话，也不会转达给董甘的。"

"她从来也没说过什么。"

"别说谎，克里斯托瓦，别说谎！"

"我没说谎。"我回答说，一面从火上拿下咖啡壶："我再次请求您安静下来，要不然就把马赛拉给吵醒了。"

"我都知道博耶娜跟您说起过我，那怎么能让我不生气呢！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还用这个威胁我。您现在就别骗我了。"

我在杯子里倒上咖啡，一面拖延时间。马尔库斯喝起没有加糖的咖啡，目光注视着麋鹿在雪地上留下的足迹。

"我承认博耶娜关于您夫妻状况的说法是冒失的。可是您也没有必要担心啊。"我用调和的口气说道："如果说我和我老婆曾经相信博耶娜说的是真话，那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

"为什么没关系？"

"因为原因很简单：博耶娜被害了。您承认吧：这个时机对您太有利了。"

我嘲讽地一笑。马尔库斯肯定理解了这笑容背后的深意，因为他立刻就开始进攻了。

"博耶娜说的话，您讲给董甘探长没有？"

“我看您太紧张了,马尔库斯。您太紧张了,放松,放松!”我轻轻地对他说“:没必要这么紧张嘛,真的。博耶娜把您的秘密全都带进坟墓里去了。”

马尔库斯双手交叉放在桌子上，探究的目光表明不完全相信我的话。这更加增强了我对他的怀疑。我终于可以肯定他就是杀害博耶娜和玛利亚的凶手了。他固执地问我：“博耶娜的那些胡说八道，您讲给董甘探长没有？”

“如果讲了,您有什么可担心的?马尔库斯。博耶娜已经不在人世了。”

“如果您讲了，警察会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我。这还不明白吗？”他提高了声音。失去了小心谨慎的样子。他很快地喝了一口咖啡。

我装出冷漠的样子。不管怎样，显而易见的是我没有权威性，而不能自命为法官去审理这件事或者类似的案件。

我强调指出“:马尔库斯,如果我是您,我一定会保持冷静的态度。这里没有人碰过任何棘手的事情。”

“谢谢您。您不知道这话让我松了一口气。”

“但是,总有一天有人会说起来的。”忽然,马赛拉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来了，或者至少我认为是想起来她的话，因为从那时起，如同我在诺尔维克湖畔之夜发生的事情那样，我把那些事情都给弄混了，混成一团了。应该说，现实中的事实我不仅把它们与脑海里贮存的事实混淆起来，而且还和我在这部小说里的加工描写混杂在一起了；有时，这些描写是用来误导马赛拉的陷阱，因为我一出门，她就能从电脑上偷看我的作品。

另外，我承认，这个突如其来的情景，我觉得好像在某个墨西哥电视剧里见过，因为这显然是那种没有构成意象的东西。坦白地说吧，某人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情有个定型的想法、一个排除了意外的想法。具体地说就是,马赛拉就在这里,站在我们面前,

好像从天而降似的，无论我还是马尔库斯都没有听见她从楼梯上下来的脚步声。或者有可能她一直就在监视我们。眼下，她站在门楣处，身穿宽大的睡衣，头发散乱，美丽得如同天使；但是，她同时又像鬼怪一样紧张和面带挑衅的神情，嘴巴露出一丝坏笑，仿佛毒蛇或者吸血鬼的表情；她的目光毫不掩饰地表现出要在一些重大事件中争取主动权的愿望，而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事情的进程。

“这‘总有一天有人会说的’是什么意思？马尔库斯突然脸红脖子粗地追问道。严格地说，他的脸色比往常要苍白得多。

马赛拉如同一个在顾客面前展示波斯地毯的商人那样从容不迫地回答道：“就是说董甘有一天会获悉我们今天知道的您的事情。”

“您这是在讹诈？”

“如果您非要使用这种词汇，那是您的事情；但是别以为我们会保持沉默，会无缘无故地变成您的帮凶。”

寂静，确切地说，是比平日更加漫长和震撼人心的寂静，占据了整个厨房，应该说，占据了这所住宅；这让我想起剧院里最为紧张的时刻。马尔库斯的眼睛注视着他那半空的杯子；我向花园望去。麋鹿曾经又一次出现在那里，可怜的动物，在这有黄昏景象的冬日上午，忍饥挨饿。我对马赛拉的行为感到羞愧。事先，我俩并没有就此达成协议。而马尔库斯肯定会认为这是一次协调好的行动。因为心里想马尔库斯犯下一两件杀人案，这是一回事；而确定此事的发生是另外一回事；更糟糕的是利用主观猜测，企图敲诈人家。

但是，在寂静中——似乎压缩了时间——我很快就确信马尔库斯是罪有应得，我妻子理应如此对待他。是的，很可能马赛拉有理，我俩面对的是一个双料杀人犯，虽然几乎不能加以证明。为此，那只有一种惩罚马尔库斯的方法了：通过威胁。这样一

来，我俩就可能变成代表上帝对他进行惩罚的角色；马尔库斯这个公开的杀人犯，绝对不能让他漏网！马赛拉以直率的方式行动是正确的。这是唯一永远摆脱可能来自马尔库斯由于利用诺尔维克湖畔事件而对我们进行敲诈的方式。

我不记得是不是马尔库斯问道：为了保守秘密，你们要求什么？还是马赛拉坦然自若地把价钱摆到了桌面上了。因为就在需要记录下发生的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的神经系统出了毛病；而且记忆力也出了问题，因此现在只好努力回忆那一切，以便纳入这个更大的虚构作品之中。但是，我绝对清晰地记得：马尔库斯站起来，把双手插入裤子口袋里，走到面向花园的窗户跟前，丝毫没有沮丧的神情，说出一些我只能大概重复出来的话："如果你们想把事情做绝，那么你们应该知道：诺尔维克湖畔住宅里的威士忌酒瓶和杯子都在我手里……"

这句话震得我心惊胆战。在马尔库斯的眼睛里，瑞典人那种表面上的淳朴已经荡然无存，他注视着我俩，因为我俩的吃惊表情而显得格外亢奋。马赛拉急忙离开厨房，连蹦带跳地蹿进地下室，稀里哗啦地翻腾瓶子和木箱。我和马尔库斯都听见了下面的响动。她泄气地回来了，走得很慢，双手拿着我俩在诺尔维克湖畔摔坏的灯座大理石碎块。她在我身边坐下来，垂头丧气，两手交叉,放在餐桌上。

"马赛拉，您根本用不着费力气跑一趟。那把马卡洛夫牌手枪也在我手里。"马尔库斯厚颜无耻地说明道"：我只留下了大理石碎块，给你俩做个纪念。"

我老婆喊道"：见你妈的鬼吧！"

所有这些，我觉得已经不像什么墨西哥电视剧了，而是侦探片的结束场面：一切都说明白了，事件也都有了了结，仿佛每部影片都有责任交代出一个对事件清晰和有道理的看法，好像导演们害怕开放的结尾，好像生活总得给我们提供完整的解释和

意义，好像在放出‘完’字之前，一定得提供完美无缺的寓意。

“你们从诺尔维克湖畔回来的那天夜里，我带着小狗出去遛弯，那完全是老天爷的安排。”马尔库斯说道。刹那间，他的眼睛，准确地说，他那明亮眼睛中凶狠的挑衅性的目光，让我回想起嬉皮士们在地下室里乐队歌手罗丹的眼睛。“那天夜里我看见你俩紧张极了，后来才知道警察在找杯子、酒瓶、大理石碎块和一把手枪，那时我意识到你俩是杀人凶手。另外，马赛拉戴的假发也非常可疑。朋友们，在瑞典我们是不过万圣节的——别来那套小孩把戏了。”

“那些东西你是怎么弄到手的？”我问他，一面向马赛拉身边走去，从她手里拿过那冰凉、沉重和边缘尖利的大理石碎块。

“很简单。昨天，马赛拉在睡午觉，您在餐厅说服探长逮捕我的时候，我就进了您家门。”

“您发疯了。”马赛拉抽泣着喊道。“克里斯托瓦从来没想过要伤害您。我们手里的那些东西是您做事的证据。”

“证据？”

“对，是有力的证据。”

我用手指摸摸大理石光滑的一面；触摸的结果让我回想起诺尔维克湖畔之夜的情景：那个俄国人满腹疑团、浑身血淋淋地倒在地毯上了。我知道假如我用那块石头狠狠打马尔库斯一下，仅仅一下，那我俩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也就立刻摆脱了这个敲竹杠的家伙。

“那你们为什么这么同情我而不把证据交给警察？”

“马尔库斯，我们不愿意伤害您。难道您还不相信我们吗？”马赛拉说道。

“你们以为我是个白痴？”他问道，一面抬高声音，一面挥舞着胳膊，好像演员在表演。我向他身边靠近。“你们所以没有告发我，是因为咱们的情况相同。如果你们告发我，那么我也告发你

们。如果你们保密，我也保密。不过，尊敬的邻居，你们来决定吧。”

尽管情形模糊，我记得，我们三人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呆在安静的厨房里，同时感觉到光线在这个舞台上渐渐暗淡下去了；而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我们——在反复研究当前的形势，在困惑、犹疑地认可马尔库斯描写的那个不幸的结局之前，我们回顾了具体细节。我想，“There's no futute”[1]我相信，地下室那一幕已经是现实或者我梦想中的残酷预兆，但终究是一种残酷的预兆。马尔库斯突然抓起咖啡杯，送到洗碗池那里；他以掌握家常规矩的鳏夫的姿势，把小杯子放进洗碗机 随后，二话不说，也没有摔门，像个真正和蔼可亲、谦虚谨慎的瑞典人那样，走出门去。

我丢下大理石碎块，跟在马赛拉身后，小跑着上楼，进了我的书房。我需要从窗帘后面监视马尔库斯。我俩看到马尔库斯穿过街道，没有回头，走进他家布满白雪的花园。栖息在女神雕像头上的乌鸦，突然飞走了，早晨的气氛变得更加孤寂。马尔库斯登上楼梯，擦去皮靴上的白雪之后，迈进了家门。那是一座红色住宅，有白色窗框和倾斜的屋顶，安静地面向波罗的海；后者终于准备解冻了。

(1) 歌词里那句英语“未来根本不存在”。

三十二

时间：2001 年夏天；地点：葡萄牙阿尔布费拉

由于我担心马尔库斯有可能破坏达成的保密协议——地点在我家厨房，时间就是那个不吉利的早晨，马赛拉悄悄下楼，我也不了解她的意图，与此同时，麋鹿群在光秃的灌木丛里寻食——我在瑞典的居留就变成了噩梦，变成了一个被于什霍姆小区冬季迷雾和模糊气氛确定的期限、被这样的危险所确定的期限：便衣警察随时有可能手里拿着杯子、酒瓶和那把杀人的手枪，来敲我家的大门 要么是这样的危险 两个身穿皮衣、头戴礼帽的俄国杀手光顾我家。

因此，方才我刚刚在一个被遗忘的纸匣里找到了我在于什霍姆小区住宅匆忙装箱时的部分东西，偶然发现了存有这部小说的硬盘；这部小说实际上最后写出了我发生的全部事件：我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往日、与马赛拉勾心斗角的生活、诺尔维克湖畔的要命事件以及马尔库斯精心算计的谋杀案。所有这一切现

在一一展现在我眼前，它们被不清晰的背景所笼罩，如同笼罩着旧金山的海雾一样。硬盘就在这里，在纸匣里面，旁边是一套残缺的银制餐具,马赛拉说,餐具原属于福西那 ·鲁辛公主,旁边还有一个神秘的指南针，上面有些难以破解的符号，里面有个紧张跳动的针，好像受伤的燕子。现在我想：硬盘里包含的一切是真实的吗？还是纯粹是我的想象？或者所有那些内容只有通过写作才能有牢固性？就因为我才写一部作品？因为我像读者相信自己喜爱的小说那样忠实地相信自己的作品？

我刚刚在葡萄牙的阿尔布费拉住下，这里是阿尔加维[1]的南部海岸，属于干旱地区，到处是漆黑的悬崖峭壁，人们说的葡萄牙语比首都里斯本柔和；我面对波罗的海的过去正在消散，剩下的只有这个硬盘，它抵抗着湿气和时间的进攻，它证明所有那些事情的确发生过，或者至少它作为发生过的事存在于我的记忆里了。

概括地说，这就是全部故事了；或者至少是我记得的、我能讲述的和我已经讲述出来的故事了。当然，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故事，而且它的结尾太突兀，结束的时刻出乎意料之外，好像我取消了一个 in crescendo[2]的结局，取消了每个读者都渴望的高潮。但这样做法的原因是，我一直打算写一部非传统小说，原因是我有意迁就自己，或许过于写得断断续续了；原因是我把回忆中的一切都当作现实，无论其中包含的利弊如何，甚至冒着这样的危险：我讲述的事情缺乏意义，不符合任何逻辑秩序，如同我们日常生活里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总之，不容置疑的是，我在笔记本电脑上重读这些文字时，现实并不一定表现为我们从电影和小说看到的那种有逻辑、有震动感和严密的系列，而是表现

(1) 阿尔加维，葡萄牙南部省份，西南濒临大西洋。

(2) 声音渐强。

为慌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形式，好像混乱是规矩，而秩序反而是例外，一切都可能是这种形式，或者那种形式。不错，如果人类的命运具有明白无误的意义——实际上，这是假的——那么世界就会通过一种稳定的秩序和不无道理的摩尼教来治理了[1]。而在生活中，事情恰恰往往以另外的形式发生，仿佛上帝已经死了，仿佛上帝已经在邪恶面前投降了，或者已经疲惫了，好像地球的变化已经落入丝毫不严谨的厄运之手，或者是背信弃义的魔鬼手中。否则的话，我是无法明白的。眼下，我一个人住在阿尔布费拉，不知道马赛拉和蒙图法尔的情况如何；我不得不使用假名字出书，因为我是个在逃犯，尽管并没有人追捕我 我再说一遍，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身上出了这么多坏事？为什么我不能分清"幸福和悲哀"？但是，在生活里，的确常常发生无缘无故、毫无道理、莫名其妙的事情——欺骗、快乐、不忠不义、贪赃枉法、杀人越货，这是一种证明上帝早已经死去多时的混乱——马尔库斯根据尼采哲学思想推理出来的说法——上帝放弃了对宇宙的引导；更为糟糕的是上帝把这未竟的事业留给了邪恶天使。通过这些，我想提醒一下：如果把虚构特有的标准应用到分析我讲述并且今天就要在阿尔布费拉结束的这个故事上，那么既不合理，也毫无益处。

但是，在尾声之前，我想澄清一点：我和马赛拉离开斯德哥尔摩已经多年了。我们与马尔库斯完全落实了长期协议——我要强调一下：没有说很多话，仅仅以表情和沉默就确定了我们之间的同谋关系——但是这个任务很艰难，要求双方盲目地信任对方，因此我和马赛拉总是没完没了地彻夜交换看法。在那些失眠的夜里，有时我俩听见马尔库斯深更半夜地回到家中，我俩便

[1] 摩尼教，该教认为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是泾渭分明的，世界是有序的；主张过严格禁欲的生活。

焦急地起床，因为担心他去警察局举报我们，直到他家的灯火全部熄灭，我俩方才入睡。但是，我估计，一旦我们离开斯德哥尔摩，马尔库斯还会发生别的事情。我没有留在马赛拉身边。恰恰相反，我俩分开了，分手的地点就在阿尔兰达那个机场。我俩分别登上了不同方向的飞机，互相不知道对方的目的地，但是共同发誓：绝对不做伤害对方的事情，不给外人提供我俩落脚地的线索。这样一来暂时被遗忘的不仅是我的猜疑：我一直无法以确凿的方式查证的猜疑，我对马赛拉最新面具的怀疑，对她的欲望和想象的怀疑，对她真实存在或者是我想象出来的情人们的怀疑，对她和她父亲保持同谋关系的程度的怀疑，而且还有她那从来没有为了我高兴而穿戴过的情爱衣物，或许属于她的某个女友的情爱衣物的怀疑。被深深遗忘的还有她因为我和女舞蹈演员的恋情而生出的怨恨；还有起初马赛拉对我无疑的爱情和最后的结局；还有与波达诺夫、博耶娜和玛利亚之死有关系的详细情况。

总之，我不想迷失在细节里；但是，所有这一切除去说明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说明了生活并不遵守什么逻辑性，也不追随什么目标，还证明了完美犯罪的存在。马尔库斯的杀人，我和马赛拉的杀人就是完美犯罪。我认为，这归咎于我们三个都没有加入犯罪集团，恰恰相反，我们像正常公民，没有犯罪前科，一直生活在怀疑犯罪的对象之外，在关键时刻我们能让偶尔的检举无效。

这个道理，我愿意再重申一遍。我不认为自己是罪犯，也没有罪犯的感觉。我从来没有准备或者预谋诺尔维克湖畔发生的事情；正如马赛拉经常急切地解释的那样，那是一次偶然事故。无论如何，引人注目的是，董甘探长后来没再讯问我。我承认，有些时候，就在我欣赏这座处于拂晓的城市和红色屋顶在海面上泛起银色的闪光时，就在我品尝炸沙丁鱼和绿色葡萄酒的时候，

我曾经猜想，法古塞大使——有时我上网可以看到他在为艺术展览开幕剪彩，或者主持学术研讨会，或者为政治家和企业家举办招待会——总是在董甘面前用某种方式为我说情，当然是在他权力范围的保险系数之内。他这样做是可能的；他什么也没做，也是可能的；因为归根到底他是个玩政治的，而凡是政客都不会为他人火中取栗。或许还是马尔库斯有道理，因为他估计即使探长认为我们双手不干净并且对我们有怀疑，但是他缺乏足够的证据清理我们在瑞典的定居生活情况。

总之，所有这一切并无突出之处，只有些微的闪光，让我的记忆感到不安。马尔库斯在我们离开瑞典前，就带着孩子们搬出了于什霍姆小区。根据他对我的预告，也许是在撒谎，他准备去美国佛罗里达。我不清楚那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是否陪同他前往。一天上午，我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曾经见过她。但也许有可能去了美国，今天正在享受着他在前妻和受害人身边不曾享受过的幸福。当我们看见带有高大集装箱的卡车停在马尔库斯家门前的时候，不一会儿他本人就出现在搬运工中间，手里提着行李和口袋，于是我们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同他见面了；还明白只要他一离去，我们要求他掏钱来换取沉默的可能性也就化为乌有了，同时也就不可能告发我们了。我们知道他带走了杯子、酒瓶和手枪，这些破烂会长期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那样悬在我们头上。

从这个面向大西洋的茅舍里——这里的大西洋很有些地中海的味道——我不时地在互联网上漫游，查看关于瑞典的消息，打算看看诺尔维克湖畔事件以及博耶娜一案是如何结案的；而玛利亚之死似乎已经最终定案了，这是法古塞大使在我们最后一次于斯德哥尔摩的谈话中透露的。有时，我以为事情是这样的：警察在马尔默抓住了一个涉嫌博耶娜案的科索沃移民；还有传闻说，波达诺夫被一个立陶宛妓女干掉了。那妓女属于在西方

活动一个时期、然后返回前苏联帝国那无法查询的深海里的妇女，一回国就永远消失了。尽管维夫多莱托·蓝的假画，就是马赛拉出售给俄国人的那一张，报纸上说，是一个从事制造赝品的古巴艺术家画的，却一直无法查清作品是如何落到那个俄国黑手党手中的；在董甘指挥下的瑞典警察的足迹，似乎消失在哈瓦那热情而芬芳的黑夜里了，那些材料也被搁置在某个部门的抽屉里了。

我在机场与马赛拉分手以后，就修改了原来的计划：没有像此前暗示给马赛拉的那样去智利南方的奇洛埃岛藏身，而是跑到阿尔布费拉这个小港口里来了，它位于葡萄牙南方，是个小渔港。借助我从马赛拉和她父亲组成的商业公司里拿到的一笔相当可观的退股金，我在这海岸边购买了一块土地，建造起六座消夏茅舍，出租给欧美旅游者。我住的这座茅舍充做接待总台。这里面向大海，面向红顶、白墙的小房子，面向曲曲弯弯通向小山的胡同。我消磨时光的办法有：忙于租赁业务，光顾村民们前往的咖啡馆和餐厅，创作永远不会发表的小说，因为只要我的作品一出版，就会把马尔库斯、马赛拉或者某个侦探吸引到我这个安静的、与世隔绝的避风港来。

说实话，这部小说没有多么充实。起初，在于什霍姆小区动笔的时候，我有些漫不经心；但是，随着我的妒忌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以及那些有血有肉的人们的行动，我便以空前的热情继续写了下去。就因为这个原因，在斯德哥尔摩，我把那台老笔记本电脑卖给执意要买下的贝贝·克里斯塔之前，我删除了保存在硬盘里的犯罪内容而没扔掉这个硬盘，而如今它被我当作垃圾扔在一边，或者说，我本以为把它扔进了垃圾箱，因为即使有股疯狂的热情鼓励我去修改和完善这部作品，我却一直觉得永远不会把这个文本变成我喜欢和每个孩子都喜欢的那种小说。为此，正像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当我在装有阿尔特米萨和

奥美罗·汉迪莱斯齐的绘画的大包裹里面发现了小说手稿时，我激动得浑身颤抖。这些绘画是马赛拉的财产。她肯定是搞错了，把它们塞进了我的箱子。我在瑞典就打算忘却的故事突然又露面了，这毫不掩饰地告诉我：这个故事拒绝死亡，拒绝被遗忘吞噬，要求给予关注；也许尽管经过了一段时间和它所谓的毫无意义，可能值得重读和加工。所有这些背景情况，在我的脑海里已经变得模糊起来了，因此我无法区别什么是发生的事情、什么是讲述的故事，这些背景情况引诱我去相信：我在斯德哥尔摩一度担心的事情或许是真实的，即马赛拉掌握进入我网页的密码，她一直偷偷在窥视我所写的一切，拿我的痛苦取乐，看到我详细描写的醋意而开心，一发现我在电脑上承认自己天真、无知，她就开心地笑了：我写的全部文字最后就变成了这样一面镜子了。但是，我不应该因此而排除这个硬盘在绘画中的再度出现，可能意味着单纯的巧合；还不应该排除的是，或许我的前妻从来就没发现我在写夫妻关系纪事、一种既令人震撼又是失败的关系史。

那天，我把硬盘插入茅舍里的笔记本电脑，舒舒服服坐在扶手椅上，耳边传来阿尔布费拉夜间的涛声，终于带着乡愁地开始重读荧屏上的文字，我想或许是我自己从来就没把硬盘扔进垃圾箱里去。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准备离开斯德哥尔摩前的几天里，我一直处于惊恐、疲惫状态，时时担心伊瓦尔会突然闯进来要钱，或者是董甘率领警察破门而入。或者也许干脆就是我自己扔下了硬盘，因为手稿过于忠实我曾经面对和宁可忘却的真人真事，可是这个硬盘却偏偏要挣脱遗忘。无论如何，让我感到鼓舞的是我回想起马赛拉、那个至今我仍然爱恋的美人、桀骜不驯的女人——突然就不再爱我了，其原因我至今不明白，她也从来没有明确说过——或许在不经意间，拯救了这部被忘却的作品，为的是将来在某个远离或者靠近这里的地方阅读它，可能就在附近的村庄里，面对这片宁静而又严肃、平静而

又芳香的大海，在这个布满精神创伤的海岸上，头顶上是阿尔加维省蔚蓝的天空。

自从我在超市餐厅里与董甘共进午餐以后，我再也没看见过这位无所畏惧的侦探和怀念祖国的老海员。在餐厅里，我品尝着海鲜汤，虽然不像探长声称那样鲜美，但那个地方却为我俩提供了谈事情的环境，如果换个地方，我俩根本不能涉及那样的话题；他让我意识到波达诺夫之死对我构成的威胁。那个智利和瑞典的警察是个怪人，不是标准的流亡者，最后不是为阿连德的革命的契卡[1]工作，而是为世界上最反共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警察机关效力。他是那种少见的标本浓眉，黑眼，说话从容不迫，缺乏幽默感，总是走在日常工作的现实和经常惬意阅读的小说虚构世界之间。此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样的警察：畅谈夜莺唱歌，梦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享受艺术，怀抱乌托邦性质的社会渴望。

我再也没有见过董甘探长，实际上是到今天下午之前为止：他那强壮有力的形象——体重增加了几公斤，出现在接待室的门口，浑身冒汗，身背橄榄绿的背包。我立刻认出了他。自从我俩在超市餐厅会面之后已经过去几年了；时光仅仅在他的胡子上留下了印记，如今已经完全银白。他身穿牛仔裤和一件与背包配套的马甲。一个中年妇女陪伴着他。她有一头烫过的黑发，大概是瑞典政府里的智利官员。董甘给我介绍说，她是他的同伴。我立刻浑身颤抖地想起，探长与可怕的俄国黑手党一样，能够跑到天涯海角去抓捕罪犯。现在，我俩在欧洲西部的尽头面面相觑了，旁边就是辽阔无垠的大西洋；我俩又多活了五岁，行动更加缓慢，活力越发减少，理想更加落空，担心的事情又有增加。而最后，董甘探长还是把我抓住了。

[1] 契卡，苏联肃反委员会的简称。

“地球小得像一块手帕嘛!”他一面握住我的手,一面毫不动情地说道。接着,他翻阅一本放在柜台上的书:“帕索斯先生,您肯定不相信，可我一直很想见到您。”

“探长,真是难以相信。好像昨天咱们才在斯德哥尔摩告别。可今天就在阿尔布费拉互相问候了。的确，对您来说，没有不可缩短的距离。董甘探长亲自来到了阿尔布费拉啊！”我装出高兴的样子说道。可我不知道干吗要伪装。

“太太呢？”他的视线离开书本,问道。

我到了这份上就做出了一个激烈的决定：伪装。如果说到现在董甘还没有逮捕我，那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在等待葡萄牙警方的手续，而葡萄牙警察办事的拖拉和官僚作风是举世闻名的。

“我俩分居已经好长时间了。”

“一离开斯德哥尔摩就分手了？”

“是的。”

“目前她在什么地方?”

“不清楚。我们从来没有写过信。”

“嘿呀,真遗憾。”

“是的,的确遗憾。不过对双方都好……”

“可是我一直认为你俩是一对模范夫妻，会白头到老呢。”

“探长,没有什么白头到老啦。这您是知道的。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我心里想，但是没有敢说出来：这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到目前为止，这里的生活最充实，从前没有体验过的温暖的气候、干净的沙滩、上等的海鲜和鱼类以及葡萄酒、沙丁鱼和牡蛎，这里都有。这里还有和蔼可亲的人们，有着浓密黑发、摩尔人大眼睛、肤色像橄榄、容易被诱惑的女人。她们说起话来非常性感,看起人来羞羞答答，做起爱来全身紧贴着你、大蜜桃般的乳房如同太平洋里的海花菜吸附在岩石一样地粘缠在你身上。应该实事

求是地说，这是快乐的生活，部分原因要感谢蒙图法尔上校几年前交给我的新身份证，那是在我们的公司解散之前，永远分手之前和发誓让遗忘症淹没我们共同的历史之前的事情了。

“马赛拉还做古玩生意吗？”探长询问道。他吁了一口气，与此同时，几颗汗珠从前额上滑下，钻进了胡须里。从胡须的长势看，显然缺乏管理。

“我估计她会做买卖的。”

“我想，这个时候，她正在纽约、伦敦或者巴黎某个剧场演出呢。可能她的真正才干是表演，而不是做艺术品和古玩生意。我估计她是在剧场里演出呢。”

“也许在拉丁美洲国家的首都里，比如，马那瓜[1]、特古西加尔帕[2]或者圣何塞[3]。”我讥诮地说道。这时我没有情绪玩幽默。我在他手里掌握着，只能盼望别通过我来调查马赛拉的下落；再说，这事我也不知道。“您呢？真的乘帆船越过大西洋到达了加勒比海？”

他摇摇头，一言不发，松开双手，点燃香烟。随后，他开口道：“还没有。但是肯定要去的。权当是去过了吧。”

“还有呢？”

“我还住在奥兰达呢。您还记得奥兰达吗？”

“怎么能不记得呢？它在机场附近，周围都是白桦树林……”

“就是那里。您记忆力很好。”他确认道，一面从鼻子里喷出烟来。

“有些事情记得住……”

“我每天早晨开车去斯德哥尔摩。每天起草证书和报告，报

[1] 马那瓜，尼加拉瓜共和国首都。

[2] 特古西加尔帕，洪都拉斯共和国首都。

[3] 圣何塞，哥斯达黎加共和国首都。

告和证书。没有什么能够吸引一个像您这种才能的作家。对不对？”

部分地减轻了热气的凉风从海上吹过来，从大街对面吹过来，轻轻地吹拂着街道；大街上点缀着一些阳伞。从阳伞下传来游泳的人们的嬉笑声。陪伴我们的只有天花板上电扇的嗡嗡声以及悬挂在门楣上花铃的叮叮声。董甘背靠柜台，双肘支在台面上。这姿势让我回想起他在瓦萨博物馆里遇见我的那个上午。

“帕索斯先生,您知道吗?有件事您可能不相信,但是的确有人把您的一部小说传给我看了。”他这样说道。他的女伴这时以瑞典妇女特有的怀乡情绪，脱下鞋子，孤独一人向海滩走去。董甘用高兴的目光追随着她的身影。

“难以相信。”我感到一阵无法描述的轻松，这是毫无理由的,因为从他来这里的事实看,只能是为了找我而来。但是,如果他愿意跟我谈文学，那就不是来寻找我而是偶然相遇的。那么我就可以认为他的出差有意外的理由，甚至可以猜测出他并不知道我新的身份证。

假如情况的确像他描绘的那样，也就是说，他来到这里是为了度假，那么天黑以后，我一定像往常我习惯的那样，去海洋咖啡馆的露台上喝葡萄酒。海洋咖啡馆是座两层的宜人小楼，外面漆得雪白，从露台上可以俯瞰整个集市的石头广场以及停泊着渔民船只的港口。我经常在那里阅读旅游者丢下的报纸，希望能找到关于斯德哥尔摩的消息；我在那里经常翻阅旧书，那是咖啡馆的女老板免费提供给顾客阅读的。女老板是个美国人，因为某个可疑的事件逃离了马里兰州，如今在出售海上的特产、地上的淡酒和蜗牛。

“传给您的是哪一部小说?”出于好奇,我问探长,因为在我离开斯德哥尔摩之前就没有发表过东西；自从那以后写好的小说，我都保存起来了，为的是将来能用我的真实姓名出版发行。

从远方传来一阵塞萨里雅·埃维拉[1]演唱的忧伤民歌，与海鸥的鸣叫混杂在一起了。

“传给我的那部小说没有书名。”董甘说道，再次从鼻孔里喷烟，目光则注视着那条小船，它此时已被渔民们翻倒在沙滩上了。浪花调皮地跳动着，而我则想象着探长的目光躲藏在墨镜后面，如同铁钩一样抓住了我的表情。

我说：“奇怪啊，因为我的全部小说都有书名。”

“可是我手里的那部就没有。”

“也许没有封面？”

“没有。”

“那您解释一下。”

“事情非常偶然。”他用警察的口气说明道：“您在离开斯德哥尔摩之前，把电脑卖给贝贝·克里斯塔了。他是我从前的同志。因为他不是特别喜爱文学，可是他却在硬盘里发现一份存档，里面提到我的名字。于是，他就传给我了……”

“啊，是这样？”他的打击让我产生了一阵奇怪的头晕目眩。每当我处于困境时我的记忆便混乱起来。不久前我还坚信，在把老笔记本电脑卖给贝贝·克里斯塔之前，我就把硬盘上的全部储存都删除了啊。不可能留下了我在瑞典生活纪事的副本。

“不错，那是您的小说，是在斯德哥尔摩于什霍姆小区开始写作的。第一句话是：‘一星期前，我邻居的妻子去世了，可是直到今天我才……’”

我知道一切全完了，我下定了唯一可能的决心。柜台的抽屉里藏着我的手枪。探长全然不知我的企图，目光继续沉浸在镜面般大海呈现出的迷茫远方，随同他的女伴慢慢走进水中，女伴没有脱去裤子，没有放下背包，沉醉在波浪的抚摩中。

[1] 塞萨里雅·埃维拉，葡萄牙著名女歌手。

“您觉得我的小说怎么样？”我问他，明明知道我处于既不真实又难以处理的境况，而指控我的竟然是我自己的作品。

探长慢慢转过身来面对我，几次清理喉咙之后，严肃地摸摸胡须，说道：“实际情况是，我把小说下载下来了，准备在这次假期里阅读。但是，您别抱幻想。请记住：我不是文学家。”他露出一丝冷笑，说明他有些不快。“这样，您就别指望专业性的批评了。正如您知道的那样，我仍然不过是斯德哥尔摩刑警队的一名探长而已，只是一个在调查、审讯和写报告中过着单调生活的男人而已。”

董甘的最后记录

时间：2003年4月　　地点 瑞典奥兰达

克里斯托瓦·帕索斯把阿尔布费拉这个小小天堂变成他永久避难所的企图是失败了。

那天夜里与帕索斯谈话之后（地点在他当作旅社接待厅的房间里），我去了海洋咖啡馆二楼露台。那是一座石头旧楼，面对小海湾。莱奥诺尔[1]在那里等着我。天空上布满了星星。我和莱奥诺尔共进晚餐：烤龙虾，葡萄酒；与此同时，从嘈杂的谈话声中，好像悄悄地传来塞萨里雅·埃维拉忧伤的歌声。她惆怅的情绪也传染了我。喝完两瓶葡萄酒、吃下一些橄榄果和饮下各自的咖啡以后，我对莱奥诺尔说，你在这里等着我，我要出去几分钟。于是，我摇摇晃晃地穿过广场，钻进小胡同，来到克里斯托瓦·帕索斯的茅舍附近。需要说明的是，我去看他，仅仅是为了邀请他

(1) 莱奥诺尔，探长的女伴。

与我们一起喝几杯；这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打算，为的是找回从前的共同的政治话题以及了解他和蒙图法尔上校达成某些协议的真正原因。直觉悄悄告诉我：在克里斯托瓦·帕索斯那张作家和管理旅游茅舍新手的嘴脸后面，隐藏和跳动着一颗充满内疚和矛盾的心，一颗装满故事、计划和失败的梦想的心。

我没有说错。在他接待旅客和写作的小厅里，天花板上的电扇还在静静地旋转，从一扇敞开的窗户上，传来一阵阵串铃的叮叮声，好似在抱怨什么。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一片非洲大草原，上面有狮子和大象。克里斯托瓦·帕索斯仰面朝天躺在地面上，一颗子弹射入了口腔。鲜血染红了手枪，与瓷砖的红色混合在一起。我马上就明白了：他的自杀与我有某种关系，与他生前的冒险史有某种关系。为此，我毫不犹豫地拿下电脑里的硬盘。几个月后，我从硬盘里查明，帕索斯正在修改这部没有题目的小说。过了一会儿，我才跑去报警。

他意外的死亡可能会搅乱我的假期；为此，我和莱奥诺尔搬到一个有些肮脏、远离城市的小旅馆去住，在那里至少可以尽量忘掉那出悲剧和装出我的假期仍然在继续，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绝对没有人会相信，只是一种偶然性，或者就是命运，把我拖拉到那里，就好像巨浪把遇难者冲到海岸上一样。所以我保持沉默，让这一自杀事件的调查由我的葡萄牙同行们去做，他们虽然无能，却待人和蔼可亲；我估计，这些警察永远破不了什么大案。我在阿尔加维的日子里，当然不可能阅读那部小说，它经过克里斯托瓦的手，又经过我的偶然介入，已经变成了遗作。由于作家之死让我感到压抑，就和莱奥诺尔提前回奥兰达了。

只是到了第二年的冬季，我才平静下来，才有了足够的时间沉浸在贝贝·克里斯塔在电脑硬盘里发现的作品，它大体上——而不是整体上——与克里斯托瓦·帕索斯在阿尔布费拉储存在硬盘里的作品吻合。如今它已经在我手中了。这部定稿比起初稿

要完整和细致，是写在硬盘上的，从来没有离开过斯德哥尔摩。我这样肯定，是因为我阅读了全文并且把初稿和定稿作了耐心的比较后得出了权威结论。但是，只是在比较完了之后，我方才意识到这是一本坦白书；于是，我第一次违背了警察的誓言，贸然决定不把落入我手中的东西交给警察局支配；我自己动手小心谨慎地开始调查实际上在于什霍姆小区发生的重大案件，也要查清作家丰富的想象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以及作品中叙述者有些矫揉造作的推测。这个自己给自己布置的任务，还真有些非同小可的意义呢，因为不管怎样，其中包括没有查明的三条人命和帕索斯的自杀啊。

寻找马赛拉下落的工作整整用去了我四十天的时间。要不是国际刑警里的朋友们的支持，时间还要更长。可以说她的下落是大致的，模糊和不能确定的。但是，对于一个临时校对一部未完成作品清样的人来说，这个下落范围是很有用的；而对于一个瑞典探长处理这个案件来说，当然没有用处。我可以从马赛拉的行为举止中重现出如下的场景：她离开斯德哥尔摩之后到中美洲去了，此后就失去了线索。国际刑警的朋友告诉我，她在洪都拉斯的圣佩德罗·苏拉住过，从事热带木材的买卖，虽然也有传闻说，她住在阿蒂特兰湖边的危地马拉小村庄巴那豪切尔，使用一张假身份证。那是一位多年前、军事独裁期间在圣地亚哥当外交官的上校替她弄到手的。另外还有来自警方提供的消息说——也值得重视——那女人不是马赛拉，不是帕索斯的前妻；真正的马赛拉离开斯德哥尔摩之后前往佩藤[1]的原始森林里去了。她在那里主办了一家内战孤儿收容所，后来被一支人民革命军的游击队当作政府的情报人员给枪毙了。虽然到此为止马赛拉的线索是中断了，但我却有另外的说法，可以说是更加大胆的

[1] 佩藤，危地马拉北部省份，大部分为热带雨林所覆盖。

说法，下面我要详细说明。

调查马尔库斯的下落，当然是大约的去向，相比之下，不那么复杂，因为有一天他乘坐的来往于迈阿密和卡依曼岛之间的小型飞机失踪了，它的遗骸再也没有被发现。幸运的是他的孩子们没有跟随他一道旅行，因此获得了一百万美金的保险赔偿费。

我一直没能准确地证实阿尼卡的存在，她是克里斯托瓦笔下虚构出来的马尔库斯的情人；我断断续续地推测，这可能是那位作家想象的结果，这就不奇怪了，因为我想到：克里斯托瓦自我介绍时说自己是个成功的作家，原因是如果在智利，只能自费出版,印数很少,在智利文学上不会有任何作用。但是,一个出生在古巴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告诉我，有些调查材料显示，马尔库斯没死，他伪装出了事故，就是为了逃脱警察的追捕，因为他与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什么案件有牵连，还为了让他的子女们领取保险金，以便随后在西印度群岛的卡塔赫纳对面的一座荒岛上开始过隐居的生活。这种说法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虽说某些古巴人，无论流亡的还是本土的，都不大可信，因为他们常常把真的说成是假的，而把假的说成是真的。但是，我并不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马尔库斯仍然活着，继续生活在什么地方；根据克里斯托瓦的作品可以容易地查明：马尔库斯厌倦了西方文明世界的生活。他的装死是他为了彻底摆脱国际警察以及摆脱克里斯托瓦可能的敲诈而运用的最佳计谋。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一定要实事求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克里斯托瓦夫妇与诺尔维克湖畔的杀人案有关系；他俩把我完全给骗了，虽然我瞧不起克里斯托瓦政治上的变节，也蔑视马赛拉的血缘关系。但同时我还要强调一点：有件事让人产生复仇的快感——根据我从克里斯托瓦的手稿内容得出的结论，他从来也没能发现马赛拉的情人是何许人氏。

经过几个月向警方朋友的电子邮件咨询，我可以把三人受

害的全部经过确定下来了；结果我吃惊地发现，那个被当作杀害博耶娜的主要嫌疑人而被捕的科索沃移民，最后供认他是杀人罪犯，解除了马尔库斯的责任。那个科索沃移民认罪的同时说道，博耶娜企图向警方指控他是林克比小区贩毒集团的成员。但是，我推测这个家伙之所以主动认罪是为了换取一笔交给他在阿尔巴尼亚的家属的钱；这个行动是完全可以得到证实的，因为在同一个日期，马尔库斯去过地拉那[1] ,用他的美国快汇金卡取出一大捆美金现钞，这在阿尔巴尼亚可是一笔真正的财富了。

在所有这些情况里，最让我感到茫然失措的是，一天下午，我在冰场上滑冰的时候，地点是在斯德哥尔摩昆斯特拉花园广场，博耶娜突然来找我谈话。那样子既笨拙又显得绝望，现在我已经完全理解她为什么会那样做。当时，我很粗暴，不尊重她的要求 我对她说 ,我现在享受着自己的自由时间 ,如果要拜访我，最合适的时间，是按照上班的规定，去机关总部找我。那时我不知道 ,由于黑手党人的恐吓 ,她不能去警察局找我 我也不知道，她打算利用这个唯一偶然出现的机会揭发坏人和拯救自己。

诺尔维克湖畔杀人案一直没有查明，但是有这样的假设：是一个立陶宛妓女杀害了波达诺夫，由于她已经回国，也就不可能传讯她了。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波达诺夫死于艾滋病，或者死于吸食过量的毒品，或者死于黑手党内部的算账。有一点是任何人也不知道，是我将来要带到坟墓里去的：我在七十年代就认识波达诺夫，地点在莫斯科克格勃开设的情报课程上，听课的是拉丁美洲的革命者。这些课程是为了抵抗智利警察的镇压行动而传授的方法；智利警察那时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和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的秘密特工的支持。那时波达诺夫是个健康、快乐的小伙子，优秀的共青团员，一个有许多少女追求的帅哥（很像法

[1]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首都。

国电影明星阿兰 ·德龙),有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可以支配,是个充满了活力的男子汉，随时准备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的战争中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努力认真地保存这些材料，这破坏了警察的规章和誓言；但是生活就是如此，正如克里斯托瓦 ·帕索斯所说的，人们保证做某某事，而环境迫使你做的是另外的事情。尽管如此，事实有可以减轻罪过的情节。这些供词由于是文学作品而缺乏法律价值；不应该把故事的叙述者与克里斯托瓦·帕索斯混为一谈。文本是不会变成现实的，尽管我用阅读小说的眼光接近文本，尽管我用准备享受书中的形象、准备把虚构看作现实、准备玩这场游戏、准备赞同作家的眼光接近文本。那个写下这些文字的克里斯托瓦——为了让这些文字变得更逼真，我无礼地做了些许修改——与那个小说（最后我又读了一遍）里的人物克里斯托瓦，是分别居住在两个世界里的不同的人；为此，一个犯罪的克里斯托瓦的供词当然不能牵连另外一个克里斯托瓦；同样，文学人物的供词也不能伤害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但即使小说的供词是真实的，仍然不能令我信服。

我断断续续地在想克里斯托瓦 ·帕索斯，那位活生生的作家，给现实补充了过多的阐释，因此创造出一种羊皮纸、一种新型、模糊而巨大的羊皮纸。我能在警察的文件里发现一些材料，例如，玛利亚的确死于过量服用安眠药；马尔库斯与妻子的身亡毫无关系，因为玛利亚去世之夜他没有回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博耶娜没有对帕索斯讲述这个关键性的细节，尽管也有可能博耶娜从来没有跟帕索斯多谈，也根本没有提及所谓马尔库斯杀妻一事；有可能所有这一切都是帕索斯的胡诌或者虚构。这位小说家最后把自己变成了小说故事的叙述者。此外，马尔库斯杀害博耶娜也是不可能的。警方的调查表明，博耶娜死于那个科索沃人之手。其余的一切可能是主人公帕索斯头脑发热的产物。

还有一个情况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不能保持沉默：无论克里斯托瓦·帕索斯还是他的前妻马赛拉都与那个俄国人波达诺夫之死没有关系；那个故事全都是作家帕索斯编造的，为的是展开情节和履行与一家颇有名气的出版社签下的第一份合同，仅此而已。我不记得究竟是哪一家出版社了：西班牙布拉内达？蒙达多里奥？还是阿尔法瓜拉？说实话，我很难相信一个像帕索斯那样手无缚鸡之力、身体瘦弱、面色苍白、动作笨拙的书生，能有力气像他描写的那样打击波达诺夫；更让我怀疑的是，波达诺夫在黑手党的高层里是个关键人物，居然没有保镖，独自在斯德哥尔摩活动。我倾向于这样的推测，马赛拉从来就没到过诺尔维克湖畔的住宅；要么就是她在帕索斯陪同下去过那里，在与波达诺夫讨论过假画的问题之后夫妻就离开了。但即使人所共知的是，波达诺夫是在作品里说的那一夜被杀害的，那么有可能是他手下的某个保镖干的，作案的时间是在帕索斯夫妇离开以后。我推测，可能是波达诺夫在俄罗斯向有影响的人士出售了过多的赝品，最后导致了他的死刑。那么有可能作品中的故事仅仅是作家帕索斯编造的弥天大谎罢了。

我无法弄明白的是，为什么帕索斯自杀的时间是在我到达阿尔布费拉之后呢？或许他以为我在跟踪他，以为我发现了他，知道了他的新身份证，以为瑞典会判处他终生监禁，会不同于他从前的岳父的命运。蒙图法尔上校逝世前已经摆脱了琐事的纠缠，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瑞士退休老人，尽管晚年大多时间局限在军人圈子里，一直担心有人会谋害他。马赛拉，上校的心肝宝贝，没能在父亲弥留之际守护在病榻前，也没能参加父亲的葬礼，其理由在我阅读了这些文字之后已经一目了然。在我藏起这些资料并且隐瞒了警方时，我没有犯法，没有 已经无事可做了，水面已经平静了，许多人死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所有这一切是否发生过；永远也不会知道这部长篇小说是真实的供词还是

虚构。但是，反正都一样，因为无论谁或者别的什么都没有力量改变这些事件的过程了。死者已经逝去；生者会活下去。

最后，在阅读并且修改了这些记录以后，有些附带的问题我要加以说明 首先，当然，一切都已经写入了克里斯托瓦·帕索斯这样的说法里了：生活已经预先安排在文学里了，因为作家克里斯托瓦如同出现在《堂吉诃德》里的克里索斯托莫一样也是自杀身亡，当作家发现马赛拉·蒙图法尔已经另有新欢时便做出了自尽的决定——塞万提斯笔下的克里索斯托莫也是如此，他发现倔强的牧羊女马赛拉不爱自己时就自杀了。出现在这部伟大作品中的马赛拉是当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其次，我还要说明的是，这些记录不能忠实地反映发生的事件，原因不仅是我根据自己对真实性的爱好而对记录的面貌做了修改，而且因为原来的作者一发现自己的手稿被妻子偷偷阅读过了，便决定润色加工，干脆设置陷阱，抹去现实主义风格，这样就可以不让马赛拉、出色的女演员了解他一开始打算写出的最新真相了。在这个意义上，眼下突出的疑问就是，改变故事是不是开始于这样一个时刻——虽然为时已晚：克里斯托瓦以为发现了有外遇的妻子的窥视的目光而公开决定修改材料；或者是不是这样的修改随后要蔓延整个文本，这样一来，甚至一个可信的故事、一个对事实独有的模仿性的反映、即虚构和现实充分而完美地结合所提出的断言，都会是谎言，都会是假象，使得开始时的意图失去价值，并否定任何天真和善意阅读这些记录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最关键的问题是，通过反复阅读，我能够隐隐约约看到我认为是明显的事情，是克里斯托瓦·帕索斯从来没有说明过的事情，或者是他在有意修改文本的保护下假装不知道的事情：马赛拉的情人不是别人，恰恰就是那个马尔库斯！这个结论我是反复仔细阅读了作品之后得出的，是根据这样一个事实得出的：在马尔库斯和克里斯托瓦认识以前，前者居然知道马赛

拉的名字；还根据这样一个情况，马尔库斯居然从他家花园里看见了帕索斯客厅里悬挂的绘画——我做过调查，这是不可能的；还有马尔库斯曾经企图从克里斯托瓦口中套出：马赛拉是否对丈夫忠实，这样套问的原因可能是，马尔库斯感到马赛拉身上有股要命的吸引力，他担心那种关系对她来说仅仅是一场冒险游戏。还不应该忘记的是，马赛拉、马尔库斯和克里斯托瓦三人在争吵的时候，她失去了理智，破口大骂马尔库斯，用的称呼是“你”,而不是此前一直使用的‘您”,她说“见你妈的鬼吧！”在这种背景下，我要强调一个可能将来重视不够的情况：马赛拉是学习过表演的，这可以让她不大费力地装假。不要忘记：马赛拉作为有才华的女演员，也有过令人惊讶的表现癖倾向。克里斯托瓦曾经用几章的篇幅生动地表现过这一倾向，尽管我时时刻刻地担心这些文字仅仅是作家想象的结果，因为马赛拉的确像一个讲求实际和性格内向的女人。我之所以坚持这个看法，是因为有一天我去巴罗马的豪宅拜访这位已经孀居的寡妇——她那百万富翁的丈夫已经去世，她告诉我：她不相信她的女友对丈夫不忠实；她说，她从来没有发现马赛拉身上有表现癖的倾向，这大概来源于作家们典型的发烧噩梦。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可以说明马赛拉和马尔库斯是情人的迹象：马尔库斯出现在帕索斯家里的时间，恰恰是在马赛拉说服丈夫急需与马尔库斯达成协议以及马尔库斯轻而易举地在马赛拉午睡时拿到了夫妻作案的证据之后。或者说是这样的情况：马尔库斯记性混乱，不记得此前是不是到过帕索斯家里，这只能解释为帕索斯不在家时，马尔库斯去过那里；为此，现在马尔库斯担心记忆力背叛了他的意识。如果用某种方式可以确认的话，有个偶然情况也是令人瞩目的：那份协议是可以让马赛拉加快速度改变现状和摆脱将来克里斯托瓦讹诈的唯一方式。那份协议保护了马赛拉的后方：无论克里斯托瓦还是马尔库斯将来都不能

对她施加压力。因此，有可能马赛拉和马尔库斯，那对斯德哥尔摩的情人，手里攥着假身份证，今天生活在美国佛罗里达、加勒比地区或者地中海沿岸的什么地方；一个我刚刚读完——这一次的确是最后一次了——的故事隐藏在那里，正在蓬勃地发展，正在重新窥探着他和她的动态。

好也罢，坏也罢，我已经修改了我觉得克里斯托瓦在描写斯德哥尔摩时的模糊、不足和附加的部分，我还补充了我认为对于正确理解作品有用的资料。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授予我的权力：克里斯托瓦已经死了，而我还活着。这部长篇小说具有这样罕见的力量，让我几乎辞去瑞典警察探长的职务；让我发现，我在那里的工作实际上仅仅是观察、联想和修饰某些事件，以便让这些事件浮出阴影,如同‘瓦萨号’沉船浮出水面一样 这个工作与克里斯托瓦·帕索斯从事的创造性劳动相去甚远。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要想放弃我新的乌托邦理想已经太晚了。这个理想就是在这个世界遥远的角落里，每天为恢复秩序和正义而拼搏，因为正如有一天我和波达诺夫在莫斯科地铁站秘密会晤时说的，也在斯德哥尔摩超市餐厅里对克里斯托瓦说的那样：在这个婊子养的生活里,应该相信点什么,应该有点理想。

今天上午，在重新坐到电脑之前，我准备打印这些记录并且将它们放进保险柜，目的是一旦我的骨灰撒在加勒比海（我梦想乘帆船前往），让这些没有标题的记录出版并且变成克里斯托瓦·帕索斯的遗作，我返回了于什霍姆小区。我需要在波罗的海面前散步；我需要在保护小区——正在昏睡——的街道两侧的白桦树林中间走过；我需要随意观看马尔库斯一家居住过的红色住宅——神秘的玛利亚在里面停止了呼吸，博耶娜在里面策划过阴谋；我还需要看看克里斯托瓦夫妇居住过的那座简朴、亲切的黄色住房——克里斯托瓦在里面写下了所有这些文字，如今落到了我手里，把我牵连进来并且奴役着我。我很想在那些水

泥台阶上停步，哪怕几分钟也好，那个缺牙的死神曾经在台阶上坐过，我渴望对车库看上一眼：马赛拉在那个倒霉的诺尔维克之夜，手里拎着那些犯罪的东西，从轿车里出来；我还渴望摸一摸那些灌木丛，马尔库斯带着他的小狗，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幽灵一样出现在灌木丛中。我沉浸在那一切中间，欣赏着那美丽的风景，但是皮衣的领子高高竖起，双手坚定地插进衣袋里，感觉寒冷像钻心的钢板贴在面颊上一样。突然，从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了报春鸟儿那微弱的、特有的和持之以恒的歌声……

奥里维罗·董甘